



列宁选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选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列 宁 选 集

(第 四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60年4月第1版 1972年10月第2版

197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888 每册 1.35元

目 录

1919—1923 年

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1—22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	23—40
目前的主要任务	24
向人民解释关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	25
对被动员者进行工作	26
对逃兵进行工作	27
直接帮助军队	27
缩小非军事工作	29
临近前线地区的工作	31
对军事专家的态度	33
肃清后方的反革命	36
动员全民作战	38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40
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41—57
给阿·马·高尔基	58—61
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62—69
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 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70—75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76—78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79—83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84—94
1	84
2	85
3	87
4	88
5	91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	95—105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 演说（1919年12月4日）	106—114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15—139
一	115
二	119
三	122
四	125
五	130
六	135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12月20日在俄共（布） 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40—145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	146—152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153—155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在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156—174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	175—177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78—269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178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180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183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 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188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 关系	195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202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211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221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232
十 几点结论	244
增补	258—269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258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260
三 意大利屠拉梯之流	262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264
五	268
怀恩科普的来信	269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草拟的）	270—276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277—288
《共产主义》（“为东南欧各国发行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 维也纳，自1920年2月1日第1—2期合刊至1920年5月8日 第18期）	289—291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292—307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	293
二 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处准备无产阶级专政?·····	296
三 纠正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的路线和改变 其部分成分·····	303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308—313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	31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	
(摘录)·····	315—343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7月19日)·····	315
3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7月26日)·····	332
4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7月30日)·····	337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344—360
论无产阶级文化·····	361—362
决议草案·····	361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363—372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20年12月22日在全俄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373—401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1920年12月 30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 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 委员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402—425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426—467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	427

形式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	430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	431
论原则分歧·····	438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衷主义·····	441
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学校”和“机关”·····	449
结论·····	459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	468—477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	
初稿·····	478—481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482—485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3月	
27日）·····	486—499
给阿捷尔拜疆、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达格斯坦、	
哥里共和国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	500—502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	503—540
代序·····	503
关于俄国现时经济（摘自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504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515
政治总结和结论·····	532
结论·····	539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1921年5月	
28日）·····	541—542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	
报告提纲（草案初稿）·····	543—552
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环境·····	543

2. 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544
3. 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545
4. 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	545
5.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军事联盟·····	546
6. 过渡到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	547
7. 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及租让制的意义和条件·····	548
8. 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548
9.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549
10. 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550
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	553—561
关于清党·····	562—564
十月革命四周年·····	565—573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574—581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俄共(布)中央1922年1月12日决议）·····	582—593
1. 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582
2. 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583
3. 实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583
4. 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私有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经济斗争之间的根本区别·····	584
5. 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586
6. 工会和企业管理·····	586
7. 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作用·····	587

8. 联系群众是工会任何工作的基本条件	589
9.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内部情况的矛盾	590
10. 工会和专家	591
11. 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592
政论家的短评 (论攀登高山, 论灰心的害处, 论贸易的好处, 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	594—602
一 打个比方	594
二 不用比喻	596
三 论捉狐狸; 论列维; 论塞拉蒂	598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603—612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1922年3月27日在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613—654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1922年4月2日)	655—657
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1922年11月13日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658—671
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一些意见	672—675
日记摘录	676—680
论合作制	681—688
一	681
二	685
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689—692
一	689
二	692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 建议)	693—697
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	698—712

注释	713—755
人名索引	757—765

伟大的创举

(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
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作战和艰苦奋斗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劳涣散现象的过程很缓慢，很困难，但一直在向前发展。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整顿、巩固和加强纪律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值得同样注意。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5月17日《真理报》¹登载了阿·日·同志《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我们

把它全部引来：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一封信，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情绪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要寻找新的方法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各地来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迫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原来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强度低，紧急的定货和机车的赶修不断拖延。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从口头转到用行动来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议上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自己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收到实际效果。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直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有些犹豫，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到了场，排成队伍，毫不拥挤地由领工员分派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效果。下表说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工作名称	工人 数目	工作时间		已进行的工作
			工作 小时	总数	
莫斯科 机车总 修配厂	装载发往彼罗沃、 穆罗姆、阿拉梯尔 和塞兹兰的铺路材 料以及修理机车和 车辆部件用的装备	48	5	240	装了7500普特材料 卸了1800普特材料
		21	3	63	
		5	4	20	
莫斯科客 车机务段	机车的复杂的日常 修理	26	5	130	总共修理了1.5个机 车
莫斯科 编组车站	机车的日常修理	24	6	144	修理好了2个机车， 拆卸了4个机车的应 修理的部分
莫斯科 车辆部	客车的日常修理	12	6	72	2个三等车厢
“彼罗沃” 车辆总修 配厂	星期六和星期日的 车辆修理和小修理	46	5	230	12个棚车和2个平车
		23	5	115	
	总 共	205	—	1 014	总共修理好了4个机 车和16个车厢，装卸 了9300普特材料

工作总值按普通报酬计算为五百万卢布，按额外工作报酬计算比这多一半。

装车的劳动强度较普通工人高百分之一百七十。其余工作的强度大致上也是这样。

消除了因劳动力不够和办事拖拉而把定货（紧急的）拖延七天至三个月的现象。

工作时，由于工具有小毛病，个别的组耽误了三四十分钟。

留下来指导工作的行政人员，几乎来不及准备新的工作。一个年老的领工员稍微有些夸张地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松懈的工人干一个星期。

由于一般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参加了工作，而且有大量这样的人要参加将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想学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

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各地的消息来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问题。

参加工作的约有百分之十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从铁道政治委员到各个企业的政治委员等负责人，以及由工会、铁道管理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的。

干起活来空前卖力和齐心。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毫不吵闹地把着四十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酷爱劳动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時候，心中油然而产生了一种出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并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一种空前未有的情景：一百多个身子疲乏但眼睛里放射出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事业的成功，仿佛胜利的歌声的浪潮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仿佛石头激起的水波荡向工人的俄罗斯，摇晃着疲乏无力的人们。

阿·日·

《真理报》5月20日在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范例》一文中评价这个出色的范例时写道：

“共产党员的这种工作情形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车站和各铁路线也有这样的情形。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做了几晚的额外工作，把陷在转盘里的机车搬起来；冬季，北方铁路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有好几个星期日都去扫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全体党员，为了同窃货行为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查，——不过这种工作是偶然的而不是经常的。喀山铁路的同志们提出了新办法，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直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这也就是他们工作的全部意义。他们决定在整个军事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提供了工作效率很高的范例。

这个范例已经引起而且应当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大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喀山铁路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大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定于5月17日。（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他们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

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喀山铁路的同志们说，他们的范例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大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额外工作，但是这样的消息一传出去，非党群众就动起来和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种工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喀山铁路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共产党支部，而且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向他们学习。至于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战士家属，实行代耕。

喀山铁路的同志们高唱着《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如果全俄罗斯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贯彻下去，那末，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全国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艰苦的月份……

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上写道：

“5月17日在亚历山大铁路上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九十八人，根据大会决议做了五小时无报酬的额外工作，只是有权再吃一顿午饭，而吃这顿饭是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一样的，各人自己出钱领半磅面包。”

尽管工作准备得不充分，组织得不很好，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一至二倍。

例如：

五个旋工在四小时内做了八十个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三。

二十个粗工在四小时内收集了六百普特旧材料和七十各重三点五普特的车辆板弹簧，总共重八百五十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百分之三百。

“同志们解释道，这是因为平时的工作做厌了，没有趣味，而在这里，大家干起来都兴高采烈。现在，如果平时做工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做得少，那就是可耻的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接到消息说，维亚兹玛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阿·嘉靖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写到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的主要部分摘引于下：

“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议，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几小时内暂时让脑子休息一下，让胳膊做些工作……我们被派往铁路局的木工厂。到了那里，看见了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了一会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三十人……面前躺着一个‘怪物’——重六七百普特的蒸汽锅炉，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动约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俄里，滚到平车跟前。我们心里有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往锅炉下面垫上木滚，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象是赖着不动，但终究移动了。我们很高兴，我们人是这样少……要知道，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还没有把这个锅炉拖动，我们来到后，才把它拖动了……我们在一个带头的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同心协力地使劲地干了一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忽然出了什么岔子！许多同志突然可笑地倒下去了，——原来我们手里的绳子‘变节了’……大约停了一分钟，换成了粗缆绳……天色已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才能完工。双手酸痛，掌心发烧，周身火热，满面通红，——事情见效了。站着的‘行政人员’惊于这种成就，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你早就该来帮忙了！一个红军战士很入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在家里过星期六，他们却在于什么呢？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不是什么偷懒的工作者，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我们干得多起劲，不偷懒，用力拖。’红军战士小心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是聪明的！’——乌·同志用洪亮出色的男高音唱着。我们

都和起来，小声地唱起工人的歌来：‘唉嘿，棒子呵，唉嘿，拖吧，拖吧……’

由于不习惯，身子疲乏了，肩背酸痛了，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饱睡一顿。目的快达到了，费了一些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个锅炉就可以做人们早就期待于它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地走进地方支部的‘俱乐部’，一间挂满标语、架有步枪、灯光明亮的房子，好好地唱完了《国际歌》，品了加了‘甜酒’的美茶，也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随后我们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排成纵队走去。夜阑人静中，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手和肩都休息好了，现在我们要到九俄里以外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修理车厢了。我们是到彼罗沃去。同志们爬到叫做‘美国人’的车厢顶上，雄壮嘹亮地唱着《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正象‘抢车的’乘客一样。眼前就是车站。我们已到目的地了，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碰见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人可太少了！三十个人要在六小时内把十三个进行中等修理的车厢修理好！面前就是划线完了的轮对，不仅有空车厢，而且有装满满满的一辆罐车……但不要紧，同志们，我们‘应付得了’！

工作沸腾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铁棒做工，也就是用杠杆做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肩膀和两条铁棒推压下，由‘带头的’同志指挥着，迅速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这对轮子收拾走了，又来收拾另一对轮子。每对轮子都放好了，我们就把这些破旧的东西，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架转动的起重机的吊到空中，轨道上再没有轮对了。那里，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活，又上油漆，又盖车顶，工作很热烈，使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很高兴。那里的铁匠们也需要我们帮忙。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个烧红了的‘挽杆’，也就是撞弯了的车钩杆。明晃晃的、冒着火花的车钩杆被钳到砧子上，凭着有经验同志的眼力，加上我们灵巧的锤击，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是明晃晃的就被我们迅速地拾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它就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挽杆的

构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和卷弹簧……

工作沸腾着，天快黑了，火炬燃的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蹲’在一堆车轮旁边，‘慢慢啜着’热茶。清凉的五月之夜，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笑语，笑声，辛辣的诙谐。

——格·同志，停工吧，修好十三个车厢就够了！

但格·同志认为这还少。

喝完茶后，我们高唱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并不限于莫斯科。6月6日《真理报》报道：

“5月31日在特维尔实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一百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做工。在三个半小时内装卸了十四个车厢，修好了三辆机车，锯了十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许多别的工作。熟练的党员工人的工作强度达到了平常生产率的十三倍。”

后来，6月8日《真理报》上又写道：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响应莫斯科同志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决定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做五小时额外工作。”

* * *

我极详尽地引证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资料，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无疑是共产主义建设极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一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大家也还没有作出足够的估计。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我们全体，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员等等都应该不倦地重复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击破他们的阴谋（如黑帮、立宪民主党人²以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⁴），这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愈往前去就愈要提出）积极地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这一更重要的任务。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但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无知的雇佣奴隶或受压迫的农民，备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自善良的愿望，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新社会的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⁵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他们害怕思索到底，害怕做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这个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并且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成更为残酷更为独特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一目的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了）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若认为一切“劳动者”都能同样地进行这一工作,那便是最空洞的词句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成长起来的,并且只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因为它是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因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做工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的平等这类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那样),谁就只是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别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虚幻的、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

是劳动群众，连同自己的亲属，都是千百次地遭受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即为了解决是英国资本还是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这一问题而屠杀数千万人的战争）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它用英勇果敢的精神，用毫不留情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打破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通向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不管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福荫”下去的倾向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但他们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不仅打破剥削者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联合组织的权力以外，即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力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力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

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绝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

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

* * *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受到 1870—1871 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雅可比说过，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⁶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句话说得很对。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建立德国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究应属于普奥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国中哪一个的问题。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因而我们也可以说，1919 年 5 月 10 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 1914—1918 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产者老爷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讥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

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回答这班老爷们说：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去帮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末变革会进行得更迅速，更和平。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不顾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始终如一地替资本服务，总是抓住虚伪透顶的论据：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陷入空想主义，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不切实际地迅速铲除过去的遗迹！

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实价值，也知道旧习俗残余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同新事物的幼芽相比必然居于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

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六百零五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六〇六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开始这个运动的，并不是境况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职业的工人，其中包括没有专长的工人，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很清楚地知道，现在不仅俄国一国，而且世界各国都有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低落的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疾病和饥饿。最后这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诸如此类的矛盾在实践上是靠这种循环的中断、群众情绪的转变、个别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这种转变中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人员等等白卫分子）是生活绝顶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饿肚子。请看，这些处在

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和疲乏，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从事不领任何报酬的额外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关键就在这里。既然熬过了四年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又熬过了一年半更艰苦的国内战争的饥饿工人，能于1919年夏季在饥饿的莫斯科开始这件伟大的事业，那末，当我们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并争得和平的时候，继续发展的情形又将是怎样的呢？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稀罕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所说的那样）。

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和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辞句，这

些辞句迷惑了各国的市侩和庸人，迷惑了现在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英雄们。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日常的问题提法来和这种堂皇的人权宣言相对立。由国家缩短工作日，就是这种提法的标本样式之一。⁷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也显得愈清楚，愈透彻。真正共产主义的“公式”与考茨基之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伯尔尼国际中他们的亲爱“兄弟们”的华丽、圆滑、堂皇辞藻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公式”把一切归结于劳动条件。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等等空话吧。现代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夸大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多设法使饥饿的工人和褴褛的农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用投机买卖或资本主义方式获得，而是象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一样用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工作来获得。

我们大家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谈革命问题的毛病现在还到处都有，甚至我们队伍里也有。例如，我们的报刊很少向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旧残余开火，很少支持普通的、质朴的、平凡的但是活生生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来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铲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

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有很多，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扫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扫清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消耗着她们的精力。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开始了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更确切地说，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我们在实践中对所有的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不反对的这个问题注意得很够吗？当然不够。我们对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关心得很够吗？再说一遍，非常不够。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这些设施不是新的，它们是由大资本主义造成的（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质前提一样），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极少，第二、——这点特别重要——是实行投机、渔利、欺骗、伪造等等的**营业性企业**，或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这种事业受到优秀工人的憎恶和鄙视是理所当然的。

毫无疑问，在我国，这样的设施已经比过去多得多了，而且它们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毫无疑问，女工和农妇中间的**组织人才**

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倍，她们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有更多消费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爱讲空话，无事忙，好争吵，空谈计划、体系等等。可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地照管这些新事物的幼芽。

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是多么会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在自己的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大肆赞扬资本家视为“模范的”企业，把资产阶级的“模范”组织当做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并不关心或几乎全不关心下述事情：描写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用一切办法使它们中间的某些组织变为模范组织，宣扬它们，并详细描述在模范的共产主义工作下能够怎样节省人力，怎样便利消费者，怎样节省产品，怎样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怎样改善卫生条件，——这一切都能做到，能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

模范的生产工作，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关心和诚实，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农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管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但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我们无疑是在全俄前进；收购的粮食从三千万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到一亿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业扩大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尽管燃料极其困难，但铁路运输已开始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 *

要好好地思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极重要的实际教训。

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创举，这是第一个主要的教训。“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也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宣布为“公社”；人们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

因此，在我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决定废除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名称的法令⁸是完全正确的。让名称普通一些，那末，新的组织工作的初期的缺陷和缺点就不会推到“公社”身上，而将由不好的共产党员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好是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禁止动辄使用这个字眼，或者只承认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证明（并由附近全体居民一致公认）有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能力和本领的真正公社，才有权用这个名称。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从事无偿的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做出模范的事迹，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最宝贵的例外。因为这里，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象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今后也要这样做，而且一定要这样做，凡是没有用艰苦的长期劳动的实际成效和真正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模范事迹来加以证实就把自己企业、机关或事业称做公社的人，都应当象骗子或空谈家那样受到无情的嘲笑和侮辱。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创举，在另一方面，即在建党工作中，也应当予以利用。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庸

俗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全体怠工，向资产阶级献殷勤，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强健的有力量的先进阶级为靠山的执政党要善于纯洁自己的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我们：胆小鬼和恶棍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是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创举继续清党：只把那些经过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候补期”的分子接收入党。凡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而没有以特别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可靠、对党忠实和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一切党员，都应当经过这样的审查。

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分不开的清党工作，定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最终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表露得非常明显。党中央写过一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①这是拥有一二十万党员（我预料在严格清党后将留下这样一个数目，现在党员人数是超过这一数目的）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响应。这样的工人在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四百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无产阶级

^① 指《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46—248页。——编者注

的国家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二十万和四百万，这就是两个“齿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比例。还有千百万农民，他们分成三大集团：第一个是同无产阶级最接近的人数最多的集团，即半无产者或贫农；其次是中农；最后是数量极少的集团，即富农或农村资产阶级。

只要还有可能买卖粮食和利用饥荒来做投机勾当，农民就仍是（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半劳动者和半投机者。作为投机者，农民是仇视我们、仇视无产阶级国家的，他们同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买卖粮食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直至孟什维克舍尔或社会革命党人波·切尔年柯夫）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劳动者**，农民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作为劳动者，千百万的农民大众是支持一二十万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并由几百万有组织的无产者所组成的国家“机器”的。

真正更民主的、同被剥削劳动群众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

正是这种“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定会彻底巩固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工作，而且只有这种工作，才会彻底使农民相信我们正确，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才会使农民成为我们无限忠实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才会把粮食困难完全克服，使共产主义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绝对巩固起来。

1919年6月28日

1919年7月在莫斯科用
单行本刊印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371—395页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致党组织的信)

同志们! 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国内和国外(首先是英法)维护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人, 拚命想使人民劳动的掠夺者地主和剥削者的政权在俄国复辟, 以便巩固他们正在全世界崩溃的政权。英法资本家用自己的军队夺取乌克兰的计划破产了; 他们在西伯利亚对高尔察克的援助也失败了; 红军在乌拉尔得到全体起义的乌拉尔工人的支援, 英勇前进, 迫近西伯利亚, 把它从当地统治者即资本家的空前未有的压迫和暴行下解放出来。最后, 英法帝国主义者用反革命阴谋夺取彼得格勒的计划也破产了⁴, 参加这次阴谋的, 有俄国的君主派即立宪民主党人² 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 甚至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现在国外的资本家拚命想借邓尼金的进攻来恢复资本的枷锁, 他们也象过去帮助高尔察克那样, 以军官、军需品、炮弹、坦克等等帮助邓尼金。

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 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 战胜邓尼金, 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胜利进攻。

目前的主要任务

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应按战时要求紧张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和关心尽量用来解决直接的战争任务，用来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犯，并把自己其余的一切活动缩小和改变，使之服从于这个任务。

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统一的军营。

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

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领导。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领导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把集体领导机关变为空谈场所，这是极大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实行集体领导时，委员会的人数和处理的工作范围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发出通报，做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稍有可能时，集体领导应限于在最小的委员会内最简短地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实际处理机关、企业的事情和任务的责任，则应委托一个素以坚强果敢见称、善于处理实际问题并享有最大信任的同志去担负。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都要最明确地规定每个人对一定事情所负的责任。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威胁着一切没有很多集体工作经验的人，而在军事上往往必然造成灾害、混乱、慌张、权力分散和

失败。

组织上的忙乱或不切实际是同样有害的。为了战争必须改造工作，但无论如何不应弄成改造机关，更不应匆忙地建立新机关。这是绝对不许可的，这只能造成混乱。所谓改造工作，应该是把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停止一个时候，或把它缩小到一定的限度。一切有助于战争的工作，应当完完全全通过现有的军事机关进行，要整顿、巩固、扩大和帮助这些机关。建立特别的“防卫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或军事革命委员会）只能是一种例外，这是第一；第二、要经过相当军事机关或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批准；第三、必须遵守上述条件。

向人民解释关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和唯一严重的敌人。如果没有协约国（英、法、美）帮助，他们早就完蛋了。由于协约国帮助，他们才成为一种力量。他们总是欺骗人民，有时装扮成“民主”、“立宪会议”、“民权”等等的拥护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甘心受他们欺骗。

现在关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他是一对双生子）的真相已完全揭穿了。枪杀几万工人；甚至枪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鞭打成县成县的农民；公开毒打妇女；地主子弟出身的军官横行无忌；大肆掠夺。关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就是如此。甚至原来是工人的叛徒、原来是站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方面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真相了。

全部的鼓动和宣传工作就是要使人民知道这一点。要向他们

解释,或者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或者是苏维埃政权即工人的政权(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能有。要特别利用那些不是布尔什维克提供的证据,即利用那些到过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那里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分子提供的证据。让每个工人和农民知道:究竟是为为什么进行斗争,假如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胜利,他们会遭到什么结果。

对被动员者进行工作

对被动员者进行工作,帮助动员,对已动员者进行工作,这是目前主要的关心对象之一。在已动员者集中或驻有警备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一切地方,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全体积极参加工作。他们全都应该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动员者和地方警备部队的士兵中进行工作,有的可以天天工作,有的可以每星期工作四小时或八小时,当然,要有严密的组织,每个人要由地方党组织和军事当局指定担负一定的工作。

居民中的非党分子或其他党的党员,当然不能进行反邓尼金或高尔察克的思想工作。但根据这一理由而不让他们做任何工作是不容许的。应该想出各种办法,使全体居民(首先是城乡中较富裕的居民)都出一分力,来帮助动员工作,来帮助已动员者。

要用特种办法来协助最迅速地最好地训练已动员的人们。苏维埃政权要征集所有的旧军官和士官等等。共产党以及全体同情分子和全体工人都应当来帮助工农国家:第一、尽力协助拿获一切逃避报到的旧军官和士官等等;第二、在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下,把那些在军事上受过理论教育或实际教育(例如参加过帝国主义

战争)而能出一分力的人组织起来。

对逃兵进行工作

近来反逃跑的斗争显然有了转变。在许多省份里，逃兵已开始大批返回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逃兵已涌到红军中来了。原因是：第一、党内同志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经常了；第二、农民日益意识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要恢复比沙皇制度更坏的制度，是要使工农再度成为奴隶，遭鞭笞，受掠夺，受军官和贵族侮辱。

因此，各地都要用全力加紧对逃兵进行工作，使逃兵回到军队里去。这是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之一。

顺便指出，能够用说服办法影响逃兵并取得成效，这表明工人国家同农民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它与地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后两种国家的纪律完全是靠棍棒或饥饿的逼迫来维持的。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纪律则能够依靠不同的东西，即由工人说服农民，工农结成同志联盟。当你听到目睹者讲述某省（例如梁赞省）有成千上万的逃兵自愿回来，讲述群众大会上向“逃兵同志”发出的号召有时收到无法形容的效果的时候，你才了解，工农的同志联盟中还蕴藏着多少未被我们利用的力量。农民有一种偏见，使他们赞成资本家，赞成社会革命党人，赞成“自由贸易”；但农民也有一种明见，使他们日益同工人结成联盟。

直接帮助军队

我们军队最需要供给衣服、靴鞋、武器和炮弹。在遭到破坏的

国家里，必须作巨大的努力才能满足军队的这种需求。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没有因缺乏军需供给而遭到崩溃，只是因为英、法、美资本家掠夺者给了他们慷慨的援助。

· 不管俄国受到怎样的破坏，但是国内还有不少的资源，我们没有加以利用，而且往往不善于利用。还有很多没有找到或没有清查过的军需库，还有很多没有利用的生产潜力，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于官吏们故意怠工，一部分是由于办事拖拉，忙于文牍，漫无条理，做事笨拙，——所有这些“往日的罪过”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威胁着向新社会制度“跳跃”的革命。

在这方面直接帮助军队是特别重要的。主管这件事情的机关，特别需要“焕然一新”，需要外援，需要当地工农自愿的、有力的、英勇的创举。

要号召全体觉悟的工农、全体苏维埃活动家尽量广泛地参加这种创举，要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试行各种办法在这方面帮助军队。在这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比在别的部门开展差得多，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需要却迫切得多。

收集居民中间的武器也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在经过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次人民革命的国家内，农民和资产阶级藏有很多武器，这是自然的不可免的现象。现在邓尼金进犯日急，必须用全力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谁隐藏或帮助隐藏武器，谁就是对工农犯了滔天大罪，应被枪决，因为他是罪人，他使成千上万的优秀的红军战士往往只因缺乏武器而在战场上遭到牺牲。

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搜查，找到了成千上万的枪枝。俄罗斯的其余地方不要落在彼得格勒之后，无论如何要赶上并超过它。

另一方面，枪枝藏得最多的无疑是农民，他们往往没有任何恶

意，不过是由于顽固地不相信任何“国家”等等。既然我们利用说服、巧妙的鼓动和适当的办法，做了很多很多的（在最好的省份里）工作，使逃兵自愿回到红军中去，毫无疑问，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出同样多也许更多的工作，使人们自愿交出武器。

工人和农民们！把暗藏的枪枝找出来交给军队！这样你们就能使自己不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毒打、枪杀和劫掠！

缩小非军事工作

为了执行上面简略提到的工作，即使是执行其中的一部分，也需要很多新的工作人员，而且是最可靠、最忠实、最有毅力的共产党员。可是到处都在诉苦，说这种工作人员不够而且过分疲劳，那末，从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人员呢？

毫无疑问，这种诉苦是颇有道理的。如果有谁来精确地计算一下，近二十个月来，依靠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同情在管理俄国的先进工人和共产党员是多么少，那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是我们管理得很有成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克服空前的困难，战胜直接或间接与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到处蠢动的敌人。除了一个敌人，即除了协约国，除了称霸世界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外，我们战胜了一切敌人，而且我们打断了协约国这个敌人的一只手——高尔察克；现在威胁我们的只是它的另一只手——邓尼金。

管理国家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新生力量在迅速地成长，这就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努力学习，吸收由新制度得来的新印象，抛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成见，把自己锻炼成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可是，不管这种新生力量成长得如何迅速，不管它在国内战争和资产阶级疯狂反抗的烈火中如何迅速地学习和成熟起来，但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还不能得到现成的国家管理人员。可是问题正在于最近这几个月，正在于 1919 年的夏秋两季，因为我们与邓尼金的斗争急需立刻解决，而且一定会立刻解决。

要获得大量现成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军事工作，就要缩小许多非军事的（或确切些说，不直接属于军事的）苏维埃工作的部门和机关，就要按这个方针（即缩小的方针）来改造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企业。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为了正确计算和分配一切科学技术力量，这是一个极有用的必要的机关。但这个机关是否绝对必要呢？当然不是。如果把一些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去做军队中的和直接为了军队的急需的共产主义工作的人，交给这个机关，那在目前简直是犯罪。

这类的机关和部门在我们中央和地方都很不少。我们要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不能不立即着手成立这类机关。但如果我们面临邓尼金的大举进犯，竟不能很好地改编队伍，停止和缩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会是傻子或罪人。

我们不当陷于张皇失措、忙乱不堪的境地，不当把什么机关都改造和关闭，不当开始建设新机关（匆匆忙忙地去做，特别有害）。我们应当在中央和在各地把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部门，暂时停闭三五个月（大概的），如不能完全停闭，则在这段时间内把它们尽量缩小，只留下绝对必要的工作。

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得到大批现成的、有经验的、忠实的、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或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来做军事工作，我们就可以冒一次险，使很多大大缩小的机关（或机关的某些部

门)在相当时期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把这些机关完全交给资产阶级的工作人员去料理。这并不是大的冒险,因为这指的只是非绝对必要的机关,自然,削弱这些机关(一半已停止了)的活动,会受到损失,但这种损失不会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灭亡。而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加强军事工作,立即大大地加强军事工作,那我们就灭亡。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并由此得出一切的结论。

如果各省县等等的机关或部门的每个领导者、每个共产党支部,抓紧时间向自己提出问题:某某机关或某某部门是否绝对需要呢?把它的工作停止或缩小十分之九,不留下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否会灭亡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就会迅速而坚决地缩小工作,把共产党员(以及他们在同情分子和非党分子中绝对可靠的助手)调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在最短期间派出成百成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就真有可能象战胜较强大的高尔察克一样战胜邓尼金。

临近前线地区的工作

最近几星期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临近前线的地区已经惊人地扩大和非常迅速地改变了。这是战争快到决定关头和接近结束的预兆或征候。

一方面,由于红军的胜利和高尔察克的瓦解,由于高尔察克占领区中革命的增长,乌拉尔和乌拉尔山一带的辽阔地区已经成为我们的临近前线的地区了。另一方面,由于我方的损失,由于敌人迫近彼得格勒,并从南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进犯,在彼得格勒近郊和南方,临近前线的地区更形扩大了。

于是临近前线地区的工作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红军迅速前进的乌拉尔山一带，我们军队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人员等等，以及当地的工人和农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在新收复地区安居下来，进行创造性的苏维埃工作；人们愈疲于战争，高尔察克的破坏愈严重，这种愿望就愈加自然。如果照这个愿望做去，那就再危险不过了。这会减弱我们的进攻，使我们的进攻停滞，而增加高尔察克恢复元气的机会。从我们方面来看，这简直是对革命的犯罪。

决不要从东线部队中多抽调一个工作人员来做地方工作^①！决不要减弱我们的进攻！要取得完全胜利，只有乌拉尔和乌拉尔山一带尝过高尔察克“民主”的可怕滋味的居民人人参加作战，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直到革命在西伯利亚取得完全的胜利。

让乌拉尔和乌拉尔山一带的建设工作推迟一下，让这种建设完全由当地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本事差的人去慢慢地进行吧。我们并不会因此灭亡。如果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那**们就会灭亡**，我们应当用乌拉尔起义工人的力量，用乌拉尔山一带农民的力量来加强这个进攻；因为这些工人和农民现在已经亲身认识到孟什维克马依斯基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立宪”诺言是什么，认识到这些诺言的真正内容即**高尔察克**是什么。

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就是背叛革命，就是背叛把工农从高尔察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

在刚解放的临近前线的地区进行工作时，要记住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不仅赢得工人而且赢得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实际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权这一工农政权的实质，一开始就把握住党根

① 没有绝对必要，一概不抽调他们，需要时，可从中部省份转调！

据二十个月的工作经验所定下的正确方针。我们在大俄罗斯有时所犯的、正在迅速纠正的那些错误，我们在乌拉尔不应重犯。

在彼得格勒近郊的临近前线的地区，在急速扩大的乌克兰和南方的广大临近前线的地区，要把一切转入战时状态，使一切工作、一切努力、一切考虑完全服从于战争，而且只服从于战争。否则就不能击退邓尼金的进犯。这是很明显的。要清楚地了解和完全实现这一点。

顺便说说，邓尼金军队的特点是军官多，哥萨克多。这种成分没有群众力量作后盾，却非常善于迅速袭击，进行冒险和拚命的活动，来散布惊惶心理，为破坏而破坏。

在同这种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最高度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警惕性。贻误时机或张皇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党或苏维埃的每个负责的工作人员都应当估计到这一点。

在军事上，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有军事纪律！

要有军事警惕性和严格性，要不屈不挠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

对军事专家的态度

以出卖彼得格勒为目的的红丘炮台大阴谋又一次特别迫切地提出了关于军事专家和肃清后方反革命的问题。毫无疑问，粮食和军事状况的尖锐化必然使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会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加强起来（参加彼得格勒阴谋的有“复兴会”⁹，既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是只有个别人参加，但终究是参加了）。同样无疑地，最近期间，在军事专家中定会象在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

革命党人中一样，出现更多的叛变者。

但因此就主张根本改变我们的军事政策，那就是不可挽回的错误和不能饶恕的怯懦心理。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叛变我们，而且将来还会叛变我们。我们将捕获他们，枪毙他们，但我们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一直在长期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便不能把从过去可恨的游击习气中生长起来的并在东部获得辉煌胜利的红军建立起来。领导我们军事机关的富有经验的人们公正地指出，在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的地方，在纪律最巩固的地方，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一般讲来，甘愿叛变的军事专家就最少，他们实现自己的阴谋的机会就最少，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游击习气及其痕迹、残余和遗毒给我军和乌克兰军队所造成的祸害、瓦解、失败、灾难以及人员和军用物资的损失，比军事专家的一切叛变所造成的大得无法计量。

在我们的党纲中，对于一般资产阶级专家问题，对于其中的一种专家即军事专家的问题，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要“无情地反对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以为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就能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①。

自然，党同时对于“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党现在镇压而且将来还要“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自然，当这类“阴谋”出现或露出一些苗头的时候，“无情镇压”所要求的品格，和“长期锻炼”所要求所培养的当学生的那种从容不迫、小心谨慎的品格是不同的。接受同军事专家“共事的长期锻炼”的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748页。——编者注

人们和埋头于“无情地镇压军事专家反革命阴谋”这一直接任务的人们之间在心情上的矛盾，很容易会引起而且正在引起摩擦和冲突。由某种反革命“阴谋”事件引起的、尤其是由大阴谋案引起的必要的人事变动，有时是大批军事专家的调动，也会引起同样的情形。

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要通过党的途径来解决，并要求党的一切组织都这样做，一定要使实际工作不受任何损失，在采取必要办法时毫不迟延，在实行我们所规定的军事政策原则时毫不动摇。

如果党的某些刊物对军事专家发出不正确的论调（象不久前在彼得格勒有过的那样），或在个别情形下对军事专家的“批评”已直接妨害到坚持不懈地利用军事专家的工作时，党应当立即纠正这种错误，不断纠正这种错误。

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手段是加强军队和被动员者的政治工作，抓紧军队政治委员的工作，改善他们的成分，提高他们的水平，要他们实际执行党纲所要求的而往往执行得非常不够的东西，即“把对（军队）指挥人员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从旁批评军事专家，企图“一举”改正，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而也是毫无希望的和有害的。让所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关心我军缺点的人都加入队伍，当红军战士或指挥员，当政治工作人员或政治委员，让每一个人（每个党员都会找到适合他的才能的工作）都到军事组织内部去为改善这种组织而工作吧。

苏维埃政权早就非常注意使工人、农民尤其是共产党员能够认真地学习军事。许多学校、机关和训练班都在这样做，但做得还非常不够。在这里，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毅力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共产党员应当特别用功地学习机关枪、大炮、装甲车等等的

操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落后，拥有大量军官的敌人占着优势，不可靠的军事专家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在这方面共产党员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肃清后方的反革命

象去年7月一样，反革命在我们后方、在我们中间又在抬头。

反革命已被战胜，但远未被消灭，它当然要利用邓尼金的胜利和粮食困难的严重情况。那些动摇的、无气节的、用言论来粉饰自己行动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跟着直接的和公开的反革命走，跟着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走，这些反革命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拥有资本，同协约国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知道专政不可避免并具有实现这种专政（按高尔察克方式）的才能。

在这方面不要有丝毫的幻想！我们知道产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乱和反革命阴谋等等的“策源地”，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农村中则是富农，还有各地的“非党”人士，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要监视这些人，要十倍严密地监视这些人。要十倍提高警惕性，因为从这方面来的反革命阴谋，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发生炸毁桥梁、组织罢工、进行种种间谍活动的事件，也是很自然的。在反革命“策源地”稍微能够“栖身”的一切中心，都必须采取各种最有力的、有系统的、反复的、普遍的和突然的预防措施。

在对待孟什维克、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要估计到最近这次经验。在他们的“外围”中，在倾向于他们的人们中，毫无疑

问，发生了一种变动：脱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靠近苏维埃政权。我们估计到了这种变动，每当这种变动稍微现实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从自己方面采取某种相应的步骤。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改变自己的这种政策，一般讲来，从倾向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主义方面“投奔”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主义方面的人数，无疑是会增加的。

但在目前，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无气节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旧是顺风转舵，倒向胜利者邓尼金。这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一般“著作家集团”的“政治领袖”（如孟什维克中的马尔托夫之流，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切尔诺夫之流）来说，特别正确。这些“著作家集团”的成员，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还因他们在政治上的完全破产而大为恼怒，所以，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冒险的“嗜好”未必是能够根除的。

决不要被他们领袖的言论和思想以及他们个人的诚恳或伪善所欺骗。这些东西对他们每个人的履历是重要的。但从政治上看，从阶级关系、从几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马尔托夫之流“代表中央”郑重地斥责自己的“积极派”¹⁰，并以开除他们的党籍相威胁（永远都是威胁！）。但这并没有消除下述事实：这个“积极派”是孟什维克中最有力量的人，他们藏在孟什维克后面，干着他们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式的勾当。沃尔斯基之流斥责阿夫克森齐也夫和切尔诺夫之流，但这毫不妨害阿夫克森齐也夫和切尔诺夫强过沃尔斯基，毫不妨害切尔诺夫说：“我们现在不推翻布尔什维克，更待何人何时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能不与反动派即切尔诺夫之流勾结而“独立地”“进行工作”，但他们实际上也是邓尼金的同盟者和他的走卒，正象由于“思

想”原因而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高尔察克开放战线的、已死去的前任总司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一样。

马尔托夫和沃尔斯基之流自以为“高于”交战双方，自以为能够建立“第三种势力”。

这个愿望即使是真诚的，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他们在 1848 年已经过了七十年的现在，还没有学会这一初步常识：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实现任何第三种专政。大概马尔托夫之流至死也不会抛弃这种幻想。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要记得，在实践中，这班人总不免今天倒向邓尼金，明天倒向布尔什维克。而今天应该做今天的事。

我们的任务是直接提出问题。怎样更好呢？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中“起来”（有的用武器，有的用阴谋，有的反对动员，如参加孟什维克组织的印刷工人或铁路员工那样等等）反对苏维埃政权亦即拥护邓尼金的几百个叛乱分子一律逮捕，关进牢狱，甚至枪毙呢，还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把几万工人和农民斩尽杀绝，一律枪毙，一律打死？要选择并不难。

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

谁要是至今还不了解这一点，谁要是只会哭叫这个决议“不公正”，那他就是不可救药的人，就应当遭受公众的嘲笑和侮辱。

动员全民作战

苏维埃共和国是被全世界的资本包围的要塞。只有那些积极参加战争并极力帮助我们的人，才有权把这要塞作为躲避高尔察

克的避难所，才有权在其中居住。因此，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动员全民作战，有的去直接作战，有的去参加配合作战的各种辅助工作。

要彻底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理想的组织。既然我们的国家组织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如果估计到它还年轻，还是新事物，它的发展遇到特殊的困难，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要想在这方面一下子大规模地实现得很彻底或者哪怕很广泛，那是极有害的不切实际的组织计划。

但为了接近理想，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局部的事情，我们党的活动分子和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创举”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同志们注意就够了。没有必要做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或规定。

我们只要指出，那些最接近苏维埃政权而照例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例如“左派”孟什维克等等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称之为“野蛮的”人质制特别愤慨。

让他们去愤慨吧，但不这样就不能进行战争，而且在危险日增的情况下，的确须要经常大量地使用这种手段。例如，孟什维克的或者说黄色的印刷工人，铁路上的“管理人员”和秘密投机者，富农，城乡的有产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对待抗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事业往往采取极端犯罪、极端无耻的冷淡态度，进而转为怠工。应该开列这类人的编组名单（或强迫他们自己编成连环保的小组），不仅要他们去挖战壕，象有时做过的那样，而且要他们从各方面给予红军以各种的物质帮助。

如果我们更广泛、更多方面、更巧妙地应用这种办法，红军战士的田地就会耕种得好些，红军战士的食品、烟草及其他必需品的

供给就会组织得好些，成千上万的工农因个别阴谋事件等等遭到死亡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共产党员、所有觉悟的工农、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立即在最近几个月内空前地振作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既然饥饿和疲惫的莫斯科铁路员工，不分有专长工人或粗工，能够为了战胜高尔察克，在完全战胜高尔察克以前一直坚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每个星期无报酬地做几小时的工作，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比平常高许多倍的劳动生产率，那也就证明，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应当做出很多的事情。

那时我们一定会胜利。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写于1919年7月3日以前

载于1919年7月9日《俄共(布)
中央通报》第4期

按《俄共(布)中央通报》原文
刊印并根据列宁修改过的
打字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397—414页

论 国 家

(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¹¹)

同志们！根据你们订的和你们通知我的计划，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国家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没有弄错，你们的训练班是才开课，你们是初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既然如此，第一次就讲这个困难的问题，很可能讲得不能使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充分明白，充分了解。要真的是这样，我请你们不要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可以说，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此，绝对不要期望在一次短短的讲话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你们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演以后，应该把自己不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反复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和谈话中继续把它们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并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

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你们每天都会因为某种原因一再遇到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你们要从阅读中，从听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谈话和讲演中，学会独立地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每个细小问题上，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在谈话中，在同敌人争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们只有学会独立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做了这几点点小小的说明之后，现在我来谈本题，谈谈什么是国家，它是怎样产生的，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应当是怎样的。

我已经说过，未必找得到第二个问题，会象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不仅宗教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自以为没有宗教偏见的人，也往往把专门的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并且企图树立一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它把某种不是来自人类本身而是来自外界的东西赋予或可能赋予人们，它是上天赐予的

力量。必须指出，这个学说同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的利益有极密切的联系，处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深深浸透了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的一切习惯、一切观点和全部科学，因此，你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一学说的残余，甚至那些愤慨地否认他们受宗教偏见支配并且深信自己能够清醒地看待国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的观点也不例外。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一切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人们总是利用国家学说来为社会特权做辩护，为剥削的存在做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做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期望人们公正无私，期望那些自以为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当你们熟悉了和充分钻研了国家问题的时候，你们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到这个斗争在各种国家观点的争论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的估计上反映或表现出来。

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¹²。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

易懂，其中有几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又要说，如果你们读这部著作时不能立刻全部了解，那也不必懊丧。这种情形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了解，也会了解它的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是从叙述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怎样产生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及其产生的条件的问题）一样，要正确地认识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谈到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有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分成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家长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碰到比较确定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做国家。

在原始社会里，在人们还生活在不大的氏族中，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野蛮状态的时候，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见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那时妇女还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什么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

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的特殊等级的人，大家知道，现在，这种暴力机构就是武装部队、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落后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做奴隶主。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

别人的人则叫做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做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并强迫他担任某种劳役。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商品交换、货币权力中间产生了资本权力。在十八世纪，更正确些说，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排挤掉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同时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他们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你们根据这种基本划分来观察国家,就会看出,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分为阶级以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国家也产生和巩固起来。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虽然有过极大的历史变化,发生过各种与人类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到现在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政治变迁和革命,但你们总可以看到国家出现的事实。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变,

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暴力机构、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详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于国家的实质及其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难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一切奴隶的机构。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构迫使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的强制机构不可。当阶级没有的时候，这种机构也就没有。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

划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共和制是一切政权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政权，民主制是人民的政权（民主一词按希腊文直译，意思是人民的政权）。这些区别都是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在任何古代史讲习班听讲这一课时，你们都会听到君主国家和共和国家互相斗争的情况，但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法典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是把奴隶除外的，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唯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管

理形式确实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内的情形也是如此。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由此就有农奴制这一概念。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工作一定的天数，而在其余的许多天内则替老爷工作。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能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其实，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广阔了，因为农奴制农民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农奴制农民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工作，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了。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更大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农奴制社会有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因素，这在当时就导致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不一样，也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虽然后者显得弱得多），但始终只有农奴主-地主才算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无论在奴隶制或农奴制之下，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不可能不采取强制手段。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¹³，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

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国内战争。整个农奴制时代也同样充满着不断的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也多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农奴主-地主的起义。

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

由于贸易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结果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工具，货币周转造成了巨量财富集中在一人手里的可能。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阶级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好象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以前那种分为奴隶主和奴隶的现象已经消灭；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多少资本或占有多少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或

者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被废除时（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在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造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起来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受到破坏，农民已有可能占有土地了。至于这种土地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按代役租制度取得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给予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用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宣称它保护全部私有权，并对私有权进行各种各样的帮助和袒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

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其实，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现在，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强制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的，而他们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所以现在，当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且已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候，当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目前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我们无论拿俄国或任何一个较为文明的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来看，都可以看到，几乎目前所有各种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象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呢，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农的统治权力的机器呢？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根本问题。人们怎样议论布尔什维克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如果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心地纯朴（也许不是由于纯朴，也许这种纯朴，如俗语所说的，比撞骗还坏），认为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和民权是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在最富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谣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重复

着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等等。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极大的责难，在全世界上重复着。这种责难使我们一定要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做辩护的各种各样的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恰巧讲到，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的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也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对全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如此明目张胆的贿赂手段（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点）。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全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队伍去同资本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农奴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展。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别有用心心的伪君子、学者和神甫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使命，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甫等等），就是许多只是受资产阶级自由的偏见影响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这种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做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这两个国家是民主共

和国，不管它们粉饰得怎样漂亮，不管它们说什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但是，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在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占统治地位，只要工人企图把自己的地位作稍微重大的改善，就立刻会引起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但是愈往后，工人的眼睛就愈明亮，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就传布得愈广泛，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以后。工人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无情的斗争。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末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我们要把这个机器拿到应该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手里。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因为这是一种骗局，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摒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自己来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

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讲演中还谈到这个问题,还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第一次载于1929年1月18日

《真理报》第15号

按速记记录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428—444页

给阿·马·高尔基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梅奇！我愈是细读您的信，愈是考虑来信的结论和信中的叙述（以及我们几次见面时您所谈的）的联系，我便愈加确信，不论是这封信，或是您的结论，或是您的一切印象，都是完全不健康的。

彼得格勒是近来最不健康的一个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居民经受的苦难最多，工人献出的优秀力量也最多，饥荒很严重，战争危险也很严重。您的神经显然受不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大家劝您换换地方，因为使自己的神经失常到病态的地步是极不明智的，就从最简单的考虑来说，也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说从其他观点来考虑了，可是您却固执己见。

在您的信中，也和您的谈话中一样，尽是一些不健康的印象，使您得出了不健康的结论。

您从痲疾和霍乱谈起；接着就发出一种不健康的怨言，说什么“博爱啦，平等啦”。说来无意，而听来却象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被围困的城市的贫穷、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

往下便对“低级”文学（什么文学？为什么与加里宁有关？）说了一些我简直无法理解的刻薄的话。而结论似乎是“剩下来的极少数有理智的工人”说：他们“被出卖”“给农夫当俘虏了”。

这就太没有道理了。怎么，难道加里宁犯了把工人出卖给农夫的罪吗？听来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十分幼稚、愚蠢、用“左的”词句代替理智的工人，或者是

心神不安、受过折磨、挨饿、有病的工人，或者是很善于歪曲一切，很会抓住任何一件小事来发泄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深仇大恨的“贵族残余分子”，才能捏造出这种事情来。您在信中也提到这些残余分子。他们的情绪有害地影响着您。

来信说，您看到“各种各样的阶层的人”。看到是一回事，在整个生活中天天接触又是一回事。您主要接触的是这些“残余分子”，因为单是您的职业就使您“接待”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您的生活环境了。

“残余分子”倒似乎是“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大多数工人”却在产生坏人、混入党内的“共产党人”，等等！于是您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干革命不能靠坏人，不能不要知识分子。

这完全是一种在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变本加厉的病态心理。

现在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卫分子的）去与坏人作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发泄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在逐月增长。这在彼得格勒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彼得格勒是一个失去地位（和理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特别多的城市，但是，从整个俄国来看，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要想在彼得格勒或者从彼得格勒来确信这一点，只有非常了解政治情况，具有特别丰富的政治经验才行。您没有这一切。而且，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在最好最难得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过是徬徨迷惘，悲观绝望，呻吟叹息，重

复旧成见，担惊受怕，惶惶不安。

要观察，就应该在下面观察，在下面可以看看重新建设生活的工作，在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农村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只观察就行了。可是您不这样做，反而把自己摆在翻译作品之类的职业编辑的地位上。在这个地位上观察不到新生活的新建设，会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听病态的知识分子的牢骚上，浪费在观察处于极端严重的战争危险和极度贫困的条件下的“故”都上。

您使自己所处的地位，使您不能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生活中的新事物；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 and 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没有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劝您离开，您又执拗地拒绝。

显然，您把自己已经弄到了病态的地步：您来信说，您对生活非但感到很沉闷，而且“非常厌恶”!!! 那是当然的！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困在一个最头痛的地方，作一个翻译文学的编辑（这可真是对于观察人，对于一个艺术家最适当的工作！）。在这里，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进行观察和研究。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在彼得格勒可以搞政治，但是您不是政治家。今天是无端打破玻璃，明天是枪声和狱中的叫喊，接着是留在彼得格勒的不工作的人中最疲惫的人的一些闲话，然后又是知识分子的、没有首都的首都知识分子的千千万万的印象，接着又是受委屈的人们的千百种诉苦，在编辑工作之余不可能看到任何的生活建设（这种建设在彼得格勒是按独特方式进行的，而且又最少），——这怎么不把自己弄到感觉生活非常厌恶

的地步呢。

全国正紧张地进行着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被推翻而疯狂地实行报复。这是自然的。为了报复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批打击从四面八方袭来。这也是自然的。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那些不是对首都举行疯狂进攻、对各种阴谋作激烈斗争、表现出首都知识分子的深仇大恨的中心所在的地方，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

生活令人厌倦，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分歧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呢，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指出。其实这是两种人的情绪的分歧：一种是从事政治或者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的斗争的人的情绪，另一种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大首都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情绪。

对您的信我率直地说出了我的看法。从（和您的）谈话中，我早就有了这样的看法，但是您的信把从您谈话中得到的那许多印象综合和固定下来了，总括起来了。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否则生活就会完全令人厌倦了。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1919年7月31日

寄往彼得格勒

1925年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5卷
第408—412页

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同志们！红军从高尔察克手里解放了乌拉尔全境，并已开始解放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农兴高采烈地欢迎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正在以铁帚扫除一切用苛捐杂税、凌辱、鞭挞和恢复沙皇压迫来折磨人民的地主资产阶级恶棍。

红军解放乌拉尔和进入西伯利亚，使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但这不应该使我们泰然自若。敌人还远未被消灭。敌人甚至还没有被彻底打垮。

必须用一切力量把高尔察克、日寇和其他外寇赶出西伯利亚，更加努力地消灭敌人，不让敌人再来奸淫虏掠。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痛苦经验，以及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弄得困苦不堪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我们是不应当白白放过的。

要预防高尔察克叛乱的重演，全体工农、全体劳动者应当从这一经验中取得五大教训。

第一个教训。要保护工农政权，打垮地主资本家匪帮，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红军。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证明：我们能够建立强大的红军，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指挥红军和战胜资本家，尽管资本家从世界最富强的国家得到大量武器和军需品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已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有工农，如果是觉悟的话，就应当不是根据空话（相信空话是愚蠢的）而是根据乌拉尔和西伯

利亚千百万人的经验来相信布尔什维克。把工农武装同大部分是同情地主资本家的旧军官的指挥结合起来，是一个极困难的任务。只有最巧妙地进行组织工作，实行严格的自觉的纪律，只有广大群众信任工人政治委员这些领导人员，这个任务才能解决。布尔什维克已把这个极困难的任务解决了。旧军官的叛变行为在我们这里有过很多，但红军不仅仍在我们手中，而且学会了战胜沙皇将军和英法美等国的将军。

因此，凡是真正想消灭高尔察克叛乱的人，都应当把一切力量、一切资财、一切能力完全贡献给建立和巩固红军的事业。忠诚地执行一切关于红军的法令和命令，维护红军的纪律，用一切办法帮助红军，——这就是一切不愿意受高尔察克蹂躏的觉悟的工农所应尽的第一个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义务。

必须尽力克服游击习气，严防个别队伍擅自行动和不服从中央政权等等行为，不然就会招致灭亡，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谁不全心全意地帮助红军，不用全力维持红军中的秩序和纪律，谁就是卖国贼和叛徒，就是高尔察克的帮凶，就应该被无情地枪毙。

我们有了强大的红军就会是不可战胜的。没有强大的红军，我们必然会成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牺牲品。

第二个教训。国家没有大量的存粮，红军就不能巩固，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自由调动红军，不能好好训练红军。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维持为军队做工的工人的生活。

一切有觉悟的工农应当知道和记住，现在我们红军的胜利不够迅速和稳固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国家的存粮不够。谁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谁就是帮助高尔察克，就是叛卖工农，就是使红军中几万

工农枉然遭受牺牲或痛苦的罪人。

骗子、投机者和愚昧无知的农民都这样议论：我把粮食按自由价格出卖，比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卖赚得多得多。

而问题正在于自由出卖使投机增长，使少数人发财，使富者愈富，而工人群众则仍旧忍饥挨饿。这是我们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最丰富的产粮区所实际看到的情形。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资本抬头，劳动者挨饿受穷。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粮价高到几千卢布一普特，货币贬值，少数投机者发财，人民愈来愈穷。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国家没有存粮，军队软弱无力，工业奄奄一息，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必然胜利。

只有富人，只有工农政权的死敌才自觉地主张自由出卖粮食。凡因愚昧无知而主张自由出卖粮食的人，应当从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例子得到教训并懂得，为什么自由出卖粮食就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

还有一些无知的农民，他们是这样议论的：让政府照战前价格用很好的货物来换我的粮食，那我就交出余粮，不然我就不交。骗子和拥护地主的人常常利用这种言论引诱无知的农民“上钩”。

不难了解，工人国家已被资本家为争夺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四年强盗战争破坏无余，后来又被高尔察克、邓尼金在全世界资本家帮助之下大肆报复破坏，这样的工人国家目前是无法给农民货物的，因为工业在停顿中。既无粮食，又无燃料，又无工业。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把余粮借给挨饿的工人，以便将来得到工业品。

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除了骗子和投机者以外，一切觉悟的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把所有的余粮全部借给工人国家，因为这

样一来，国家就能恢复工业，把工业品供给农民。

有人会问我们，农民是否会相信工人国家而把余粮借给它呢？

我们回答说：第一、国家给予借券即纸币。第二、所有农民根据经验知道，工人国家即苏维埃政权是帮助劳动者而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因此，苏维埃政权也就叫做工农政权。第三、农民没有其他出路；或者相信工人，或者相信资本家；或者信任工人国家，把粮食借给它，或者信任资本家的国家。在俄国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内，农民没有其他出路。农民愈觉悟，就会愈坚定地拥护工人，愈坚决地尽力帮助工人国家，使地主资本家政权无法复辟。

第三个教训。要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必须遵守极严格的革命秩序，必须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和命令，并监督所有的人来执行。

根据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取得胜利的例子，我们大家都明显地看到，稍微混乱，稍微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令，稍不当心或稍许懈怠，都会立刻加强地主资本家的势力，促成他们的胜利。因为地主资本家还没有消灭，还不承认失败。凡是有理智的工人和农民都看见、知道和懂得，地主资本家只是被击溃和躲藏起来，他们往往涂上了“苏维埃的”“保护”色。许多地主钻进了国营农场，许多资本家钻进各种“管理总局”和“中央管理局”，变成苏维埃职员；他们时刻窥伺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和弱点，以便把它推翻，以便今天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明天帮助邓尼金。

必须用全力侦察和捕获这些强盗，这些隐藏的地主和资本家，把他们从一切掩蔽所里揭发出来，无情地惩治他们。他们是劳动者的死敌，是有本事有经验的奸猾的敌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施展阴谋的有利时机；他们是怠工者，他们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危害苏维埃政权。对付劳动者的这种敌人，对付地主、资本家、怠工

者和白匪，必须是无情的。

要善于捕获这些人，就必须机敏、谨慎、有觉悟，必须极细心地注视每一个极小的混乱现象，注视每一个不老实地执行苏维埃政权法令的极小的行为。地主和资本家是有力量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经验，不仅因为他们有世界上富强国家的援助，而且因为存在着广大群众的习惯和愚昧的势力，这些群众想“照旧”生活，而不了解必须严格地诚实地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

极小的犯法行为，极小的破坏苏维埃秩序的行为，都是劳动者的敌人立刻可以利用的漏洞，都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取得胜利的机会。高尔察克叛乱就是起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稍欠谨慎，起于个别部队稍微违反命令。忘记这一点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第四个教训。不仅把高尔察克叛乱起于小事这点忘记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把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³促成高尔察克叛乱、直接支持这次叛乱忘记，也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是学会不按言论而按行动来评价各个政党的时候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白卫分子的帮凶，是地主资本家的帮凶。实际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个别的事实，而且有俄国革命历史上的两大时期：（1）克伦斯基执政，（2）高尔察克统治。在这两次事变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实际上则起了白卫分子的帮凶的作用。现在，他们提议再允许他们“试验”一次并把这叫做实行“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统一战线”，难道我们竟愚蠢地相信他们吗？在高尔察克叛乱以后，除了个别的人而外，难道农民还不懂得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就是同高尔察克的帮凶讲统一吗？

有人会反驳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认识了自己的

错误，再也不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了。但这不是事实。第一、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没有放弃这种联盟，而同这些“右派”又没有一定的界限，其所以没有，应归罪于“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也只是口头上“斥责”他们的“右派”，实际上却违反自己的言论而软弱无力地与右派为伍。第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也拥护高尔察克的主张，帮助资产阶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掩盖这些人的肮脏的血腥的资本主义事业。这种主张就是：民权，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立宪会议，出版自由等等。在全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共和国正是用这种“民主”谎言来为资本家的统治辩护，为奴役殖民地的战争辩护。在我国，无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或任何一个将军都乐意许下这种“民主”诺言。是否可以信任这些听信口头诺言而帮助公开的匪徒的人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一例外地都在帮助公开的匪徒，帮助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用假民主的口号粉饰他们的政权，粉饰他们对俄国的进攻，粉饰他们的统治，粉饰他们的政策。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向我们提议缔结“联盟”，其条件是我们向资本家及其领袖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让步，例如“放弃恐怖手段”（当我们面对着整个协约国即富强国家联盟的亿万富翁在俄国策动阴谋，采用恐怖手段的时候），容许粮食自由贸易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些“条件”含义就是：我们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要倒向资本家方面，又要同资本家利用每种让步来加以反对的布尔什维克结成“统一战线”！不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现时别想在俄国找到能够相信你们的人了。在俄国，有觉悟的工农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的帮凶，其中一部分人是自觉地恶意地这样做，另一部分人是由于缺

乏理智，由于坚持旧错误才这样做，但他们都是白卫分子的帮凶。

第五个教训。要消灭高尔察克和高尔察克统治，不让他们卷土重来，所有的农民都必须毫不动摇地作出拥护工人国家的选择。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当做稻草人来吓唬农民。

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稻草人了。

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只有公子少爷、蹩脚的知识分子这些连坏书都学得很差的先生，才会凭空幻想中间道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中间道路，而且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民权、立宪会议、自由等等漂亮词句掩盖着的），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没有从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中学会这一点，谁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而在俄国，我们大家都看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在高尔察克统治下是怎样幻想中间道路的。

这些幻想是为谁效劳呢？这些幻想帮助了谁呢？只帮助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幻想中间道路的人就是高尔察克的帮凶。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农已根据经验把资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做过比较。工人阶级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的，这个党还在1905年，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已同全体革命无产阶级打成一片了。

工人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工人国家要毫不动摇地镇压地主和资本家，镇压那些帮助剥削者的叛徒和卖国贼，并战胜他们。

工人国家是地主和资本家、骗子和投机者的无情的敌人，是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的敌人，是货币权力的敌人。

工人国家是劳动者和农民的唯一忠实的朋友和援助者。丝毫

不倒向资本方面，结成反资本的劳动者的联盟，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专政”的实际意义就是如此。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用这些话来恐吓农民。这是不会成功的。在高尔察克叛乱后，甚至处在穷乡僻壤的工人和农民都懂得，这些东西恰恰是消除高尔察克灾祸的良药。

打倒动摇的、无气节的、走上帮助资本的错误道路的、为资本的口号和诺言所俘虏的人！同资本作无情的斗争，结成劳动者的联盟，结成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这就是高尔察克叛乱给予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训。

尼·列宁

1919年8月24日

载于1919年8月28日
《真理报》第190号

按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
列宁《为战胜高尔察克告
工农书》小册子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506—513页

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1919年9月23日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
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能向女工代表会议表示祝贺感到非常高兴。我不准备涉及目前使每个女工和每个觉悟的劳动者最关心的题目和问题，即粮食和我国军事形势这些最迫切的问题。我从报上对你们开会情况的报道中知道，这些问题都已在会上详细谈过了，托洛茨基同志谈了军事问题，雅柯夫列娃和斯维捷尔斯基两位同志谈了粮食问题，因此，请允许我不再谈这些问题吧。

我想略为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一般任务，即一般同过渡到社会主义有关的任务和目前急待解决的首要任务。同志们，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其任务都有两部分。任务的第一部分比较简单容易，它只触及把妇女置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的旧法律。

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哪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还保留着资本政权，那里的男子总是有特权的。俄国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从1917年10月25日

起，这里确立了工人政权。苏维埃政权一诞生就决心成为一个劳动者政权，反对一切剥削的政权。它决心要使地主资本家不能再剥削劳动者，要消灭资本的统治。苏维埃政权竭力设法让劳动者建立起没有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的生活，因为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上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完全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私生子、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

应该指出，在这方面，甚至最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立法也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使她们处于不平等的和受屈辱的地位。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则彻底废除了劳动群众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的旧法律。今天我们可以十分自豪而毫不夸大地说，除了苏维埃俄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妇女是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是处于不受屈辱的地位的，这从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是我们最初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果你们有机会同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接触，或者得到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占领区出版的俄文报纸，或者有机会同拥护这些报纸的观点的人们交谈，你们就能时常听到他们责备苏维埃政权破坏民主。

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者，布尔什维克党员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经常受到某些人的指责。他们说我们破坏民主，并举

出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这件事作为指责的根据。对于这种指责，我们通常这样回答：只要土地私有制还存在，人与人之间还不平等，有资本的人还在做老板，而其余替他做工的人还是他的雇佣奴隶，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民主和立宪会议，我们就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这种民主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只是用来掩饰奴役制度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者只拥护能改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状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反对一切人对人的剥削。在我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那种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剥削者服务的民主。不劳动者被剥夺选举权，那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们回答这些指责说，应当提出某一国家中民主实现得如何的问题。我们看到，各民主共和国都宣布了平等，但是在民法中，在规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妇女处处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受卑视的地位。我们说，这才是破坏民主，而且正是破坏被压迫者享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比所有最先进的国家更彻底地实现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中丝毫也看不到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痕迹。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项民主立法，为妇女做到的都不及苏维埃政权在它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所做到的一半。

当然，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也决不满足于只颁布法令。但是在立法方面，我们已做了使男女地位平等所应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理由以此自豪。目前妇女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在最先进的国家看来已很理想了。但我们自己认为：当然，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妇女要是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总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要使妇女的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你们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妇女担负的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

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方面，妇女有十分广阔的工作场所。目前，我们正在认真地做准备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地基；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件事，只有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妇女摆脱了这种琐碎的、使人愚钝的非生产性工作而同我们一道从事新工作的时候，才能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得做好多年。

这种工作不可能立刻做出成绩，不会产生很显眼的效果。

我们正在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设施，来帮助妇女摆脱家务。建立这些设施的工作，主要应该由妇女来担任。应当承认，目前在俄国，这种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状态的设施还不多。这种设施的数目还很小，而且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战争环境和所遭到的粮食困难（这些问题，有几位同志已在会上给你们详细讲过）又妨碍我们进行这一工作。不过还是应当指出，这些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地位的设施，在一切稍有可能建立的地方，都在纷纷建立起来。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女工自己应当关心这种设施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地位。

在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

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一方面，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为女工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在同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敌对力量作斗争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无论在军事方面同进行战争来推翻劳动者政权的力量作斗争，或者在粮食方面同投机者作斗争，我们都感到困难，因为全心全意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我们的劳动者还不够多。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认为最宝贵的莫过于广大非党女工群众的帮助了。她们应该知道，在资产阶级的旧社会，要进行政治活动也许需要有各方面的素养，而这是妇女办不到的。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地主资本家，是为消灭剥削而斗争，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女工开着大门的，这种活动就是妇女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帮助男子。

我们不仅要进行千百万人的组织工作，我们也要进行规模很小的组织工作，给妇女从事劳动创造条件。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能从事劳动，例如支援军队，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妇女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切工作，使红军看到人们在关怀他们，在为他们操心。妇女也可以在粮食部门工作，如分配粮食，改善群众的伙食，发展目前

正在彼得格勒广泛设立的食堂等等。

也就是在这些方面，女工的活动起着真正的组织者的作用。妇女还需要参加建立并照管试验性的大型经济的工作，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这里不致成为孤立无援的事业。没有大批劳动妇女参加，这一事业是无法完成的。做这种工作，无论是去监督产品分配，或是为了更容易取得产品而去实行监督，女工都是完全适合的。这一任务，非党女工完全能够胜任，而这一任务的实现，首先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

在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几乎完全废除工厂私有制以后，苏维埃政权力求使所有的劳动者，无论党员或非党员，无论男子或妇女，都参加这一经济建设。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这一事业，只有在全俄国不是有几百个妇女、而是有千百万个妇女投入这一事业时，才能够向前推进。那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十分巩固。那时，劳动者会证明，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也能生活，也能管理经济。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在俄国将十分稳固，苏维埃共和国将不惧怕国内外的任何敌人。

载于1919年9月25日
《真理报》第213号

按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
列宁《在女工代表大会上的
演说》小册子原文刊印
并根据《真理报》原文作
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22—27页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¹⁴正好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邓尼金的胜利，使得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拚命从事阴谋活动，使得资产阶级加紧扰乱人心，千方百计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犹豫动摇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³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反而于我们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¹⁵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现在，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会让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机可乘。我们号召大批入党的，只是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而不是投机农民。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现在入党的，只会是真心赞成共产主义的人，只会是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是真诚的劳动者，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群众敞开党的大门。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它团结了大多数农民。倾向于资本的，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会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材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生力量。

非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同志们，加入党吧！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困难的工作，进行建设国家的工作。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怕工作是新的并有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

这是不对的。能够而且应当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和劳动农民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1919年10月11日

载于1919年10月12日

《真理报》第228号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45—47页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 和我们的任务

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¹⁴期间入党的有一万三千六百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完全没有料到的成绩。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那些为丧失自己的“老爷式的”特权地位而伤心的专家、官吏、职员在内，——所有这伙人恰巧在最近，恰巧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拚命扰乱人心，预言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邓尼金即将胜利。

这伙“知识分子”是多么善于巧妙地运用扰乱人心这个武器呵！要知道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总是要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动的一帮”并且“死命地”抓住这个武器的。

莫斯科本来是商人势力特别大的地方，是剥削者、地主、资本家、食利者最集中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合到了一起的地方，是驻着中央政权机关因而官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正是这个莫斯科是资产阶级造谣、诽谤、扰乱人心最方便的场所。邓尼金和尤登尼奇顺利进攻的“时机”，是资产阶级这种手段取得“成绩”的非常有利的时机。

无产阶级群众看到了邓尼金的“成绩”，并且知道正是现在做一个共产党员会遭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和危险，但是他们中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起来支援共产党，承担异常艰巨的管理国家的

重担。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我们党的成就简直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向首都居民，从而也向整个共和国和全世界证明并清楚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正是在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中间蕴藏着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源泉。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有很多人志愿申请入党，从这个成就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实际地显示了为劳动解放事业的敌人深恶痛绝的而为劳动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十分珍视的那一方面，即（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从道义上（从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讲）影响群众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施行这种影响的方法。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则，在整整两年的过程中（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给劳动群众树立了榜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这样忠诚，他们同劳动者的敌人（剥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作斗争时这样坚决，他们在艰苦的时刻这样坚定，他们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的时候这样奋不顾身，只有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的力量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怕没有素养和没有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并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奇迹。不论个别的考验多么严重，这样的奇迹会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彻底胜利。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这个任务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任务，

靠老一套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资本主义扼杀了、压制了、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找出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纯朴，更坚强，更真诚。

因此，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

当然，决不能认为大胆就是马上把重要的职务委托给新手，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是新手没有掌握的。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要知道，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要大胆，是说要立即给这些新手在广大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的机会和显显身手的机会。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打破习以为常的陈规陋矩（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可惜还不少哩！——非常怕冒犯已经规定的苏维埃的陈规陋矩，虽然这些有时不是由自觉的共产党员而是由旧官吏和旧职员“规定”的）；要大胆，是说要决心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

在很多场合可以为新党员安排这样的工作，即让这些党员一

方面监督旧官吏是否忠诚地履行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很快能学会业务，并能独立地担当工作。在其他场合可以安排他们来更新、加强工农群众同国家机关的直接联系。在我们工业的“管理总局和中央管理局”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怠工者、潜藏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政权。中央和地方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的艺术应该表现在加紧利用党的新生力量同这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

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尽量节省这些力量，尽量减少拖拉现象和不必要的手续，尽量精简机构，尽量使这个机构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能为群众所了解，能使群众直接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目前正在加紧动员老党员参加军事工作。这一工作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而应不断加强。但是，为了战争胜利，同时应该改善、精简、革新我们的非军事的管理机关。

谁的后备多，谁的力量来源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多。我们比他们多，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居民绝对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汲取这些东西，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更深入地从他们当中汲取这些东西。我们能够从这个最丰富的后备库中汲取这些东西，因为它能向我们提供最真诚的、受过苦难生活锻炼最多的、最接近工农的、能领导工农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材。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都根本没有稍微近似这个后备库的东西，他们的基础愈来愈不稳，工农中从前拥护过他们的人愈来愈离开他们。

这就是世界苏维埃政权最终肯定胜利和必然胜利的原因。

1919年10月21日

载于1919年10月22日
《俄共(布)中央通报》第7期

署名：尼·列宁

按《俄共(布)中央通报》
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53—57页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 经济和政治

我本想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初步准备了个别章节。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即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员讨论。

1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

(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每次谈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总是把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完全置诸脑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这种斗争,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2

由于俄国是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俄国的基本力量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着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广大的国家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进行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还保存着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已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废除;第二是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着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

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是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年3月所通过的我党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我们用革命的打击手段立刻办到了一般可以立即办到的事情。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1917年10月26日（1917年11月8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即工厂、股份公司、银行、铁路等等的私有主。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组织“国营农场”，即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合作社这一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①，也刚刚开始实行。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概括地说，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① 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三千五百三十六个，“农业公社”大约有一千九百六十一一个，农业劳动组合有三千六百九十六个。我国中央统计局现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统计。1919年11月间就会陆续得到统计结果。

3

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原理，我们来引用一些具体的数字。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从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8月1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三千万普特。下一个年度约为一亿一千万普特。再下一个年度（1919年至1920年）头三个月的收购结果大约可达到四千五百万普特，而在1918年同时期（8月至10月）只有三千七百万普特。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我们的情况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总是不断地在改善着。这种改善是在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用了世界列强的一切力量来组织国内战争，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的条件下达到的。

所以，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暗藏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怎样诬蔑，怎样造谣，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现已获得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拚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和阴谋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时期内，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下述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统计局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苏维埃俄国二十六省（不是全国）粮食生产与消费情形的统计材料准备

发表。

统计结果如下：

苏维埃 26省	人 口 (单位百万)	产粮数 (不包括种 子和饲料) (单位百万 普特)	供应的粮食数 (单位百万普特)		居民所 拥有的粮 食量(单 位百万 普特)	每人消 费的粮 食量(单 位普特)	
			由粮食 人民委 员部供 应的	由投机 商贩供 应的			
产粮省	城市…… 4.4	—	20.9	20.6	41.5	9.5	
	乡村……28.6	625.4	—	—	481.8	16.9	
消费省	城市…… 5.9	—	20.0	20.0	40.0	6.8	
	乡村……13.8	114.0	12.1	27.8	151.4	11.0	
总 计(26省)		52.7	739.4	53.0	68.4	714.7	13.6

由此可见，城市的粮食大约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另一半是由投机商贩供应的。根据 1918 年的精确调查，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的比例正是如此。不过工人购买国家的粮食比购买投机商贩的粮食要少付九成的钱。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规定的价格。这就是精确地研究了工人收支情形以后得出的结果。

4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上述的统计数字确切地表明了俄国现时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已摆脱了多少年来一直压迫着他们、剥削着他们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前跨进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及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资产阶级的

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并不考虑这一步骤。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角度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语)。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而取得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马上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俄国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时期是经常挨饿的。农民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他们总是饿着肚子把几亿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第一次为自己工作,并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那种使农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

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当对农民始终贯彻以下基本政策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毫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赋予的这种“教养”就迫使农民设法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并非在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形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材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1918—1919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四千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虽然当时这些机关还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国家明白地认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他们完全不愧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是社会主义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会主义工人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

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呢，他们欺骗国家，在各地竭力进行撞骗，趁火打劫，投机倒把，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偷偷地用比国家规定价格高十倍的价钱，出卖了四千万普特粮食，——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相当的劳动才创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形下，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从四面八方对我们叫喊，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用强力夺取余粮等等事情说：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以及前者有劫掠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5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

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最后，农民也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

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动摇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引导动摇分子和不稳定分子，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基础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包含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提升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出：是摆脱哪一个阶级的压迫而取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与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还是以力争废除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解释过，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作为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的平等观就会变成一种成见。¹⁶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观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观的浅近真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具有

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

(待续)^①

1919年10月30日

载于1919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250号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87—97页

^① 本文没有写完。——编者注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 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⁷上的报告

(1919年11月22日)

同志们！能够向代表东部各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同志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就俄国和全世界的目前局势问题讲几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报告的题目是目前时局问题。我觉得目前在这方面有最重大的意义的，是东部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革命运动。显然，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由于种种原因，如由于俄国的落后和幅员广大，由于它位于欧亚两洲之间，位于东西方之间，我们已肩负起了全部重担（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件极荣幸的事情），充当了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急先锋。因此，最近将来的全部事变一定会是更广泛更顽强的反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前兆，而且它们必然会同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德、法、英、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讲到军事方面，你们知道，现在我们各条战线上的情况都是很顺利的。我不准备详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说明，国际帝国主义强迫我们进行的国内战争，两年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遭到了无数的苦难，使工人和农民担负了往往是他们担负不了的重担。但是，这次战争也创造了奇迹。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

就掠夺我们而现在已经变成了野兽的所谓我国“盟友”的横暴行为和残酷进攻，使疲于作战、似乎不能再经受一次战争的人们变成了战士，使他们在两年中间不仅坚持了战争，而且就要胜利地结束这次战争。我们现在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说明世界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和各民族争取解放的历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这方面说来，两年来我们的国内战争不仅完全证实了历史早已作出的见证，即战争的性质及其胜利主要取决于参战国的国内制度，战争是该国战前所推行的国内政治的反映。所有这一切在进行战争时必然会反映出来。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哪个阶级进行了战争并还在继续进行战争。正因为我们的国内战争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是劳动人民为摆脱本国和全世界资本家压迫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在俄国这样一个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折磨的落后国家里，人们才能有坚强的意志，能在极端艰难困苦的两年中把战争坚持下来。

国内战争的历史通过高尔察克的实例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高尔察克有世界列强的援助，有在十万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国际帝国主义者最出色的军队，例如曾准备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但几乎没有参加这个战争、因而很少受到损失的日本军队）护卫下的铁路线，有那些生活非常富裕、从来没有尝过农奴制的滋味、因而对共产主义比任何人都更反感的西伯利亚农民作依靠，——象高尔察克这样的一个敌人，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的军队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先头部队。并且直到今天，西伯利亚还有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活动。高尔察克在极其富饶的西伯利亚统治了一年多，起初还受到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支持，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建立立宪会议委员

会¹⁸阵线这样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庸人和一般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是稳固的、不可战胜的,可是实践表明,他愈深入俄国腹地,他的力量就愈枯竭,到了最后,终于在苏维埃俄国面前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是由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的,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末,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

我想,红军所做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歷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它将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真正唤醒,就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这样的奇迹:东部各族人民的解放现在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不仅从国际革命的远景看来是如此,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军事进攻以后在亚洲即在西伯利亚直接作战的经验看来也是如此。

其次,俄国国内战争的经验还向我们和各国共产党人表明,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国家内部也在大大地巩固起来。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使工人农民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但是,在两年战争过去之后,我们终究可以根据经验说,我们正在胜利,并且将来还会不断地胜利,因为我们有后方,有巩固的后方,因为农民和工人虽然饥寒交迫,但却是团结的,坚强的,每一个沉重打击都使他们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更努力地增强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战胜

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他们的同盟者——世界上的头等强国。过去的两年向我们表明：一方面，革命战争可能会发展下去；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外敌侵犯的沉重打击下巩固起来。外敌侵犯的目的是要迅速摧毁革命发源地，摧毁敢于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的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但是，他们并没有摧毁俄国工人和农民，反而使俄国工人和农民受了一次锻炼。

目前时局的主要总结和主要内容就是如此。我们就要彻底战胜我们领土上的最后一个敌人邓尼金了。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十分强大。我们可以千百次地说，我们的话没有说错：共和国的内部建设已经巩固；我们结束对邓尼金的战争以后，一定能比过去强壮百倍，成熟百倍，足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任务。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还只能用极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执行这一项建设任务，现在，我们走上了自由的道路，一定能拿出全部力量来执行这项任务。

我们看到西欧的帝国主义正在瓦解。你们知道，一年以前，甚至德国社会党人也同极大多数不了解时局的社会党人一样，以为世界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填满了历史，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做出什么别的事情。他们觉得，甚至社会党人也只能投靠某一个强大的世界强盗集团，没有其他的出路。在1918年10月底看起来似乎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以后的一年当中，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些空前未有的现象，广泛而深刻的现象，使很多社会党人擦亮了眼睛，这些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曾经是爱国主义者，而且曾经借口大敌当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为自己联合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为制造理由，说这些帝国主义者能使人们摆脱德帝国主义的压迫。看吧，这个战争粉碎了多少幻想！我们看到，德帝国主义的瓦解不仅引起了共和革命，而且

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你们知道，目前德国的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国内战争——德国无产阶级和涂上一层共和色彩而实质上还和从前一样的德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也更迫近了。

大家知道，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成熟得非常迅速。美国 and 英国的情形也如此。这些国家似乎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是德帝国主义生番的征服者，可是到缔结凡尔赛和约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这个和约的掠夺性比德国掠夺者强迫我们接受的布列斯特和约还要厉害几百倍，但凡尔赛和约只能是对这些倒霉的战胜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最沉重的打击。凡尔赛和约使各战胜国民族擦亮了眼睛，并且证明英法等国并不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而是一些号称民主实际则由帝国主义掠夺者操纵的国家。这些掠夺者之间的内部斗争发展得异常迅速，这使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凡尔赛和约不过是高唱凯歌的帝国主义的表面胜利，实质上它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崩溃，意味着劳动群众断然离开那些在战争时期同腐朽的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并维护着一个参战强盗集团的社会党人。劳动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因为凡尔赛和约是掠夺性的和约，它表明，英法两国同德国作战，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加强本国帝国主义的实力。这种内部斗争越往后就会越扩大。今天我看到在11月21日从伦敦发出的一则电讯，美国记者（这些人是不可能同情革命者的嫌疑的）在电讯中写道，法国出现空前的反美情绪，因为美国人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英国和法国是胜利了，但它们欠下了美国无数的债。美国不管法国人和英国人怎样以战胜者自居，还是决定要揩他们的油水，要为美国在战时提供的援助取得超额利息，而此刻正在建设并在规模上日益超过英国的美国舰队，势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保证。

掠夺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还极其粗野，美国商行代办收买妇女和姑娘这种活商品，把她们运到美国去开妓院，这就是一个证明。自由文明的美国竟以活商品供给妓院！在波兰和比利时，现在可以经常看到同美国商行代办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实际上，每一个得到过协约国援助的小国都大量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就拿波兰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虽然它自夸现在是一个独立强国，美国商行代办和投机商人却纷纷去到那里，要买光所有的财富。美国商行代办正在把波兰全部买下来。那里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不被美国人掌握着。美国已蛮横到如此地步，竟奴役起“伟大自由的胜利者”法国来了。法国过去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国家，现在却完全成了美国的债务国，因为法国已毫无经济实力，粮食和煤炭都不能自给，不能大规模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而美国又一定要它缴纳全部贡款。因此，法国、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经济破产日益明显。法国大选结果是教权派获得胜利。法国人民过去受了骗，为了所谓自由民主拿出了全部力量去跟德国打仗，现在得到的报酬却是无穷的债务、凶残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嘲弄，以及代表最野蛮的反动势力的教权派在大选中的获得多数。

世界局势已变得无比的错综复杂。我们打垮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这些国际资本的走狗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的胜利还要巨大得多，虽然这个胜利并不十分明显。这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内部日益瓦解，再也不能派军队来攻打我们了。协约国做过出兵的尝试，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协约国军队一碰到我们的军队，一读到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俄罗斯苏维埃宪法，就瓦解了。不管腐朽的社会主义的首领们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的宪法总是不断博得劳动群众的同情。“苏维埃”这个词现在已为大家所了解，苏维埃宪法已经用各国文字译出，每个工人都读到

了。工人们知道，这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工人知道，这是我们反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成果。我们这个胜利已影响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我们已把它们军队夺过来了，争取过来了，它们再不能派这些军队来进攻苏维埃俄国了。

它们试了试用外国军队，用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军队来作战，但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几星期以前，英国大臣邱吉尔在议院里大吹特吹（并已电告全世界），说已经组织了十四个民族对苏俄的征讨，到新年就能战胜俄国。的确，参加征讨的有许多民族，有芬兰、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但是我们知道征讨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爱沙尼亚人已离开了尤登尼奇的军队，现在各家报纸正由于爱沙尼亚人不肯帮助尤登尼奇而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芬兰也没有帮助尤登尼奇，虽然芬兰的资产阶级是很想这样做的。这样，第二次进攻的尝试也失败了。在第一个阶段，协约国派出了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装备非常优良，看起来准能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却退出了高加索、阿尔汉格尔斯克、克里木，现在虽然还留在穆尔曼，象捷克斯洛伐克人还留在西伯利亚一样，但已经是残存的孤岛了。想用自己的军队来战胜我们的第一次尝试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胜利。第二次尝试是命令跟我们毗邻的而在财政上完全依附协约国的那些国家来攻打我们，来扼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然而这一次尝试也失败了：原来这些小国哪个也没有能力打这样的仗。更糟糕的是，每一个小国都对协约国有很深的仇恨。芬兰没有在尤登尼奇占领红村的时候夺取彼得格勒，就是因为它拿不定主意，它看出它跟苏俄为邻还能够独立生存，而同协约国就不可能和睦相处。所有的小国都有过这种情形。芬兰、立陶宛、爱斯兰和

波兰，现在就是这样。这些国家虽然盛行着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但都仇恨协约国在它们那里盘剥它们。现在，我们根据对事变进程的准确估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战争，不仅第一阶段已经破产，而且第二阶段也破产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战胜已经打垮了一半的邓尼金的军队。

我要在报告中简括说明的目前国内外的局势就是如此。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东部各民族目前的情形。你们是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我应该指出，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负起异常艰难但又异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末，你们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负的就将是更新更伟大的任务。十分明显，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每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如果革命进行得很顺利，很迅速，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世界各国都已武装起来对付本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心在想怎样战胜自己家里的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酝酿着国内战争，而老社会党人妥协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参加这个战争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去年3月通过的纲领里面，我们在说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说，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东方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

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向来都是帝国主义国际政策的对象，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我们非常了解，人们所谓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权，就是分配被委托去盗窃和抢劫的权利，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剥削的权利。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去完全和历史的进步没有关系，因为当时他们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他们已不再扮演这种消极的角色了。我们知道，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机器。他们将利用这种学识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现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继续很多年，需要人们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们将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你们参加国际革命，就要担负起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总的胜利打下基础，因为在这里，人口中的多数是第一次进行独立的运动，他们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

东部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俄国还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

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别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群众，即遭受中世纪压迫的劳动农民群众。俄国革命已经表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后，就胜利地推翻了中世纪压迫。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因为卷入斗争的是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但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你们就能够同第三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一些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们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你们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们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创始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

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就是你们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在这方面对你们会有帮助的，一方面是同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结成紧密的联盟，另一方面是要善于正确地对待你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们应当借助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间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本国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部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由于革命时代的来临和革命运动的增长（这是不容置疑的），东部各共产党组织只要能共同努力，就一定会顺利解决这个任务，彻底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载于1919年12月20日
《俄共（布）中央通报》第9期

按《俄共（布）中央通报》
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129—140页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 第一次代表大会¹⁹上的演说

(1919年12月4日)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政府向你们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致敬。当然，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们非常重视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能够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协作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的组织，一切能够逐渐促进这个转变过程的组织。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早已拨出十亿卢布基金来帮助创办这种事业²⁰。在《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条例》²¹上特别指出了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共耕企业的意义，苏维埃政权也用全力来使这个法令不致成为一纸空文，使它真正能够收到应有的效果。

所有这种企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原来那种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不加改变，就谈不到如何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只有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无论哪一种能够促进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的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谬的。

我们十分清楚，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例子，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固守老一套的经营方法，要使他们采取某种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这样做达不到目的，而且也荒谬。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而且可能过渡到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我们才可以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具有这样巨大的意义，使你们大家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担负了重大的责任，自然使得苏维埃政权及其代表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和特别谨慎。

在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法令中说过，我们认为所有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企业绝对不应当和附近农民隔离，表现特殊，而必须帮助他们。在法令中是这样写的，在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的示范章程中也是这样写的，在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各项指令中也经常这样说，但全部问题就在于要找到切合实际的办法，实现这一点的办法。在这里我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个主要的困难。你们既然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做实际工作的公共农庄工作人员，在这次会议上就有可能交流经验，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扫除一切怀疑，证明我们能够担负起或开始担负起巩固劳动组合、协作社、公社以及各种集体农业、公共农业企业的实际工作。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实际的成果。

我们读农业公社章程或论述这一问题的书籍时，总觉得这里面过多地注意宣传和在理论上论证组织公社的必要性。当然，这是必要的，要是没有详细的宣传，不解释协作的农业的优越性，不把这个意思千番百次地加以说明，我们便不能指望广大农民群众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并开始在实际上来试验这种办法。宣传

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不怕重复，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重复，但对成千上万的农民也许不是重复，而是第一次发现的真理。如果认为我们过于注重宣传，那就应当说，我们还必须百倍地努力照这样做去。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只是向农民一般地解释农业公社制度的好处，不在实际上证明合作社和劳动组合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那农民是不会相信我们的宣传的。

这个法令上说，公社、劳动组合、合作社应当帮助附近的农民。但是国家——工人政权拨出十亿卢布的基金来帮助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当然，某个公社如果从这笔基金中拿出一点来帮助农民，恐怕只会引起农民的讥笑，而且这种讥笑是完全有理由的。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既然拨了十亿基金给你们，那你们自然不难从这笔基金中掏出一二来给我们。”恐怕农民只会讥笑这种行为，因为农民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抱着决不肯轻易相信的态度。农民许多世纪以来从国家政权方面得到的一向只是压迫，所以他们对官家做的一切事情总是不相信的。农业公社帮助农民，如果只是为了执行法令，那末这种帮助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如果公社在实践上表明自己真正在认真改善农民经济，那就很好，那就无疑会提高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威信。但往往也有这样的情形，公社只是引起农民的反感，“公社”这个名词有时甚至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而且这种情形不仅是在荒唐地企图强迫农民加入公社的时候才发生。这种做法之荒唐，是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所以苏维埃政权早就反对这种做法了。假如现在还有个别强迫的例子，我希望那是很少的，你们一定能利用这次代表大会来使这种不象话的行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根除，使附近农民找不到一点借口来坚持旧的成见：似乎加入公社是出于被迫。

但是，即使我们消除了过去的缺点，完全克服了这种不象话的行为，我们也只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国家帮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如果国家不帮助各种集体农业企业，那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就是不拥护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也因为这是同我们的整个任务符合的，我们深知这些协作社、劳动组合和集体组织都是新的创举，如果执政的工人阶级不支持这些创举，那它们就不会成长起来。正由于国家给它们以资金和其他种种援助，为了使它们真正成长起来，我们还应当做到，让农民不致以讥笑来对待这件事。我们应当时刻警惕，不致让农民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的社员是靠公家养活的，说这些人与普通农民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得到公家的优待。如果除了土地外还从十亿卢布基金中拨出建筑补助费，那末任何一个傻瓜都会比普通农民生活得好。农民会说：这里哪谈得上什么共产主义，哪里有什么改良，他们有什么值得我们钦佩的？如果挑出几十个或几百个人来，给他们几十亿卢布，那他们当然会干起来。

最使我们忧虑的正是农民的这种态度，我很希望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自信地说，我们不仅避免了这种危险，而且找到了对付的办法，使农民不仅不会这样想，反而会在每个公社中、在每个劳动组合中都看到国家政权所扶植的某种东西，在其中找到新的耕作方式，这种新方式不是在书本上、在讲演中（这是很容易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表明它比旧方式优越。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所以说光凭手边一堆枯燥的数字，就很难判断，我们是否已在实际上证明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都真正比所有旧企业强，证明工人政权是在那里帮助农民。

我想，为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你们这些具体了解周

围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情况的人，制定一个切实的办法，检查是否执行了农业公社必须帮助附近农民的法令，是否已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每个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中过渡的具体情况如何，这些工作是怎样实行的，有多少协作社和公社已在实际上这样做了，又有多少仅仅是准备要这样做，公社对农民的帮助有过多少次，帮助的性质如何，是慈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公社和劳动组合从国家给它们的补助金中拿出一部分来给农民，那只会使每个农民想到，这不过是一些好人帮助了他，但这绝不能证明是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农民对于这样的“好人”自古以来就是不相信的。要很好地检查，弄清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真正表现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才能向农民证明按协作原则和劳动组合原则种地比单干好，并且证明比单干好并不是由于有了公家的帮助；要很好地向农民证明，没有公家帮助，这种新制度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可惜我不能从头至尾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因此我也不能参加制定这些检查办法。但我相信，你们和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同志一起，是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办法来的。我很满意地读了农业人民委员谢烈达同志写的那篇论文，他着重指出公社和协作社不应当同附近农民隔离，而是要努力改善农民经济。要把公社办成模范公社，使附近农民自己愿意来加入公社；要善于做出实际榜样给他们看：应当怎样来帮助那些在商品缺乏和整个经济都遭到破坏的困难条件下经营农业的人。为了规定这样做的实际办法，必须制定一个详尽的指示，列举帮助附近农民的各种方式，询问每个公社在帮助农民方面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并且指出具体办法，使现有的两千个公社和大约四千个劳动组合每一个都能在实际上成为巩固农民信念的核心，使农民相信集体农业这种过渡到

社会主义去的办法是有益的东西，而不是空想，不是梦呓。

我已经说过，法令责成公社帮助附近农民。要在法令中用另一种方式来表明这种意思，要在法令中写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是不可能的。我们本来就是规定一般的原则，希望各地有觉悟的同志们忠实地去执行，并且善于想出许多办法，按照各地的具体经济条件来实施这个法令。当然，任何法令都有办法躲避不执行的，甚至阳奉阴违。因此，关于帮助农民的法令，如果不忠实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公社应当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就是使农民经济通过同公社的接触，得到公社在经济上的帮助，而开始改变其条件；每个公社、劳动组合或协作社都要善于奠定改进农民经济条件的基础，并切实加以改进，实际地向农民证明这种改变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你们自然会想到，人们会说，要改进经营就要有比现在好一些的条件，而现在的条件则是四年帝国主义大战以及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进行的两年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在现时我国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还谈得上推广农业改进措施呢，只要能勉强活下去不饿死也就谢天谢地了。

当然，这样的怀疑可能会有有的。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我就要用以下的话来回答。的确，由于经济解体、经济破坏、商品缺少、运输力薄弱、工具和耕畜被毁，要广泛地改进经营是做不到的，但是，在许多个别情形下，小规模地改进经营，无疑还是能够做到的。假定连这点也办不到，那是否就可以说，公社无法使附近农民的生活改变，无法向农民证明，集体农业企业不是人工培植的温室里的植物，而是工人政权对劳动农民新的帮助，是协助农民去同富农作斗争呢？我相信，即使这样提问题，即使我们在现时经济破坏条件下无法实行改良，只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中有忠实的共产党

员，那还是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成绩来的。

空口无凭，我就举出我们在城市里叫作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事情来作例子。城市工人在每人工作时间之外再为社会做几小时的义务工作，这就叫做星期六义务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举行的。苏维埃政权有一次号召说，红军战士在前线忍受着空前的牺牲，他们虽然受尽一切苦难，还能获得空前的胜利；又说，我们要最终地取得胜利，就必须使这种英雄气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只是表现在前线上，而且也表现在后方。莫斯科工人就以星期六义务劳动来响应了这个号召。毫无疑问，莫斯科工人经受的艰难困苦要比农民厉害得多，如果你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想一想他们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开始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末你们就会同意，有些事情，只要运用莫斯科工人所运用的这种办法，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以做到的，决不能借口条件困难而加以拒绝。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又在实际上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做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但是，我们说，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作。

这种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在每个大工业城市中推行起来，现

在党要求每个党员都参加这种工作，对于不执行这种要求的党员给予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如果你们也在公社中、劳动组合中和协作社中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你们在最坏的条件也能够而且一定会使农民认识到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每个协作社的特点不在于它领取公家的补助金，而在于这些组织中都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参加，这些人不仅向别人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善于身体力行，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共产主义方法经营农业，并且尽量帮助附近农民。对于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来推诿的，这里决不能借口商品、种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检验，至少能使我们精确地判断，我们实际上对所面临的困难任务领会如何。

我相信，这次公社、协作社和劳动组合全体代表会议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了解到，这种办法真正是巩固公社和协作社的极好手段，能够收到实际效果，使全国各地都不会发生农民对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表示敌意的事情。但这还不够，还要做到农民对它们表示好感。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自己要尽力来帮助它们做到这一点，使我们国家从十亿卢布基金或其他来源中拨出的补助金，只是用来使劳动公社和劳动组合能和附近农民生活实际接近起来。不是这样，则对劳动组合或协作社的任何帮助，我们都认为不仅无益，而且绝对有害。不能认为公社帮助附近农民是因为自己富裕，而是要使这种帮助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帮助，即为农民创造从单独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协作经济的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只有用我在这里说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

城市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坏得不可比拟，他们却首先开始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如果你们能估计到这点，那末我深信，在你们全体一致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使现有的几千个公社和

劳动组合每一个都成为在农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都用实际行动来向农民表明，虽然它们还是嫩弱的幼芽，但毕竟不是人工制造的，不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而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巩固地战胜旧的愚昧状态，才能战胜破产和贫困，只有那时，我们才不会害怕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载于1919年12月5日和6日
《真理报》第273和27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168—176页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革命党人³出版的文集《俄国革命的一年(1917—1918年)》(1918年莫斯科“土地和自由”出版社莫斯科版)里,载有一篇尼·瓦·斯维亚齐茨基的精彩文章:《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的总结(序言)》。作者列举了七十九个选区中的五十四选区的数字。

作者考察的范围差不多包括欧俄和西伯利亚各省。没有包括的省份有:奥洛涅茨、爱斯兰、卡卢加、贝萨拉比亚、波多尔斯克、奥连堡、亚库茨克和顿河。

我们先引证一些尼·瓦·斯维亚齐茨基所发表的基本总结,然后再来研究从这些材料得出的政治结论。

一

五十四选区在1917年11月份投票总数是三千六百二十六万二千五百六十票。作者分七个地区(加上陆军和海军)列举的选票总数是三千六百二十五万七千九百六十票,但是他按个别党派列举的总数正同我所指出的相一致。

按党派来分,情形如下: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得一千六百五十万票,如果加上其他各民族(乌克兰民族、穆斯林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社会革命党人所得的票数,则为二千零九十万票,即占总票数百分之五十八。

孟什维克得六十六万八千零六十四票,如果加上各个类似集

团如“人民社会党人”²²（三十一万二千票）、《统一》派²³（二万五千票）、合作社派（五万一千票）、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九万五千票）、乌克兰社会主义者（五十万零七千票）、德意志社会主义者（四万四千票）和芬兰社会主义者（一万四千票）所得的票数，那末总共是一百七十万票。

布尔什维克得九百零二万三千九百六十三票。

立宪民主党人²得一百八十五万六千六百三十九票。如果加上“土地占有者和地主联盟”（二十一万五千票）、“右派集团”（二十九万二千票）、旧教徒（七万三千票）和各民族主义者，即犹太民族主义者（五十五万票）、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五十七万六千票）、巴什基里亚民族主义者（十九万五千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六万七千票）、波兰民族主义者（十五万五千票）、哥萨克民族主义者（七万九千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十三万票）、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万二千票），以及“各种团体和组织名单”（四十一万八千票）所得的票数，那末各地主和资产阶级党派所得的选票，总共是四百六十万票。

大家知道，从1917年2月到10月的整个革命时期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始终是结成联盟的。此外，无论这个时期或这个时期以后的全部事变发展过程都清楚地证明：这两个党共同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也象第二国际所有的政党一样，冒充并自命为社会主义党派。

我们把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三个基本党派集团合起来计算，便得出总数如下：

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	902万 = 25%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人、 孟什维克及其他）·····	2 262万 = 62%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	462万 = 13%
总 共 ·····	3 626万 = 100%

现在我们把尼·瓦·斯维亚齐茨基按地区计算的数字列举如下：

选票数目（单位一千）

地区① (军队另列)	投俄罗斯 社会革命 党人票者	百分 比	投布尔什 维克票者	百分 比	投立宪 民主党 人票者	百分 比	共 计
北部地区	1140.0	38	1177.2	40	393.0	13	2975.1
中部工业地区	1987.9	38	2305.6	44	550.2	10	5242.5
伏尔加河流域 黑土带地区	4733.9	70	1115.6	16	267.0	4	6764.3
西部地区	1242.1	43	1282.2	44	48.1	2	2961.0
东乌拉尔地区	1547.7	43(62%②)	443.9	12	181.3	5	3583.5
西伯利亚地区	2094.8	75	273.9	10	87.5	3	2786.7
乌克兰	1878.1	25(77%③)	754.0	10	277.5	4	7581.3
陆军和海军	1885.1	43	1671.3	38	51.9	1	4363.6

- ① 作者一反常规，把俄国划分为以下几个地区：**北部地区**，其中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彼得格勒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里夫兰省。**中部工业地区**，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省、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下新城省、梁赞省、土拉省、特维尔省、雅罗斯拉夫里省。**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其中包括阿斯特拉罕省、沃罗涅什省、库尔斯克省、奥勒省、奔萨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辛比尔斯克省、唐波夫省。**西部地区**，其中包括维切布斯克省、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斯摩棱斯克省。**东乌拉尔地区**，其中包括维亚特卡省、喀山省、皮尔姆省、乌发省。**西伯利亚地区**，其中包括托波尔斯科省、托姆斯克省、阿尔泰省、叶尼塞斯克省、伊尔库茨克省、外贝加尔省、阿穆尔河沿岸省。**乌克兰**，其中包括沃伦省、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塔夫利达省、哈尔科夫省、赫尔松省、切尔尼果夫省。
- ② 括弧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斯维亚齐茨基把穆斯林民族的和楚瓦什的社会革命党人加上后得出的数字。
- ③ 括弧中的百分之七十七是我把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加上后得出的数字。

从这些按地区计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是农民的政党。在大俄罗斯纯农业区域（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东乌拉尔地区）和乌克兰纯农业区域里，社会革命党人得了百分之六十二至七十七的选票。在各工业中心，布尔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尼·瓦·斯维亚齐茨基列举的那些按区域计算的数字中是削减了的，因为他把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和工业不发达的以及完全不是工业的区域合并在一起了。例如，斯维亚齐茨基按省列举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各民族集团和其他集团”所得的票数，说明如下情况：

布尔什维克在北部地区所占的优势似乎不大：百分之四十对百分之三十八。但是这个地区既包括非工业区，又包括工业区；在非工业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而在工业区的情形是：首都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得百分之四十五（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百分之十六；彼得格勒省布尔什维克得百分之五十，社会革命党人得百分之二十六；里夫兰省布尔什维克得百分之七十二，社会革命党人零票。

在中部工业地区各省：莫斯科省，布尔什维克得百分之五十六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百分之二十五；莫斯科首都区，布尔什维克得百分之五十，社会革命党人得百分之八；特维尔省，布尔什维克得百分之五十四，社会革命党人得百分之三十九；弗拉基米尔省，布尔什维克得百分之五十六，社会革命党人得百分之三十二。

顺便指出，关于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只拥有无产阶级“少数”的说法，在这些事实面前该是多么可笑啊！而这种说法，我们

无论是从孟什维克(六十六万八千票,再加上南高加索的七八十万票,对布尔什维克的九百万票)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叛徒们那里,都可以听到。

二

获得四分之一选票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四分之三选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因为现在,在协约国——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帮助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敌人两年之后,再否认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事实,那就简直可笑了。

问题在于那些遭到失败的人们,包括第二国际的所有拥护者,由于怀有疯狂的政治仇恨,甚至不能严肃地提出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胜利这个极有意味的历史的政治的问题。问题在于只有从庸俗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观点来看,这才是“怪事”,而这种民主派的全部无知和偏见都会被这一问题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彻底揭穿。

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被第二国际抛弃了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无疑是解决了的。

布尔什维克所以获得了胜利,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拥护,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最觉悟、最坚决、最革命的部分即这个先进阶级的真正先锋队的拥护。

我们拿两个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来做例子。在这两个地方,选举立宪会议时总共投了一百七十六万五千一百票。其中:

社会革命党人·····	21.80 万票
布尔什维克·····	83.70 万票
立宪民主党人·····	51.54 万票

尽管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切尔诺夫、马尔托夫、考茨基、龙格、麦克唐纳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平等”、“普选”、“民主”、“纯粹民主”或“彻底民主”这些女神面前磕破了头,但是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政治上不平等的事实并未因此而消失。

这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事实。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领导农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以及这种城市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得到了无产阶级极大多数的拥护。同布尔什维克在无产阶级中竞争的党——孟什维克党,这时已被彻底粉碎了(布尔什维克以九百万票对孟什维克的一百四十万票,一百四十万票是把六十六万八千票和南高加索的七八十万票加在一起的数目)。并且,这个党是在十五年的斗争中(1903—1917年)被粉碎的,这个斗争锻炼、教育并组织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它锻炼成了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同时,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还准备了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决定了两党的相互关系,对1917—1919年的伟大事变起了总演习的作用。

自称为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喜欢用什么无产阶级“统一”有好处的甜言蜜语来回避极其严肃的历史问题。他们搬弄这些甜言蜜语时,却忘记了机会主义在1871—1914

年工人运动中积累起来这一历史事实，忘记了（或者是不愿意）考虑一下机会主义在1914年8月破产的原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1914—1917年发生分裂的原因。

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不极其认真地全面地准备好把机会主义驱逐出去和镇压下去，那末连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也是荒唐的。那些现在想以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来脱身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²⁴、法国社会党²⁵等等的领袖们，必须牢牢记住俄国革命的这个教训。

其次，布尔什维克不仅有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拥护，不仅有在反对机会主义的顽强的长期斗争中经过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拥护，而且在两个首都还有——如用军事术语来说——强大的“决战主力”。

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同时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特别是在残酷的、激烈的、称为革命的阶级战争中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

首都或一般大工商业中心（在我们俄国，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但并非永远如此）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自然，其条件是这些中心得到足够的地方力量即农村力量的支持，哪怕是稍缓的支持也好。

在两个首都，在俄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布尔什维克具有压倒的决定的优势。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差不多比社会革命党人多三倍。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比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加在一起还要多。此外，我们的敌人已经被粉碎了，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不论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总共获得百分之三的选票）的“联合”在劳动群众中间已经名声扫地。当时，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

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真正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①大家知道，在1917年11月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同联合立宪民主党人的想法很接近，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农民接近百倍，但连这些领袖还曾想过（并且向我们讨过价钱）撇开立宪民主党人而同布尔什维克联合！

在1917年10月至11月，我们把两个首都夺取过来是有一定把握的，因为当时我们拥有压倒的优势和最可靠的政治准备，无论是从集合、集中、训练、考验和锻炼布尔什维克“军队”方面来说，或是从瓦解、削弱、分裂“敌”“军”并使其士气沮丧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既然一定能用迅速、坚决的打击来夺取两个首都，夺取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这两个中心（无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讲），我们就可以不顾官僚和“知识界”的疯狂反抗，不顾怠工等等，而通过中央国家政权机关用事实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证明，无产阶级是他们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朋友和领导者。

三

但是，在没有谈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之前，还要谈一下军队。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军队吸取了人民力量的全部精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混蛋们（不仅包括直接转到“保卫祖国”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而且包括“中派分子”）

^①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引证的数字也表明了无产阶级党的统一和团结一致，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政党却极端涣散。

用他们的言行加强了德国或英法两国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对军队的统治，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却永远也没有忘记马克思在1870年说过的话：“资产阶级将教会无产阶级掌握武器！”^{①26}只有德奥和英法俄的社会主义叛徒们才会在帝国主义战争即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中，高谈什么“保卫祖国”，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则集中全部注意力（从1914年8月起）来使军队革命化，利用军队反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强盗，把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进行的非正义的和掠夺性的战争变成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劳动群众对“自己的”、“本国的”资产阶级的正义的合理的战争。

社会主义叛徒们在1914—1917年没有准备利用军队去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

布尔什维克从1914年8月起，就以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秘密组织活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当然，社会主义叛徒们，各国的谢德曼、考茨基之流，关于这点只是用军队被布尔什维克的鼓动瓦解了这些话来支吾搪塞。但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为了对剥削者进行斗争，我们瓦解了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力量，从敌人那里把武装了的工农群众争取了过来。

顺便指出，我们工作的成就，还表现在这次也有俄国军队参加的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投票的总结上。

下面就是尼·瓦·斯维亚齐茨基列举的这次投票的主要数字：

① 本选集中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均按列宁的俄译文译出，其中个别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编者注

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投票数目

(单位一千)

陆海军部队	投社会 革命党 人票者	投布尔 什维克 票者	投立宪 民主党 人票者	投各民族集 团及其他集 团票者	共 计
北方战线	240.0	480.0	?	60.0 ^②	780.0
西方战线	180.6	653.4	16.7	125.2	976.0
西南战线	402.9	300.1	13.7	290.6	1 007.4
罗马尼亚战线	679.4	167.0	21.4	260.7	1 128.6
高加索战线	360.0	60.0	?	—	420.0
波罗的海舰队	—	(120.0) ^①	—	—	(120.0) ^①
黑海舰队	22.2	10.8	—	19.5	52.5
总 共	1 885.1	1 671.3	51.8	756.0	4 364.5
		+ (120.0) ^①	+ ?		+ (120.0) ^①
		1 791.3			+ ?

总数是：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有一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一百六十七万一千三百票。如果后者加上波罗的海舰队的十二万票(大概的数字)，那末结果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一百七十九万一千三百票。

可见，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只比社会革命党人略微少一点。

可见，在1917年10月至11月，军队已有一半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

如果没有这种情形，我们是不能获得胜利的。

① 这是大概的数字；这里当选的布尔什维克有两个人。尼·瓦·斯维亚齐茨基是以每个当选者平均获得六万票计算的，所以我就用了十二万这个数字。

② 关于究竟哪个党从黑海舰队得了一万九千五百票，并没有说明。这一栏内的其余数字，显然差不多全属于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因为当选的有十个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即孟什维克)。

但是，由于我们在全部军队里拥有差不多半数的选票，所以我们在两个首都附近的和一般离两个首都不很远的各个战线上，已握有压倒的优势。如果除开高加索战线不算，那末布尔什维克一般说来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如果以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来说，那末布尔什维克得选票一百万以上，而社会革命党人得四十二万票。

可见，在军队方面，布尔什维克到1917年11月也有了政治上的“决战主力”，而这就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既然布尔什维克在北方和西方战线上已有巨大优势，而在离中心区较远的其余战线上又有时间并有可能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方面夺取过来（这一点到下面再谈），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军队方面对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行任何反抗。

四

我们根据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考察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拥护；（2）得到差不多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心区的战线上拥有压倒优势。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能把他们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到自己方面来，那末这些条件就只能提供一种极短暂的和不巩固的胜利。

主要之点就在这里。

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应读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以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不了解:

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

满脑子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忘掉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精髓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老爷们,把国家政权当作一种圣物,当作一种偶像或者是正式投票产生的合力,当作“彻底民主”的绝对物(还有其他类似的胡说)。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政权仅仅是各个阶级都能而且应该利用(并且应该善于利用)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的工具。**

资产阶级利用了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就是这样。只有马克思主义叛徒才“忘记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应该(在集合了充分强大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决战主力”后)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它的国家政权,以便运用这个工具来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是什么呢?

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中立”农民,并尽可能把农民——无论如何也要把劳动的不剥削的那一部分农民中的大多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用从资产阶级方面剥夺来的工厂和一般生产资料来组织大规模的机器生产。

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

* * *

机会主义者老爷们，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嘲弄马克思的学说，“教导”人民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而我们却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说：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把国家政权夺归己有，然后利用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同情。

* * *

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怎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影响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方面争取过来的工具呢？

第一、无产阶级做到这一点，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是彻底摧毁它、粉碎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机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构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类型就是苏维埃政权。

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小时之后，便立刻宣布解散旧的国家机构（这种机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经过几个世纪而被改成适合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也是如此²⁷），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苏维埃是只允许被剥削的劳动者参加，而不容许任何剥削者插足的。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之后，立刻用这个办法，一举而把小资产阶级的和各“社会主义”党派中拥护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过来，因为这些群众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他们受过资产阶级（包括它的应声虫切尔诺夫、考茨基、马尔托夫等之流在内）的欺骗，他们获得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就第一次获得了为维护自己利益、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群众斗争的工具。

第二、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立刻或者至少是很快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把“它们的”群众，即把跟它们走的群众夺取过来，夺取的方法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满足群众最迫切的经济需要。

资产阶级无论掌握多么“强大的”国家政权，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的第二天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有做到这一点的机构（苏维埃），又有做到这一点的经济手段（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

俄国无产阶级正是这样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夺取过来的，简直可以说，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个小时之后就夺取过来了。因为在彼得格勒战胜资产阶级几小时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就颁布了《土地法令》，在这个土地法令中以革命的速度、毅力和坚决精神立刻完全满足了大多数农民的全部迫切的经济需要，完全地和非赎买地剥夺了地主。

为了向农民们证明，无产者不是想用多数票压他们或向他们发号施令，而是要帮助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在《土地法令》中并没有加上自己的一言一语，这个法令是从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所公布的农民委托书（当然是最革命的委托书）中逐字逐句抄写下来的。

社会革命党人曾大发雷霆、忿怒不满、大声哭喊，说“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纲领偷去了”；但是，这只会使人嘲笑社会革命党人；你看这个政党是多么漂亮啊，原来为了要实现它的纲领中一切革命的、一切有益于劳动者的东西，竟要先把它打败，把它从政府中赶出去才行！

第二国际的叛徒、蠢才和书呆子们永远也不能了解的这个辩证法就在于：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决定于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欺骗工人。无产阶级为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自然，实现这一切的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时才会具备。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既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一个特殊阶级，也不能使无产阶级在罢工、游行示威、羞辱和驱逐机会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中，在长期准备、教育、训练和斗争考验中取得成就。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各中心也就不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起着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掌握了这些中心，也就等于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些说，也就等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神经中枢、心脏和枢纽。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在无产阶级的地位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地位之间，也就不能有那种亲密关系、亲近和联系，而这些因素（亲密关系、亲近和联系）是无产阶级为影响这

些群众、为有效地诱导他们所必需的。

五

我们再往下谈。

无产阶级能够夺得国家政权，实现苏维埃制度，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劳动者的经济需要。

这样是否就足以保证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了呢？

还不够。

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可以只用投票表决来决定，或者不要长期的斗争经验而用任何一种方式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

这是幻想。这是考茨基、龙格、麦克唐纳之类的书呆子和甜言蜜语的社会党人的阿谀奉承。

如果资本主义不是一方面使群众处于受折磨、受压制、受恐吓、分离涣散(农村!)和愚昧无知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把造谣欺骗、普遍愚弄工农并使他们钝化等等的庞大机构交给资产阶级，那末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劳动群众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走”这个极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他们必然要通过亲身的实际经验，才能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无

产阶级的领导作出比较。

正是这种情况经常被崇拜“彻底民主”的人们忽略过去，他们以为极严重的政治问题可以用投票表决来解决。其实，这些本来就尖锐并且为斗争加剧起来的问题，只能由国内战争来解决，而在国内战争中，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的经验，他们拿无产阶级政权跟资产阶级政权加以比较的经验，有巨大的意义。

把1917年11月俄国立宪会议选举和1917—1919年的两年国内战争对照起来看，能使我们在这方面获得极大的教益。

请你们看一看，究竟哪些地区布尔什维克获得的选票最少。首先是东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在这两个地区里投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分别占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其次是乌克兰；这里投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百分之十。在其余地区，投布尔什维克票的百分比最小的是大俄罗斯农业区，即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但是在这个地区有百分之十六的票数是投给布尔什维克的。

正是在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间）得票百分比最小的地区，我们看到反革命的运动、暴动以及反革命力量的组织最得势。正是在这些地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支持了好几个月。

凡是无产阶级影响最小的地区，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也就暴露得特别明显：

起初，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给了他们土地，而复员的士兵又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的消息。后来，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为了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为了保存俄国这个革命策源地，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挫伤了”小资产阶级最浓厚的情感即爱国主义感情。当布尔什维克表明将严格地硬性要求农民按照固定价格把余粮交给国家的时候，那些余粮最多的地方的农民就特别讨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乌拉尔、西伯利亚、乌

克兰一带的农民就转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方面去了。

后来，体验了高尔察克统治区和邓尼金统治区每个办报人在每期白卫分子报纸上所鼓吹的高尔察克“民主”和邓尼金“民主”，使农民看到，关于民主和“立宪会议”的词句，事实上不过是掩盖地主资本家专政的空话罢了。

于是又开始重新转向布尔什维主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后方的农民起义发展起来了。农民把红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归根结蒂，正是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主要代表者农民的这些动摇，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和高尔察克、邓尼金政权的命运。但是，在这个“归根结蒂”之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严重斗争和痛苦考验的时期，这种斗争和考验在俄国经历了两年还没有结束，即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一带还没有结束。而且不能担保再过一两年就会完全结束。

拥护“彻底”民主的人们不去仔细想想这个历史事实的意义。他们过去和现在都给自己臆造出一种童话，仿佛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说服”大多数劳动者，并用投票表决方式把他们牢牢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现实证明，只有在长久的残酷的斗争中，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沉痛经验，才会引导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专政作出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说：前者比后者好。

在理论上，所有学过马克思主义并愿考虑十九世纪各先进国家政治历史经验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摇摆不定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动摇的经济根源已被经济科学很明显地揭示出来了，而这个经济科学的种种道理又是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在报纸、传单和小册子上重复过千百万次的。

但是，人们不善于把这些道理运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时

代。他们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和幻想(关于阶级“平等”,关于“彻底的”和“纯粹的”民主,关于用投票表决来解决重大历史性问题等等)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不愿了解,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长久的经验、根据许多实际例子来向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证明,他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要比拥护资产阶级专政有利,任何第三种专政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此后两年国内战争发展进程所表明的那幅图画的基本背景。这次战争中的基本力量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就已经明显地看出来,无产阶级军队的“决战主力”的作用、动摇的农民的作用、资产阶级的作用都看出来了。尼·瓦·斯维亚齐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取得最大胜利的地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最大胜利的地区,即北部地区和中部工业地区。”(第116页)自然,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那些中心,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分子力量最弱。自然,在这些中心,阶级斗争最剧烈。资产阶级的主力正是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些地方、也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粉碎资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只有把它彻底粉碎之后,无产阶级才能利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最终争取到居民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情和拥护。

关于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要是我们善于利用它,善于阅读它的话——向我们一次再次地说明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道理。

另外,这些材料也说明了民族问题的作用和意义。试拿乌克

兰来说吧，在近来几次讨论乌克兰问题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责难本文作者过分“强调了”乌克兰民族问题。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表明，还在1917年11月，在乌克兰获得多数的是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三百四十万票加五十万票，共三百九十万票，投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票的有一百九十万票，而全乌克兰的总票数是七百六十万票）。在西南战线和罗马尼亚战线的军队中，乌克兰社会主义者获得的选票分别占总票数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十四（投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票的分别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五十九）。

在这种情况下，轻视乌克兰民族问题的意义——而大俄罗斯人时常犯这种毛病（犹太人也犯这种毛病，也许比大俄罗斯人稍少一些）——就是犯严重而危险的错误。在乌克兰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早在1917年就发生了分裂，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们既然是国际主义者，所以第一、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第二、我们应该正是在民族这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对国际主义者说来，国界问题是次要的，甚至是极其次要的）实行让步。重要的是其他问题，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利益，重要的是同邓尼金作斗争的红军的一致和纪律的利益，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至于乌克兰是否要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那是一个极不重要的问题。甚至这样一种前途，即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各种制度都尝试一下（比方说他们在若干年内既实际尝试一下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又实际尝试一下和它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又尝试一下各种形式的亲密联盟，如此等等），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慌。

如果企图预先一劳永逸地、“果断地”和“坚定不移地”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见解狭隘，或者简直是愚蠢了，因为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这样的问题上犹豫动摇是完全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无产阶级是毫不足惧的。一个真正善于当国际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代表，对待这种动摇应该保持极端慎重和极其忍耐的态度，应该让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来根除这种动摇。而对其他比较根本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我在上面已经提出），我们则应采取不忍耐、不留情、不调和、不动摇的态度。

六

把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和从1917年10月到1919年12月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加以比较，就能作出一些有关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现在让我们试把其中主要的结论简略叙述一下，或者至少指出来也好。

1. 普选制是测量各个阶级对自己任务的理解成熟到什么程度的标尺。它表明各个阶级想要怎样解决自己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的解决本身却不是用投票表决所能达到的，而是用直到国内战争为止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达到的。

2. 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上，赞同它的偏见，以为投票表决能够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

3. 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

要的。但是，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

4. 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人物和拥护者以及德国的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袖，实际上正在这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他们口头上虽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却在自己的宣传中向无产阶级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为了以后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先在形式上反映大多数居民的意志（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选票）。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之类的腐朽社会主义领袖们根据这一前提所发出的反对“少数人专政”等等的号泣，只是说明这班领袖不了解实际上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占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专政，不了解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摧毁这种专政的条件。

5. 这种不了解特别表现在下面这点上：他们忘记了各资产阶级政党所以能居于统治地位，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民众的欺骗，由于资本的压迫，以及在资本主义本质问题上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各小资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政党通常总是想用多多少少隐蔽的阶级调和的形式来代替阶级斗争。

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要使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情形下，即在保存资本权力和资本压迫的情形下，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并且应当夺取政权。”

我们说：“首先要使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压迫，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那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才能迅速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相反的情况将是历史上罕见的

例外（即使在这种例外的情形下，象芬兰的例子²⁸所证明的，资产阶级是会发动国内战争的）。

6. 或者换句话说：

资产阶级和它的应声虫，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我们保证在保存私有制和资本压迫（即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情形下承认平等或彻底民主的原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大多数来决定。”

我们却说：“首先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破坏事实上不平等的柱石和基础，然后由战胜了剥削者的无产阶级引导所有劳动群众走向阶级的消灭，即走向并非骗局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平等。”

7.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无产阶级，或除了无产阶级中已意识到自己的革命任务并能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那一部分人以外，还有人数众多的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阶层，他们跟资产阶级走，跟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包括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走，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欺骗，因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认识到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可能性。

这些被剥削的劳动阶层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提供同盟者，无产阶级先锋队和这些同盟者加在一起，就在居民中巩固地占了多数，但是，无产阶级只有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即只有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并破坏了它的国家机构之后，才能争取到这些同盟者。

8.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

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许多同盟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这些群众从来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9. 最后，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总是有很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必然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摇摆不定。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胜利，首先应当正确地选择对资产阶级举行决定性进攻的时机，同时考虑到使资产阶级和它的小资产阶级同盟者分离，或使它们之间的联盟不稳固，等等；其次，无产阶级在自己胜利之后，应当利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摇来中立他们，阻止他们站到剥削者方面去；应当不顾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而善于坚持一个相当时期，如此等等。

10.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而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在1903—1917年预先学会战胜孟什维克，即战胜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并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那末它就不能在1917—1919年战胜资产阶级。

现在最危险的自我欺骗（有时简直是愚弄工人），就是德国的“独立党人”领袖们和法国的龙格派²⁹等等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

政。实际上他们在继续推行着那种旧的惯用的政策，即向机会主义作大大小小的让步，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态度，盲目服从资产阶级民主（即他们所说的“彻底民主”或“纯粹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等等的偏见。

1919年12月16日

1919年12月发表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220—244页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年12月20日在俄共(布)
莫斯科市代表会议³⁰上的报告)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做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实际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我们党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现象即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使我联想到的一些问题。因此在实际结论方面我只能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种事情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的评论，如果不能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非常审慎的。他们认为，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到了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当做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变

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流行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绝大多数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算做社会主义者，为了表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而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是正确的名称了。早在四十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末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至于共产主义，它是这种社会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不要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的情况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习惯，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以及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等等，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了普遍的现象。显然，在那些为

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刚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得到了很大好处，尽管已经完成并得到了大规模发展的事业（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已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强大得多）有很大的意义，但如果把采取“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现在正在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会是极大的歪曲，那就会带来胡乱吹嘘的实际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诸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统治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的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资本主义，即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不足介意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出现新的、细小的、投机性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

入了各种细小的投机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坏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更加残酷的斗争，激起了疯狂的投机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种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为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最顽强地进行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在战争中和我们遭到同样灾害的奥地利之类的西欧国家，它们同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活动更猖獗，而那里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产生、正在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违反资本主义旧有的一切惯例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东西，即广泛组

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忍受着极度饥饿、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在开始推广并受到群众欢迎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给予全面的支持，如果我们不愿意仅仅做一个同资本主义作斗争这样一种原则意义上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在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的规模，还没有整理出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只是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比莫斯科开展得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大量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备而经过审查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明我们不仅叫做共产党员和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个事物并实际地加以运用。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

提出这个问题，并从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真正地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十分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应该了解这一点），它对清除混进党来的分子和抵制党在腐朽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受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简要报道载于1919年12月21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第287号

1927年第一次全文刊印

按速记记录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251—256页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

同志们！四个月以前，1919年8月底的时候，我曾经为战胜高尔察克写过一封给工人和农民的信^①。

现在，我又为战胜邓尼金把这封信全文重新印发给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

红军攻克了基辅、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正胜利地向罗斯托夫推进。乌克兰的反邓尼金起义正在高涨中。必须集聚一切力量，把试图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的邓尼金军队彻底粉碎。必须消灭邓尼金，以免再次受到侵犯。

西伯利亚被高尔察克占领以后，当地人民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过了好几个月才被红军解放，这个教训俄罗斯全体工农都已经知道，现在乌克兰工农也应当记取。

邓尼金在乌克兰的统治，也同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统治一样，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考验。毫无疑问，从这个令人痛苦的考验中得出教训，就会使乌克兰工农象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农一样，更清楚地了解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更坚定地保卫苏维埃政权。

在大俄罗斯，地主土地占有制已彻底废除。乌克兰也应当这样做，乌克兰工农苏维埃政权应当彻底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彻底推翻地主对乌克兰工农的一切压迫，把地主撵走，并在这一切之后

^① 见本卷第62—69页。——编者注

把胜利巩固起来。

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及其他许多为大俄罗斯劳动群众和乌克兰劳动群众同样具有的任务以外，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在这些特殊任务中，有一个是目前值得特别注意的。这就是民族问题，就是说：乌克兰应该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已经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所以不言而喻的，而且理所当然的，只有乌克兰工人和农民自己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才能够确定并且一定会确定：究竟是把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起来，还是让它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如果取后者，那末在这个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联邦关系。

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劳动者争取劳动完全摆脱资本压迫能够成功，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劳动的利益要求在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有最充分的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地主、资本家即资产阶级的拥护者竭力分裂工人，加剧民族纠纷和民族仇恨，以削弱工人的力量，巩固资本政权。

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

我们是反对民族仇视、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的。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要求世界各国工农紧密团结起来，完全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劳动者不应当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1914—1918年罪恶滔天、反动透顶的战争使两者分得更清楚了，使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间的恶感和仇恨也更加加剧了。没有充分权利的附属民族对大国压迫民族的不满和不信任，例如乌克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不信任，已经积累好几百年了。

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这种联盟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强制，它的基础是充分信任，明确意识到兄弟般的团结一致，完全自愿赞同。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实现这种联盟的时候，应当十分耐心和十分谨慎，不要把事情搞坏，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设法消除几世纪以来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引起的、由私有制引起的以及因瓜分和重分私有财产而彼此仇视所引起的那种不信任心理。

所以，在力求实现各民族统一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分裂民族的行为时，我们应当非常谨慎，非常耐心，对民族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采取让步态度。但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有关劳动基本利益的一切事情上，我们决不让步，决不调和。至于现在暂时（因为我们是力求完全消灭国界的）怎样确定国界，这不是基本的、重要的问题，而是次要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从缓解决，因为在广大农民和小业主中，民族的不信任心理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急躁从事反而会加强这种心理，危害完全统一的事业。

俄国工农革命即1917年10月至11月革命的经验，以及这个革命在两年内胜利地反抗国内外资本家的侵犯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资本家能够暂时地利用了波兰、拉脱维亚、爱斯兰和芬兰

的农民和小业主对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制造了纠纷。事实表明，这种不信任心理正在消失，只是消失得非常缓慢。一直是压迫民族的大俄罗斯人表现得愈谨慎、愈耐心，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消除就愈有保障。我们承认了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斯兰和芬兰的国家独立，现在就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取得这些弱小邻国中深受资本家欺骗压抑的最落后的劳动群众的信任。我们采用了这种方法，现在就能满有把握地使他们摆脱“他们自己的”民族资本家的影响，完全信任我们，向未来的统一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迈进。

在乌克兰还没有完全从邓尼金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前，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是乌克兰政府。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即担任政府委员的，除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外，还有乌克兰斗争派³¹共产党人。斗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之一，还在于前者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独立。布尔什维克不认为这一点是引起分歧和分裂的问题，会妨碍同心协力地进行无产阶级工作。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而发生分歧。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人主张乌克兰完全独立，有人主张建立比较密切的联邦关系，有人主张乌克兰同俄罗斯完全合并。

为这些问题而发生分歧是不能容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

如果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要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乌克兰人很容易怀疑，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为了无产者在反资本斗争中的统一，而是出于旧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偏见。这种不信任是很自然的，在相当程度上是难免

的和合乎情理的，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

如果乌克兰共产党人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独立，也会使人怀疑，他们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为了乌克兰工农反对资本压迫的暂时利益，而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小业主的民族偏见。因为我们千百次地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到，各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如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等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者，都装扮成拥护无产阶级的人，唯一的目的是用这种欺骗手段来偷运他们同“本”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反对革命工人的政策。我们在俄国1917年2月至10月克伦斯基执政的例子中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一切国家中也不断看到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乌克兰共产党人的互不信任是很容易产生的。怎样消除这种不信任呢？怎样克服这种不信任而造成相互的信任呢？

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共同斗争，反对各国的地主资本家，反对他们恢复自己无上权力的尝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种共同的斗争会在实践中清楚地表明，不管怎样解决国家独立问题或国界问题，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一定要有紧密的军事联盟和经济联盟，不然，“协约国”的资本家，即英、法、美、日、意这些富强资本主义国家联盟的资本家就会把我们分别扼杀。我们同得到这些资本家金钱和武器援助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斗争的例子，清楚地说明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谁破坏大俄罗斯工农同乌克兰工农的团结和紧密的联盟，谁就是帮助高尔察克之流、邓尼金之流和各国资本家强盗们。

所以，在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大俄罗斯

民族主义的表现,就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会带来很大的害处,使我和乌克兰同志之间发生分裂,而使邓尼金和邓尼金匪党得到好处。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及斗争派发生争执时,如果这些争执只涉及乌克兰独立问题、乌克兰同俄罗斯联合的形式问题以及一般的民族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让步的态度。但是在各民族所共有的根本问题上,即在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许同资产阶级妥协、不许分散我们抵抗邓尼金的力量等问题上,我们大家,无论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乌克兰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都是不能让步、不能调和的。

战胜邓尼金,消灭邓尼金,保证这样的进犯不再重演,这就是大俄罗斯工农和乌克兰工农的根本利益。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因为全世界资本家都在帮助邓尼金,而且将来还会帮助各种各样的邓尼金。

在这个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中,我们大俄罗斯工人同乌克兰工人应当结成紧密的联盟,因为孤军作战显然是不会胜利的。至于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国界如何划定,两国的相互关系如何确定,这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让步;在这方面,可以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工人和农民的事业,战胜资本主义的事业,是不会因此遭到毁灭的。

如果我们不能保持紧密的联盟,共同反对邓尼金,反对我们两国的和一切国家中的资本家和富农,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俄罗斯就可能被资本家扼杀,就是说,劳动的事业就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葬送掉。

各国资产阶级和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即联合资产阶级反对

工人的“妥协主义”政党，拚命地分裂各民族工人的团结，煽起互不信任的心理，破坏工人紧密的国际联盟和国际友爱。资产阶级的努力如果成功，工人事业就会一败涂地。希望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乌克兰共产党人能够耐心地、坚持地、顽强地共同奋斗，粉碎任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阴谋，消除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偏见，给全世界劳动者做出榜样，表明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可以结成真正巩固的联盟，共同为取得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建立全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而斗争。

尼·列宁

1919年12月28日

载于1920年1月4日
《真理报》第3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
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259—265页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³²

1. “我们是否准备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

不。我们曾以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地正式地申述过我们的和平愿望。遗憾的是，法国资本主义政府却唆使波兰(大概也唆使罗马尼亚)进攻我们。甚至很多从里昂发出的美国电讯都在这样说。

2. “我们对亚洲的计划是什么?”

和对欧洲的一样，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同正在觉醒起来要求过新生活，过没有剥削、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商人的生活的各国工人和农民和平共居。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一场因瓜分世界而引起的英法(和俄国)集团的资本家对德奥集团的资本家的战争，它唤醒了亚洲，使亚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更强烈地渴望自由、渴望和平劳动、渴望制止战争再起。

3. “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什么?”

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用于运输和生产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

4. “实现这种和平的障碍是什么?”

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象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

5. “我们对于美国把俄国革命者驱逐出境的看法如何?”

我们收留了他们。我们在国内是不怕革命者的。我们根本不怕任何人。如果美国还有那么几百个或几千个本国公民使它感到害怕,那我们准备就我们收留美国所害怕的一切公民(当然,刑事犯除外)问题举行谈判。

6. “俄德两国建立经济联盟的可能性如何?”

很遗憾,可能性不大。因为谢德曼之流是很坏的同盟者。我们主张同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建立联盟。

7. “我们对盟国要求交出战犯的看法如何?”

如果要认真的话,那末战犯就是各国的资本家。把土地超过一百公顷的地主和资本超过十万法郎的资本家全部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能教会他们从事有益的劳动,教会他们不再扮演可耻的、卑鄙的、血腥的角色,即充当剥削者和为瓜分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罪犯。这样,战争很快就会绝迹了。

8. “同我们保持和平对欧洲的经济有何影响?”

用机器换粮食、亚麻和其他原料,难道会对欧洲不利吗?显然不会是不利的。

9. “我们对苏维埃这一世界力量未来的发展的看法如何?”

未来属于全世界的苏维埃制度。这一点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例如,计算一下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季度中增加了多少拥护苏维埃和同情苏维埃的小册子、书籍、传单和报纸就足以证明。情况只能是这样。既然城市工人、农村工人、雇农、短工以及不剥削雇佣工人的小农都懂得,既然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懂得,苏维埃使他们掌握了全部政权,使他们摆脱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那末还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呢?至少我是不知道

这种方法的。

10.“俄国是否还必须担心外来的反革命干涉？”

很遗憾，还必须担心。因为资本家是个愚蠢而贪婪的人。他们作过多次这种愚蠢而贪婪的尝试。因此，在每个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没有把本国的资本家改造好以前，还必须担心这些资本家再来干涉。

11.“俄国是否愿意同美国发生事务上的往来？”

当然愿意，正如我们愿意和一切国家发生事务上的往来一样。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对爱沙尼亚作了巨大的让步，就证明我们愿意这样做，为此，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同意租让。

弗·乌里杨诺夫(尼·列宁)

1920年2月18日

用英文载于1920年2月21日

《纽约晚报》第12671号

用俄文第一次载于1950年4月

22日《真理报》第112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333—335页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20年3月29日在俄共(布)
第九次代表大会³³上)

同志们，在开始报告之前，我应该预先说明，这个报告也象在前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样，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组织部分。这种划分首先就令人想到，从外表上、从组织上看来，中央工作包括些什么。这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逝世后我党度过的第一个年头；这个损失不能不影响到中央的整个组织。没有人能象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那样善于一身兼负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我们就不得不试图用集体工作来代替他一人的工作。

这一年来中央的工作，就日常工作来讲，是由中央全会选出的两个集体机关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执行的；同时为了使两局的决议互相协调、互相联系起见，就由中央书记兼任两局委员。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情形：组织局真正首要的任务是分配党的干部，而政治局的任务是解决政治问题。自然，这种划分是相当勉强的；显然，任何政治如果没有人员的任命和调动，就无法执行。因此，任何组织问题都有政治意义，所以我们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只要有一个中央委员提出声明，就可以根据某种理由把任何问题看成政治问题。企图用别种办法来划分中央工作恐怕是不适当的，而在实践中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上述工作方式收到了非常好的结果：在我们两局之间从来没

有发生过难以解决的事。这两个机关的工作一般说来是协调的，由于中央书记参加两局而使这种方式的实际运用便利得多了，并且中央书记执行的完全是党中央的意志。为避免发生某种误会起见，必须首先着重指出，党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作出集体决议的，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出决议的那些任务。否则，中央工作是不能正确进行的。

上面简单说明了中央内部的工作程序，现在我来执行自己的任务，做关于中央工作的报告。做中央政治工作的报告，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年来政治局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随时解决一切有关政治的问题，即有关统一各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以及一切工人阶级组织的行动，有关统一苏维埃共和国全部工作并努力指导这些工作的问题。政治局解决了所有一切有关国际、国内政治的问题。当然，要想大致上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你们可以从中央对本届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上看到必需的总结材料。要想在报告中重复这一总结，这是我不能胜任的，而且我以为，代表们也不感兴趣。我们每一个在党和苏维埃某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每天都注视着千变万化的国内外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在苏维埃政权颁布的法令中、在党组织的工作中、在每一转变中表现出来，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对党中央委员会的评价。必须指出，问题是这么多，往往只好非常匆忙地解决，只是由于集体中的各成员彼此十分了解，知道各人意见上的出入，相互信任，才得以完成这个工作。否则，甚至这个集体的人数再增加两倍也应付不了。往往要用电话商谈代替开会来解决复杂问题。这是在深信某些显然复杂而带有争论性的问题不会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才采取这种做法。现在，在我做总的报告的时候，我想不按年月先后或分门别类地评论各种问题，而只谈那些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

并且是把昨天的经验,确切些说,即过去一年的经验同当前的任务联系起来的那些问题。

现在还没有到编写苏维埃政权历史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時候,那我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说,并且我想也可以代表中央说,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的一年,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我们往前行进的跳板看待的。从这个角度看来,中央工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同军事任务和决定苏维埃共和国国际地位的任务有关的工作;另一类是国内和平经济建设的工作。后一类工作已经提到首要地位,也许直到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大家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有决定意义的战线上获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的时候起,才提到首要地位的。去年春季,我们在军事情况方面曾经十分困难,大家记得,当时我们遭到过多次失利和以前料想不到的反革命势力和协约国代表一再突然举行的大进攻。所以很自然的,这一时期的工作,大半是解决军事任务和国内战争任务,在所有的胆小鬼看来(更不用说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³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们的政党了),在大批中间分子看来,这个任务是无法解决的,它逼得他们老老实实承认:这是个解决不了的任务,因为俄国落后,又被削弱了,既然西欧革命迟迟未发,那末俄国就不能战胜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那时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以十分坚定的态度,保持绝对的信心说,我们一定能胜利,必须实行“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

为了实现这个口号,就必须完全自觉地和公开地不去满足许多最迫切的需要,往往使极多的人有求无助,而深信我们应当把全部力量集中用在战争上,以便在协约国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只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

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当然，我们不仅要着重指出这一方面，而且要注意到从这一方面所得到的教训：没有纪律，没有集中制，我们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为了铲除反革命、拯救祖国，为了使俄国革命战胜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所忍受的空前牺牲，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党的纪律，有极严格的集中制，而且绝对相信成千成万人的牺牲定能有助于这些任务的执行，绝对相信这是真正可能做到和有把握的事业。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使我们党和实现专政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成为团结俄国以至全世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因素。

如果想想一个被削弱了的贫困落后国家为什么竟能战胜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想想发生这种历史奇迹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那末，我们可以看出，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中制、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在什么基础上实现的呢？在一个教育程度最差的国家中，千百万劳动群众所以能够组织起来，这种纪律、这种集中制所以能够实现，也就是因为受过资本主义锻炼的工人已被资本主义团结起来，一切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团结起来，而且越是先进国家，这种团结的规模就越广泛；另一方面，是由于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生产中的小私有制造成分裂。私有制造成分裂，我们则团结起来，把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越来越多地团结起来。这一点现在可以说，甚至瞎子，至少是那些原来不愿看见这件事情的人都已经看出来。时间越久，我们的敌人分裂得越厉害。他们被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商品生产私有制分裂开了，不管这些人是

用余粮做投机买卖、靠剥削挨饿的工人发财致富的小业主，或者是各国资本家，尽管后者拥有军事实力，创立了“国际联盟”³⁴这全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伟大统一联盟”。这样的统一是彻头彻尾的幻想、骗局、虚构。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这个臭名远扬的“国际联盟”，它企图瓜分管理各国家的权利，企图分割世界，可是这臭名远扬的联盟原来是个肥皂泡，马上就破灭了，因为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我们从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了这一点，而这就证实着一个基本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我们确定了自己的正确立场，树立了自己的绝对信心，深信十月革命必然胜利，深信我们所担负的事业虽然有很大的困难，虽然有无数的障碍，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群众一定会奋起加入的。我们早知道，我们有同盟者，我们必须善于在这一个负有历史上光荣艰巨任务的家中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使这些空前的牺牲获得百倍的补偿，因为我们在自己这个国家中每多坚持一个月，我们就能在世界各国多获得千百万的同盟者。

如果想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能够胜利，为什么我们必然胜利，那末只能说，是因为所有我们的敌人，那些在形式上同世界最强大的资本政府和资本代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不管他们在形式上是如何统一，实际上却是分裂的；他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其实在分裂他们，使他们互相敌视，加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又腐蚀他们，使同盟者变成了野兽，以至他们看不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英国士兵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登陆的法国水兵中，在世界各国工人中，同情苏俄的人日益增多起来，虽然在所有一切先进国家里，社会党妥协分子都投到资本方面去了。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基本原因，这个最深刻的原因，使我们获得了最可靠的胜利；这个原因仍旧是我们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主要泉源；这个泉源使我们

能够说,等我们在本国充分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并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它的先进政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无产阶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这实际上也就是无产阶级意志的表现,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决心的表现,无产阶级同全世界千百万工人联合的决心的表现。

那些资产者老爷们和第二国际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却把这称为鼓动性的词句。不对,这是历史事实,这是俄国流血的、痛苦的国内战争的经验证实了的事实。这次国内战争是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战争;世界资本在殴斗中自己崩溃了,它自己毁灭了自己,我们却在一个被饥饿和伤寒折磨得奄奄待毙的无产阶级国家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在这个国家里,被我们团结起来的劳动群众越来越多。以前妥协派认为是鼓动性词句而且被资产阶级习惯地加以嘲笑的东西,在我国革命的这一年中,尤其是在报告所包括的这一年中,终于变成了无可争论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极肯定地说,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就证明我们有全世界的基础,有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得多的基础。我们有国际同盟,它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下来、没有任何手续的,从“国家法”观点来看,它是毫无意义的,而实际上,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它却有无所不包的意义。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月,不管是我们夺得了新的阵地或者只抵挡住了空前强大的敌人的每一个月,都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并使我们获得千百万新的同盟者。

这个过程看来是很艰难的,并且带来了几次莫大的失败。在芬兰开始空前白色恐怖之后,正好在过去这一年,接着又有匈牙利革命的失败²⁸,协约国代表们瞒着本国议会,同罗马尼亚订立秘密条约,把这个革命扑灭了。

这是最卑鄙的叛卖行为,是协约国用白色恐怖来扑灭匈牙利

的革命的阴谋；更无须说它们怎样竭力同德国妥协派勾结起来扑灭德国革命³⁵；更无须说这班称李卜克内西为正直的德国人的人怎样和德帝国主义者一起，象疯狗一样扑向这个正直的德国人了。它们这样放肆地采用高压手段，只能使我们更加巩固和强大，同时却毁坏了它们自己的基础。

我觉得，我们得到的这个基本经验，是我们应当特别估计到的。在这方面最需要考虑的是，使我们的鼓动和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分析和说明我们为什么获得胜利，为什么在国内战争中付出的那些牺牲得到了百倍的补偿，而根据这个经验，又应当怎样做才能在另一个战争中，在不流血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这一战争只是改变了形式，而进行这种战争反对我们的，仍然是旧资本主义世界的旧代表、旧仆和旧领袖，不过是进行得更起劲、更疯狂、更卖力罢了。我国革命比任何其他革命都更有力地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革命的力量、革命进攻的力量、革命的毅力、坚决性和胜利越大，则资产阶级方面的抵抗力也越大。我们取得胜利越多，则资本主义剥削者也就越努力学习怎样联合起来，转而采取更坚决的进攻。因为你们大家都记得很清楚（从时间上说，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可是从事变过程说，却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在十月革命开始时，人们是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海外奇谈的；在俄国，很快就抛弃了这种观点，而在欧洲，也抛弃了这种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还不发展、还很薄弱的观点。布尔什维主义成了世界现象，工人革命抬起头来了。苏维埃制度，即我们继承了1905年的教训，吸取了自己的经验而在十月革命时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已成了全世界的历史现象。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两个营垒完全自觉地互相敌对着。但是应当指出，只是在过去的这一年，才开始了它们彼此间的最后决战。现在，恰好在这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

正经历着一个也许是最巨大、最急遽而尚未完结的转变关头，即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关头。

你们都知道，协约国各帝国主义列强的领袖们向全世界高喊过：“我们永远不会同布尔什维克这些篡权者、强盗、夺取政权而反对民主的人停战。”你们知道，先是他们的封锁撤销了，接着连他们联合各小国的尝试也破产了，因为当时我们不仅善于把各国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且也做到了把各小国的资产阶级吸引过来，因为帝国主义者不只压迫本国工人，并且也压迫各小国的资产阶级。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把各先进国家中的动摇的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以致现在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协约国只好违反自己的许诺、誓言，破坏自己签订的条约；它们也曾同俄国各种自卫分子订过几十次条约，现在对这些条约就象守着破木盆叹气³⁶，因为它们为了这些条约耗费了亿万金钱，结果落个一场空。

现在它们撤销了封锁，开始同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实际的和平谈判，它们又不把这种谈判进行到底，所以各小国对它们丧失了信心，对它们的力量丧失了信心。我们看见，协约国的态度，它们对外的态度，从法学的通常观点看来，是很不明确的。各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处在非和非战的、又承认我们又不承认我们的状态。我们的敌人原来深信自己是一种力量，现在它们完全崩溃的情形却表明它们丝毫没有力量，只不过是一小群互相争吵、根本没有力量奈何我们的资本主义野兽。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拉脱维亚正式向我们提出了和平的建议；芬兰打来了一个电报，正式提议划定国界，其实这也就是向和平政策转变。最后还有波兰，波兰的统治集团曾特别蛮横地以战争威胁我们，而且现在还继续这样做，过去和现在它从协约国领到的大炮最多，并且协约国还答应，只要它继续同俄国斗争就尽力帮助

它，——甚至这个由于政府的地位不稳而不得不同意作任何军事冒险的波兰，也送来了请求举行和谈的照会。必须特别谨慎。我们的政策要求非常小心。在这里极难找到正确的路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刻火车所停的轨道通往何处，连敌人自己也不知道它今后究竟怎么办。在挑唆波兰方面最卖力的代表法国政策的老爷们，以及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领袖们都不知道今后会怎样，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们今天说：“老爷们，给我们几列车大炮，几万万金钱，我们决心同布尔什维克打一仗。”他们隐瞒罢工浪潮在波兰日益高涨的消息，他们严令检查机关不许泄露真情。而那儿的革命运动日益增长着。德国革命的高涨已进入新的阶段，工人在经过了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³⁷之后，现在正在建立红军，最近从那里发来的电讯直接指出，工人越来越慷慨激昂。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者脑子里不由地开始想到：“是不是晚了？会不会在国家尚未作出或和或战的正式决定以前就在波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

我们知道，每过一个月我们的力量都会大大增强，而且将来也会愈来愈大。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但是我们对待国际危机应当非常小心，应当准备随时应付任何突然事件。我们已得到了波兰正式的媾和建议。这些老爷现在正处在如此绝望的状态中，弄得他们的朋友，即德国君主派分子，一些更有锻炼、更有政治经验和知识的人们也铤而走险，举行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波兰资产阶级突然提出了媾和的建议，因为它知道，冒险可能成为波兰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我们知道敌人正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十分肯定地指出：虽然有了媾和建议，但战争还是可能的。他们日后的举动是无法预见的。这种人，我们都看到过，

这些克伦斯基之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人，我们都领教过。在这两年中，我们看到，他们怎样今天跑到高尔察克方面，明天又几乎跑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然后又跑到邓尼金方面，而这一切都是用自由和民主的词句作为借口的。我们既知道这批老爷们，所以我们双手抓紧媾和建议，同意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我们相信，同各小国缔结和约，对于推进事业来说，要比战争好无数倍，因为帝国主义者用战争欺骗劳动群众，在战争掩盖下隐瞒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真相，所以，任何一种和平都会使散布我们影响的道路增加一百倍、宽广一百倍。在过去这几年中，我们的影响本来已经很大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已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随时都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我们的敌人自己还不清楚，他们在这一方面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他们正在进行各种战争准备，这是无可怀疑的。现在有很多同俄国毗邻的国家，也许还有很多非毗邻的国家，都在进行这种全国的武装准备。所以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可能地随机应变，最坚决地抓住我们已定的方针，并随时准备应付一切事变。争取和平的战争，我们是用了极大的毅力来进行的。这场战争正使我们取得辉煌的成就。在这种战场上，我们表现得很有本事，至少也不比红军在流血战场上的活动差些。但是，即使这些小国渴望和平，同我们缔结和约的事情还不取决于它们的意志。它们完全被欠协约国的债捆住了，而在协约国之间正进行着拚命的互斗和竞赛。所以我们应当记着，从国内战争和反协约国战争所造成的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形势看来，和平当然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在采取各种促进和平的步骤的同时，也应当极力从事军事准备，绝对不能解除我们军队的武装。我们军队是使帝国主义列强不敢对我国采取丝毫侵犯举动的真实保障，这些列强纵

然可以指望起初获得某些侥幸一时的胜利，但结果任何一国都不免被苏维埃俄国粉碎。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这应当成为我们鼓动和宣传的重点，我们要善于准备这一着，要善于在日益疲惫不堪的情形下解决那个迫使我们把和与战两者结合起来的任务。

现在我要说到迫使我们用极大的决心引导劳动群众利用军队来解决当前基本任务的那些最重要的带根本性的理由。旧的纪律泉源，即资本，现在已经削弱了；旧的团结泉源已经消失了。我们应当造成另一种纪律，造成另一种纪律和团结的泉源。强迫手段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愤懑、叫嚣、喧嚷和号泣；这班人爱空喊“自由”和“平等”，却不懂得给资本享受自由就是对工人犯罪，让饱食的人和挨饿的人平等就是对劳动群众犯罪。为了反对这种谎言，我们主张在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团结劳动者的事业中，丝毫也不能害怕采用强迫手段；因为从来没有过不采用强迫手段进行的革命，无产阶级也有权采用强迫手段，以便坚决地保持住自己的成果。当资产者老爷们、妥协派老爷们、德国独立党²⁴老爷们、奥地利独立党²⁸老爷们和法国龙格派²⁹老爷们争论历史因素问题时，他们总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坚定性、不屈不挠精神这些因素忘掉了。我们无产阶级曾对自己也对别人说过，并且用事实证明过，我们宁肯死得一个人不剩，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领土，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即纪律的原则和坚定的政策的原则，为了这些我们是应当忍受牺牲的。这也就是我国无产阶级的不屈不挠精神和久经锻炼的性的表现。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正处在崩溃的关头，资产阶级正处在绝望和危机的关头，在这个时候决定一切的，也只有这个政治因素。至于少数和多数、民主和自由的词句，不管旧历史时期的英雄们怎样陈述过这些东西，都不能起丝毫决定作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如果

工人阶级决心作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善于用自己的全部力量，那就可以解决任务。大家都来解决这个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决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胜一切的因素。

我们有了这个胜利，有了这种信心，才开始执行并且已经执行和平经济建设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就是我们本届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责。在这方面，我认为谈不上做中央政治局的报告，确切些说，谈不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同志们，是的，这就是应当由你们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应当由你们以党的最高级机关的权威来考虑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清清楚楚地提到你们面前来了。我们已经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你们的责任就在于最终批准、修改或变更我们的决定。但是中央在自己的报告中应当说，它在这个基本的迫切问题上已经采取了极明确的立场。对的，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任务上去。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我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要善于运用我们的胜利。另一方面应当懂得，这个过渡需要大量的牺牲，即我国本来就已经忍受得够多的那种牺牲。

原则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央是很明显的。中央全部工作都是服从这个政策、根据这种精神的。例如你们将要解决的关于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的问题，看来似乎是局部的问题，如果割断它同各方的联系，当然不能说它是有根本原则意义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都要从我们在知识、经验、革命实践方面的基本收获出发。例如有人对我们说：“集体领导制是广大群众参加管理

的形式之一。”可是我们中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作过决定，我们应当向你们报告：同志们，这种理论上的混乱是决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在军事工作和国内战争的基本问题上有十分之一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那我们就早已被人打垮了，而且被打垮是理所应得的。

同志们，请准许我在做中央工作报告的时候，在谈到新阶级是采用集体领导制还是一长制来进行管理的问题的时候，稍微作点理论上的说明，指出一个阶级怎样实行管理，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新手；而我国革命和以往一切革命的区别，就在于我国革命中没有空想成分。新阶级只有在反对其他阶级的激烈斗争中保持住自己，才能推翻旧阶级取而代之，而且只有当它能够根本消灭阶级时，它才能获得最终胜利。阶级斗争的巨大而复杂的过程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这样，你们就会陷在糊涂观点的泥坑里。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资产阶级对封建主实行的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宪法上明文规定了自由平等。这些都是骗人的话。有劳动者存在的时候，私有者是善于投机倒把的，而且正由于他是私有者，也就不得不投机倒把。我们说，平等是没有的，在饱食者和挨饿者之间无所谓平等，在投机者和劳动者之间也无所谓平等。

现在的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无产阶级的统治就表现在取消了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共和的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一个私有制上。我们宪法之所以争取到在历史上的存在权利，就是因为废除私有制不仅是在纸上写写而已。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了私有制，并彻底破坏了私有制，阶级统治也就表现在这里。首先就表现在私有制问题上。我们实际解决了私有制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阶级统治。后

来，宪法又把实际生活中解决了的废除资本家地主的私有制的问题记载在纸上，并补充说：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有比农民更大的权利，而剥削者则没有丝毫权利，——这样就把我们业已实行的本阶级的统治记载下来了，这样我们也就把劳动者的一切阶层和一切小的集团同自己联系起来。

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是分散的，其中私有财产较多的人就是私有财产较少的人的敌人；无产者废除私有制，就是公开向他们宣战。还有许多不觉悟的无知的人，他们完全拥护一切自由贸易，可是他们不能参加战斗，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战胜剥削者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既不拥护我们，但也无力反对我们。关于私有制以及哪一个阶级领导的问题，只有阶级统治能够决定。谁要是象我们所常看见的那样把阶级统治表现在什么地方问题同“民主集中制”问题联系起来，那他就要造成莫大的混乱，在这个基础上是任何工作也无法顺利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明确性是一个基本条件。既然我们的敌人也承认，说我们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方面作出了奇迹，那末这就不应当从外表上来了解，以为我们有许多鼓动员，我们耗费了无数纸张等，而应当从内部实质来了解，就是说，我们鼓动中所含有的真理钻进一切人的头脑中去了。而这个真理是躲避不了的。

当一个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的时候，它也改变了所有制的关系。资产阶级代替了封建阶级之后，也就改变了所有制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宪法上说：“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和乞丐是平等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这种“平等”把国家统治权交给了资产阶级。难道你们以为资产阶级代替了封建阶级之后，它就把国家和管理混为一谈了吗？没有的事，他们不是这样的傻瓜，他们说：要管理就要有善于管理的人材，为了这点，就要用封建主，要改造他们。他

们果然这样做了。这是他们犯了错误吗？同志们，不是的，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莫名其妙地就有了，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我们看看这个例子：资产阶级刚胜利时，它是用另一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理工作的，否则它就无人可用。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材，而我们现在也就有同样的任务，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所以我们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了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由什么证书所能证明，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

资产者在还不善于管理时获得了胜利，他们是这样保障自己的胜利的：宣布新宪法，从自己的阶级中征募行政人员，开始学习，同时并利用旧阶级的行政人员，教自己的新人做行政工作，为了这件事，运用了全部国家机构，而封闭旧的封建机关，让富家子弟进学校，这样经过了几十个年头，他们把本阶级的行政人员培养出来了。现时在统治阶级按自己的面貌组成的国家中，也应采取过去所有的国家都用过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愿站到纯粹空想和空谈的立场上去，那我们就要说，我们应当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我们应当保障革命所夺得的宪法，但是要管理，要建设国家，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材，而这样的人材我们只有从旧阶级中才能找到。

关于集体领导制的议论，往往贯串着一种极愚昧的精神，即反对专家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是不能达到胜利的。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也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这个基本问题应当提得十分明显，应当提作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借助于被

我们推翻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浸透了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同时,我们应当从本阶级队伍中选拔自己的管理人员。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实际训练等等,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进行工作。

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既有了两年来的经验,就不能这样议论,好象我们是第一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在斯莫尔尼³⁹时期和在此前后,我们做了够多的蠢事。这是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第一次干新事业,哪里会有智慧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不能把正确成分和不正确成分区别开来,要办到这点是需要时间的。现在这已经是不久前的过去的事了,我们已经度过了这个时期。这一充满混乱和热情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说明过去这个时期的文件就是布列斯特和约。这是历史文件;不仅如此,这是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被迫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软弱无力。这是怎样的历史时期呢?是我们软弱无力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度过了这个时期。这又是通盘实行集体领导制的时期。这是无法跳过的历史事实,有人说,集体领导制是学习管理的学校。但是决不能永远停留在学校的预备班里!(鼓掌)这样是行不通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如果我们的举动仍旧象小学生一样,那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挨打的。应当前进。应当用毅力,用统一的意志猛求上进。在工会面前有极大的困难。要设法使工会理解,这个任务是一种反对臭名远扬的民主制残余的任务。所有这些关于被委派者的叫喊,所有在各个决议案中、在各种谈话中常常说到的陈腐有害的滥调,应当一律扫除干净。否则我们就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在两年内还不能领会这个教训,那我们就是落后,而落后的

人是会挨打的。

任务非常困难。我们的工会对无产阶级的国家建设有过极大的帮助。工会是党联系千百万没有知识的群众的一个环节。我们不会蒙住眼睛：当工会帮助国家办理粮食工作时，曾肩负了和我们的各种灾难作斗争的任务。难道这不是极大的任务吗？不久以前出版了《中央统计局公报》。公报上刊出了一些绝无信仰布尔什维主义的嫌疑的统计学家们作出的总结。其中有两个极有趣的数字：在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了七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十七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是每年只消费十六普特粮食的。这就是表明粮食斗争中阶级对比关系的两个数字。无产阶级继续忍受牺牲。竟还有人叫嚷什么采用暴力！但是无产阶级认为暴力是正当的、合法的，并且用忍受最大牺牲的事实证明了采用这种暴力是正确的。在我们饥饿破产的俄国，各产粮省的大多数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比在沙皇资本主义俄国的时代吃得好些。但我们要说，当红军还没有获得胜利时，群众总是要挨饿的。那时必须要工人阶级先锋队忍受这种牺牲。它在这个斗争中受到了锻炼，但受过锻炼之后，我们应当继续前进。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这一步。同任何一种工会一样，老工会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过去。在这个过去时期中，工会是反对劳动压迫者的机关，反对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当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时，当工人阶级象现在这样必须忍受极大牺牲、忍受饥饿死亡时，情形就完全改变了。

这种改变，不是一切人都了解到的，不是一切人都研究过的。在这方面，有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了我们，他们要求用集体领导制来代替一长制。同志们，对不起，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一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复杂的任务：

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一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到这点。经过了那次我们在火线上坚持下来的战争之后，一定还有不流血的战争。结果就是我们的胜利越大，象西伯利亚、乌克兰、库班这样的地区也就越多。那里有富裕农民，那里没有无产者，即使有无产阶级，也是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恶习腐化了的；并且我们知道，凡是有小块土地的人都说：“我管政府干吗！我要尽量敲一下饿肚子的人的竹杠，我才不在乎政府呢！”今后，协约国将会帮助那些原来被邓尼金宰割，以后又动摇到我们方面来的投机者农民。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商业、用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投机倒把成为国际性的。在《中央通报》⁴⁰上登载过的加米涅夫同志的提纲，把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完全表达出来了。他们想使投机倒把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正在戒备着呢！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方面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的意志。原来留下的那些旧偏见、旧习惯，应当一概扫除。

我在结束时，还要讲讲古谢夫同志写的一本小册子。据我看来，这本小册子有两方面值得注意：它的优点，不仅在于形式上，也不仅在于它是在我们代表大会开幕前写成的。不知怎的我们一向都惯于写决议案。据说，除了枯燥无味的著作外，各种各样的著作都是好的。我看，凡是决议案都应当列入枯燥无味的著作。如果我们都仿效古谢夫同志，少写些决议案，多写些小册子，即使它们也同古谢夫的小册子一样有大批错误，那也要好些。尽管有这些

错误，它还是一本很好的小册子，因为它所注意的中心是恢复全国工业和生产这一基本经济计划，因为其中的一切都服从于基本经济计划。在中央委员会今天散发给大家的提纲中，有整整一节是完完全全从古谢夫同志的提纲中摘引来的。我们可以借专家们的帮助，更详尽具体地拟定这个基本经济计划。我们应当记住，这个计划是预定用很多年来实现的。我们并不诺许一下子就使我国避免饥荒。我们指出，斗争将比在军事战线上更加困难，但这个斗争会引起我们更大的兴趣，它是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真正基本任务的门径。这个斗争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切力量，要求意志统一，我们以前做到过这一点，现在我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末我们在不流血战线上获得的胜利，决不会少于在国内战争战线上所获得的胜利。（鼓掌）

载于1920年莫斯科出版的
《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速记记录》一书

按该书原文刊印并根据
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
第404—423页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 到创造新制度

我们这张报纸⁴¹是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的报纸。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只有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只有在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那些进行垂死挣扎、组织反革命暴动和国内战争的剥削者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在实际上提出来。

这个时刻好象在1918年初就已来到了，而1918年2月德帝国主义向俄国举行武装进攻之后，它的确是来到了。但在当时这个时刻出现得异常短促，新的更强大的反革命暴动与侵略的浪潮来得异常急速，苏维埃政权根本没有可能比较专心地埋头地研究和建设的问题。

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我们遭到了空前未闻的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饥饿和灾难，同时，在这两年中，红军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匪帮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胜利。

现在我们真正有可能指望（如果法国资本家唆使波兰作战不会成功的话）取得更稳定更持久的和平了。

两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些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建设的经验。因此，可以而且应当直接提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更正确些说，不是共产主义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因为这里指

的不是从资本主义当中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高级发展阶段，而是它的低级发展阶段、初级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资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又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⁴²、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劳动与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具体方式。

在实行这种劳动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会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根本不会思考的人了。

在这样崭新、伟大和艰难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策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惊慌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创立吸

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需要做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高尚不过的工作。

幸好，我们在推翻了资产阶级，镇压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已经夺得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

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品质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十年、十五年以至二十年的磨炼中得到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又在两年空前未有的穷困、饥饿、破坏和苦难当中使这些品质受到了磨炼。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

1920年4月8日

载于1920年4月11日《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

署名：尼·列宁

按《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4—476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⁴³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 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新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极大的区别,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不,是按最狭义来说的,也就是,把国际意义理解为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

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极大的错误。而且,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

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出,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更常见的,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还不如说是他们由于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整个思想进程和整个思想范围,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思想糊涂、见识迂腐、手段卑鄙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这一切还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批评,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去作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用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他预见到可能有一种情况会到来,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⁴⁴上写了一篇《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下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现时〈与1848年相比〉^①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革命民族的行列,

^① 本选集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编者注

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越来越移到斯拉夫人那里去了。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十九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俄国从西方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主动性，也许现在它本身已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最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重新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早已不再是西欧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回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崩溃得更快一些。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牺牲的实在太多了——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了社会革命的幼苗，并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冲破反动势力的冰层，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写得多么好啊！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

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

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人士由

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所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经历了十五年（1903—1917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经验。因为在这十五年内，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在革命经验方面，或在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也就是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革命运动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这样多的经历，即使接近于这样多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如此丰富地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斗争特色和斗争方法，并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且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当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处处都感到伟大的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在酝酿着和准备着。国外的侨民报刊，在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三个主要政派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

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更确切一点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形成着各种真正阶级的政治思想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所必需的政治思想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性和尖锐性在世界上都是见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在自发的斗争发展中，诞生了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当时关于苏维埃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的策略和参加议会的策略的更替，合法斗争形式和非法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互相配合、互相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每一个月所受的政治科学基础的训练，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

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大步向前迅速发展。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他们的骨干保存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连纳事件⁴⁵发生以后，便稍微快了一些。在1905年以后，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莫大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必须利用的“合法机会”配合起来，那末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所有工人选民团中都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

的政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⁴⁶ 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不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观点，都在侨民的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轻蔑地、高傲地耸起鼻子，嘲笑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斗争剧烈，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机会”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在其他几个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讨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所以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派以及“考茨基派”，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末起，就已无情地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²⁹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⁴⁷首领、费边社分子⁴⁸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恬不知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老朽和腐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反对自己的莫大的破坏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一变而为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政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从前议会(虽然是反动透顶的议会)的反对党领袖的称号，使这种领袖容易在革命中继续起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在几个星期内就出色地掌握了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⁴⁹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一切方法和手腕、论据和诡辩。我们现在读到一切有关谢德曼和诺斯

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社分子及独立工党领袖等等的文字，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早已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真是历史开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现在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估计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主要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²⁴、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和表现了糊涂观念，所有这些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不善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象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不善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在各处都破产了。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反对议会制的(实际上是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而所作的准备也绝不象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上述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要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

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⁵⁰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些,而“工农”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则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议会制的共和国更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详的、仔细的、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在1917年10月取得胜利,也不能保持住这个胜利。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 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 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就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在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讲到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情形就不同了。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关于这一点,国外知道得还远远不够。这种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类型的社会阶层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由于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犯旧的错误，这种错误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环境里，由于意外的原因，总是会以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尽管俄国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大于西欧各国，但是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毫无疑问，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的布尔什维主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一度发展得非常茂盛，因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就特别巩固了。布尔什维主义承受并继续了这一斗争，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作了

斗争。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个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它的独特的“革命性”和“左的精神”，在于它承认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手段。自然，我们所以摒弃个人恐怖，只是因为这种手段不适当，至于有些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一般地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因遭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围攻而采取的恐怖手段，那末这种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他们的“左的精神”就在于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这里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还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开除伯恩斯坦的党籍，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贩卖行为）最近似革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现在1920年，在经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一切政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政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¹³的党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失节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总地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起到第一个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建立时止这一完全终结了的历史时期，那末，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一般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直接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而直截了当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机会主义国家观，可是这封信却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隐藏了三十六年^①）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杰出的革命家，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的论据，是1905年抵制议会的成功经验。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谄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⁵¹也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225页。——编者注

义。而且当时的斗争是由这样一个问题引起的，即让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议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和速度是否相同，所以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了，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拒绝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模仿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①，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纠正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的迅速高涨并且转为起义，另一方面，正在维新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整个历史环境，迫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这个历史时期已经完全终结，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现在如果回顾一下，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激烈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配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组织（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① 关于个别人所说的话，作相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⁵²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同志，就在这一年都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柏利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总是首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说：

假定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Do ut 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与他们大同小异），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社分子、“独立党人”、“劳工分子”（“拉布分子”⁵³）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们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那时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愿意做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哪种**具体**情况下的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它作战，决不许那班老于世故的“求实主义”的社会党人和议会的奸诈之徒，拿“一般妥协”的空谈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现在英国工联“领袖”们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正是这样来卸脱他们**实行叛卖**，实行**这种**实际上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一点在政治上决不是总象这个幼稚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应许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

为了不给人们留下曲解的余地，我试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单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末以来就在实际上制定了它的国际主义。它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战争时就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制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保卫祖国”的谬论。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去谋求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大臣职位。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极大的新的考验：它不同“本国

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准备推翻他们，并且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便彻底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和平，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和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做了人力所及的一切来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之下。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辩护，即为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²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该国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在于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⁵⁴。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

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有一本表现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之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明白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认识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就政治方面看来，这个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呢，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号一律按照原文）

往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它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它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的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这本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政党的一切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合于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制度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特别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下投入革命斗争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及阶层包括进来，就必须建立基础最广泛和范围最广大的新的组织形式。这种一切革命分子汇集的地点，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听从‘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集合

在这里。在这里，把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以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可见，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赞成议会制度，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斗争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地参加过1903年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或是密切地观察过这一运动发展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陈腐的、早已听腻了的废话！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

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为什么不要这简单明了的道理，却要来这一套胡说八道呢？来这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⁵⁵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非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的普通、正常和简单的关系，把人们的思想弄糊涂了，陷于困惑莫解的地位。在德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按期举行的代表大会遵照正确手续来自由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刊以及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等方便办法来检阅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内战的扩大，不得不抛弃这种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方式和非法的方式，二者结合使用，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组成或保留“一批领袖”，在这个时候，人们张皇失措，臆想出了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由于荷兰“论坛派”⁵⁶不幸生在一个小国，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从来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非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陷入了迷途，茫然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不加思索，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现代的“时髦”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且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会想一想这是什么对什么的关系，不会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中分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总是投奔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混蛋们痛恨，

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指责他们是叛徒。最新的(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替某些先进国家创造了垄断的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内到处出现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班家伙,他们只顾自己本行业的利益,只顾工人贵族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多数的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过去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堡、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艾列尔^①,就是这样的新领袖。艾列尔企图使问题“深入”一层,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① 《共产主义工人报》⁵⁷(汉堡1920年2月7日第32号所载卡尔·艾列尔《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先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若不先摧毁政党,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曼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艾列尔和克·霍纳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曾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特别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完全不适当的议论。要知道,仅仅承认马克思主义还是不能避免错误的。俄国人特别清楚这一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特别在我国常常是“时髦的”。

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而纵容这些行为，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认党性就意味着不是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跃进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跃进到中级阶段，而是跃进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

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来讲几句结束前一问题的话。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中心小组⁵⁸已经在彼得堡开始形成，它必须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³³（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危险的病症，一经治愈，机体甚至还会更加强健一些。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使我们必须把总指挥部即党的领袖们特别“隐藏起来”，藏得特别秘密，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几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把他们送去服苦役，使其中许多人早死。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适当地采用隐蔽的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几百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送去死亡，另一只手

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①。

在许多国家里，其中也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将来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防范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 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肯定无疑地要对这个问题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唱唱高调，怒气冲冲地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大骂一顿（克·霍纳骂得特别“庄重”和特别粗鲁），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

①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这个错误，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的党中央。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通知杜马中的劳动派⁵⁹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到邓尼金那里去了。

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的总计划，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现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实行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六十一万一千人。十月革命前后，党员人数变动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还比现在少得多。⁶⁰我们怕把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对于执政党一定会设法钻营依附，而这些人只是配枪毙的。最近一次我们大开党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天在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邓尼金攻占奥勒尔（距莫斯科约三百五十俄里），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以及一般不坚定的人，是决不可能指望加入共产党来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的（因为这样更可能会受到绞刑或拷打）。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一千个党员选代表一人参加），由大会选出十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即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每局各五人，由中央全会选出中央委员组成。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在工会会员已经超过四百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

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的、比较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末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有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多样化的宣传鼓动工作，及时地和经常地召集工会领导者的会议，以及有威信的工会工作者的会议，同时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很少），他们教唆这些信徒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离开无产阶级政权而独立！），直到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扩大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满足群众的需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材来担任管理国家的职务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察院”的法令中，曾经规定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有权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重视），以及通过经常

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机构就是这样。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懂得：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既然熟悉这种机构，并且观察过这种机构是怎样在二十五年内从不合法的地下小组成长起来的，那末在他看来，什么“从上面”或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就是一些幼稚可笑的废话，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同时，德国左派说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么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洁的、由非常可爱的（也许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郑重的、非常渊博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我们也不会不觉得是同样幼稚可笑的废话。

资本主义必然给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的、长期形成的职业上和手艺上的差异；一方面是各种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年复一年地才能发展成而且一定会发展成比较广泛的、行会气味比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业和同一手艺），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材，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材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任何其他解决这种任务的办法都是极不认真的，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工会是工人由散漫无力进到初步阶级联合的过渡。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些行会的狭隘性，某些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除了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又一巨大进步，这时候党更需要不仅用旧的方法，而且用新的方法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还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全国经济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非个别行业）手中，然后再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述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无异是害怕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

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吸引愈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问，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并且一定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方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盘踞”得更加牢固，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自私自利，不顾别人，贪得无厌，形同市侩，在情绪上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龚帕斯之流，同西欧的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在社会面貌和政治面貌上完全是同一个类型。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象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使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丢尽了丑，并且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去夺取政权），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几天中，即在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

败涂地，只获得七十万票，加上南高加索的票数，一共只有一百四十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九百万票。请参看我《共产国际》杂志⁶¹第七、八两期合刊上所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①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如果忘记这个最起码最明显的真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象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实质上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这是美国的丹尼尔·德莱昂派的一种极其确切的绝妙的说法。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参看恩格斯于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⁶²）的影响之下。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浮，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在如何滥用这个字眼。要想善于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

① 见本卷第115—139页。——编者注

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联系），**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为了在凡是有无产阶级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是最反动的）里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也就应当善于忍受一切牺牲，克服各种重大障碍。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⁶³ 1920年3月10日所登的材料，英国工会会员，从1917年年底到1918年年底，已经由五百五十万人增加到六百六十万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到1919年年底，达到七百五十万人。我手头虽然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第一次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还浸透了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袖手旁观，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说什么这种联合会将成为（将成为！）广大的工人联合会！！说什么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这个联合会！！

很难想象谁还会做出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对革命更有

危害的事情来！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打败本国资产阶级和协约国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已经两年半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问，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他们象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么一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⁶⁴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进行工作。毫无疑问，机会主义的“领袖”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教士、警察和法庭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出去，使他们极不便于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机智灵活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法，保持缄默，隐瞒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无论如何也要在那里进行共产主义工作。1905年以前，我们在沙皇制度下，不曾有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企图捕获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时，我们却派遣了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当时其中有一个是彼得堡的杰出的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时被沙皇的将军杀害），他们在那里同群众建立了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把工人从祖巴托夫分子^①的影响

^① 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无非都是祖巴托夫分子，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实行自己的无耻政策时采用一些文明、细致和民主的粉饰手段。

下拉出来。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宪政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特别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种工作是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并且还要系统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对于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以及对于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直截了当地加以谴责，并且建议下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要予以谴责（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既然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而且是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制度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度！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末，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

句空话吗？

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度，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迟一二十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略加以计算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极为严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末“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进行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一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制度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的左派或左的荷兰派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已经认为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根本推翻了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又不再是错误了。他们连一点证据的影子都没有拿出来，并且也

拿不出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不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不以极端注意、仔细和审慎的态度去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的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仍旧跟着中央党⁶⁵（天主教的“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无数的反革命军队。”（见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无数的”无产者，不仅还一般地赞成议会制度，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可见在德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可见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异常野蛮和残暴的压迫，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用特别多样的形式造成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成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意志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特别透彻的了解，所以我们对别人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在德国共产党人看

来，议会制度自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必须把痛苦的真理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必须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无数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甫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ßbauern）走，那末根据这一点，也已经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教育不开展的、闭塞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什么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必须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甫愚弄的、因闭塞而愚昧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最好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1917年9月至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

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决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到“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月至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度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得久不久，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1917年9月至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至于这几次选举曾经产生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万分有益的）政治成效这一点，我敢说，我已经在前面所说的那篇论文中论证过了，该文对俄国立宪会议选举结果作了详尽的分析。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已经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隶属于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事实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的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上面提到的“荷兰派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四条的译文（译自英文）如下：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被破坏、社会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关，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参加一切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既绝对没有估计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 1848 年、1870 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 1878—1890 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估计到俄国的经验（见上文），就是合法的斗争和不合法的斗争相配合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目前特定的情况说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权利的共和政府以及一般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必须（有些地方已经做到）把合法的斗争和不合法的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候正在迅速地迫近着。这个极重要的问题，荷兰人和一般左派却是根本不了解的。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 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 年 2 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 年 10 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不合逻辑到惊

人的程度。如果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关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事实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准备）去进行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准备由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更加困难或者并不更方便一些。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拥护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的胜利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的时候，因为在要解散的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所以并不感到困难，反而感到方便。提纲的作者完全糊涂了，他们忘记了一系列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所有革命的经验，而这些革命的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和一般“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象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那种人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没有深刻地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认”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的共同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为了证明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

议会优越这个新的真理，荷兰和德国的左派正在象熊那样帮这种倒忙⁶⁶。自然，谁要是照旧笼统地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它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一次抵制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把第一次抵制的情形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不能召开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议会外（尤其是罢工）的群众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个经验对欧洲目前的条件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战时和战后，绝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卑鄙无耻，叛卖变节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革命情绪现在可以说是“新鲜的”或“珍奇的”，人们对这种情绪等待得实在太长久、太枉然、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这种情绪所支配。自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极长期、极艰苦的流血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革命策略

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己的“革命性”，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生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中原因之一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在农民当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采纳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开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逃避”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的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

优秀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瑞典的泽·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从下面来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恶劣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的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这种群众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发、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地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和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要顺利地克服这种困难，就非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非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舞台上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要同驱逐不适当的领袖，代之以适当的领袖这种做法结合起来）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这种工作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①

^① 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Comunista astensionista）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期他主编的《苏维埃报》⁶⁷（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出版的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中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遗憾。请看看 1874 年恩格斯反驳三十三个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是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之一，这种著作家的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都有极为深刻的内容。

恩格斯说：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宣言中说，——‘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第 3、4 期)、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⁶⁸(19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出版的第 1—4 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说，波尔迪加同志和他那派对屠拉梯及其同道者的抨击是正确的，因为后者既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里，依然当议员，又继续奉行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⁶⁹容忍这种现象，当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象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的害处和危险，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暗中破坏了党和苏维埃政权。对机会主义的议员采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存在是对的。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不彻底”(见《共产主义》第 3 期)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见弗·恩格斯《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⁷⁰ 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⁷¹。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致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最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分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象“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象兰斯柏利同志所提到的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忍受过同样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所作的“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

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罢工者钱用完了，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的饥饿和苦难）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使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推在客观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是被资本家说服，有时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是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国的工人都见到过某种形式的类似现象）。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正确断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正象有些杀人案件那样，很难断定它们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必要的自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密布置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①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

^①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在自己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地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把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都抹杀了。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末除了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训练、教育和启发，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表现出最主要的那种不可容许的、叛卖性的、体现着对革命阶级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野蛮的强盗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即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种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强盗式的“国际联盟”³⁴；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反对“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不可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成为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其中包括对

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种蠢话的），居然还能得到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而且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恢复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

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⁷²；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⁷³（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了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致于象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来领会这个真理。

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实行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老《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订立过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断地在思想和政治上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有丝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一直继续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但是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和政治上停止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农民政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揭露他们这班冒充

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过短期的正式政治同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有好几年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非常靠拢我们，是一个跟我们意见几乎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产党人”⁷⁴）。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订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同盟，我们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而未作任何修改，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毫无疑问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达成协议。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订立（并且不久实现了）正式的政治同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同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我们，后来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抱着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订立同盟的想法，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些攻击证明“左派”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派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

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总共只占百分之十三的席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却占百分之五十一的席位。为什么德国工人这种完全同一性质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没有立刻增加共产党人的力量，却首先增加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动摇于谢德曼派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左倾”幼稚病的无数表现，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到外面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已经证明不能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克里斯平、累德堡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该党党员共约七十五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立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这个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真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一定会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一方面可以便利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的溶合，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和政治上的斗

争。要制定这样一个适当的妥协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允许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那些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许多形形色色的中间阶层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内部没有分成比较开展和比较不开展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末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足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而削弱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末就要对那些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让步，当他们倾向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倾向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于那种“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

的操之过急的“决议”，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末了，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也是他们的确定无疑的错误之一。这种见解象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表达得越“庄重”和“郑重”，越“坚决”和武断，结果就越笨拙。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那种荒谬绝伦的、甚至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订立同盟对协约国作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堡等），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不容许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坐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倒，维也纳苏维埃革命还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滚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主义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要否定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部分地直接危害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加以否定，而且立刻加以否定。能不能顺利地否定这个和约，不仅决定于德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而且决定于国际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阻碍了这种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种

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末，这种罪过就应该由他们去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的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极其强大的国际堡垒）。一定要把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急不容缓地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这该由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去提倡），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末苏维埃德国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忍受为时更久的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帝国主义者做好圈套来陷害德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挑衅说：“你们说出来吧，你们不愿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地对付诡计多端而且目前还比他们强大的敌人，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却象小孩子一样，果然上了这个圈套。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要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在工人中间掀起了一种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前途确实无量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如“英国社会党”⁷⁵、“社会主义工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⁷⁶)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它们之间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上述“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根据加入第三国际、承认用苏维埃制度代替议会制度以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来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却是它们在是否参加议会和新的共产党是否加入旧的“工党”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这个“工党”是工会工作者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的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也跟“社会主义工党”^①一样,表示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就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的意见不一致了,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见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根本分歧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

^① 似乎“社会主义工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德国的表现形式同英国的比较起来,更加同“俄国的”相近)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考查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 Gallacher)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生产中(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地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着争吵。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党员群众对于议会愈来愈起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赞成 Soviets<俄文苏维埃的英文译音>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或以政治为职业的)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革命的同志不应当<所有着重号都是原作者加的>支持这帮匪徒。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于革命利益的人将会实行叛变。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里。至于韩德逊和克莱尼斯(Clynes)之流已经反动得无可救药了。正式的独立工党越来越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麦克唐纳和斯诺顿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避难所。正式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党员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么方法拥护机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给上述这些先生帮忙。在这里英国社会党不起任何作用……这里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生产(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晰的、精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如果同志们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那我们一定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而又不愿意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末,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反动派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

原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证明他们能够象‘主人’自己，象阶级政治家那样，有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来，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普通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那些善于表达群众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这种（往往是蒙昧的、不自觉的、未觉醒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哪些哪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加拉赫同志这封给编辑部的信，无疑包含着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正在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1908年和1918年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的萌芽。

该信作者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百姓”都能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该信作者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

该信作者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不论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还是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

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好家长，但他毕竟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该信作者没有提出，甚至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如果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如果不由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末，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该信作者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也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本国内部活动着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莱尼斯、麦克唐纳、斯诺顿之流已经反动得无可救药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某种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⁷⁷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讲中同阿斯奎斯（曾经特别邀请他出席会议，但是他拒绝了）和那些不愿意同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证明自由

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劳合-乔治所“宁愿称之为”社会主义政党的那个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工党，就会获得胜利。“这在法国叫做共产主义”，——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在德国叫做社会主义，在俄国叫做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是根本赞成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言：“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走到农业区域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里党派的划分仍然保持着原样。那里离危险还远。那里还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区域，那里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区域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的危险时始终注意到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在那里，确定的观念有着巩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荡。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它一开始动摇，那末，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再从劳合-乔治演讲以后所进行的讨论中，引出下面一个插曲，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华莱斯(Wallace)先生问道：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你认为你在工业区域对于这些产业工人所采取的政策会得到什么结果？会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目前诚心诚意拥护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

首相回答说：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失望而被推到工党方面去，现在在工党里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在破坏着政府的威信。结果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无疑是大大加强了。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的几次补选所表明了。”

附带说说，这一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糊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是这一点也会使资产阶级灭亡的。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改正），但是他们终归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做‘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显，他说：‘我们把工党看作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那些由于他们厂内的工友都是工联会员，又由于想领取补助金而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

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一种思潮的产物，而英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还没有超出这种思潮的界限，虽然在人民的头脑里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很快就要改变这种情况……”

“……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推翻这些社会爱国派，我们在英国既不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当分散自己的力量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中自己的力量，造成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工会很快组成政府；革命的反对派必须准备向工党政府实行进攻……”

总之，自由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由百年来的经验奉为神圣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

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象覆舟时的老鼠一样，纷纷逃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述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自己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尝过由这批人组成的政府的滋味，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尝过了这种滋味，那末毫无疑问，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必须由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顿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过来，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转变是由群众的政治经验造成的，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如果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至少应当知道）：韩德逊和斯诺顿要是战胜了劳合-乔治和邱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守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末他们提出“不妥协，不转折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一万名兵士跟五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折”、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十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拚。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这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也可以看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抱着一种不够细心、不够注意、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革命阶级的政党，如果我们要带着群众走（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末，第一、我们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顿去打倒劳合-乔治和邱吉尔（更确切点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害怕自己的胜利！）；第二、我们必须帮助工人阶级大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认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认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认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认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必须促使这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将有很大的把握取得胜利，一举而推翻韩德逊之流的

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邱吉尔发生“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发生“摩擦”，自己的力量（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日益削弱，那末将来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不知所措了。

现在我要更具体地来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共产党可以向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提议“妥协”，提议订立选举协定，向他们说：让我们共同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让我们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在选举时，而是根据单独的投票）来分配议席，但同时我们要保留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因为这样做就是背叛；英国共产主义者也绝对必须坚持和保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坚持（从1903—1917年的十五年内）和保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同意在这种条件下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关心）。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亲自出马“煽动”群众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自己的政府，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共产主义者反对韩德逊之流

的全部宣传，我们将毫无顾忌，毫不避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拒绝在这种条件下同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接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在群众中获得胜利，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那些漂亮的、非常正确的、非常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说明之后，都会同情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那时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偷偷摸摸地力求获得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公然去同保守党人携手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 1917 年 2 月 27 日（旧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获得胜利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在 1917 年 6 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占百分之十三的席位）。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极亲密的政治同盟，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①，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

^① 俄国 1917 年 11 月间立宪会议的选举，有三千六百万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其结果如下：布尔什维克得选票百分之二十五，各种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得选票百分之十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各小团体得选票百分之六十二。

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无力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末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众的同情，而使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对我们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号召选民投“拉布分子”候选人的票，反对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都往往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资格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赞成韩德逊而反对劳合-乔治，那他们想必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邱吉尔专政（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好，而且也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正象用绞索吊住绞犯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象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道者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狡猾”，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的”反驳者说：请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到群众身上去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不见

得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了解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了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1917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而到了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这种情况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布尔什维克。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复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的普通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问，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自己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它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末他在这个问题上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复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所犯的错误。第二、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

但是要讲到这点就不仅要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要联系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十 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最落后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不断发展，规模巨大。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次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独立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表明了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怎样产生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苏维埃。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工人运动中，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巩固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首先而且主要是同本国的（每个国家的）“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

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看来，这种斗争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第二种斗争无论在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一致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毫无疑问，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都在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预备学校，以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成为有组织政治派别以后，历史给了它十五年的准备时间，它才获得胜利。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期中就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显得坚强有力，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身分证、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等等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机会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它不会或者不能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领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

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主要的）已经做到了，这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吸引过来，使它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接近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更接近于实际解决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连取得胜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这离胜利还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

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是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立场上来，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也要善于在这些群众接近和转到新立场上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没有完全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解决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末，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完全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解决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在革命中得到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那时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在这方面，甚至那些带有一切小组习气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能做出成绩来的。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布置百万大军（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配置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准备进行最后

决战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决不能象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应当以百万、千万来计算。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布置就绪了，以致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约略描写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邱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典型各国都有，只是稍有民族差别而已）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种分歧却是万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上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事情、全部任务就在于估计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何时完全成熟。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

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举出人名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必然破产，而这种破产恰恰会以我们的精神，以共产主义的方向启发群众；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邱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派、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要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柱石”之间分裂得最厉害的时机，来进行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击溃，并且夺取政权。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适用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

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于敌人最危险的、能极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和平”时期，非革命时期）在合法的斗争方面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以为合法的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只有不合法的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在这样条件下，例如，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在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横蛮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次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的时候，有些政党和领袖不能或不愿意（不要说“不能”，还是说“不愿意”吧）采用不合法的斗争手段，如果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不善于把不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用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要困难得多，因而也就可贵得多。善于寻找、探求和正确判定一种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坚决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别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那里什么时候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极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全部的准备工作，四只脚都钉上掌子（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引起“决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什么样的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从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反动军阀千百次无耻行为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⁷⁸），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意外的”、“微小的”缘由，就能把人民一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经常不断地、不屈不挠地、毫不放松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对爱尔兰的政策、对殖民地的政策和在全世界范围内施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遭遇的一切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法，用共产主义的方法，本着第三国际的精神而不是本着第二国际的精神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在你们俄国是这样，可是在我们那里，议会活动却是不一样

的”。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各国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方面，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工作。在我国的选举中，也始终有很多很多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只顾小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行为。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方式，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散发传单，走遍工人住所，走遍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的农民的茅舍，深入最普通的平民酒馆，进入最普通的平民会社、团体以及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象在议会中说话那样）跟人民说话，丝毫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要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关和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器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到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不费气力，共产主义的任务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必须把气力费在解决日益多样化的、日益牵涉到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日益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一个个部门、一个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所有这些社会生活的领域，

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现在,当各国人民受尽了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睁开了眼睛,认清了真相(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是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处都布满了特别多的易燃物,造成了特别多的缘由,可以引起冲突和危机,使阶级斗争尖锐化。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颗星星之火(目前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都有无数火花从各方面迸发出来)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特别能够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甚至是最陈旧的、最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希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将来就不能担负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各种各样的武器,既不能做好准备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来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做好准备在将来取得胜利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成功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夫俗子意料之外的多次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资产阶级到处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把它恨到了极点,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加速事变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在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唤起群众来评价布尔什维主义;而且除了报纸以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人们

纷纷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着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举动，也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现在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热心地攻击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在这方面也同克伦斯基一样，做得“太过火了”，因而也帮助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反布尔什维主义问题当作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张皇失措，把成千成万的人当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嫌疑犯大肆逮捕，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一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就是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聪明，很有经验，却也做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了各种经费非常充裕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了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了很多学者、鼓动家、教士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要“闭口不谈”和窒息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差不多只看到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够得逞，对我们来说也绝对没有什么可怕。共产主义确实正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起来”，它的幼芽真是各处都有，“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根深蒂固地侵入了机体并且浸透了整个机体。就是你煞费苦心，“堵住”一个出口，“传染病”也会找到另一个出口，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出口。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豕

突狼奔，暴怒若狂，肆意横行，做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向布尔什维克预先报复，再设法屠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个、几千个以至几十万个明天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击败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被击败了⁷⁹；一万五千多个德国共产党人，被谢德曼和诺斯克协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欺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³⁵；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²⁸。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为了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向前胜利前进，所缺的只有一点，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还没有广泛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各先进国家的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就是缺少这种认识，缺少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从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

“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我们要设法使共产党人不要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的，确切一点说，要更快地纠正，更迅速地、使机体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着手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这样强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妥协，这就是错误，这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

惨绝人寰的、卑鄙肮脏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是这样有力地推动了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个革命广阔深入的发展是这样无比迅速，其变换着的形式是这样无比丰富，它在实践上对任何学理主义的驳斥是这样富有教益，这一切使人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增 补

由于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我国的出版机构还没有完成出版我这本小册子的任务，这时却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绝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作什么超过几篇匆匆草就的政论家札记的著作，因此就扼要地谈几点。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已经另行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的两期（第7、8期）左派的《苏维埃报》，该报正在公开讨论可能分裂和必须分裂的问题，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派直到目前还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实行分裂，象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实行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

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观点混乱要好些，因为观点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也妨碍党和衷共济地开展真正有组织的、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实际把自己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不要具备善于掌握各种活动场所、各个部门、各种不同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试准备（并进而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地和必要地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就有十五年的功夫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系统的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而欧美，现在还不得以“急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党，成为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①

① 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并的问题，我还要指出下列一点。根据我所看到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来判断，前者的长处是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这种类似的现象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止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在个别的地方组织里，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时候在某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部分地是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人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而且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⁸⁰（《Die Rote Fahne》，Zentralorgan der Komm.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cusbund⁸¹）第三十二号上，载有德共中央关于卡普和吕特维茨军事“叛乱”³⁷（阴谋，冒险）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政府”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对那个“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政府，应许采取“忠顺的反对派”的态度（即不准备用“暴力来推翻”这个政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词句上吹毛求疵，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默不作声地放过去，例如社会主义

由于在革命的时候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还不是证明这种策略正确的根据。可是无论如何，一个共产党要想在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部队，并且除此之外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末毫无疑问，它就必须善于采取无论对于城市的工厂“街道”，或者对于乡村都是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和生动的方法，去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

⑧ 斯巴达克联盟。——编者注

叛徒的政府，决不能（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上）称之为“社会主义”政府；谢德曼之流以及考茨基和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政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那就不能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这类话；也决不能写下象声明第四条里这样的语句：

“……政治自由可以无限制地享用，而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成为资本专政的这种情况，从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观点来看，对于继续争取无产阶级群众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决不会有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顿之流（克里斯平之流），跳不出也不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的客套的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决不会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的拘束的时候，当然还可以补充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和克里斯平之流这班庸人去用事实揭穿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清洁的”政府，会“最清洁不过地”做一番“清洗”工作，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⁸¹打扫干净。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

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即卡普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又一次暴露出来了^①。《自由报》⁸³(《Freiheit》)(独立党人机关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 Stunden》)和阿尔都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些先生绝对不会象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那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的关头,他们必然会实行叛卖……同时却仍旧“极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当冒充共产主义者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和没有气节,而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状况毫无希望,并且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走狗面前开始哭诉的时候,他们也算是想“帮助”无产阶级的!

三

意大利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派议员留在党内是错误的。上述两期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这番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

^① 关于这一点,在1920年3月28日和30日的奥地利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⁸²(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第266、267号,尔·尔·,《德国革命的新阶段》[L. L.,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上,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了非常简单、明了而确切的说明。

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这位记者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没有根据的忧虑的程度。最高纲领派⁸⁴玩弄苏维埃理论的烈火，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粹是海外奇谈，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经常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学说当作诱惑物去迷惑无产者眼睛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改良，好来迁延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丧失自己的幻想，对自己喜爱的神话丧失信仰。因此，一连串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罢工使得已经很严重的国内局势越发严重了。亚得利亚海问题所遭遇的困难，使全国愤慨异常，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采用劳动纪律之必要，其实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秩序和充裕生活……”

象白天一样清楚，屠拉梯自己及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帮手、教唆者等大概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之流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象而且恰恰象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完完全全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状态的、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工作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有价值啊！他们不懂得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钝，多么象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对，对，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象熊那样替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倒忙，他最好不过地证实了波尔迪加同志及其《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

国际，那就该大张挞伐地把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赶出自己的行列，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为共产党。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波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却从对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评中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凡是参加会议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并不能拿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记)国际上有过这样的范例，即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而对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又确实是有益的。他们简直想象不出利用议会会有“新的”方式，而一味对“旧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坚持的、顽强的工作，便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根本同第二国际传统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留并发展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关不可。尽管你大叫大嚷反对“领袖”，尽管你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究竟还不能使人不利用那些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个工作，还不能使人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种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

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已经两年半的时候，在我们周围还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在这两方面做工作的人，真正是共产主义者，真正是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的党员，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方面或后一方面（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无论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然后进而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环境），都不可能逃避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解决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被资产阶级庸俗化了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钻营的行为，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在各国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不是典型的吗？

“拒绝”参加议会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行为，对议会的肥缺的资产阶级式的享用，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卑鄙的市侩陋习，——凡此种种，毫无疑问都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

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最流行的特点。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经常产生资产阶级),在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啊,你们觉得自己“异常革命”,事实上你们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却被一些比较小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会产生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得多、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象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还必须学习,必须补习怎样去克服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限量的困难。

到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无产阶级的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材,就不能建设也无从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目空一切地、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而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人”当中又会复活起来(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得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法律辩护人”⁸⁵

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种人们习惯了的、被资产阶级偏见所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们驱逐出党，是很“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极有限的）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很“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不愧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共产党党团，是很“困难的”；要使共产党议员不干资产阶级议会的无聊玩意，而在群众中从事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很“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很“困难的”，从前在俄国很困难，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因为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解决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末，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党团，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末，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卒补课，而这种匆忙补课，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平常犯更多的错误，会比一般表现更多的弱点和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末资产阶级的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一定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 and 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的。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场所，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克服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简直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五

在本书俄文本中，我谈到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革命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为的地方，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着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本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列宁同志：

由于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出版以前，就有可能读到它。在您的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政策上所起的作用，您再三着重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极少甚至根本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谨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的敬礼！

戴·伊·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写于1920年4—5月间

1920年6月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98页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⁸⁶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以下的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提纲草案，请同志们讨论，并请全体同志，特别是具体了解这些复杂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同志，以最简短（至多三、两页）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评论、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奥地利的经验。

波兰犹太和乌克兰的经验。

亚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经验。

东方各民族。

同大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里亚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坦。

土尔克斯坦及其经验。

美国的黑人。

各殖民地。

中国——朝鲜——日本。

尼·列宁

1920年6月5日

1. 按资产阶级民主的本性说来,关于一般平等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平等问题的抽象的或形式的提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特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武器。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斗争的自觉的代表者,它根据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揭露其虚假和伪善的基本任务,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而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虚伪性,在事实上表明,标榜为“西方民主”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压在弱小民

族头上的暴力。国际联盟³⁴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更快地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露了这个真理。

4. 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5.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

6.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实现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捷尔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

系中，或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在实践上已经显示出它是适当的。

8. 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用经验来检查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紧密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紧密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

9. 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象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承认民族平等，在实践上却不负任何责任，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民主派，或者是象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应当不断地揭发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自己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

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象我们在第二国际政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

11.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

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的和世纪式的分子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第六、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苏维埃

共和国联盟以外，附属的和弱小的民族别无生路。

12.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的和弱小的民族的压迫，使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不仅憎恨而且不信任整个压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该民族中的无产阶级。这一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年至1919年曾经按照社会沙文主义的精神，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迫殖民地和掠夺在财政上处于依赖地位的国家的“权利”，他们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为不能不加重这种完全合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很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指出的不信任心理和偏见，必须作某种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追求联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1920年6月发表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列宁
修改过的清样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24—130页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在他的论文中，很好地分析了现在已经成为黄色国际的第二国际为什么不仅不能规定革命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甚至不能恰当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接着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提出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基础。

根据这些理论基础，能够(而且我觉得应当)拟出即将在1920年7月15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个总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初稿如下：

1. 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免除破坏现象，免除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

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而奔走，那他们就不能执行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在许多有“工人贵族”的先进国家内，情

况正是如此，这些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中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骨干，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引到农村中去，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

2. 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都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级：

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工、短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而成立单独的组织（政治的、军事的、工会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的以及其他的组织），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二、半无产者或极小农，他们一方面依靠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仅能给他们家庭生活一小部分食物的小块私有土地或租佃土地上耕作，来获得生活资料。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农村劳动居民的人数是非常多的，但是资产阶级分子和第二国际的黄色“社会党人”抹杀这类农民的存在和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一部分人是为了有意识地欺骗工人，一部分人是由于盲目地为种种庸俗的因循观念所蛊惑，竟把这类农民同一般“农民”群众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这种方法，在德国和法国表现得最明显，其次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如果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对，这类农民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十分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半无产者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能够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

第三、小农，他们根据所有权或租佃权拥有小块土地，可以应付他们家属和自己经营上的需要，并不需要雇用他人的劳动力。这一阶层一定能从无产阶级胜利中得到好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能立刻充分地给他们以下几种利益：（一）取消向大土地占有者缴纳的地租或一半收成（例如法国的 *métayers*，即分成制佃农，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二）取消抵押借款；（三）取消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对他们的依赖（林地及其使用等等）；（四）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可以使用无产阶级剥夺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农具和部分建筑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农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以及其他许多利益。

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到追求绝对的贸易自由和使用私有财产权自由那方面去，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大），所以就被投机行为和私有者习惯所腐化。但是在实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时，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十分坚决地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条件下，这一阶层的动摇不会很大，并且这种动摇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整个说来，这个阶层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

3. 上述三类农村居民的总和，构成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城市内，而且在农村中都是有充分保障的。相反的意见在广泛地流行着，但是，第

一、这种意见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统计不断进行欺骗，极力掩盖上述农村各阶级同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之间，以及半无产者和小农同大农之间的鸿沟；第二、这种意见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由于黄色第二国际的英雄和各个先进国家的被帝国主义特权腐化了的“工人贵族”，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在农村贫民中进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机会主义者的全部注意力无论过去和现在都集中在怎样去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大农和中农（关于他们的情形可参看下文）作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妥协，而不集中在由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第三、这种意见所以能够得到支持，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成见（这种成见是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的），由于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的真理：上述三类遭受空前痛苦的、分散的、受压制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胜利得到利益，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出他们已经有这种有组织才能的十分坚强果断的领袖和保护者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4. “中农”在经济意义上应当了解为小农，他们根据所有权或租佃权也拥有不大的一块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不仅能够维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种剩余至少在好年月可能变为资本，第二、往往（例如两三家农户中就有一家）能够雇用他人的劳动力。拥有五至十公顷土地的德国农户，可以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

中农的具体例子，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这类农户中雇有农业雇工工人的农户约占该类农户的三分之一^①。在法国，象葡萄这类需要在土地上花费更多劳动的特种农作物比较发达，大概这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要更广泛些。

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这种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使他们中立。这个阶层动摇于两种势力之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赞成资产阶级的。因为在这里，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是占优势的；希望干投机活动，希望贸易“自由”和保存私有制是很自然的；与雇佣工人的对抗是直接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废除地租和抵押关系，会直接改善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应该立刻完全取消私有制，并且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有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素租来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

把这种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合起来，就可以充分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效。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有在十分谨慎，逐步前进，用榜样的力量，而不对中农施用任何暴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过渡到集体农业。

^① 确切数字如下：拥有五至十公顷土地的农户有六十五万二千七百九十八户（农户总数为五百七十三万六千零八十二户）；他们所雇用的各种雇工人为四十八万七千七百零四人，家庭劳动力（Familienangehörige）为二百万零三千六百三十三人。在奥地利，据1902年的统计，这类农户有三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一户，其中有十二万六千一百三十六户是使用雇佣劳动的，雇有雇工工人十四万六千零四十四人，家庭劳动力为一百二十六万五千九百六十九人。奥地利的农户总数为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九户。

5. 大农 («Großbauern») 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是雇有几个雇佣工人来经营的，他们所以同“农民”有关，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地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这个阶层进行的斗争上，把农村居民中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等等。

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会进行各种反抗，实行怠工和反革命性质的直接武装行动。所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必要的力量，以便彻底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除了推翻工业中的资本家以外，同时还要在这个阶层的反抗刚一露头的时候，便给它最坚决最无情的歼灭性的打击，为此就得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应当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取得优势。

但是，甚至剥夺大农也决不能是已经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更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把这种经济公有化。在个别的、多半是例外的情况下，要把他们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没收；同时还要保证根据一定的条件使小农可以无偿地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全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大农的斗争由于若干特殊条件而复杂起来，并且拖延了时间，但是这个革命的经验终究表明，这一阶层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之后，能够恭顺地执行无产阶级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并且甚至开始（虽然非常缓慢）对

捍卫一切劳动者而无情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

在俄国，使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大农的斗争变得复杂和迟缓的特殊条件，主要是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变革以后，俄国革命经历了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阶段，也就是说，经历了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阶段；其次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文化低，数量少；再次是地域辽阔，交通极不方便。各先进国家既没有这些阻碍条件，欧美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应当更积极地准备并且更迅速、更坚决、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彻底消灭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以前，农村中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不会相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十分稳固的。

6. 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一切土地，这种大土地占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直接或通过自己的农场主有系统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一部分中农），他们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他们大半是封建主的后裔（如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的贵族，法国复辟了的领主，英国的勋爵，美国的前奴隶主），或者是特别豪富的财阀，或者是这两类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混血儿。

在共产党队伍中，决不容许宣传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要给予报酬，决不容许给他们报酬，因为在现代欧美各国的条件下，这样做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就是对遭受战争痛苦最厉害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征收新贡款，而这个战争却增加了百万富翁的数目，使他们大发横财。

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怎样经营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的问题，由于俄国经济落后，主要是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使

用，只有较少的例外留作办所谓“国营农场”，这种农场由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经营，把那里以前的雇佣工人变成执行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国家的苏维埃委员。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大农业企业，并且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一条，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削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一、通常用来反对这一点的理由是说大农业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这种说法往往是以最恶毒的机会主义和背叛革命的行为来偷换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无产阶级为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害怕生产暂时降低的现象，就象北美奴隶制的敌人——资产阶级没有因为1863—1865年内战所引起的棉花生产的暂时降低而裹足不前一样。对资产者说来，重要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对被剥削劳动群众说来，最重要的是推翻剥削者，保证劳动者能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的条件。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或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

第二、不仅提高农业大规模生产，就是保留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也预先要有充分开展的、富有革命觉悟的、在职业上政治上组织上受过很好锻炼的农村无产者。凡是在还没有具备这种条件或者还没有可能把这一事业适当地委托给有觉悟而又内行的产业工人来做的地方，如果企图把大农场急忙转交国家经营，那末只能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威信，在那里建立“国营农场”时必须特别小心，必须极其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

第三、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保留着大土地占有者对附近小农所施行的中世纪式、半劳役式的剥削制残余，例如德国的租房农民 (Instleute)，法国的分成制佃农 (métayers)，美国的分成制佃农 (在美国南部，不仅黑人多半受这样的剥削，而且有时白种人也受这种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把小农所承租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原佃户使用，因为没有别的经济技术基础，并且也不能立刻建立起这种基础。

大农场的农具必须加以没收并转归国家所有，必须保证国营农场有了这些农具以后，附近的小农在遵守无产阶级国家所规定的条件下才可以无偿地使用这种农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不仅绝对必须立刻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田产，而且绝对必须把他们这些反革命头子和残酷压迫全体农民的人一律驱逐出去或加以拘禁；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城市和乡村的巩固，必须有系统地努力使这个阶级中具有宝贵经验、知识和组织能力的人，都能用来 (在最可靠的工人共产党员的特别监督下) 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

7.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完全能够控制，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 (全部经济电气化) 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这个为全体社会主义者口头上一致公认的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实际上却

被统治着黄色第二国际的并且在德国和英国“独立党人”⁸⁷、法国龙格派²⁹等等领袖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所曲解。这种曲解就是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较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而忽视了这种困难的具体过渡到和达到这一未来的迫切任务。在实践中这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鼓吹“社会和平”，即完全背叛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现时正在战争到处造成的空前破产和贫困的条件下，正在战争使一小撮百万富翁大发横财和极其无耻的条件下进行着斗争。

要使农村中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能够成功，就要求：第一、各国共产党教育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忍受牺牲和具有承担牺牲的决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和引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这个先锋队也善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表现出最大的牺牲精神和英勇精神；第二、要取得成功，还要使农村中最受剥削的劳动群众能从工人的胜利中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刻大大改善自己的状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因而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从获得粮食来供应城市。

8. 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劳动群众处在异常痛苦的、分散的、往往是受着半中世纪束缚的条件下，所以组织和教育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是有极大的困难的，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农村的罢工斗争，加紧援助和全面开展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群众性罢工。为现时德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所证实所丰富的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日益开展的群众性罢工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能够而且应当吸引农村中的小农参加这个斗争）才能打破农村的沉睡状态，唤醒农村被剥削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才能在他们面前明显地实

际地显露出他们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意义。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痛斥那些背叛和变节的社会主义者，可惜这种社会主义者不仅在黄色第二国际里出现，而且也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欧洲特别重要的三个大党里出现，他们不仅对农村罢工斗争采取冷淡的态度，而且借口有降低消费品生产的危险来反对这种罢工斗争（例如卡·考茨基）。假如不是在实践中用行动证明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能够把展开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看得高于世界上的一切，能够为这一革命作出最大的牺牲，那末任何纲领和庄严的声明都是一钱不值的，因为要避免饥饿、破产和新的帝国主义大战，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特别需要指出，现在旧社会主义的领袖和“工人贵族”的代表为了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群众中保持自己的声誉，常常在口头上向共产主义让步，甚至在名义上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些人必须在工作中，在革命意识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进行得最激烈、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大农，富农）反抗得最猛烈、社会党人妥协分子和共产党人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受到考验，以便证明他们是不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和能不能担任负责的职务。

9. 共产党应当竭力尽快地在农村里建立代表苏维埃，首先建立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只有同群众性罢工斗争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执行自己的使命，才能巩固起来，使小农受到影响（然后把他们包括在自己的组织里）。但是，如果因为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沉重压迫，以及没有产业工人及其工会的援助，罢工斗争还没有展开，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那末建立农村的代表苏维埃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其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哪怕是比较小的也好，加紧进行鼓动

工作,用最通俗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的要求,用突出的剥削和压迫的实例来阐明这些要求,经常派产业工人到农村去工作等等。

写于1920年6月初

1920年7月发表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31—142页

《共产主义》

（“为东南欧各国发行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
维也纳，自1920年2月1日第1—2期合刊至
1920年5月8日第18期）

在维也纳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是一种很好的杂志，它提供了很多有关奥地利、波兰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的极有意义的材料，同时也登载了国际运动的大事记、关于匈牙利和德国的文章、关于总任务和策略等等的文章。但是它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随便翻一下就立刻可以发现的缺点。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这个杂志正害着这种幼稚病，也就是我在彼得格勒刚出版的小册子中所阐述的病。

我想现在就把《共产主义》这份好杂志的幼稚病的三个症候扼要地指出来。在第六期（1920年3月1日）上登载了格·鲁·同志的一篇文章：《论议会制问题》，编辑部称它为讨论性的文章，而贝·库·同志，即《论实行抵制议会问题》一文（1920年5月8日第18期）的作者（幸而）直接否定这篇文章，也就是声明他不同意这篇文章。

格·鲁·的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别是臆想出来的；没有对一定的历史情况的具体分析；没有注意最主要的东西（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所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

关等)。

贝·库·同志在第十四期(1920年4月17日)《德国事件》一文中批评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0年3月21日的声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批评过这个声明。但是我们批评的性质根本不同。贝·库·同志是根据马克思的引文来批评的,但是这引文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他全盘否定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既然大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而走向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离开正确的革命策略而“独立的”)党²⁴内又继续离开右翼走向左翼,即实际上走向共产主义,既然事情是这样,那末对于这样的工人是否可以考虑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这种考虑的任务是否可以推开不管呢?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和5月间所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单纯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的工人还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种工人中的大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抹杀撇开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最后,上面提到的载于《共产主义》杂志第十八期上的贝·库·同志的那篇文章,特别明显地、清楚地、有效地揭露了他的错误在于同情现在欧洲所采取的抵制议会的策略。因为作者为了区别于“工团主义的抵制”,区别于“消极的”抵制,而臆想出一种特殊的“积极的”(哦,多么“左”呀!……)抵制,这就异常清楚地显出他的论断的错误是多么深刻。

作者写道:“积极的抵制就是说共产党不要满足于推广反对参加选举的

口号,为了有利于实行抵制,就象党参加了选举那样,象党的鼓动和行动(工作、活动、行为、斗争)是指望获得尽可能更多的无产阶级的选票那样,展开广泛的革命的鼓动工作。”(552页)

这真是妙论。这比任何批评都更有力地置反议会派于死地。臆想出“积极的”抵制,“就象”我们参加了选举那样!!大批愚昧无知的和半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是认真地参加选举的,因为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还是这些偏见的俘虏。而我们不去帮助这些愚昧无知的(虽然有时是“具有高度文化的”)小市民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抛掉他们的偏见,反而回避参加议会,并以臆想出没日常的资产阶级的恶习的策略来消遣!!

好极了,好极了,贝·库·同志!你为反议会主义辩护的言论比我的批评能更快地帮助消除这种愚蠢。

尼·列宁

1920年6月12日

1920年发表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43—145页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基本任务的提纲

1.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完全懂得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并且全心全意地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了。一个更重大的进步，就是在各个地方，不仅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群众，而且先进的农业工人，也都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条件地同情这些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错误或弱点。一种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的错误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旧的领袖和政党为了继续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and 帮凶，有的是半不自觉地对群众的愿望和压力实行让步，有的是有意识地欺骗群众，他们说他们愿意有条件地甚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全部实践中，依旧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水平上。这种情形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会直接腐蚀群众，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象匆忙改名为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叛变，有再度重演的危险。另一种小得多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运动发展的毛病，就是“左的”倾向，不能正确地估计党在对待阶级和群众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

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们。为此必须做到：第一、更具体地，特别是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二、指出在一切国家内为了实现这两个口号，可以而且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哪些准备工作；第三、指出纠正我们运动的缺点的途径和方法。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

2. 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的主要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的任何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尝试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引导受资本剥削的全部劳动群众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的，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相适应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

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都是单独的任务，它们要求对待剥削者和对待被剥削者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法。第三个任务则是由前两个任务产生的，它只要求根据每一次表现动摇的具体情况，把前两种方法巧妙地、及时地、灵活地结合起来。

3. 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那种具体的情况下，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理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破坏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粉碎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尝试，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保证真正使整个剥削阶级屈服。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旧政党和旧领袖总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奴役下，在资产阶级压迫下（这种压迫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愈文明，这些压迫形式就愈巧妙，同时也就愈残酷，愈厉害），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都能够使自己具有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性格，这种看法同样是粉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是欺骗工人。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这个唯一革命阶级的全体或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推翻剥削者，镇压剥削者，使被剥削者摆脱他们的奴隶地位，立刻靠

剥夺资本家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有在这以后，只有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才能启发和教育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在无产阶级周围，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领导，使他们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私、散漫、恶习和弱点，把他们变为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4.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领导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以前的工联主义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最后，只有真正摆脱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压迫之后，只有取得了真正自由（不受剥削者的束缚）组成自己的苏维埃的可能性之后，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才能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挥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千百万人的全部主动性和毅力。只有在苏维埃成了唯一的国家机构时，全体被剥削群众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而他们即使在最开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条件下，事实上总是有百分之九十九被排斥在国家管理之外的。只有在苏维埃里，被剥削群众才开始不是从书本上，而是

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来真正地学习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新的社会纪律，建立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二

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处准备无产阶级专政？

5.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实行自己的专政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甚至往往还没有有步骤地展开。但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在最近的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种革命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整个经济政治情况包含着非常多的可能突然爆发的易燃物和导火线；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以外，革命的另一条件就是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处于危机状态，现在这个条件也已经具备了。从上面所说的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指出的许多社会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因此，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看，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政党），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使无产阶级准备取得国家政权，并且是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派通常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作，还远没有充分地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要使这种工作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作并且与无产阶级专政前夕的任务相适应，那就必须经过这种改造和革新。

6.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相反地，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凡是完全或部分持有改良主义、“中派”等等观点的党派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由于斗争极端尖锐化，都不可避免地或者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者置身动摇者之列，或者成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靠的朋友（这是最危险的）。因此，要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要加紧反对改良主义的和“中派”的倾向，而且要改变这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不能只限于说明这种倾向的错误，而且应当不断地和无情地揭露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出这种倾向的一切活动家，否则无产阶级就无从知道，它要同谁一道去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可能——而且经验已经表明确实是在——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⁸⁸，在揭发那些有改良主义者或“中派分子”的表现的人时，任何不彻底或软弱的表现都会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资产阶级明天就会利用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的东西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7. 特别是不能只限于一般地从原则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合作，否认任何“同敌人合作论”。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势下单纯地维护“自由”和“平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永远不能一下子完全消灭私有制），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直接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用整个政权机构来巩固和维护剥削者的“不自由”，使他们不能继续干压迫和剥削的勾当，就是巩固和维护私有者（即把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一定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的人）同无产者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前，看来只是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分歧，但在明天，在胜利后，这种分歧就必然会成为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根本改变对“中派分子”和“民主维护者”的斗争的全部性质，甚至初步准备群众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都

是不可能的。

8.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引导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要说明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仅要揭露那些实际上等于在工人运动内部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倾向的表现，而且要在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旧的领袖。在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愈长久、愈彻底、愈巩固，资产阶级就愈能把他们培养的、浸透了他们的观点和成见的、往往是他们直接或间接收买的人物安置在领袖的地位上。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从他们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有联系，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职务，不然工人政府的权力就会没有力量，而这种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9.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窒息、压制、恐吓、拆散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要开始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在各处立刻实行下列一些办法。

在一切组织、协会、团体中，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其次是在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团体中（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都应该成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小组或支部大多数是公开的，但是也必须要有秘密的，在凡是考虑

到资产阶级可能取缔这些小组或支部、逮捕或驱逐它们的成员的情况下，都必须成立秘密的小组或支部。这些支部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同党中央也有密切的联系，应该互相交流经验，应该针对各方面的社会生活，针对各类劳动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全党、教育全阶级和群众。

同时，在实践中创造出必要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小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毒害很深以至完全不可救药的“领袖”和“负责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揭露，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屠杀以后大部分都愿意倾听和接受关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学说的群众，则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他们，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

10. 共产党员的小组或支部之一，即议会党团，也就是在资产阶级代议机关（首先是全国的，其次是地方的、市政的等等）中当议员的党员的小组，是特别值得党加以注意和关心的。一方面，在最广大的落后的或具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劳动群众的心目中，这个讲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员正应该从这个讲台上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在俄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资产阶级议会是合理的（任何国家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也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全部历史已经说明，特别是在先进国家内，议会讲台已经变成进行闻所未闻的舞弊、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欺骗人民、升官发财、弄虚作假、压迫劳动者的主要场所或主要的场所之一。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对议会深恶痛绝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共产党和一切加入第三国

际的政党，特别是在这些政党不是通过与旧党分裂，不是通过与旧党进行长期顽强斗争，而是通过使旧党采取（往往只是在名义上）新的立场而产生的情况下，就尤其需要严格对待自己的议会党团，使议会党团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指示；议会党团的成员必须大部分是革命工人；在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必须认真仔细地分析这些议员的演说是否贯彻了共产主义的原则；必须派遣这些议员到群众中去进行鼓动工作，必须把那些表现出第二国际倾向的人从议会党团中开除出去，等等。

11.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养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社会“支柱”，而在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如果不立即有步骤地同这个阶层进行广泛的和公开的斗争，那就连进行任何使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的初步准备工作都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如经验已经完全证明的，就是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这个阶层还会给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提供不少的人力。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就是指受资本剥削的全体劳动群众，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最没有受过教育、最受压迫、最难组织的劳动群众。

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不能够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作出巨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既有原则上的意义又有实践上的意义。在全世界资产阶级举行进攻、发动战争、实行封锁的最艰苦的时期，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作出最大的牺牲，不是比其他各阶层的劳动群众挨饿得更厉害，那末，它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专政，就不能赢得全体劳动群众一致的尊敬和信任。

共产党和整个先进的无产阶级特别需要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广泛的和自发的群众罢工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压迫下，只有这种运动才能真正唤醒、推动、启发和组织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完全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这样的准备，就不能实行无产阶级的任何专政。在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队伍里，绝对不能容许有象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这类公开反对罢工的人。当然对于那些经常出卖工人的工联领袖和议会领袖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利用罢工的经验叫工人实行改良主义，而不是叫他们进行革命（如最近几年在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的）。

12. 目前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最“合法”、在阶级斗争最不尖锐的意义上最“和平”的国家里，共产党绝对必须经常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结合起来的时期已经完全到来了。因为在最文明、最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制“最稳固”的国家里，政府都已经不顾它们骗人的虚伪声明，经常编造共产党人的黑名单，不断违反它们自己的宪法，半秘密地和秘密地援助白卫分子，杀害各国共产党人，准备暗中逮捕共产党员，派遣奸细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此等等。只有最反动的市侩（不管他们用什么“民主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或者否认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一切公开的共产党必须立即建立秘密组织，经常进行秘密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资产阶级的任何迫害。特别需要在陆军、海军和警察中进行秘密工作，因

为在帝国主义大屠杀以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害怕工人和农民参加的全民军队，开始秘密地采取各种办法，专门从资产阶级中挑选人员，来建立专门用特别完善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

另一方面，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只是从事秘密工作，而应该同时从事公开工作，为此就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具有各种名称（必要时名称可以经常改变）的公开的出版物和公开的组织。芬兰、匈牙利的秘密的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德国、波兰、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也部分地在这样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⁶⁴（I. W. W.）也应当这样做，现在一切公开的共产党，只要检察官可以随便借口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控诉，都应当这样做。

在原则上绝对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当前这个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有着种种特点，也是因为必须向资产阶级证明，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不能夺取的工作部门和场所，尤其是因为到处都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和更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性，而打破他们这种信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13. 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报刊的状况特别明显地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自由和平等根本是假的，必须经常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无论在战败国德国或在战胜国美国，资产阶级国家机构都使用了全部力量，金融大王施展了一切伎俩来取缔工人报刊：控告，逮捕编辑（或雇用凶手来杀害他们），禁止邮寄，没收纸张，如此等等。此外，日报所需要的新闻都掌握在资产阶级通讯社手里，广告又由资本家“自由”支配，而大型报纸没有广告是不能弥补亏空的。总之，资产阶级正在用欺骗，用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来取缔革命无产阶级的报刊。

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应当创办一种在工人中间大量发行的

新型的定期刊物：第一、发行公开的出版物，不要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不要说它是属于党的，要学会象 1905 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那样来利用甚至最小的合法机会；第二、散发秘密小报，虽然这种小报篇幅极小，出版不定期，但它可以由工人在许多印刷所翻印（秘密地或在运动壮大时用革命手段夺取印刷所），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提出革命的口号。

不进行有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三

纠正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 政党的路线和改变其部分成分

14. 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²⁵、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²⁴、英国独立工党⁴⁷、美国社会党⁸⁹，都已经退出这个黄色国际，决定（前三个党是有条件的，后一个党甚至是无条件的）加入第三国际，这个事实极其客观地确切地说明了，在那些从世界经济和政治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对于实行专政的准备程度如何。这一事实证明，不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都被事变的整个进程说服了，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现在主要的事情是完成这种转变，真正从组织上巩固既有的成就，以便能毫不动摇地全线前进。

15. 上面提到的这些政党（如瑞士社会党⁹⁰ 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属实，还应加上瑞士社会党）的全部活动以及它们的每一种定期出版物都明显地证实，它们的活动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往

往直接违背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否认资产阶级民主。

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议：大会认为不能立刻吸收这些政党；批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党”的回信，同意准备和任何一个退出第二国际而愿意靠近第三国际的政党进行谈判；允许这些政党派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同时规定这些政党（以及类似的政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

1. 在党的一切定期出版物上公布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2. 党的各个支部或地方组织必须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些决议；

3. 讨论以后，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并

4. 清除党内仍然按照第二国际的精神从事活动的分子。

5. 必须把党的一切定期机关刊物移交给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编辑部。

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该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审查上述及其他类似的政党，如查明它们确实已执行上述条件，确实已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那就可以正式接受它们加入第三国际。

16. 关于在上述和其他类似的政党的负责岗位上至今仍占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鉴于属于这些政党的工人越来越衷心同情共产主义，只要在这些政党内部还能够本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进行工作，能够对还留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进行批评，那共产主义者退出这些政党是不适当的。

同时，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赞成英国共产主义的或

者同情共产主义的小组和组织加入“工党”⁵³(Labour Party),虽然“工党”是参加第二国际的。因为这个政党还能让加入进去的组织象现在这样自由地进行批评,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自由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而这个政党还具有工人阶级一切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的性质。只要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取一切步骤,作一些让步,以便能够影响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从群众容易看到的更高的讲台上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使政权更快地从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手里转到“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手里,以使群众尽快地抛弃这方面的最后幻想。

17. 至于说到意大利社会党⁶⁹,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议⁹¹,即载于1920年5月8日《新秩序》⁹²(«L'Ordine Nuovo»)杂志上的向该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建议和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以纠正党的路线,清除党内特别是议会党团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

18. 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那些在这次大会的专门决议中遭到详尽驳斥的关于党对阶级和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共产党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极反动的工会的观点是错误的;竭力维护这种观点的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⁵⁴,多少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瑞士共产党”、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在维也纳出版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Kommunismus»)、现在已经被解散的阿姆斯特丹书记处和某些荷兰同志,以及英国的若干共产主义组织,如“工人社会主义联盟”⁷⁶等等,此外还有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

会”和英国的“厂工会委员会”⁸³ (Shop Stewards Committee)等。

但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其中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可以而且最好立刻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在这里，特别是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英国的“厂工会委员会”的关系，涉及到一个深刻的无产阶级和群众的运动，而这个运动事实上基本是站在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的立场上的。这些组织对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以采取错误的观点，主要不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实质上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因为完全革命的、同群众有联系的无产者在政治上没有经验。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和小组，即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厂工会委员会”不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情况下，也要对这些组织采取极其友好的政策，接近它们，接近同情它们的群众，根据各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善意地向它们说明它们的上述观点的错误，决不要放弃争取同这些组织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各种尝试。

19. 因此，大会提请全体同志，特别是罗曼语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志们注意：战后在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思想上的分化。无产阶级分子过去往往因为对第二国际政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完全合理的憎恨，而拥护无政府主义，现在很明显，他们对这些原则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他们愈熟悉俄国、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德国的经验，这种认识就传播得愈广泛。

因此，大会认为全体同志都有责任全力帮助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从无政府主义转到第三国际方面来。大会指出，衡量真正的

共产党的工作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应该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方面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1920年7月4日

1920年7月发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61—176页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⁹⁴没有制订各个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到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大多数国家不仅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流派和派别,而且有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现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派愈来愈多,这些党派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现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了,不过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党派。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依靠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治权”,好让它们实行以前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

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已经博得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同情,并且一天一天成为一支愈来愈强大的力量。

在一定的情况下,第三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动摇的、不彻底的集团削弱的危险。

此外,在大多数人抱有共产主义观点的某些大党里(意大利、瑞典),至今还存在相当大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

它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以便重新抬头，积极展开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

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因此，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制定十分确切的接纳新党的条件，并向那些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指出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

* * *

1.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人民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凶，即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較重要的职务（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中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最初甚至不必害怕让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 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

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 必须始终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的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

5.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农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去中立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 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假仁假义，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论、任何对于国际联盟³⁴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自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

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相类似了。

8.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⁹⁵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反复地宣传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实行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产生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⁹⁶。

11. 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 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是党的政策。

13.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

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14. 在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共产党应该反复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用物资。应该在敌人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公开地或者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等等。

16. 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内修改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18. 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

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内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1920年7月发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81—186页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二十条⁹⁷

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允许第七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可以例外。

第一次载于1921年彼得
格勒共产国际出版局出版的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速记记录》

按该书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187页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⁹⁸（摘录）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 基本任务的报告

（7月19日）

（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鼓掌。报告人准备讲话了，听众仍继续鼓掌，用各种语言欢呼。欢呼多时。）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的提纲已经用各国文字发表了，这个提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新东西（特别是对俄国同志来说），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要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传播到许多西方国家去，传播到西欧去。因此，我的报告只着重谈谈给我指定的题目的第一部分，即国际形势，当然也只能简要地谈谈。

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数额十分巨大。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有时，极少数资本家就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就落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各种联合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从金融

上、产权上，有的甚至从生产上，控制了整批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已经把最自由的共和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一点，象法国的里季斯这样一些根本不是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统治达到了顶点：世界已经分割完了，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瓜分了，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分割完毕。四十年前，六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二亿五千万。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经达到六亿左右，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就有整整十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你们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直接在法律上国家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要有一系列财政和经济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战争，而这些战争不能算作战争，因为常常不过是欧美帝国主义军队，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残杀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居民，演成一场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只有两三家，最多不过四五家）的无上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次战争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这次战争是为了决定：在极少数大国集团中（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利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你们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由于这次战争，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一亿三千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一亿二千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这是包括象德国那样

最先进、最有教养、最文明、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的二亿五千万人口！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这些先进国家降到了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破产、饥饿、毫无权利的境地，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受条约的束缚，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国家所未曾有过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是这样的情况：战后马上使不下十二亿五千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自夸爱好和平，不错，在五十年前，它还可以勉强这样吹嘘，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垄断资本的统治还没有建立，资本主义还可以比较和平地发展，即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如今这个“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压迫更加骇人听闻了，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凡尔赛条约已经使德国以及其他许多战败国经济破产，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受尽屈辱。

多少国家因此得到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到美国。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一亿。日本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辽阔的亚洲大陆，也获得了很大利益，它的人口是五千万。获利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它的人口有五千万。如果加上战时赚了钱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二亿五千万人。

这就是帝国主义大战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十二亿五千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二亿五千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陷于依赖美国的地位，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二亿五千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

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瓜分世界的利益。全世界的人口总数是十七亿五千万。我提醒你们注意全世界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描绘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画。同时，同志们，在世界人口这样划分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自然加重了许多倍。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附属地位，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我现在举例来简单说明一下。

就拿各国的债务来说吧。从1914年到1920年，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债务至少增加了六倍。下面我要引证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即凯因斯《和约造成的经济后果》一书。凯因斯是英国的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亲自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能引人注目，令人深思，因为他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这个英国市侩把布尔什维主义描绘成畸形的狰狞可怕的东西。凯因斯的结论说，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随同凡尔赛和约走向破产。凯因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他说，你们简直在发疯。我现在把他的数字综合摘引一下。

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怎样呢？我把一英镑折合成十个金卢布。那末，美国借出是一百九十亿，贷入是零。战前它是英国的债务国。列维同志1920年4月14日在最近一次德国共产党代表大

会上做报告时说得很对，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英美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只有美国一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美国战前是债务国，现在却完全是债权国了。世界上其他的强国没有不负债的。英国的状况是：借出一百七十亿，贷入八十亿，已经陷于半负债状况。而且在它的债款中，有近六十亿是俄国欠的，其中包括俄国战时赊购军火的欠款。不久前，俄国苏维埃政府代表克拉辛在同劳合-乔治谈到贷款条约问题时，曾经明确地告诉过领导英国政府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说，要是他们还指望收回债款，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外交家凯因斯也已经指出了这种错误。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俄国革命政府不愿还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还这种债，因为这些债务是高利贷，已经清偿过二十倍了，连那位丝毫不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者凯因斯都说：“显然这种债务是不能算数了。”

至于说到法国，凯因斯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借出三十五亿，贷入却是一百零五亿！要知道，法国人自称是世界的高利贷者，因为它有大量的“储蓄”，它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金融上的掠夺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使它能够几十亿几十亿地贷给别国，特别是贷给俄国。这些贷款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尽管如此，尽管法国是战胜国，它还是陷于负债地位。

共产党员勃拉温同志在《谁应该偿还战时债款？》（1920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材料，得出了各国债务对国民财产的比例。英、法这两个战胜国的债务占全部国民财产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意大利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俄国占百分之九十。但是，这些债务并没有使我们感到苦恼，因为在凯因斯的著作出版以前不久，我们已经听从了他的绝妙的忠告——废除了**一切债务**。（热烈鼓掌）

然而凯因斯在这里不过是大发庸人常有的怪癖罢了，他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忠告时说，法国当然只会占便宜，英国当然也不会受太大的损失，因为反正从俄国是捞不到什么了；只有美国要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凯因斯指望美国能够“慷慨”一番！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同凯因斯以及其他庸俗的和平主义者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要废除债务，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朝另外的方向努力，而不应该指望资本家老爷们的“慷慨”。

从这些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战争甚至给战胜国也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工资远远抵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秩序、防止日益高涨的革命的机关，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最后号召人们遵守秩序，克勤克俭，当然，工人仍旧是做资本的奴隶。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协约国的机构，全世界资本家的机构作出了下述总结：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百分之一百二十，工资却只增加百分之百；英国物价上涨百分之一百七十，工资只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法国物价上涨百分之三百，工资只增加百分之二百；日本物价上涨百分之一百三十，工资只增加百分之六十（这是我参照勃拉温同志在上述小册子里引用的数字和1920年3月10日《泰晤士报》⁹⁹所载最高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得出的）。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起工人日益不可遏止的愤怒，使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日益加强，自发的罢工浪潮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认识到，资本家靠战争发了横财，而一切战费和债务却要由工人来负担。不久以前有一则电讯说，美国想肃清“有害的鼓动分子”，要再把五百个共产党员驱逐到我们俄国来。

不要说美国驱逐五百个，就是驱逐整整五十万个俄国的、美国

的、日本的、法国的“鼓动分子”，也无济于事，因为使他们束手无策的物价失调问题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们牢牢地保持着私有制，在他们那里私有制是“神圣的”。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因为现在只有俄国摧毁了剥削者的私有制。资本家对物价失调束手无策，而工人靠原来的工资已经活不下去了。任何老办法都不能解脱这种灾难，任何局部的罢工、任何议会斗争、任何投票表决都无济于事，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资本家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债，使全世界都受一小撮人的盘剥，同时，工人的生活条件却愈来愈变得不堪忍受了。只有消灭剥削者的“私有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拉品斯基同志在《英国与世界革命》的小册子（我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于1920年2月摘要刊载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中指出，英国煤的出口价格比工业当局预定的高一倍。

郎卡郡的股票价格竟上涨了百分之三百。银行利润率至少是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还应该指出，所有的银行家在计算银行利润时，都巧妙地把大部分的利润用奖金、酬金等名目隐藏起来。这些无可争辩的经济材料又一次证明：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应该着重指出，那就是列维同志在上述报告中所特别强调的币值变动。由于负债、滥发纸币等原因，各国的货币都贬值了。根据上面我提到过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材料，即1920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声明，可以看出：同美元比较，英国货币贬值约三分之一，法国、意大利货币贬值三分之二，德国货币贬值达百分之九十六。

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完全瓦解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正是在许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家的基础上，这种关系由于

币值的变动而无法维持了。现在，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生存，不能进行贸易了，因为它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买进原料。

结果，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了。这一点，就是凯因斯那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坚决卫士，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在了解了凡尔赛谈判的底细之后，也不得不承认。顺便说一下，我认为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一般革命的宣言所产生的效果比不上凯因斯描写威尔逊和实践中的“威尔逊主义”的那几页书。象凯因斯和第二国际的许多英雄（甚至“第二半”国际¹⁰⁰的许多英雄）这类市侩及和平主义者，曾经把威尔逊当作偶像崇拜，为他的《十四点》祈祷，甚至撰写“科学”著作论述他的政策的“基础”，希望他拯救“社会和平”，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解，实行社会改良。后来凯因斯却有力地证明了威尔逊不过是个愚人，这一切幻想一碰到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位先生所体现的资本政策——讲求实际、斤斤计较的商人政策，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学究们甚至从凯因斯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威尔逊政策的“基础”，归结起来不过是神甫的蠢见，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和对阶级斗争的完全无知。

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人民群众，首先是十二亿五千万人，即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的贫困、破产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无权利的殖民地附属国，是被“委任”给金融强盗们统治的国家。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的奴隶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关俄国的秘密条约也起了这种作用，不过，这种条约的实际效力，几乎和那些写着我们负债几十亿几十亿的废纸相等。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把十二亿五千万人遭受掠夺、奴

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

另一方面，就是在任何一个债权国内，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因为战时人们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不是被置于死地，就是随时都有受到军法制裁的危险。战争环境使人们无暇去观察实际的经济情况。作家、诗人、神甫和所有的书报杂志都在专心致志地歌颂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大揭露也开始了：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被揭穿了；凡尔赛和约被揭穿了，它本来应当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它们的失败。凯因斯的例子还表明，欧美千千万万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稍有知识和多少受过教育的人不得不走上凯因斯所走的道路，他辞去了职务，写了一本书，揭露本国政府。他的行为说明，一旦千百万人懂得了所谓“为自由而战”等花言巧语不过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结果不过是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破产、受奴役，那末在他们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些什么变化。资产者凯因斯说，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用凯因斯所提倡的方法，就是取消一切债务！这不光是凯因斯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一个人的主张，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千百万人同意这样的主张。千百万人听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呼声：只有废除债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只好“诅咒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债务废除了）”，乞求美国的“慷慨”吧！！我认为，应该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鼓动的经济学家们致谢。

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象凯因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操纵一切的战胜国中间，

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末，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全世界的图画。我们懂得，十二亿五千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是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国际联盟³⁴向各国人民端出了一项规约，其中宣称国际联盟结束了战争，今后不允许任何人再破坏和平，当这个体现了全世界劳动群众最后希望的规约生效的时候，这看来是我们的重大胜利。在规约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说，对德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不用特殊条件加以控制；你们瞧吧，有了规约就好了。但是，规约一正式公布，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就背弃了它！在规约一开始生效的时候，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威尔逊这“四巨头”，又坐下来磋商建立新关系了！规约这架机器刚一开动，就完全垮了！

我们从对付俄国的战争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俄国这个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这样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又富又强的国家的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力量根本不能同它们相比，可是我们打胜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之间一点也不团结，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法国希望俄国还债，希望它成为威慑德国的力量；英国却希望瓜分俄国，企图夺取巴库的石油，同俄国各边疆国家缔结条约。英国官方的一个文件，非常诚实地列举了半年前（1919年12月）答应要攻占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国家（一共十四个国家）。英国曾经打算利用这些国家来实行它的政策，给了它们亿万的贷款。现在这一切打算都落空了，全部贷款也石沉大海了。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这个规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

力的保卫者表明，他们在每个问题上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正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而进行激烈的争吵。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快到手的赃物抢去。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已经完全决裂了。十二亿五千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富强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正在推行一种旨在破坏国际联盟盟员国和伙伴的政策。因此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现在我们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口吻，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不安宁”；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形是没有的。现在资产阶级活象一只野兽，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情况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来镇压某一部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谓的学究行径，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种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都正在遭受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

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证明”准备条件。

我现在拿英国“独立工党”⁴⁷的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作例子，来说明机会主义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内还有多么大的势力，有些党的工作离组织革命阶级去利用革命危机的要求还多么远。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中谈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根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几乎完全是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麦克唐纳承认现在有革命危机，革命情绪正在增长，也承认工人群众是同情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英国），无产阶级专政比目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好得多。

但是，麦克唐纳仍旧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幻想着超阶级政府的小资产者。麦克唐纳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骗子、诡辩家、学究一样，认为阶级斗争不过是“记叙的事实”。麦克唐纳绝口不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建立似乎是超阶级的“民主”政府的教训，以及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类似的教训。他却麻醉他的党，麻醉那些不幸把这个资产者当作社会主义者，把这个庸人当作领袖的工人说：“我们知道，这〈革命危机，革命风潮〉会过去，会平息的。”他说，战争必然会引起危机，危机在战后虽然不会立即平息，但“总归会平息下去的”！

这就是一个愿意参加第三国际的党的领袖说的！这样赤裸裸的暴露是罕见的，因而更为可贵，它也暴露了法国社会党²⁵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²⁴上层分子中间同样常见的情况：既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真正的革命

准备。

这就是许许多多目前退出第二国际的党的主要弊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谈得最多的是尽量具体而明确地规定准备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现在，在欧洲和美洲，这种书出版得特别多，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出版得愈多，群众就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迅速地同情布尔什维主义。我指的是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孟什维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是很了解的。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克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现在，在欧洲和美洲，必须使更多的人更确切地懂得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因为这个概念同那些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的概念，是一类的东西。我们俄国人没有兴趣为欧洲写一本书来说明什么是孟什维主义。而奥托·鲍威尔写的书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预先对那些要把这本书译成各国文字出版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机会主义出版家表示感谢吧。把鲍威尔的书用作共产主义教科书的特种补充读物，是很有益处的。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叛变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不能解答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鼓掌）

奥托·鲍威尔用一句话绝妙地表达了世界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为此，我们应当在他生前就给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我们能

够在维也纳随意作主的话)。奥·鲍威尔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奇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只有德国小市民之类的人,才能制造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就是数字、组织性、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横施暴力”。

我举的这个例子也许有点滑稽可笑。但是,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往往会闹出笑话来。现在,引导工人阶级、引导工人阶级中一切肯动脑子的人参加国际孟什维主义(麦克唐纳、奥·鲍威尔之流)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一件最有益和最迫切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势力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可以靠剥削十亿被压迫的人民来生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利用这种条件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掠夺本国工人而得的利润。

战前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八十亿到一百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五亿法郎来施舍给

工人领袖、工人贵族，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最大中心城市的文化，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设立千百种好差事。哪里有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国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的决定的胜利，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在我发表的提纲中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现象的深厚的经济根源。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在离开大会的时候，应该下定最大的决心，把各个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同这一任务比较，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

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许多国家里发现有反议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受无产阶级的某些先进部队支持的，因为这些先进部队痛恨过去的议会活动，痛恨英、法、意等一切国家中议会政客的行为，这种痛恨无疑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共产国际应当指导同志们更深入地领会俄国的经验，认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消除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缺点，同战胜那些以改良主义者的姿态加入第二国际旧党、并按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级相比，要容易一千倍。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说，这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的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但是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完全要靠我们今后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小市民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帝国主义大战帮助了革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那些最偏僻的地方抽兵来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印度士兵说，抗击德国、保卫大不列颠是印度农民的义务；法国资产阶级教育法属殖民地的士兵说，保卫法国是黑人的义务。这样就教给了他们使用武器的本领。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

领，我们为此要向资产阶级深深地致谢，我们要以全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特别要以全体俄国红军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帝国主义大战把附属民族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会在中途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原则，使得到目前为止在亿万人当中无组织地进行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去做。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⁹⁴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不仅他们已经知道、已经懂得了这种思想，而且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在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以学者的态度，俨然以学者的态度，象好讲体系的德国人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体系”，或者象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¹⁰¹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思想”。这种关于苏维埃“体系”和“思想”的议论，在工人当中往往会混淆视听，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工人现在正在抛弃这种学究的无稽之谈，拿起苏维埃给他们的武器。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起义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原理。在我国取得了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

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原理。现在我们俄国比国际帝国主义弱，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等待时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维护十二亿五千万人的利益。暂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偏见和无知这样的障碍，但是这些正在迅速地被克服，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被压迫劳动者的利益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打听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的部队，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支持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末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长时间鼓掌）

3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¹⁰²的报告

（7月26日）

同志们，我只预备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的修改。在他以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各种现象出发。

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有十亿以上，都是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大概是十二亿五千万。我们把世界总人口算作十七亿五千万，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有些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关系中，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某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于对该国的附属关系中。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穿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中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个问题谈的是世界上某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发生争论的地方是：共产

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说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在委员会里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也属于这种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国家里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

了我们的观点。

其次，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的殖民地里，在象土尔克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各国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工作。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并且在实际中很好地运用它。同样明显，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是能够在本国的条件下运用这种武器和这种组织形式的。苏维埃组织的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虽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进行的有殖民地国家的几个代表参加的讨论，完全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证明，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并且指出，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无条件地应该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

现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一般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胜利了的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国苏维埃政府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末，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思想也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而且在

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其殖民地人民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⁷⁵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普通的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统治是叛变的行为。的确，有侵略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对社会主义是最大的危险，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这就是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的最大叛变。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¹⁰³上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的党也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看不到第二国际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被剥削附属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大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这些看法就是我们决议的基础。无疑，这些决议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革命的工作，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4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¹⁰⁴的发言

(7月30日)

同志们！塞拉蒂说，我们还没有发明«sincéromètre»。这是一个新的法文字，意思是诚实测量器。这种器具还没有发明，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器具，我们已经有了测定方向的工具。塞拉蒂同志的

错误就在于他不去使用这种早已知道的工具。关于他的错误，我以后再谈。

关于克里斯平同志，我只想说几句话。很遗憾，他今天没有来。（迪特曼：“他病了！”）真可惜。他的发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它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我要说的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情况，而是克里斯平的发言中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思想。我想，我能够证明这个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讲话，克里斯平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完全和考茨基相同。克里斯平在答复一句插话时说：“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尔福特纲领¹⁰⁵中就提到过。”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总是想到爱尔福特纲领的例子。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的纲领就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¹⁰⁶。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和法国的都证明，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念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抹杀了这一点，把它掩盖起来，这也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克里斯平同志又说：“我们是群众选出来的领袖。”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在德国独立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各派的斗争。不需要象塞拉蒂同志那样去寻找诚实测量器，去开这个玩笑，就能确定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各派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一派是现在重新又来拥护我们的革命工人，他们反对工人贵族；另一派是旧领袖领导的各文明国家的工人贵族。克里斯平究竟属于旧领袖和工人贵族的一派呢，还是属于反对工人贵族的新的革命工人群众一派呢？克里斯平同志正是对这个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克里斯平同志关于分裂问题的论调是怎样的呢？他说，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痛苦，他曾经为之痛哭不已。这完全同考茨基一样。究竟是同谁分裂呢？同谢德曼吗？是的！克里斯平说，“我们分裂了”。第一、你们分裂得太迟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只能这么说。第二、独立党人不应该为这种事情痛哭，而应该说：国际工人阶级还在受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压迫。法国和英国的情形都是这样。克里斯平同志对分裂问题的想法不是共产党人的想法，而完全是似乎不再有影响的考茨基的那种想法。接着克里斯平谈到高额工资问题。他说，同俄国工人和一般东欧工人比较起来，德国工人的生活相当好。照他的说法，只有在“不过分”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才能发动革命。试问，在共产党内能不能容许有这种论调？这是反革命的论调。无疑，我们俄国的生活水平比德国低，在我们建立了专政以后，工人更挨饿了，生活水平更降低了。没有牺牲，没有工人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说的，正好同克里斯平相反。如果想要准备工人去建立专政，又同他们谈什么生活状况“不过分”恶化，那就是忘记了一个主要的情况：工人贵族产生出来，帮助“本国的”资产

阶级用帝国主义方法争夺和压迫整个世界，恰恰是为了得到较高的工资。如果德国工人现在想革命，就应当忍受牺牲，不怕牺牲。

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力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少数比较富裕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生活比较好，如果告诉工人应当提防“过分”变穷，那就是反革命。应当反过来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担心在革命斗争时“过分”变穷，他们是不能算作党员的。否则，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尤其是在西欧各国。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这样区别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斯汀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非用暴力和恐怖不可。当然，没有必要预先就说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分子还是和今天一样，如果克虏伯和斯汀尼斯还是和今天一样，那末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是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的。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

其次谈到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平特别激动，他想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他说，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搞点东西来给小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把土地交给合作社。这种看法太学究气了。就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德国在内，既有相当数量的大地产，也有不是用大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土地；可以在不破坏经济的情况下把这种土地分一部分给小农。可以保存大生产，同时又分一部分对小农来说是最重要的土地给他们。很遗憾，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

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要犯错误。例如，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前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短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匈牙利的大部分土地是用半封建方式经营的。在这些大地产中，一定会找出而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可以不归小农私有，而是租给他），使耕种小块土地的小农也可以得到一份没收来的土地。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从前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一定不能维持下去。

虽然克里斯平也说，“你们不能否认我们有革命信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我就坚决否认你们有这种信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愿意采取革命的行动，而是说你们不善于用革命的观点考虑问题。假如选出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给他们十本考茨基的书和克里斯平的讲话，那末我敢担保，这个委员会一定会说：这篇讲话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从头到尾浸透了考茨基的思想。克里斯平的一切论证方法完全是考茨基式的，可是克里斯平还说：“考茨基在我们党内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对后来入党的革命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应该承认一个确凿的事实：考茨基一直到现在，对克里斯平，对他的全部思想进程、对他的一切观念，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克里斯平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必发明什么诚实测量器，就可以说：克里斯平的方向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方向的。我们说明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方向。

怀恩科普和明岑堡同志因为我们邀请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同它的代表谈话而表示不满，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当考茨基攻击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象对待阶级敌人那样同

他进行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了，他们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是革命工人的一部分。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我们同德国独立党人、法国人、英国人是不能一下子讲通的。怀恩科普同志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他几乎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一切错误意见。怀恩科普说，他不赞成潘涅库克的观点，但是他的发言却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左派”集团的基本错误，不过，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中的一般错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同志的发言浸透了资产阶级观点，用这种观点是无法准备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怀恩科普和明岑堡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还要更进一步，那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当然，我们没有象塞拉蒂所说的那种诚实测量器来测验一个人是否诚实，但是我们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于判断人，而在于估计形势。很可惜，塞拉蒂虽然说了话，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他的发言同我们在第二国际那里听到的一样。

塞拉蒂说，“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德国的是革命的，意大利的也是革命的”，这是不对的。

即使是反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不愿意组织革命的宣传和鼓动，那也是犯了错误，有很大的过错，因为，即使没有革命的形势，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也就在这里，社会党人不愿意象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

塞拉蒂只是重复了克里斯平的话。我们不想说，哪天哪天一定要开除屠拉梯。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已经谈过了，可是塞拉蒂对我们说：“清党可以，但是不要赶走任何人。”我们应当向意大利

的同志们说,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派⁹²,而不是现在社会党⁶⁹和它的议会党团的多数领导者。这些人硬说,他们想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摧残。俄国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和其他很多人,也在“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摧残,然而这还不能作为让他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根据。

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和一切有右派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请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提纲和决议。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是愿意留在共产国际里的。

全文第一次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共产国际出版局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按该书原文刊印并根据列宁修改过的速记记录作过校订,各次发言按该书原文刊印并根据德文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8—206、209—220页

青年团的任务

(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代表大会向列宁热烈欢呼)同志们!今天我想谈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一般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一种组织的问题。

要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即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条件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一般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要学习。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而这里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在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那些将来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的学习、训练和教育,就决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青年的学习、

训练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只有把青年的学习、组织和训练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做到；这一代青年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教给青年什么；真正想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称号的青年应当怎样学习；以及应当如何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够彻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

我应当指出，看来首先的和极其自然的回答是：青年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一般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但是“学习共产主义”这个回答未免太笼统了。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呢？为了学到共产主义知识，我们应该从所有的一般知识中吸取哪些东西呢？这里我们可能遇到许多危险，如果把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得不正确，或者对这一任务理解得太片面，往往就会出现这种危险。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里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这样下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言论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

如果我们只求了解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全力来消除这种危险，那末五十万至一百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就会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

这样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结合这一切来学习共产主义呢？从旧学校和旧的科学中，我们应当吸取一些什么呢？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我们要否定旧学校，只从这种学校中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

这里，我要谈谈经常听到的人们对旧学校的斥责与非难，从这些话中，往往会得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有人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这是对的，但是，

还要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

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指明了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拥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决不能象旧学校那样，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当领会你们学到的知识，并且要用批判的态度来领会这些知识，使自己的头脑不被一堆无用的垃圾塞满，而能具备现代有学识的人所必备的一切实际知识。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这

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材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我们应当废除这样的学校，破坏这样的学校，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所积累起来而为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去区别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分散在辽阔国土上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自觉的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战胜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就会连基地也不能巩固，更谈不到在这个基地上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了。同样，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打破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存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谈到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时对基本任务应有的提法。

为了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谈谈怎样学习的问题，让我举

出一个实际例子。你们都知道，紧接着军事任务，即紧接着保卫共和国的任务之后，我们现在又面临着经济任务。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必须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末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气化；只有全国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全国的经济恢复工作，要在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改造和恢复工农业。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不能实现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气化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每个人必须学会，并且必须教导一切劳动青年都学会。这就是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就是每一个要做共产主义者的青年，明确地认识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就负起了帮助党建设共产主义、帮助整个青年一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责任的青年的任务。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们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善于团结自己的力量。新一代人所面临的任务就更复杂了。你们不只是应当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援助工农政权击退资本家的侵犯。这一点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你们完全了解，每个共产主义者都非常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一半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旧东西已经象应该被破坏的那样破坏了，已经象应该变成废墟那样变成废墟了。地基已经清理好了，年

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同你们的直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你们在教育、训练和发动全体青年的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你们就应当是千百万青年建设者中的第一批。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你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自然要讲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的方法应该有什么特点。

我在这里首先要谈谈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

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实际活动，使青年在学习、组织、团结和斗争的过程中把自己和自己所领导的一切人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但是，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责备我们，说我们共产主义者摒弃一切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蔽工农耳目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摒弃道德，否认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明明知道，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要贯彻他们这些剥削者的利益。也有人不是从道

德的意旨中，不是从上帝的意旨中，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旧社会建筑在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体工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毁坏这个社会，应该打倒这些压迫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而上帝是不会创造这种团结的。

只有工厂，只有受过训练的、从过去的沉睡中醒过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种团结。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才有群众运动开展起来，这种运动已经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最弱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个国家三年来为了捍卫自己而击退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日益增长着。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它能领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得起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欺骗。我们的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这种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

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赶走沙皇并不困难，这总共用了几天的工夫。赶走地主也不很困难，这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赶走资本家同样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他本人或家畜都不需要的多余粮食，而其余的人都没有粮食吃，那末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而其余的人让他们去挨饿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规则，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工厂中工作。这容易做到吗？你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象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容易。这里需要无产阶级去重新教育和改造一部分农民，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以便把那些富裕的和专靠别人贫困来发财致富的农民的反抗消灭下去。可见，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是要来完成这项任务。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成果都交给了一部分人。可是，我国的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上相当于我需要的两倍的粮食，然后用这些余粮来作投机勾当，那又怎样呢？如果我这样盘算：饿肚子的人愈多，我出卖粮食的价钱就愈高，那又怎样呢？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这是私有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那一切都会开倒车，回复到资本家政权、资产阶级政权的时代去，就象过去一些革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复辟，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某些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基本任务的主要特征。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染上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末别人的事也与我完全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财有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这样的心理和情绪是共产主义者不应当有的。当工人和农民已经证明我们能用本身的力量捍卫自己并且创造新社会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新的共产主义教育，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

这就是对年轻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学习、教育和训练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旧的剥削者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服务的。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这样一代青年，他们在同资产阶级作有纪律的残酷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才能把自己教育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学习、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教育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教育并不是要这样。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被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这也就是对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只要工农还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学校还操纵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青年人就仍然是愚昧无知的。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养成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我们的学校必

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学习、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称号。你们很清楚地知道，俄国暂时还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国，全世界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我们还比它们弱；我们随时都有遭到新的进攻的危险；只有学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而我们得到巩固之后，就会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把全体青年都组织和团结起来，要在这个斗争中作出受教育和守纪律的榜样。那时你们才能开始并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大厦的事业。

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我来给你们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是一个拉丁名词，共产主义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如果每人都单独经营一块土地，那能不能实行共同劳动呢？共同劳动不是一下子就能实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同劳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努力、吃苦、创造，而且是在斗争进程中实行起来的。这里不能靠旧的书本，书本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里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邓尼金从南方进攻时，农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当时农民不欢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但是农民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尝到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的滋味之后，就认清了农民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投奔资本家，那末资本家就要你去当地主的奴隶；或者跟着工人走，虽然工人没有说会让你过天堂的生活，而且还要你在艰苦的斗争中遵守铁的纪律和具有坚强的意志，

可是他们能使你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奴役。甚至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根据亲身的经验懂得和认识了这一点以后，也成为自觉的、经过艰苦锻炼的共产主义拥护者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应当把这种经验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础。

我已经回答了我們应当学什么，应该从旧学校和旧科学中吸取什么的问题。现在我还想来回答应当怎样学习这些东西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我要从某些青年组织的工作经验中举出几个例子，向你们具体说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共产主义教育。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种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人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就是要男女青年团员自己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地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很快地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时这个拥有四十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任务还在于要掌握各种知识，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摆脱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都贡献给公共事业。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实质。只有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青年男女才能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这种工作中取得实际的成绩时，他们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就拿城郊菜园工作来做例子吧。难道这不是工作吗？这也是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之一。人民在挨饿，工厂在挨饿。为了避免挨饿，应该发展菜园，但是耕作还按旧的方式进行。所以必须有更觉悟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菜园会增加，菜园面积会扩大，效果会更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每个青年团组织，每个青年团支部，都必须把这件事看成自己的事情。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积极主动的突击队。青年团应当成为这样的—一个团体，使每个工人都感觉到，这个团体中讲的学说也许是他不了解的，也许是他还不能一下子就相信的，但是从这些人的实际工作和活动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正能给他指明正确道路的人。

如果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各方面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它就会迷失方向，走上资产阶级的老路。我们的教育应当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帮助劳动人民解决共产主义学说提出的任务。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穷困贫瘠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所以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青年团员个个都是有知识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实行了自觉的纪律，看到全体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要在农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帮助做

些事情，我举一个小例子，象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的工作。从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那时每个人只为自己工作，谁也不注意这里有没有老人或病人；或者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因而妇女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谁应当来反对这种现象呢？青年团。青年团应当出来说：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组织青年队协助搞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经常到各家各户去，有组织地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工作，正确地分配力量，让大家知道，劳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劳动。

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所以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在旧社会中，是各家单独劳动，除了压迫老百姓的地主和资本家外，谁也没有把劳动组织起来。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怎样脏，怎样困难，我们都应当把它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需要资本家和地主，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就受到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教育。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完成现在所提出的任务。我们应该估计到，要全国实现电气化，使我国贫瘠的土地能用最新的技术来经营，至少要花十年工夫。所以，现在是十五岁、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这一代青年，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在任何乡村和任何城市里，每天都能实际解决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要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竞赛开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组织自己的劳动的本领怎样。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建设的业绩来检查自己的每一

步骤，只有经常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团结一致的自觉的劳动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把自己的五十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并且赢得普遍的尊敬。
(掌声雷动)

载于1920年10月5、6、7日
《真理报》第221、222、223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根据1920年尼·列宁（弗·伊·乌里杨诺夫）《青年团的任务》小册子的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250—266页

论无产阶级文化

从10月8日的《消息报》¹⁰⁷上可以看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说的话，跟昨天我们同他约定的正相反¹⁰⁸。

必须立即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一项决议草案，经中央通过后提交这届大会。今天就必须以中央名义把决议草案提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通过，因为代表大会今天就要闭幕了。

决议草案

1.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

2. 因此，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一般无产阶级组织，应当最积极地作为最主要的成分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3.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

和文化。

4.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5. 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坚持这一原则观点,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企图,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相反地,代表大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

* * *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别人把他的意思曲解了。因此,这个决议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

写于1920年10月8日

1926年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282—283页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 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1月3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来发表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一部分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研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组织问题的时候谈到的，有一部分是我对提交人民委员会的草案的意见。昨天已经决定以这个草案为基础，细节以后还要讨论。

我只能说，起初我是竭力反对你们这个机关改名的。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和教学。在苏维埃时期的经历，使我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现在新名称已经确定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决定，你们就把我的意见当作个人意见看待好了。如果事情不只是改变叫法，那只能表示欢迎。

要是我们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文教工作，那就不只是换个名称的问题，喜欢给各种新事物、新机构加头衔的“苏维埃的”缺点也就可以原谅了。要是能成功，我们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绩。

要使同志们和我们一起做文教工作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联系我们的政治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名称是能规定某种内容的，因为在整个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持有教育脱离政治的旧观点，我们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一贯占着统治地位。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是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现在还在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欺骗群众的。

在那里，愈是重要的机构就愈不能摆脱资本和资本的政治。

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机构的联系都非常密切，虽然资产阶级社会不肯直接承认这一点。并且，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

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真理”，使人们承认我们的真理。

从资产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政治过渡是很困难的，何况资产阶级还开动了全套宣传鼓动机器不断地诬蔑我们。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锻炼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就是说，如果不能解决无产阶级为完全战胜其宿敌所必须提出的一切任务，那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赞成认为劳动群众已经有了实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的空想观点。我们根据整个工人社会主义历史的确切材料，看到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有大工业、罢工斗争、政治组织才能准备无产阶级去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一致行动，推翻剥削者，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具备了一切必要的力量，并且已经在实际中发挥了作用。

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忘记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至于如何建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如何同其他机关合并，如何同中央和地方机关联系等等问题，那就要由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有专门研究的更内行的同志来回答了。我只是在原则方面强调指出几个要点。与过去那些谎言不同，我们不能不公开提出问题，公开承认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习惯、风气和信念，我们要把这一切习惯、风气和思想用作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的工具，至于究竟如何教育的问题，就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必须使人们懂得，现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逐渐卷入了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因此不可能也不容许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置身于国际政治之外。目前国际政治的真正基础，就是全世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俄国。必须认识到，这关系到资本主义国家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命运。要知道，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是处在一小撮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形势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或者是投身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就证明自己一点没有觉悟，象某些置身于革命和战争之外的愚人一样，看不见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全部欺骗，看不见资产阶级如何故意使群众愚昧无知。

我们完全公开地说无产阶级要进行这种斗争，任何人都必须决定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另一边。谁想既不站在这边又不站在那边，结果必然遭到失败并且陷入窘境。

以尤登尼奇、高尔察克、佩特留拉、马赫诺等等为代表的克伦斯基派、社会革命党³、社会民主党余孽的不断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俄国各地反革命的各种形式和色彩，可以说，我们受到的锻炼比任何人都多得多。看一看西欧，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正在他们那里发生，那里正在重演我们的历史。各国的克伦斯基派几乎都是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他们在许多国家里，特别是在德国占着统治地位。到处都是一样，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只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不是白色专政（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武装起来反对我们，准备实行这种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点我们都有十分细致而深刻的体会，所以关于俄国共产党员我也不必多说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一切讨论和决定也应该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其他的形式，也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其他的形式。党能够做到比较符合本阶级的利益，党会有某些变化或更正，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式。三年来，苏维埃俄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全部斗争，是与党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发挥无产阶级的教育、组织和领导作用这一点分不开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垮台。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工农劳动群众必须战胜知识分子的旧习气，必须改造自己，不这样就无法着手建设事业。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个事业十分重要，一定要注意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如何进行活动、如何进行组织建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至于如何实现，要谈的还很多，只好到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去谈了。昨天批准

的指令是解决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不过还没有在人民委员会里最后定下来。再过几天，这个指令的最后定稿就会发表，那时你们会看到，其中并没有直接谈到与党的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无论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一切缺点、任命一切人员和进行一切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使那些同无产阶级有联系的共产主义分子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学习他们的精神，服从他们的领导，摆脱我们一直在努力铲除的资产阶级欺骗的影响。教师组织曾经长期抗拒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教育委员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形式是公开怠工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我们只好慢慢地逐步地夺取共产主义阵地。对于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解决社会教育和群众教育任务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突出的任务是：结合党的领导，使这个庞大的机构——这支现在已经在为工人服务的五十万教育大军服从我们，贯彻我们的精神，受到我们的主动精神的激励。教育工作者和教员过去受的教育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习惯，是敌视无产阶级的，他们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紧密地同党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完全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

因为要同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决裂，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对这个任务应该特别重视。的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如何使大部分是旧人员的教师同共产党员发生联系？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

必须多多思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样才能把这些如此不相同的人从组织上联系起来。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应有任何怀疑。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可是这些工作人员都不习惯于联系政治来进行工作，特别是联系对我们有用的政治，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政治，因此，如何使他们联系起来，就是一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认真地考虑了经验的提示，我们认为，象今天我出席讲话的这种会议，象你们的这种会议，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过去都认为宣传员是属于一定的小组或一定的组织的，现在各级党委对每一个宣传员都应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宣传员都属于管理和领导整个国家、领导苏维埃俄国同全世界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斗争的党。他代表正在斗争的阶级，代表领导着并且应当领导巨大的国家机构的党。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受过斗争的考验和锻炼，但是，当他们由鼓动员、宣传员变成鼓动员的领导人，一个巨大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的时候，却不愿意或不能了解这种转变和变化的巨大意义。至于要不要有一个相应的头衔，即使是象国民学校总监这种值得考虑的头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善于领导教师群众。

必须指出，几十万教师，——这是一种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机构。教师群众接受了

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浸透了这种文化的缺点，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握有我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需的知识。

我们应该吸收数十万有用的人材来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这个任务在前线，在我们的红军里已经解决了，红军中吸收了上万的旧军人。经过长期改造，他们和红军溶为一体了，最后并以自己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在文化教育工作中我们也应该仿效这个榜样。的确，这件工作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是更为重要。每一个鼓动员和宣传员都是我们所必需的，他们要严格地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但又不能只局限于党的范围内，应该记住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几十万教师，培养他们对工作的兴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偏见，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事业，使他们也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十分重大，只有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才能把这些受资本主义压迫、被资本主义从我们方面拉过去的群众引上正路。

这就是每个在学校范围以外进行工作的鼓动员和宣传员应该努力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不容忽视的。在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许多实际困难，那你们就应当帮助共产主义，不仅应当成为党小组派出的代表和领导人，而且应当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派出的代表和领导人。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改造群众的工作。我们所看到的群众对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知识的兴趣和要求，是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胜利的保证，胜利也许不会象前线上那么快，也许要碰到很大的困难，有时还会遭到失败，但是最后我们总是会胜利的。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这个名称的了解可能不正确。既然这里提到了政治这个概念,政治在这里就是最主要的。

但是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任务上,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工作中有十分之九的时间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昨天看到了对弗兰格尔作战获胜的消息,这个消息你们今天就会看到,也许明天这些胜利会表明,斗争的一个阶段将要结束,我们争得了同一系列西方国家的和平,而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使我们能抽出力量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种老式的宣传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按照旧的意思来理解宣传工作,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对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

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就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只要战争使我们有可能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那时，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就会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

我们就是要这样来改善经济，使它更加稳固，更带有公共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更合理地分配产品，增加煤产量，并且在没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气味的条件下恢复工业。

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都是要领导实际的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感到共产主义象他们自己的事一样容易理解。这件工作进行得不好，错误百出。我们不掩饰这一点，但是，工农本身应该在我们的帮助下，在我们不大的、小小的协助下建立和整顿我们的机构。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只是我们的纲领、理论和课题了，它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实际建设事业了。在战争中，我们遭到过最严重的失败，然而我们在这些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取得了全胜。现在，我们也应当在每次失败中吸取知识，我们应当记住，应该用过去的工作做例子教育工人和农民。指出我们的缺点，将来好避免这些缺点。

把这个建设作为一个例子翻来复去地提出来，首先我们就能把不好的负责的共产党员变成我们经济事业的真正建设者。我们要取得必需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对群众的重新教育又只有依靠鼓动和宣传工作，应该首先使群众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

这就是每一个鼓动员、宣传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內容，谁掌握了这一点，谁的工作就一定会有成绩。（热烈鼓掌）

载于莫斯科出版的《全俄政治
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公报
（1920年11月1—8日）》

按《公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329—338页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920年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
第八次代表大会¹⁰⁹上)

(听众高呼：“列宁同志万岁！”掌声雷动，热烈欢呼。)同志们，我现在来做关于政府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我认为我做报告的任务，不是向你们列举一些工农政权的法案和措施，即使是一些极其重大的或者是极其重要的也罢。我认为，谈这个时期的事件也不会使你们感到兴趣，并且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应该力求总结出这一年我们所取得的主要教训，这一年来我们政策的变化之大，并不亚于革命的头几年，而且从总结这一年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无论从提交你们审议和批准的法律草案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中都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现在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任务上，认为这些任务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会因完成这些任务而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请允许我只简要地谈一谈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过去的一年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总结。

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和逼迫下，怎样把战争强加给了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今年4月向波兰政府提出了缔结和约的建议，当时提出的条件比现在的条件对它更有利，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我们同波兰的停战谈判已经完全失败以

后，我们才不得不进行战争。虽然我们的部队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而在华沙附近遭到了十分惨重的失败，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却签订了一个比我们4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对我们更加有利的和约。同波兰的预备和约已经签定，现在正在进行关于签订正式和约的谈判。我们丝毫不向自己隐瞒这种危险：某些最顽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某些俄国白卫分子集团正在施加压力，竭力使这次谈判结果不能签订和约。但是，我们应该说，协约国的旨在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和武装镇压的政策日益破产；而我们正在把为数愈来愈多的、绝对站在敌视苏维埃政权立场上的国家争取到我们的和平政策这方面来。签订和约的国家的数目日益增多，很可能最近就会同波兰签订正式和约，这样一来，又会给企图用武力拔掉我们政权的资本主义力量联盟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

同志们，你们当然也知道，我们对波战争的暂时失利以及在战争中某些时候我们情况的严重，是由于我们当时必须反对弗兰格尔造成的，弗兰格尔当时已经得到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正式承认¹¹⁰，并且得到了物质、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巨大援助。我们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必须迅速集中部队，以给弗兰格尔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你们当然知道，红军攻克了连军事专家和军事权威都认为攻不破的障碍和工事，表现了非凡的英勇精神。我们彻底地、坚决地、非常迅速地打败了弗兰格尔，这个胜利是红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就这样被消灭了。

我们现在能够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担当起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和早就吸引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并且深信资本家老板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轻而易举地来破坏这个工作了。但是，我们当然要随时加以警惕。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已经保证不会再有战争了。我们所以缺乏这种保证，完全不在于我们还没有正式和约。

我们清楚地知道，弗兰格尔的残部还没有消灭，而且躲在不很远的地方，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庇护和保护，并借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帮助正在重整旗鼓；俄国白卫分子组织也在加强活动，企图重新建立某些部队，打算同弗兰格尔的力量配合起来，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进攻俄国。

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战斗准备。我们不要以为已经给了帝国主义打击就行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使自己的红军随时保持一切战斗准备，加强它的战斗力。这一点当然不能因为一部分军队的遣散和迅速复员而受到妨碍。我们估计，红军和它的指挥人员在战争期间所取得的巨大经验现在会帮助我们改善红军的素质。我们要努力做到，在裁减军队以后，我们所保留的红军的基本核心不会使国家的开支负担过重，同时在军队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比以前更好地保证：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重新征集和动员更多的军事力量。

我们相信，一切由于支持白卫分子反对我们的阴谋而遭到很大损失的邻国，已经充分地接受了不容置疑的经验教训，并且正确地估计了我们的和解精神，这种精神曾经被人说成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在取得三年来的经验以后，它们应该相信，在我们显示出最坚定的和平愿望的同时，我们在军事方面也是有准备的。所以任何对我们发动战争的企图，对于那些卷入这种战争的国家来说，都将意味着它们在不进行战争或者在战争以前所能获得的条件，要比它们在战时和战后所得到的条件来得好。这一点已在若干国家得到证明。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战果，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战果，同时，包围着我们的或者同俄国在政治上打交道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因此我们和邻邦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好转。你们知道，我们同许多和俄国西部边疆毗连的国家终于签订了和约，这

些国家以前都是在前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内的，苏维埃政权现在根据我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已经无条件地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在这个基础上签订的和约完全可能比资本家和西欧某些国家所想象的更巩固。

同拉脱维亚政府的关系，我应该说，有一个时期似乎是关系的恶化在威胁着我们，这种恶化甚至到了可能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然而我国驻拉脱维亚代表最近的报告正好指出：政策已经发生变化，许多误会和引起不满的正当原因都已消除。我们有很大的希望在最近和拉脱维亚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同西欧进行贸易时，拉脱维亚自然要比爱沙尼亚以及其他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毗连的国家对我们更加有利。

同志们，我还应该指出，这一年来，我们的政策在东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庆祝布哈拉、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这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它们不仅恢复了自己的完全独立，而且由工农掌握了政权。这些共和国证明：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原则不只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内，不只是在拥有无产阶级这个社会支柱的国家内容易被理解和迅速实现，就是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内也是这样。农民苏维埃的思想胜利了。掌握在农民手里的政权是有保障的；他们掌握了土地、生产资料。农民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已经由我们政策的实践结果巩固下来了。

我们还可以庆祝即将同波斯签订的条约，和波斯的友好关系是有保证的，因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还应该指出，我们和阿富汗，尤其是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愈来愈协调，愈来愈巩固。在对待土耳其这个国家方面，协约国尽

力使它和西欧各国之间不能建立一点正常关系。尽管资产阶级进行种种阻挠和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尽管在俄国周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国家，但是，这种情况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越发使俄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联盟和友好关系不断地巩固起来，因为帝国主义对于无福置身于胜利者之列的民族施用暴力是它们整个政策中最主要的事实，而这种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我们在这方面以及在西方对比较欧化的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明现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国际情况的好转是有巩固的基础的。我们相信，在我们继续执行爱好和平政策的情况下，在我们要作让步的情况下（而我们必须让步以避免战争），尽管帝国主义者施展一切阴谋诡计（当然，这总归会使这个或那个国家和我们发生争端的），但是，我们政策的基本路线和由帝国主义政策本质产生的基本利益正显示出它们的作用，并且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而这就保证我们能够从根本上专心从事经济建设事业，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安心地、坚决地和满怀信心地进行工作。

我还应当指出，现在正在和英国进行签订贸易协定的谈判。可惜，这个谈判比我们预料的要拖得久一些，然而，我们在这方面是绝对没有过错的。还在7月间苏维埃军队取得最大胜利的时候，英国政府向我们正式提出使贸易关系得以建立的议定书，我们回答完全同意，然而从那时候起，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内的派别斗争阻碍了这件事情。我们发现英国政府犹豫不定，威胁要和我们完全断绝关系，要立即把舰队开往彼得格勒。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整个英国到处成立了“行动委员会”¹¹¹来回答这一威胁。我们看到，在工人的压力下，机会主义派的极端拥护者及

其领袖不得不走上这条完全“违宪的”政策的道路，而这种政策他们自己昨天还在谴责。结果，劳动群众的压力和觉悟的力量，冲破至今还在英国工会运动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孟什维主义的偏见，给自己开辟了道路，终于折断了帝国主义者好战政策的矛头。而现在我们继续执行和平政策，我们仍然主张以英国政府提出的七月草案为基础。我们愿意立即签订贸易协定，如果说这个协定直到现在还没有签订，那末，这只能归咎于英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派别，因为它们想破坏这个贸易协定，它们不仅违背大多数工人的意志，甚至也违背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而想再次获得放手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机会。这就是它们干的勾当。

这种政策在英国某些有势力的集团里，即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者的集团里执行得愈久，它就会使金融情况愈紧张，资产阶级英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现在所需要的部分协定就愈拖下来，帝国主义者就愈接近于这种情况：它们以后要接受的不是部分协定而是全部协定。

同志们，我应该说，由于同英国的这种贸易协定，产生了我们经济政策上的一个极重大的问题，这就是租让问题。今年11月23日公布的租让法令，是苏维埃政权在报告总结的这段期间内通过的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当然，你们大家都熟悉这个法令的全文。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公布了一些补充材料，这些材料可以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我们所发表的不仅是附有这个法令全文的单行本，而且还有关于最主要的租让项目，即粮食、森林和矿山等租让项目的清单。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使我们所公布的这个法令的全文尽快地传到西欧各国去，并且我们希望我们的租让政策将来即使从实践方面来说，也是成功的。我们丝毫不对自己隐瞒这一政策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

个落后的弱国内引起的危险。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我们只要站稳脚跟，就能度过这些危险，要善于把较大的危险和较小的危险区别开来，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避免较大的危险。

不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们，在下新城省阿尔查马斯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有一位非党农民谈到租让问题，他说：“同志们，我们派遣你们去参加全俄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承担三年义务，只是不要把我们的亲娘俄国用租让的办法卖掉。”我非常欢迎这种传布很广的情绪。我认为，这正向我们说明，在非党劳动群众中，不只是在工人中，而且在农民中，三年来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政治经验和经济经验。这些经验使他们把摆脱资本家的压迫看得重于一切，使他们加倍警惕地、非常警觉地对待每一个可能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步骤。毫无疑问，对这样的声明我们要细心倾听，但是我们应该说明，这根本谈不到把俄国卖给资本家，我们说的是租让，同时每一个租让条约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并且有种种经过周密考虑的保证，这种保证在本届代表大会上和以后各种会议上还要不止一次地和你们共同考虑和讨论，所以这些临时性的条约并不等于出卖。它们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是对资本家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使我们借此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我们没有权利轻视任何即使稍微有助于改善工农处境的事情。

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迅速恢复贸易关系。这些谈判此刻正在

半公开地进行。我们订购的机车和机器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订购了。如果我们能够公开地进行谈判，我们一定要大大地扩大这种可能性。依靠工业我们就能取得许多成就，并且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然而即使在很顺利的情况下，这个时期也是以若干年来计算的。应该记住：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得到了和平，另一方面，历史告诫我们，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用一系列的战争来解决。这个教训我们不会忘记。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不敢再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会不会长久，我们不能担保。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情况稍有变化，帝国主义强盗就会重新向我们进攻。必须对这一点有所准备。因此，首先应该恢复经济，应该使它牢固地站稳脚跟。没有经济设备，没有从资本主义国家运来的机器，就不可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要能够恢复经济，不惜多给资本家一些利润。应该使工人和农民的心情象那些说自己不怕牺牲和困苦的非党农民的心情一样。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干涉的危险，并不从伤感的观点来看租让问题，而是把租让看成战争的继续，把无情的斗争转到另一方面去，同时又看到资产阶级再次企图恢复旧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很好，它给我们保证：监视和保护我们的利益不仅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事情，而且是每个工人和农民的事情。因此，我们相信，即使在执行租让条约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在根本不让资本家政权复辟的基础上保护住我们的利益；我们一定能把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小于战争的危險，而这就会使战争难以再起，并使我们有可能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即在较少的年头内（但还是要好多年）恢复和发展我们的经济。

同志们，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我研究了要向你们报告的立法材

料,认为现在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¹¹²的大多数措施和决议,都是和这项经济工作有关的局部的、详细的、往往是十分细小的措施。当然,你们并不希望我把这些措施列举出来。这样做是极其枯燥和十分无味的。我只想提醒大家,我们已经远不是第一次把劳动战线提到第一位了。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918年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①。这是强迫我们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在经济上割裂俄国的时期,我们就因为这个具有极端掠夺性的条约而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况。那时有可能指望获得一个喘息时机,使我们有条件来恢复和平的经济工作(虽然我们现在才知道,喘息时机是十分短暂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刻在4月29日的决议中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种经济建设上去。这项决议并未撤销,它还是我们的法律,它使我们能够正确地估计下列情况:我们是怎样着手执行这项任务的;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将工作进行到底,现在应该更加注意什么。

仔细看看这项决议就会知道,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早在1918年4月就已经完全肯定地和十分坚决地提了出来。一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说:温故而知新。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重复经济建设的这些基本道理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们还要重复好多次,但是请注意一下,1918年宣布的抽象原则和实际上已经开始的经济工作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尽管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而且经常被打断,我们还是更加接近和更加具体地去实际安排经济任务。我们还要重复许多次。没有多次的重复,没有一些后退,没有检查,没有个别修正,没有新办法,不尽力去说服落后的和无准备的人,那就不能进行建设。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0—293页。——编者注

目前政治形势的全部关键，就是我们正处在转折的过渡时期，正处在有着某些曲折的从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这在以前也曾有过，但没有这样广泛的规模。这应该再三地提醒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一般政治任务是什么，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无产阶级专政不怕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因为受资本主义压迫最厉害的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因为它实行强制是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并且它拥有任何一个旧阶级所没有过的强制手段和说服手段，虽然这些旧阶级进行宣传鼓动的物质潜力比我们大得多。

如果提出总结我们三年经验的问题（因为在若干基本方面总结一年的经验是很困难的），如果给自己提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得多的敌人这个问题，那必须回答说，这是由于在红军的组织中，无产阶级对反对一切剥削者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出色地实行了一贯坚强的领导。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大多数农民都那样乐意走这条路呢？因为他们虽然绝大部分都不是党员，但是他们确信：除了支持苏维埃政权而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当然，他们不是从书本、从宣传，而是从经验中确信这一点的。内战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的同盟（这个同盟同小农经济的某些基本特点有着更密切的血缘关系），使他们确信了这一点。这些小私有者政党同地主、资本家结成同盟的经验，以及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的经验，都使农民群众确信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苏维埃的实事求是的政策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钢铁般的领导是拯救农民摆脱剥削和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是因为我们能够使农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的以坚定不移的信念为基础的强制政策，才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

现在我们应该记住,在向劳动战线过渡的时候,同样的任务在新环境下以更广泛的规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和我们跟白卫分子作战时的任务是一样的,当时我们看到工农群众表现了在其他国家的任何战争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热情和努力。非党农民,同我方才引过他的话的阿尔查马斯农民一样,的确是根据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相信剥削者是残酷无情的敌人,因此需要残酷无情的政权来镇压他们。这样,我们就吸引了空前众多的人民来自觉地对待战争,积极支援战争。要使所有党工工人和非党工人,所有非党农民(农民绝大部分不是党员)都这样毫无例外地同情战争,了解战争,这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任何政治制度连十分之一也办不到。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强敌的基础。这里证实了一条最深刻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现在我们从这方面来谈谈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的问题,这些任务通过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的数十数百个专门决议已经摆在你们面前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十分之九的工作(这一点下面再谈)和人民委员会大概一大半的工作都是属于这些任务。我要谈的是关于经济任务的问题: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改造俄国经济的基础,即小农经济的基础。这些任务要求把每个工会会员都吸收到这一崭新的事业中来,这种事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这里是否具备战时那种迅速取得绝对胜利的条件,

是否具备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条件。工会会员和大多数非党群众是否确信我们必须采取新办法，必须实现经济建设的伟大任务呢？他们是否象以前确信必须为战争献出一切，为前线的胜利牺牲一切那样确信这一切呢？既然这样提出问题，你们一定会回答：毫无疑问，还没有。他们相信这一点的程度距离所要求的还远得很。

战争是千百年来尽人皆知、习以为常的事情。过去地主的野蛮残暴行为是这样的明显，以致使人们很容易相信，甚至连那些住在以产粮为主的边疆区而同工业联系最少的农民也不难相信。我们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几乎激起了每一个人的热情。现在要使农民群众和工会会员了解这些任务，要使他们懂得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管资本主义剥削几十年来已经多么根深蒂固也要把它铲掉，那就比较困难了。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工农群众而且只有我们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此外别无出路。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末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醒你们注意几条老生常谈的真理，即关于组织任务的重要性、劳动纪律、工会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因为没有其他的组织团结着这么广泛的群众）的真理。我们不仅应该重复这些老生常谈的真理，而且应该充分意识到，从军事任务向经济任务的过渡已经到来了。

我们在军事方面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我们应该在完成需要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发挥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更困难的任务方面准备同样的胜利。必须使千百万世代受奴役、受压迫、任何独立性都遭到压制的人相信新的任务；几百万工人参加了工

会，但在政治上还是不自觉的，还不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主人，必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但不是为了反抗政权，而是为了拥护和推行自己的工人政权的措施，把它贯彻到底。这个转变是有困难的，从简单的公式来看，这并不是一项新的任务。但这是一项新的任务，因为现在经济任务第一次具有这样大的规模，我们应该意识到，应该记住，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是更困难、更长久的；要在这个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忠诚。我们获得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因为群众已经深刻认识到，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为政治和军事服务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宣布过很多次，但是还不够，所以我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一年来所实行的各项措施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立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生产宣传局；使它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按生产计划又创办了一些报纸，这些报纸不仅要注意生产宣传，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把生产宣传组织起来。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宣传的必要性，是由政治局势的一切特点造成的。这无论对工人阶级、工会或农民说来都是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国家机构最必要的工作，可是我们还远没有充分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具有如何管理工业，如何使群众关心生产的书本知识，而且比实际应用的的多千百倍。我们必须使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关心生产，使他们记住，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而且只有这样，苏维埃俄国才能在十年之内摆脱现在所处的悲惨境地和所忍受的饥寒。不了解这一任务，我们就会葬送一切，因为如果我们的机构软弱无力，我们就只能退却，因为资本家在稍事养息之后随时都会重新挑起战

争，那时我们就不能继续打仗。那时我们就不能发挥我们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就会在这最后一战中被打垮。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迄今为止，一切革命、一切最伟大的革命的命运都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来决定的。我们的革命也是这种最伟大的革命。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阶段，应当准备迎接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所以必须做到战争一旦到来，我们就能够应付自如。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强制手段，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保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已经为农民群众和非党工人所了解，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并不害怕这个专政，他们不恐惧这个专政，他们把它看作靠山和支柱，也就是说，他们把它看作可以用来同地主和资本家对抗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取得胜利。

这种认识、这种信念已经深入贯彻在农民群众对待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的态度上，但是现在要转到经济任务方面来。也许这一转变不会立刻成功。也许，不经过某些动摇，不重犯松弛涣散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老毛病，是不会转变过来的。还必须更加紧张、更加努力地从事这种工作，牢牢记住我们一定能够说服非党农民和觉悟低的工会会员，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若不恢复经济生活，在战争第二阶段就不能战胜敌人，这一点是驳不倒的，让我们使千百万人更自觉地对待经济战线上的战争吧。这是中央生产宣传局的任务，这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任务，这是党的一切工作人员的任务，这是苏维埃政权所有一切机关的任务，这是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的任务，我们曾经靠宣传工作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宣传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向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说真话，而其他任何宣传都向他们说假话。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宣传工作转向更加困难的方面，即涉及工人在工厂中日常工作的方面，不管这种工作的条件多么困难，不管昨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培

养工人和农民不信任政权的影响多么巨大。必须使工人和农民相信，如果不重新配备力量，不找到全国团结的新形式，不找到与这种强制相联系的新形式，我们就不可能离开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崩溃的深渊，而我们已经开始离开这个深渊了。

同志们，我来谈一谈我们经济政策的某些论据和我们的经济任务，我认为它们足以说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整个过渡。首先，我应当提到我们的土地法案，即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帮助农民经济的法案，这项法案已在今年12月14日刊登出来，关于这个法案的基本原则，所有地方工作人员早已从阐明这项法案实质的专门广播中知道了。

应该立刻使这项法案，——是从地方上的经验出发的（法案是根据地方经验制定的），各地同志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在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各部的代表中得到详尽的讨论。现在大概已经没有哪一位同志怀疑：不仅从鼓励的意义上，而且从强制的意义上来说，都必须采取专门的和特别有力的援助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

我们曾经是而且还是一个小农国家，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参加过渡的农民必须比过去参加战争的农民多十倍。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需要一部分成年的男人参加。但是，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必须毫无例外地动员所有的男女工人和农民。要使我们共产党人和土地部的工作人员相信应当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这并不困难。我相信，在这里讨论提交你们审查的12月14日法案时，对于这一点不会发生丝毫原则上的分歧。必须懂得另外一种困难，说服非党农民的困难。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

这种计划建立在沙子上，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三年来没有学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困苦的、有时是贫穷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纲领和进行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必须清楚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在土地部工作的党员召集起来，总结他们的经验，了解地方上已经做了哪些事情，并把这些列入中央将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颁布的法案中去。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说服非党农民，因为他们是群众，因为只有提高这些本身积极、主动的群众对于必须从事这一事业的认识，才能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农民经济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胜利，那末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取得胜利，因此，必须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必须使每一个非党农民都明白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他们并没有白白度过这整整六个艰难困苦的年头。他们已经不同于战前的农夫。他们受过严重的苦难，他们想得很多，忍受了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痛苦，这使他们忘记了许多旧的东西。我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懂得，决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应该按另一种方式生活，同时我们应当赶快用我们的一切宣传手段、一切国家力量、一切教育、一切党的手段和力量来说服非党农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土地法案（我相信你们会一致通过这一法案，当然，在通过时一定会作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奠定真正的基础。只有当我们说服了大多数农民并且吸引他们参加这一事业的时候，土地法案才能象我们的政策那样巩固，因为正如库拉也夫同志根据鞑靼共和国的经验在一篇文章内正确指出的，勤劳的中农和贫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朋友，懒汉是它的敌人。这是一个其中没有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内容的真理，但它是不

容置疑的，非常明显的，在任何农村集会和任何非党农民会议上，都能为绝大多数劳动农民所理解，并且会变成他们的信念。

同志们，这就是现在我们由战争时期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我要首先向你们强调的一点。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实行国家强制，首先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来发展农民经济。只要我们善于再说服几百万对此毫无认识的人，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一切力量都用在上面，并且设法建立和扩大生气勃勃的、巩固的强制机构，来适应新的说服范围，这样我们就会胜利地结束这场战役。克服农民群众中的守旧、无知和不信任等残余的战役现在开始了。在这里用旧的办法是不能取胜的；如果用我们已学会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地诱导的办法，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就能不只是通过法令，设置机关，草拟公文，——光发布命令是不够的，——并且要使春天全部播种工作比过去做得好，使小农经济得到某种改善，即使是最起码的改善也好（愈谨慎愈好），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大规模地进行。如果我们能正确地了解到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视非党农民，把三年来获得的全部技巧、全部经验都用在上面，那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不取得这样的胜利，不使小农经济在实际上得到大量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并使农民领会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告诉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象阿尔查马斯那样的非党农民，决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饿和寒冷，不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战争中就会被打倒。这是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在这里，谁要是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丝毫的松懈，谁就是工农政权的极大罪人，谁就是在帮助地主和资本家，而地主和资本家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离我们很

近的地方，他们的军队整装待发，只要他们看见我们软弱就会向我们进攻。要使我们有力，除了发展我们的农业和城市工业这个主要支柱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使非党农民相信必须这样做，动员一切力量援助他们，在实际上给他们这种援助。

我们承认自己对农民是负了债的。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我们应当偿还这笔债务，恢复了我们的工业以后，我们一定要偿还。但是，为了恢复工业，就需要有富余的农产品。因此，我们的土地法案不仅有使我们一定要达到实际目标的意义，而且有使苏维埃政权的几百个决定和法案以它为中心的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工业建设的基础，我们开始恢复俄国经济力量的基础，目前怎样正在我国形成。在这里我应当首先把你们的注意力从各人民委员部收到或即将收到的一大堆报告，转到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报告中的一个地方。每个人民委员部最近都会向你们提出一大堆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实际的总结材料，但是必须从中找出最主要的东西，以便取得即使是十分微小的成就；同时也要找出对于执行我们整个经济计划的基本的东西，以便恢复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工业。而这种基础之一，就是我们粮食征购工作的状况。在发给你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三年工作报告这本小册子里有一张图表，我只把其中的总结数字念一念，并且只念整数，因为数字念起来，特别是听起来很困难。这是各年征购的总结数字。从1916年8月1日到1917年8月1日征购了三亿二千万普特，下一年征购了五千万普特，以后是一亿普特和二亿普特。三亿二千万、五千万、一亿和二亿这些数字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史，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方面的工作的主要情况，并且为我们真

正开始我们的建设准备了基础。革命前的三亿二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大概的最低数字，达不到这个数字，就不能开始建设。革命的第一年征购了五千万普特，饥饿、挨冻和贫困很严重；第二年征购了一亿普特；第三年征购了二亿普特。每年增加一倍。根据斯维捷尔斯基昨天给我的报告看来，到12月15日共有一亿五千五百万普特。我们第一次站稳了脚跟。我们将掌握大约三亿普特的储备，可能更多一些，没有这样的储备就不可能恢复国家的工业，就谈不到恢复运输业，更不可能去实现俄国电气化的伟大任务。任何一个工农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它不能依靠工人农民的共同努力来收集这么多的粮食储备，保证产业工人有饭吃，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安置在苏维埃政权所需要的地方的话。办不到这一点，那不过是空谈而已。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储备。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有了这些成就，有了这些粮食，就能着手恢复国民经济。我们知道，这些成就是以农民忍受巨大的困难、饥饿和缺少饲料为代价而取得的，而这些困难可能还要增加。我们知道，早年已使农民的贫困和灾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我们便把上述法案中所叙述的援助措施提到了首位。我们把这种粮食储备看作是恢复工业的储备，看作是援助农民的储备。没有这种储备，国家政权便会化为乌有。没有这种储备，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除了我们坚决执行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影响方式，即实物奖励。实物奖励法令是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最主要的法令和决议之一。当时我们还不能立刻颁布这项法令。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从4月起作出了一连串的决定和决议，而这项法令只是到了我们在运输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建立了五十万普特粮食储备的时候才颁布的。五十万

普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你们大概已经看了昨天《消息报》¹⁰⁷上登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说明,这五十万普特已有十七万普特用掉了。正如你们看到的,储备并不可观,而且远远不够,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走上我们将要继续走的那条道路。这证明我们将不仅经过说服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光向农民和工人们说加强劳动纪律吧,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帮助他们,要奖励那些经历了难以估量的苦难之后在劳动战线上仍然表现了英勇精神的人。我们已经建立了储备,但是这种储备的使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人民委员会有许多指令说明,实际上实物奖励往往成了单纯的附加工资。在这方面还要加以详细研究。除了会议和补充草案以外,中央还要进行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在地方上和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国家不仅要进行说服工作,并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作人员,懂得这一点是不难的,要懂得这一点并不需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早就得到非党工农群众的同情。我们只是需要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和更实际地在地方上安排这项工作。

现在我们再谈谈燃料问题,你们会从李可夫同志的提纲中看到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情况已经改善,不仅木柴方面有所改善,就是石油方面也有改善。现在,由于阿捷尔拜疆共和国的工人表现了巨大的热情,由于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由于有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委派的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员,石油方面的情况很好,在燃料方面我们也开始自立了。由于派出了一个由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主席的全权委员会到顿巴斯去工作,我们每月从顿巴斯得到的煤已由二千五百万普特提高到五千万普特。该委员会通过决定,把负责的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那里去工作。现在已派皮达可夫同志到那里去领导。

由此可见，我们为了在燃料方面取得成就，采取了一些措施。顿巴斯是最大的基地之一，现在已经由我们掌握。我们从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记录中可以找到有关顿巴斯的决议。在这些决议里面谈到，要派遣能够把中央政权的代表和地方工作人员团结在一起的最有权威的委员会到地方上去。我们必须加强地方工作，我认为，这些委员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我们今后还要组织这样的委员会。

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泥炭是我国蕴藏量非常丰富的一种燃料，但是过去由于开采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无法加以利用。所以这种新方法将帮助我们克服燃料荒，燃料荒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严重危险之一。如果我们依然用旧的经营方法，那末，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的泥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经帮助两位俄国工程师把这项新发明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使这种新方法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总之，我们已经处在大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在经济上将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有无限丰富的泥炭。但我们不能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做这种工作迫于饥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如讲自愿，任何人都不会去。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上层，它是不关心下层的。

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应该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顺利改进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已使我们能够大量开采泥炭，不必吸收受过训练的工人，因为用这种方法，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也可以工作。我们已经生产这种机器了，我个人建议代表同志们去看一看关于泥炭开采工作的影片，这部片子在

莫斯科已经放映过，现在可以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放映。它会使人们具体地了解这是克服燃料荒的胜利基础之一。我们制造了用新方法来操作的机器，但是这些机器造的不好。我们已派人到国外去安排同国外的商品交换，虽然我们的贸易关系是半公开的，但还是会帮助我们在国外得到这些由我国发明家设计而在外国制造的优良机器。这些机器的数目，泥炭总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成绩，将是衡量我们经济方面的一切成绩的尺度，因为不克服燃料荒，就不能取得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在恢复运输业方面能否取得重大成就，也与此有关。

同时，你们已经从叶姆沙诺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我们在恢复运输方面制订了一个为期多年的切实计划。第一〇四二号命令预计为五年，在五年当中我们就能恢复我们的运输业，减少破烂机车的数目；我要强调一下，在提纲的第九条里指出我们已经把这个期限缩短了，这一点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

当预计多年实现的大计划出现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怀疑分子，他们说：我们哪里还能去预计许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坏了。同志们，必须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运输工作的明显改进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第九条的一个地方，那里说恢复运输业的期限原定为五年，但是这一期限已经缩短，因为我们正在超额完成工作；期限现已确定为三年半。其他经济部门也应当这样工作。而这也就日益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实际的现实任务。各地在注意科学和实践的经验的同时，还应当不断地努力使计划完成得比原先规定的快，以便使群众看到，经验能够使我们缩短完全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漫长时期。这取决于我们。要在每个修配厂、每个机务段、每一方面改进业务，这样我们

就会缩短期限。而且我们正在缩短它。不要害怕多年的计划，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能恢复经济，各地要抓紧执行这些计划。

必须使经济计划按照既定规划完成，加快完成这一规划的应受到表扬和鼓励；群众不仅应当懂得，并且还应当体会到，缩短饥饿、挨冻和穷困的时期完全取决于他们尽快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个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

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使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中心。我们已经着手实现这一任务，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后者改组的决议提交你们审查。

你们要审查这一草案，我相信，这一草案经过必要的修改会一致通过的。它的内容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不小，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熟悉自己情况并把已经提到首位的全部经济工作统一起来的机构。

古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以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他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这一任务，附带提一下，他的这本小册子不象他以前那本小册子写得那样成功。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一个关于成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把许多重要的工作人员调到该委员会去，其中我们看到有托洛茨基和李可夫的名字。我要指出，少作一些这样的空想吧。我们不能丢掉建立了三年的机构。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缺点，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详尽地谈到这些缺点。这个问题已经作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提到日程上了。我是指改进苏维埃机关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应当谨慎地工作，按照需要、根据实际经验来改变我们的机关。古谢夫同志讥笑我们提出的方案，并且说我们建议给劳动国防委员会增加一个农业人民委员部。不错，我们这样的方案也提过。在我们的方案中，劳动国防委员会

占着很小的地位，它是一个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工作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划分得不好；有时我们超出了范围，履行了立法机关的职务。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我们解决这些事情的办法是，立刻把它们转给人民委员会。当必须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建立一个更能统一经济政策的机构时，在我们面前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按立法程序确定这些关系。我们面前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划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占用很多人力来编纂法典，消耗大量纸张，而这毕竟还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

我们要采取另一种办法。有人认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大概相当于人民委员会。我们要放弃这种想法。要让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会。我们将消除许多摩擦，并尽早加以实现。如果人民委员会的某一位委员不满意，请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来，因为人民委员会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召开。这样我们就会消除各主管部门之间的摩擦，并且使劳动国防委员会成为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机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它同真正制定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有关。现在的任务是把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我们为此任务毕竟做了一点工作，这个任务是在两年当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我提醒你们注意这项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法案，同时我相信，经过必要的补充你们一定会批准这个法案，那时，统一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会进行得更顺利，更迅速，更坚决。

现在我来谈最后一点，电气化的问题，它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提到代表大会议程上来的，你们就要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我认为，我们是在非常重大的转变关头在这里开会的，这个转变无论如何都证明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人们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和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部门内，在一切机关内都来树立这种风气。

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大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

你们将要听到国家电气化委员会¹¹³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2月7日的决议建立的。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签署了关于这一委员会的成员的决议，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许多优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共一百多名，专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此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优秀力量参加。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就是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本书今天或明天就要分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被这本书吓倒。我认为，我不难使你们相信这本书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同志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是阶级间和群众间的关系的说

明。但是同时必须记住，现在是实际走上这条道路并且衡量它的实际效果的时候了。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建设。我们在谈到恢复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它们的协作时，不能不谈到广泛的经济计划。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计划；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大致的计划。这个党纲不象我们的真正党纲那样，只有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才可以修改。不，这个纲领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镇中天天都会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如果说，我们在战场上进行过斗争，并且顺利地取得了胜利，那末，使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危险的认识。当时大家都在问：地主和资本家能不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回答说：可能。因此，我们曾经百倍地努力，我们全力以赴并取得了胜利。

你们提到经济战线并且问道：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能不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已经同“苏哈列夫卡”¹¹⁴作过斗争。前几天，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把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场所封闭了。（鼓掌）“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旧时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

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已经拟定了国家电气化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我们的二百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制定的。一个为期很长的、不下十年的计划制定好了，这个计划给我们开了一笔物资账和财务账。这个计划指出，为了实现电气化，我们需要几百万桶水泥和几百万块砖。为了实现电气化的任务，在财务方面估计要用十亿至十二亿金卢布。你们知道，我们的黄金储备远远抵不上这个数字。同时我们的粮食储备也不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我所谈的计划，用租让的办法来抵这笔账。你们会看到我们的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工作是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的。

不很久以前，我在莫斯科省一个偏僻的沃洛柯拉姆斯克县过了一个农民的节日¹¹⁵，那里的农民已经用电灯照明了。在街上举

行了庆祝大会，有一个农民出来讲了话，他祝贺农民生活中的这个新事件。他说，我们农民过去是黑暗的，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光啦，有了“非自然的光啦，它将照亮我们农民的黑暗”。我个人对这些话并不感到惊奇。当然，对于非党农民群众来说，电光是“非自然的”光，但是对我们来说，非自然的却是农民和工人竟然能够在黑暗、穷困中，在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下生活几百年、几千年。从这种黑暗中是不能很快跳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使我们建成的每一个电站都要真正成为教育的据点，对群众进行所谓电的教育。我们现在有一个拟好的电气化计划，但是，完成这个计划却要好多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这里的情况应当同我们第一批经济计划中恢复运输业的计划——第一〇四二号命令的情况一样，这个计划原定五年完成，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到三年半，因为它正在超额完成。

但是应当知道和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电气化的。所以我们的委员会还应该努力扫除文盲。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需要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教养；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明确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这个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在这个党纲中，除了实现电气化的总计划以外，你们还会看到一些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专门计划。每一个到地方上去的同志，都要对他那一地区如何实行电气化，如何由黑暗过渡到正常生活进行一定的研究。同志们，对于交给你们的一些条例可以并且应当在当地加以比较、研究和检查，并且在每个学校、每个小组里，使人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不仅用党纲上写的东西来回答，同时还能谈一谈怎样摆脱黑暗状态。

优秀的工作人员和经济专家已经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制定俄国电气化和恢复俄国经济的计划的任务。现在要努力使工人和农民知道这项任务多么艰巨，应当如何着手把这一任务担当起来。

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个电站都变成教育的中心，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末，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载于1921年出版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按该书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1卷
第441—470页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¹¹⁶

(1920年12月30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
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首先我应当请你们原谅我违反了常例，因为要参加讨论，当然应当先听取报告、副报告和讨论，可是很遗憾，我的身体不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昨天我已经把刊印出来的基本文件读了一遍，并且准备了自己的意见。我刚才说的那种违反常例的情况自然会给你们造成一些不便，——我不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所以就可能重复他们说过的话，而对应当答复的问题，却没有答复。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基本材料是托洛茨基同志的《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把这本小册子同他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提纲加以比较，并且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我发现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在对这个问题举行党内大辩论的时候，怎么能够轻率地写出这样一篇不象样子的东西呢？现在我把在我看来是带有根本的理论错误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工会不仅是在历史上必要的、而且是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却

经常地忘掉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不重视这一点。你看，他提出来的题目——《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就是一个过于广泛的题目。

根据前面所说，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进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当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个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不是教员和学生，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一方面是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谈工会的作用而不考虑到这些真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的错误。

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政党的一般作用的提纲。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要实现这些职能，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也是新型

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工会，就是这样。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由包括这整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严重地遭到分裂，受人鄙视，在某些地方还被人收买（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这样，就象是形成了一系列的齿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的实质本身的结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第一条里指出“思想混乱”，特别和专门谈到工会的危机，这基本上是一种带有原则性错误的东西。如果要谈危机，那只有在分析了政治形势之后才可以谈。事实上，“思想混乱”的正是托洛茨基，因为他正是在工会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来看）这个基本问题上，忽略了一点，即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在俄国，这样的群众就是农民。在别的国家里，这样的群众是没有的，但就是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有非无产阶级的或非纯粹无产阶级

的群众。这就是真正发生思想混乱的地方。而托洛茨基却责备别人思想混乱，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我研究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老是在讲“一般原则”。在他整个提纲里，都是从“一般原则”来谈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更不用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谈得已经够多了¹¹⁷。更不用说，托洛茨基本人在他自己的提纲里所引证的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两人的话已经讲得十分明白，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两人大概是德国话所说的“替人挨打的孩子”或练习论战的对象。原则上的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本人还引用过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写的东西，选中这两个人作为论战对象是很笨拙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去找，从这里也找不出任何严重的原则分歧。一般说来，重大的错误，原则上的错误，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现在“从原则上”提出问题，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拖向后退。感谢上帝，我们终于从原则转到实际的工作上来了。在斯莫尔尼³⁹，我们曾经大谈原则，而且无疑是谈得过多了。现在，经过三年之后，关于生产问题的所有各点以及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组成部分，都已经有了法令。然而这些法令的命运不佳：我们虽然在上面签署，但是随后我们自己也把它们忘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加以执行。然后又想出一些原则的论断，想出一些原则的意见分歧。我在后面就要说到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的法令^①，这个法令大家都忘记了，也包括我在内，这是应当引咎自责的。

如果不算我列举过的分歧之点，那末现有的真正的意见分歧，

① 见本卷第424—425页。——编者注

完全是与一般原则的问题无关的。我所以要把我上面所列举的我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分歧”指出来，是因为照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就应当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呢（我们是非常需要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会这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必然存在，而在遥远的将来是否存在会成为问题的机关，它的特点正是在这里。工会的存在会成为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谈论吧。而当前的问题是怎样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怎样调整好工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中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工作中的复杂的传动装置，并不是指苏维埃机关而言。那里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复杂的传动装置，那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只是抽象地和原则地谈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里有无产阶级，有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有小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没有官僚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情况，传动装置已经就非常复杂了。如果要提出工会“任务”的困难何在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想到这一点。再说一遍，真正的意见分歧，根本不在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地方，而在如何掌握群众的问题上，在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上。我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经验（虽然是范围很小的），我们是可以避免这些充满了托洛茨基同志这本小册子的大量的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和原则错误的。例如，这本小册子的许多条提纲，都是要同“苏维埃工联主义”进行论战

的。麻烦还嫌不够，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怪物！这是谁呢？是梁赞诺夫同志。我认识梁赞诺夫同志有二十多年了，你们认识他的时间虽然比我短些，但是在工作上对他的了解并不比我少。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不擅长于（当然他是有别的专长的）理解口号的意义的。梁赞诺夫同志有时说了不十分恰当的话，而我们却在提纲中把这些说成是“苏维埃工联主义”！这难道是严肃的吗？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有“苏维埃工联主义”、“苏维埃反对签订和约”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名堂。拿任何一点都可以造出一个苏维埃的什么“主义”。（梁赞诺夫：“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对，完全正确，“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

而托洛茨基同志在表现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时，自己又犯了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这是一个错误。托洛茨基同志说什么“工人国家”。对不起，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在1917年写工人国家，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如果人们向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的，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工人阶级免于谁的压迫呢？”那末这就犯了明显的错误。不完全是一个工人国家，问题就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错误之一也就在这里。目前我们已经从一般原则进到实际的讨论和法令上来了，可是有人却拖我们后退，不让我们接近实际的东西。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布哈林：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是我不打算答复这个问题。谁要愿意的话，可以回忆一下刚刚闭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那里可以找到答案。

不仅如此。从我们的党纲（这是《共产主义入门》的作者十分

熟悉的文件)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一种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能够没有工会来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它把我们带到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理想里面去了。这种理想,我们要再过十五年至二十年才能实现,而且是否在这个时间内就一定能实现,我还不能肯定。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只要我们不陶醉于、不迷恋于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抽象的概念,或者那种外表上看起来有时象是“理论”,而实际上是错误的东西,是对过渡的特点的错误估计,那末,对于这种现实,我们是能够很好地认识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关于这种结合,我在后面还要谈到。但单是这一个词就足以表明,在这里给自己捏造出象“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的敌人,就是犯了错误。因为“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已经融合,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的概念了。企图找出与托姆斯基同志和洛佐夫

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把他们说成是工会的“官僚”，——在这次争论中究竟哪方面有官僚主义倾向，我在后面还要谈到）的原则分歧，同样是白费力气。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说梁赞诺夫同志有时会犯硬要杜撰口号而且几乎是原则性口号的小毛病，那末，托姆斯基同志虽然有很多毛病，却没有这个毛病。因此，我认为在这里对托姆斯基同志展开原则性的斗争（象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那样），未免太过分了。这实在使我觉得奇怪。有一个时期，我们大家在派别上的、理论上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歧方面犯了许多错误，——自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说是成长了。现在已经到了从虚构和夸大原则分歧转到实际工作上来的时候了。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基本上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奢望当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作得很好的托姆斯基，应当反映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他总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应当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反映出这种复杂的转变，并且如果群众感到一些痛苦，却不知道是什么使自己痛苦，而托姆斯基也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痛苦（掌声，笑声），如果在这时发出警号，那末我肯定地说，这是功劳，而不是缺点。我完全相信，在托姆斯基那里可以找到很多理论上的小错误。不过，如果我们能坐下来深思熟虑地起草决议或者提纲，那末我们是能把它们全都改正过来的；也许我们不会去改正这些东西，因为生产工作比纠正理论上的小小分歧更有好处。

现在我来谈谈“生产民主”；这可以说是为了布哈林。我们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有小的弱点，就是大人物也有小的弱点，布哈林也不例外。只要一看到标新立异的词儿，他就忍不住要表示赞成。在12月7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简直是热情奋发地起草

关于生产民主的决议。我越深刻地考虑这个“生产民主”，就越清楚地看到它在理论上的荒谬，看到它的轻率。这里除了一团糟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根据这个例子，至少在党的会议上应当再一次指出：“尼·伊·布哈林同志，少玩弄一点名词上的花样吧，这对于你，对于理论，对于共和国，都会有好处的。”（掌声）生产是永远需要的。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我们不能反对在讲演和文章里使用这个词。一篇文章不过是探讨和清楚地说明一种关系。但是，如果你要把这变成提纲，把这作为口号去联合“同意者”和不同意者，如果象托洛茨基那样，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那末，这听起来就十分奇怪了。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谈，党是否应当“选择”，以及使党陷于非“选择”不可的境地，究竟是谁的过错。事情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就应当说：“无论如何，应当尽可能少选择象‘生产民主’这样在理论上错误的、除了混乱之外毫无实际内容的口号。”托洛茨基也好，布哈林也好，显然都没有从理论上周密地考虑过这个名词，因而把自己也搞糊涂了。“生产民主”使人产生的思想，完全不是他们两人所醉心的那些观念所包含的思想。他们想要强调生产，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生产。在文章或演说中强调，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把这变成提纲，要党加以选择，那我就要说：作出反对这个东西的选择吧，因为这是一个糊涂观念。生产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一长制还不久，一双鞋子还没有穿坏。决不许制造糊涂观念，制造危险，使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一长制，什么时候需要专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专政，——我听见布哈林在后面喊：“完全正确。”（笑声，掌声。）

其次。从9月起，我们就谈到从重点制过渡到平均制的问题，

我们在全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谈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决议¹¹⁸。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要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

显然，应当非常慎重而周密地对待这个问题。还在那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①上（当时产生了七人派、八人派以及布哈林同志的有名的“缓冲集团”¹¹⁹），我们就谈到了这些原则问题，就已经认定从重点制过渡到平均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为了执行九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我们还应当努一把力。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实行重点制，这就是在一切必要的生产部门中，对最急需的某一生产部门特别偏重。偏重的表现是什么呢？偏重可以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并且我应当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努力工作还是不够的，这里就是有英雄人物也还是不够的，因为一个英雄人物可能有很多优良品质，但是他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在这里，需要善于处理非常特殊的问题。因此，如果提出重点制与平均制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对它作充分的考虑，而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中恰恰是看不到的；他把他原来的提纲修改得越多，他的错误论点也就越多。请看他现在的提纲是怎样说的吧：

……“在消费方面，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

^① 这里是指1920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中央全会。这两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见1920年11月13日《真理报》¹第255号和1920年12月14日《真理报》第281号；对决议的说明，见1920年12月20日《俄共中央通报》⁴⁰第26期。

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托洛茨基小册子第31页提纲第41条）

这在理论上是十足的糊涂观念。这是根本错误的。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如果给我这样一种照顾，每天给我八分之一磅的面包，那我是不胜感激之至。重点制的优先照顾也包括消费方面的优先照顾。否则，重点制就是幻想，就是空中楼阁，而我们毕竟是唯物主义者。工人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提出重点制，那就请你给我们面包、衣服和肉类吧。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曾经在国防委员会¹¹²里几百次地具体地讨论这些问题；有人争着要皮靴，他说“我是重点部门”，而另一个人说，“给我皮靴吧，否则你的重点工人就坚持不住了，你的重点制就要垮了”。

由此可见，提纲中关于平均制和重点制的问题根本提错了。而且提纲是从经过实践检验的已经取得的成就倒退回去。这是不行的，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

其次，是“结合”的问题。关于“结合”，目前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闭口不谈。开口如银，闭口如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实践上从事结合了；在我国，没有哪一个大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哪一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内的大的部门，不是在实际上实行了结合的。效果是不是都很好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去研究一下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吧。在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用以实行结合的法令，简直是多不胜数。而我们却没有实际地研究一下，这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某某工业部门的某种结合，究竟得到了怎样的结果，省工会的某某委员担任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一职务，其结果如何，他实行这种结合已经有几个月等等，——我们还没有能实事求是地

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些实际经验。我们善于制造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并且在这里面犯错误，在这方面我们是能手，而在研究和审查我们自己的经验方面却成了外行。假如我们将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除了从这样或那样地贯彻改良农业的法令的观点去研究农业区的小组以外，还有研究结合，研究萨拉托夫省面粉工业、彼得格勒五金工业、顿巴斯煤矿工业等实行结合的结果的小组，如果这些小组都搜集了许多材料，并且宣称：“我们已经研究了某某问题和某某问题”，那我就要说：“好，我们开始研究实际问题了，我们已经度过童年而长大成人了！”然而，如果在我们已经在结合上面化费了三年的时间之后，有人却向我们提出“提纲”，在里面制造出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更为错误的呢？我们已经开始实行结合了，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是实行得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地研究我们的经验。因此，在结合问题上，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说话。

需要研究实际的经验。在我签署的法令和决定中，有一些是对研究实际结合的指示，而实践比任何理论都重要百倍。所以，当人们说，“让我们来谈谈‘结合’吧”，我就回答说，“让我们来研究研究我们做过的事情吧”。我们犯过很多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法令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改，这也是可能的。我同意这一点，对于法令，我没有丝毫的迷恋。但是应当提出实际的建议：某点某点应当修改。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提法。这才不会是无效的工作。这才不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当我读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实际的结论》时，我觉得这些实际的结论恰恰都犯有这种毛病。因为，那上面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应当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而在其领导机构的成员中则应当有二分之

一到三分之二兼任。为什么呢？这完全是想当然，是“大致估计”。自然，在我们的法令中，时常是根据“大致估计”确定这样的比例的，但为什么这在法令上是无法避免的呢？我不是一切法令的辩护者，也不想把法令说得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好。法令上常常看到这样的比例数字，如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兼任人员等等，这都是根据大致的估计确定的。如果法令上写着这样的话，那末，这就是说，你们试着这样做吧，我们随后再来衡量你们“试验”的结果。我们随后再来研究真正的效果。等我们研究出结果，我们就会前进了。结合我们正在实行，并且将日益有所改进，因为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实际和更加实事求是了。

也许，我已经开始在谈“生产宣传”了吧？这有什么办法呢！讨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时，是必然要牵涉到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并且我们也是实际地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已经有专门管理生产宣传的国家机关¹²⁰，它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们好不好，我不知道，应当加以考验；关于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写什么“提纲”。

如果整个地谈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那末关于民主的问题就用不着谈什么别的，只谈通常的民主就够了。玩弄“生产民主”之类的花招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这是第一。第二是生产宣传。机关已经建立了。托洛茨基的提纲谈到生产宣传。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提纲”在这里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机关好不好，暂时还不知道。这要等我们在实际上考验它之后再说。让我们来进行研究和调查吧。我们假定，在代表大会上建立十个小组，每组十人。然后就可以问：“你进行过生产宣传工作吗？情形如何？结果怎样？”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便可以奖励那些成绩特别好的人，而抛弃那些不成功的经验。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

虽然很少，很不成熟，但终究是有了，可是有人要我们离开这些经验，把我们拖回到“原则的提纲”上去。这与其说是“工联主义”，不如说是“反动的”运动。

其次，第三，是奖金问题。实行实物奖励，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任务。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已经有进展了。在这方面已经拨出五十万普特的粮食，其中有十七万普特已经用掉。用得不好，恰当不恰当，我不知道。在人民委员会里，曾经有人指出说分配得不好，说不是作为奖励，而是成了附加工资。工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研究，但是还没有研究出结果。十七万普特的粮食已经拿出去了；应当合理地进行分配，应当用来奖励那些表现了英勇精神的、认真负责的、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经济工作者，一句话，奖励那些具备托洛茨基所夸奖的品质的人。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提纲里夸奖，而是要给他们面包和肉。譬如说取消发给某一类的工人的肉，把它用奖金的形式分给别的、“重点的”工人，这是否更好些呢？我们不拒绝这样的重点制。这种重点制是需要的。我们要仔细地研究我们实行重点制的实际经验。

其次，第四，是纪律裁判会。如果我们没有纪律裁判会，那末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生产民主”——请布哈林同志不要对我的话发火，——就都成了十分荒谬的东西了。可是你们的提纲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原则上、在理论上、在实际上，对于托洛茨基的提纲和布哈林的立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糟糕透了！

当我想到你们不是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更加相信这个结论了。不仅如此，提纲中还包含着许多理论上的错误；在估计“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时所采取的观点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因为谈论这样广泛的问题，是不应当不从政治方面去

考虑目前局势的特点的。所以我们曾经同布哈林同志一起，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写道，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

在分析目前的政治局势时，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军队的复员，战争的结束，获得比以前长得多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可能性，比较巩固地从军事战线过渡到劳动战线的可能性。单是由于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化。怎样变化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仔细地加以研究，然而从你们的提纲中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没有研究出结果以前，要善于等待。人民是过度疲劳了，应当用于某些重点生产部门的许多储备，已经用完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正在变化。战争造成的疲惫现象非常严重，各种需要增加了，但是生产没有增加，或增加得不够。而另一方面，我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即只有当我们善于先为强制奠定说服的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制^①。我应当指出，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的。

我们是否已经为一切新的生产任务奠定了足够广泛和坚固的说服基础呢？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把群众吸引过来。可是群众能不能一下子转到这些新的任务上来呢？不能，因为譬如说关于应不应当推翻地主弗兰格尔的问题，应不应当为这一目的而不惜牺牲的问题，象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特别的宣传的。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如果我们不是指“原

^① 参看本卷第382页。——编者注

则的”问题，不是指关于“苏维埃工联主义”的议论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而是指问题的实际方面，那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只是刚刚建立起生产宣传机关；我们还没有经验。我们实行了实物奖励制，但是还没有取得经验。我们建立了纪律裁判会，但是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而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使群众有准备。这个问题是否已经经过准备，是否已经从这方面研究、考虑和衡量过呢？远远没有。这就包含着根本的、重大的、危险的政治错误，因为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需要按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规则办事，而这里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裁起来了。有人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然而他们却一次也没有衡量过就虚构出了“生产民主”这样一个荒谬的口号。

对于这个口号的意义尤其应当放到这样一种政治形势下来理解，这个形势就是：官僚主义已经很明显地摆在群众的眼前，我们已经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需要代表大会做的“只是一致批准”了。这是错误的。单是批准还不够；所谓批准，是说把已经充分衡量过和考虑过的东西固定下来，实际上呢，生产民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充分考虑过、考验过、检查过。想想看，提出“生产民主”的口号，群众会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

“我们是普通人，是群众中来的，我们说，必须实行革新，必须改正错误，必须赶走官僚主义者；而你却转移视线，说什么要进行生产，要以生产成就来表现民主。但是我不想同管理处、管理总局等等的官僚主义者一起搞生产，我们要别的人。”你们没有让群众说话、领会和思考，你们没有让党取得新的经验，就迫不及待，冒冒失失，创造出一些理论上荒谬的公式。而那些过于热心的执行者，又会使这种错误加深多少倍呢？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

如何领导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他有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往往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是责任是要放在他身上的。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11月9日）和十二月全会（12月7日）。在这两次全会上，所有这些错误已经不是表现为逻辑分析、前提和理论推论，而是表现为行动了。结果是在中央委员会中搞得一团混乱；这是革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危险的。关键在于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的“缓冲”集团。这一集团带来的危害和混乱最大。

请大家回忆一下交通总政治部¹²¹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¹²²的历史吧。在1920年4月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说交通总政治部是一个“临时的”机关，它“在最短期间”必须转入正常状态。¹²³在9月里，你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要转入正常状态。”^①11月（11月9日）举行了全体会议，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的提纲并发表了关于工联主义的议论。不论他关于生产宣传的个别词句讲得多么好，我们必须指出，这一切完全是不知所云，文不对题，是开倒车，中央委员会目前是不能讨论这样的东西的。布哈林说：“这是很好的。”可能是很好的，然而它不是对于问题的回答。经过一场激烈的论战之后，以十票对四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用客气的同志的口吻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已在日程上提出了”要“在工会内部加强并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决议

① 见《俄共中央通报》第26期第2页所载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的决议第3点：“其次，中央认为，运输工会曾经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当时有必要成立交通总政治部和水运政治处¹²⁴，作为帮助和调整工作的临时的杠杆。目前，这种困难状况已经大大地改善了。因此，现在可以而且应当着手把这些组织并入工会作为工会的机关，使它们适应于和溶化于工会机构。”

中还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应当“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思想是很明显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要仅仅在形式上，而要在实际上执行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样才能用你们的工作帮助所有的工会，才能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优先照顾和高傲自大——我们比你们好，比你们富有，比你们得到的帮助多。”

在这以后，我们便转到实际工作上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公布了委员会的名单。托洛茨基退出了委员会，破坏了它，不愿意工作。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卢托维诺夫喜欢扮演反对派的角色。的确，奥新斯基也是这样。坦白说，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角色。但是难道这就是理由吗？奥新斯基搞各种运动搞得很好。虽然奥新斯基也喜欢搞“反对派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同他一起工作。而象破坏委员会这种手段，则是官僚主义的，非苏维埃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有害的。在目前，当我们应当把“反对派”中的健康成分从不健康成分中分出来的时候，这种手段更是加倍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加倍有害的。当奥新斯基进行“反对派运动”时，我对他说，“这个运动是有害的”，然而当他进行各种运动时，那人们会连声叫好。卢托维诺夫在他的“反对派运动”中犯了错误，伊慎科和施略普尼柯夫也一样，这我决不会否认，但是决不能因此而破坏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表示什么呢？表示已经从知识分子的那种空虚的意见分歧转到实际的工作上来了。生产宣传、奖励制、纪律裁判会，——这些就是应当讨论的问题，就是委员会应当研究的问题。这时候，“缓冲集团”的首领布哈林同志，连同普列奥布拉任斯

基和谢烈布利雅柯夫，看到中央委员会危险地分成两派，就起来缓冲，对这种缓冲，我很难找到一个客气的字眼来形容。如果我象布哈林同志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布哈林同志企图有所创造；没有疑问，他的愿望是十分真挚的和“缓冲”的。然而结果并不是缓冲，而只是表明他没有估计到政治局势，此外，他还犯了理论上的错误。

把所有这些争议提出来广泛进行辩论，应不应当呢？从事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应不应当呢？在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前占去我们非常需要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应不应当呢？在这期间，我们本来可以研究研究奖励制的问题，纪律裁判会的问题，以及结合的问题。我们本来可以在中央委员会所组织的委员会上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如果布哈林同志想缓冲，而不想成为那种“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¹²⁵的人，那他就应该主张并且坚持要托洛茨基同志留在委员会里。如果他这样主张而且这样做了，那我们也许可以走上实际的道路，也许可以在这个委员会里把一长制实际上究竟怎样、民主制怎样、被委派者怎样等等问题研究一下了。

再往后，在12月（12月7日的全会），同水运员工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了，这就使得冲突愈加尖锐，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八票对我们的七票的局面。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地写成了十二月全会决议的“理论”部分，力图“调和”和实行“缓冲”，然而，在委员会遭到破坏之后，这显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

交通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呢？

完全不在于它们采用了强制手段。这反而倒是它们的功劳。它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够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及时地、不引起冲突地过渡到正常的工会工作上去，没有能够很好地同各个工会相适应，没有能够站在同各个工会平等的地位上来帮助它们。在军事方面有宝贵的经验：英雄主义、认真负责等等。但是也有军人中的坏分子的坏经验：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纲，同他的意识和意志相反，不是支持军事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支持最坏的东西。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昨天应当骂自己是个蠢人，这就是我忽略了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鲁祖塔克有个缺点，就是讲话声音不响，不那么引人入胜，不那么漂亮。稍不注意，就会把他忽略过去。昨天我没有能够参加会议，翻阅了一下自己的材料，在其中发现了一份提交1920年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¹²⁶的印刷品，标题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文章不长，我把它的全文给你们读一下：

提交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

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

（鲁祖塔克同志的报告提纲）

1. 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工会几乎成为除执行工人监督外，能够而且应当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工作的唯一机关。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关还没有调整好，而企业主和高级技术人员的怠工，尖锐地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保护工业和恢复国家整个经济机构的正常职能的任务。

2. 此后，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当时它的主要工作是取消私人企业并且组织对这些企业的国家管理，这个时期，**工会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平行地和共同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机关力量薄弱，这种**平行现象**在当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工会和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建立了充分联系的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正确的。

3. 以后国家经济机关开始进行管理，它们逐步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这一切就**使工业管理工作和生产计划的制订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这些机关了。**这时，工会在组织生产方面的工作就是**参加组织各管理总局、中央管理局以及工厂管理处领导机构。**

4. 目前，在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机关和工会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的问题，又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来了。目前必须尽量合理地利用每一个劳动单位，吸引全体生产者群众自觉地参加到生产过程中来；同时，目前国家经济管理机关逐渐增长和复杂化，已经变成同生产本身不相称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这种情况不能不推动工会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并且不仅是通过工会在经济机关中的代表，而且推动整个工会组织参加这项工作。

5. 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根据**现有的生产的物质因素**（原料、燃料、机器的状况等等）来规定总的生产计划，那末工会就应当是从**组织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即合理地使用劳动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在制定总的生产计划时，无论是计划的各个部分还是整个计划，都一定要有工会参加**，以便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劳动的利用最恰当地结合起来。

6. 要实行真正的劳动纪律，要有效地同逃避劳动的现象进行斗争等等，就必须使所有的生产参加者都**自觉参加**实现这些任务。**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宜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和组织上的缺点。

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巨大的。它应当教会**每个车间、每个工厂中的自己的会员**注意由于**技术设备使用不当或行政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而引起**的**劳动力使用上的一切缺点**。必须利用**各个企业和生产部门的全部经验**来同拖拉作风、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7. 为了特别强调这些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工会应当在组织方面，在日常的具体工作中，把这些任务放在一定的地位。根据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工会下面设立的经济部，在开展本身的工作时，必须逐渐地规定和确定整个工会工作的性质。例如，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整个生产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本身的需要，因此**工资和奖励应当密切联系并取决于生产计划的完成程度**。实物奖励制和工资部分地用实物支付的制度，应当逐步改成按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供应工人的制度**。

8. 工会工作的这种安排，一方面能够结束**平行机关（政治部等等）**继续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能够恢复群众同经济管理机关的密切联系。

9.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会参加国民经济建设的纲领大部分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战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会本身**组织上的薄弱**以及它同经济机关的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脱节。

10. 因此，工会应当为自己规定最近的实际任务如下：（一）最积极地参加解决生产问题和管理问题；（二）会同相当的经济机关，直接参加**组织有权威的管理机关**；（三）密切注意**管理机关的不同类型**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四）必须参加草拟和确定**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五）根据经济任务的主次来**组织劳动**；（六）建立广泛的进行**生产鼓动和宣传**的组织。

11. **工会和工会组织下面的经济部**，必须切实地变成工会有计划地参加生产组织工作的灵活的有力的杠杆。

12. 在对工人实行有计划物质供给方面，工会必须把本身的影响转移到中央和地方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分配机关**方面去，实际地参加所有的分配机关，并且在其中实行**监督**，对中央及省的**工人供应委员会**的活动，应当特别注意。

13. 由于个别的管理总局、中央管理局等的本位主义倾向，所谓“重点制”已经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因此，工会在任何地方都应当维护重点制在经济中的真正实行，应当坚持根据生产部门的重要性的国家现有物质资源情况来修订现有的确定重点单位的办法。

14. 对所谓的模范企业必须特别注意，要通过建立有权威的管理机关，通过劳动纪律和工会工作，把它们变成真正的模范企业。

15. 在组织劳动方面，除了使各种工资成为一套严整的制度，全面修订生产定额之外，工会必须坚决地担负起同**逃避劳动的各种形式**（旷工、迟到等

等)进行斗争的工作。直到现在,纪律裁判会尚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必须把它变成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有力工具。

16. 执行上述任务,制定生产宣传的实际计划以及制定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各种办法,都应当由经济部负责。因此,必须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经济部,在最近期间召集一次**全俄经济部特别会议**,讨论与国家经济机关工作有关的经济建设上的实际问题。

我想,现在你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要责备自己了。这才是一个好的纲领,它比托洛茨基同志经过多次思索之后所写的和布哈林同志根本没有经过思索就写出来的(12月7日全会的决议)要强过百倍。我们所有的多年来没有做过工会运动工作的中央委员,必须向鲁祖塔克同志学习,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也应当向他学习。这个纲领已被工会采纳了。

我们大家都把纪律裁判会忘记了,只讲“生产民主”而不讲实际奖励制和纪律裁判会,那就只是空话。

现在我把鲁祖塔克的提纲同托洛茨基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比较一下。托洛茨基提纲第五条末了这样说:

“……现在必须着手改组工会,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着手选拔领导人员……”

请看这种真正的官僚主义吧!托洛茨基与克列斯廷斯基要选拔工会的“领导人员”呢!

再说一遍:这就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说明。它的错误并不在于它采取了压制办法;这正是它的功劳。它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所有工会的共同任务,自己没有能够更正确、更迅速、更有效地运用同志纪律裁判会,也没有能够帮助所有的工会这样做。当我读了鲁祖塔克同志提纲中关于纪律裁判会的话之后,我就想:好象已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了。果

然，是有过这样的法令的。那就是1919年11月14日颁布的《工人的同志纪律裁判会条例》（《法令汇编》第537号）。

在这种裁判会里，工会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这种裁判会的好坏，它们的工作成绩如何，能不能经常起作用，这些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实际经验加以研究，那要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所写的有益百万倍。

现在我要结束我的话了。总结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材料，我应当指出，把这些分歧提出来在党内广泛辩论，提交党代表大会讨论，乃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在委员会里，只有在委员会里，我们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才能前进，可是现在我们却在后退，而且在今后几个星期中还会继续后退，退到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上去，而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至于说到我，我对这已经讨厌到极点了，不管我有没有病，我都非常希望能够躲开它，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我都愿意。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错误，一系列的原则错误。从政治上说，整个对待问题的态度都是极不妥当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东西。总之，他的政策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我相信，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是会斥责并且否决这种政策的。（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

1921年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列宁修改过的速记记录作
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1—25页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 和布哈林的错误¹²⁷

党内的争论和派别斗争，在代表大会前，即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前，并且由于选举的即将举行而热烈地开展起来了。在第一次派别活动之后，即在托洛茨基同志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表了“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序言的日期注明为1920年12月25日）之后，接着就是俄共彼得格勒组织的激烈的（读者从后面可以看到，这样激烈是完全应该的）宣言（《告全党书》，1921年1月6日发表于《彼得格勒真理报》¹²⁸，以后又在1921年1月13日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莫斯科《真理报》¹）。此后，莫斯科委员会又发表了反对彼得格勒组织的宣言（载于同一天的《真理报》上）。以后又出现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发表的关于1920年12月30日的争论的速记记录，这次争论是在一次规模巨大而且由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上，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¹⁰⁹ 俄共党团的会议上进行的。这个速记记录的标题是《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序言的日期注明为1921年1月6日）。自然，这远不是全部的争论材料。现在几乎到处都在举行党的会议，讨论争论中的问题。我在1920年12月30日曾经不得不象我当时所说的那样，在“违反常例”的条件下，即在不能参加讨论、不能听到前面的发言和后面的发言的条件下发言。现在我想来恢复被违反的常例，比较“正规地”谈谈我的意见。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

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言论呢？这种言论，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把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的言论看成派别言论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们（当然，托洛茨基同志除外），对这个问题特别喜欢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也是这样。可是布哈林同志在1920年12月30日以“缓冲派”¹¹⁹的名义发言时，却认为自己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

“……当火车有某种倾覆的趋势时，缓冲物就不是那么不好的东西了。”（1920年12月30日争论记录第45页）

这样说来，是存在着某种倾覆趋势的。然而，能不能想象有这样一些有觉悟的党员，他们竟对于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存在着这种倾覆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呢？

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说，“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参加编写工作的是“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人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¹²²委员等）”，说这是一种“纲领性小册子”。在提纲第四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届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

如果这还不算是一个中央委员在建立派别组织，如果这还不算是“某种倾覆趋势”，那就请布哈林同志或他的任何一个同道者向党解释解释：俄文“派别活动”和党的“倾覆趋势”究竟还有什么

别的涵义??能不能想象,还有哪一种盲眼症能比这些愿意“缓冲”、而对于这样的“倾覆趋势”却熟视无睹的人们的盲眼症更奇怪呢??

想想看吧: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11月9日和12月7日)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坚持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作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原来独树一帜而现在在十九个中央委员中仍旧是独树一帜的一个委员,又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为自己挑选了一批人,把这批人的“集体”“著作”当做“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进行选择”!!托洛茨基同志在1920年12月25日宣告说有两种趋势而且只有两种趋势(虽然布哈林同志在11月9日已经以“缓冲者”的姿态出现),这就非常明显地揭露了布哈林集团的真正作用,说明它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这一点就更不用我说了。这是附带的话。不过我要问问随便哪一个党员:这种要求对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进行“选择”的进逼和攻击,岂不是头脑发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三年之后的今天,党内竟会有一个党员,就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问题这样地“攻击”,这岂不是太令人吃惊了吗?

不仅如此。请你们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触目皆是的派别攻击吧。在提纲第一条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对“某些工会运动工作人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这些工作人员被抛“回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大概,在十九个中央委员中,只有他一个人是代表党的)。提纲第八条夸大其词地谴责“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请注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层”上,这才是真正的官僚主义态度呢!)。提纲第十一条一开始就极其委婉地、有根有据地、切实地……怎样才能说得更客气一点呢?……“暗示”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就是

说在口头上承认”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³³的决议。

请看，在我们面前，有权威的法官作出裁判：**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党的决议！**

提纲第十二条说：

“……许多工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可调和地反对结合的可能……在这些工会工作者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不仅如此。许多工会工作者拒不执行新的任务和方法，在自己一批人中间培养行会的关门主义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请读者细心地把这种论断多看几遍，并且把它好好地研究一下吧。这里面“妙语”可真是多得惊人。首先，从这种言论的派别性的角度来给它一个评价吧！设想一下，如果托姆斯基发表一个纲领，责备托洛茨基和“许多”军事工作者培养官僚主义习气、支持野蛮制度的残余等等，那末托洛茨基会怎样说呢，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等人，既然没有看到——简直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激烈性和派别性，没有看到这里的派别性要比彼得格勒同志们的宣言严重好多倍，那末他们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次，请看一下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吧：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批人中间培养……情绪”……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态度。请看，问题的关键在于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在自己一批人中间”培养的是什么“情绪”，而并不在于群众、千百万群众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意中说明了他和“缓冲派”布哈林等人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和掩盖的整个争论的实质。

整个争论的实质和斗争的根源，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不

执行新的任务和方法并且在自己一批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

还是在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抗议并且决心要抛弃那些不愿意纠正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新工作人员呢？

争论的实质，是在于有人不愿意了解“新的任务和方法”呢？

还是在于有人用新任务和新方法的词句来笨拙地掩饰他对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庇护呢？

读者要牢牢记住全部争论的这个实质！

形式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所谓“集体工作的成果”的提纲上写道：“工人的民主不知道偶像崇拜”。“它只知道对革命的适宜性。”（提纲第 23 条）

托洛茨基同志这个提纲的遭遇是不愉快的。提纲中的正确的东西，不仅不是新的，而且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而提纲中的新的东西，却又全都是不正确的。

我摘录了托洛茨基同志几个正确的论点。这几个论点，不仅在提纲第二十三条里所涉及的那个问题（关于交通总政治部¹²¹）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

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即使是反对整个中央的派别纲领，托洛茨基也是有权发表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0 年 12 月 24 日中央关于争论自由的决议批准了这种形式上的权利，这一点也

是没有问题的。缓冲派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有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却不承认彼得格勒组织有这种权利，这大概是因为布哈林在1920年12月30日甚至说出了“工人民主的神圣口号”这样的话（速记记录第45页）……

然而，对革命的适宜性如何呢？

能不能找到一个严肃的人，一个没有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缓冲”派的那种派别自尊冲昏头脑，而具有清醒的神智和良好的记忆力的人，他会认为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权威的领袖就工会运动问题发表这种言论对革命是适宜的呢？？

就算托洛茨基在指出“新的任务和方法”时非常正确，——实际上他指出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然而单是托洛茨基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无论对于他本人，对于党，对于工会运动，对于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教育工作，或者对于共和国，都是有害的，这一点难道还能否认吗？？

好心肠的布哈林和他的伙伴自称为“缓冲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不考虑采用这个称号必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吧。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

大家都知道，大的意见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破伤风，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全部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的倾覆的话，那末这种分歧就可能变成有政治危险的东西。

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人口里只占很少数的情况下。而工会运动（我在1920年12月30日的演说中曾经极力强调，这种运动就是几乎全部都组织在工会内的无产阶级的运动）中的分裂，正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在1920年11月2日至6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¹²⁶上“风波掀起”（风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掀起的）的时候，当会议刚刚结束……不，我说错了，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非常激动的托姆斯基同志跑到政治局来，在非常冷静的鲁祖塔克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叙述了托洛茨基同志怎样在会议上说到“整刷”工会，而他，托姆斯基，又怎样与之争辩，——当这一事件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争论的实质正是在于政策（就是说在于党对工会的政策），而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刷”政策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即使“整刷”政策部分地被“新的任务和方法”（托洛茨基提纲第12条）证明是对的，然而，在现时的条件下，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政策也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它有造成分裂的危险。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认为，把“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归罪于他，“是一种纯粹的讽刺”（列·托洛茨基《答彼得格勒同志们》，载于1921年1月15日《真理报》第9号）。但是“整刷”这个词现在所以成了一个真正的“惯用语”，并不只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

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用了这个词，使它“传遍了”全党和工会。不是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从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说来，这个词还依然是很确切的。这就是说，这一个词就非常简练地表现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纲领性小册子的全部精神、全部倾向。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串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只要回忆一下对托姆斯基同志或“许多工会工作者”的责难，说他们“在自己一批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就可以清楚了！

但是，如果说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1920年11月2日至6日）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可能导致分裂的气氛，那末到了1920年12月初，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评论我们的争论的政治实质时，应当以这一事件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根本的着眼点；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以为对此沉默会有所帮助，那是枉费心机。在目前情况下，沉默非但不是“缓冲”，而是火上加油，因为问题不仅已被现实生活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强调地指出来了。正是这本小册子，在我所引证的几段话中（特别是在提纲第十二条中），再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情的实质究竟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批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还是在于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例如，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引起群众理所当然的“敌视”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很有根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已经走到分裂的地步了。也许布哈林同志正是因为这句话而责骂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是“废话连篇”吧？然而现在任

何一个党员，只要他读过1920年12月30日争论的速记记录，都会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道的，因为他会看到，援引真实事实和依据真实事实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毫无事实根据、满嘴知识分子“空话”的，正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腿是泥做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的时候，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立刻打断他的话，喊道：

“而你还曾加以鼓励呢。”（《速记记录》第15页）

这是一种严重的谴责。这个谴责如果被证实，那末这个被谴责为**鼓励分裂**——哪怕分裂的只是一个工会——的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内，在俄国共产党内，或是在我们共和国的工会内，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这种严重的谴责是由一位同志以不严肃的方式提出的，而且非常遗憾，这位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这种不严肃的辩论“狂热”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对他自己的好文章，例如生产宣传方面的文章，有时也能添“一匙焦油”而毁掉了生产宣传本身的全部优点。常有一些好性情的人（如布哈林），他们甚至在最残酷的斗争中，也能尽量少在自己的攻击中施放毒药；但是也常有一些性情不太好的人，他们动辄就在自己的攻击中施放毒药。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如果能自己检查一下，或者请他的朋友替他检查一下，那对他是会有益处的。

人们会说，即使是采取了不严肃的、不妥当的、显然是“派别的”方式，但谴责终究是提出来了。既然事情严重，那末与其缄默不言，倒不如实话实说，哪怕说得不妥当也好。

事情无疑是严重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里接触到了整个争论的**关键**，它比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好在我们有十分确凿、十分客观的具体材料，足以从**本质上**答复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提出的

问题。

第一，在速记记录的同一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他不仅回答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不对！”，并且还确切地举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本来想提出（我可以补充说：这显然是出于派别狂热）的，决不是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这种谴责，而是要谴责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促成了或引起了分裂。（我附带指出，这一谴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在九月的发言，事实上已经得到中央和全党的批准，而且一次也没有看见有谁提出过正式的反对。）

季诺维也夫同志回答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祖塔克同志已经用他手里的记录证明，“这个问题〈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里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问题〉远在我〈季诺维也夫〉做任何发言之前，以及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

这是一个十分明白、确切和符合事实的声明。这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几千名担任负责工作的俄共党员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所作的声明，而无论是在季诺维也夫这次发言之后曾经两次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或是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也曾经发言的布哈林同志，都没有反驳过他所指出的事实。

第二，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谴责，还有一个更明确和更正式的反驳，那就是载于同一速记记录上的1920年12月7日通过的俄共中央全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的冲突问题，中央委员会决

定：（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2）在2月份召开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3）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权。（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处¹²⁴和交通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员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读者由此可以看到，这里不但没有责备水运员工，而且相反，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承认他们是对的。不过，在1921年1月14日的共同纲领上署名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加米涅夫除外）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这里所说的共同纲领就是《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是由一批中央委员和工会委员会委员提交中央委员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非中央委员而以工会委员会委员名义签名的是洛佐夫斯基。其余的人是：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和阿尔乔姆·谢尔盖也夫。）

这个决议的通过是为了反对上面所列举的这批中央委员，即反对我们这一派人的。因为我们当时是会投票反对暂时保留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看到我们这一派必然要获胜，托洛茨基才不得不去投票拥护布哈林的决议，因为不这样做，就会通过我们的决议。11月间曾经拥护托洛茨基的李可夫同志，在12月间参加了工会委员会处理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工作，因此他也确认水运员工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中央委员会十二月会议（12月7日）的多数，是由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等等同志组成的，就是说，是由谁也不怀疑他们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抱有成见的一些中央委员组成的。而这个多数，就其决议的实质看来，所责备的并不是水运员工，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只是拒绝立

即加以撤换罢了。这就是说，索斯诺夫斯基的谴责的毫无根据又得到了证明。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点。我屡次提到的“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一谴责有没有凭空虚构或言过其实的地方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920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发言里同样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回答是十分确切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从印就的佐夫同志关于水路运输的命令(1920年5月3日)中援引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声明：“委员选举制已被废除”。季诺维也夫同志很正确地把这叫做根本的错误。这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和“委派制”极端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又立刻作了附带的说明，认为在被委派的同志当中，有些人“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都大大不如”佐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我曾听到过对佐夫同志的评价，说他是很有贵的工作人员，我在国防委员会¹¹²中的观察，也完全证实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人想损害这样的同志的威信，也没有任何人想使他们成为“替罪的羔羊”（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报告第二十五页，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想这样做）。破坏“被委派者”威信的，不是那些纠正他们错误的人，而是那些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想袒护他们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我们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并没有加以夸大的分歧实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于反对袒护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反对为它们辩护，而力求纠正它们。全部问题就是这样。

论原则分歧

但是，有人也许会这样对我们说：假如存在着根本的和深刻的原则分歧，那末这种分歧难道不是证明甚至发表最尖锐和最带派别性的言论也是有理由的吗？假如需要说出什么不容易理解的新的东西，那末这难道不是证明有时甚至是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吗？

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同志力图指出这样的分歧，但是却指不出来。如果说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12月25日）之前，还可以（而且应当）用有条件的或和解的口吻来说话（“即使有未被意识到的新任务，有分歧，也不能这样对待问题”），那末，在这本小册子发表之后，就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小册子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根本错误的。

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拿来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所通过的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比较一下，就能最明显不过地看出这一点。我在12月30日的发言中和在1月21日的《真理报》上，都援引过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这个提纲比托洛茨基的提纲正确，完备。托洛茨基的提纲与鲁祖塔克的提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托洛茨基错误的地方。

先从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塞进12月7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臭名昭著的“生产民主”说起吧。如果这个笨拙的、知识分子的、矫揉造作的术语（“标新立异的词儿”）是用在一篇演说或一篇文章

中，而我们却对它加以挑剔，那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正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可笑的位置：他们是在提纲中坚持这个术语，坚持这个把他们的“纲领”跟工会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区别开来的术语！

这个术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样做只是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请看一看布哈林自己在他起草的12月7日中央全会的决议上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吧。在这个决议中，布哈林这样写道：“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你们看：“这就是说”！布哈林在向群众说话时，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必须特别加以解释的深奥的术语。我认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非民主的；写给群众看的东西，不应当用这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新术语；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白费时间来解释不必要的术语），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

这种论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民主的意义不仅是“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进行一切选举都要考虑到政治坚定性和经济工作能力。和托洛茨基的愿望相反，在拥有百万群众的组织中，还应当有一定百分比的调停人和官吏（在今后许多年内，好的官吏还是要有的）。

但我们并不说什么“调停人的”或“官吏的”民主。

第三，只注意被选举者，只注意组织人员、行政人员等等，是错误的。这些优秀人材终究只是少数。应当注意普通人，注意群众。鲁祖塔克的提纲对这一点不仅说得更简洁，更明了，而且在理论上也更正确（提纲第6条）：

“……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宜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第四，“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术语。可以从否认专政和一长制的意义上去了解它，也可以从延缓实现或回避普通民主的意义上去解释它。这两种解释都是有害的，要想避免这种解释，就非加上冗长的和特别的注解不可。

鲁祖塔克简洁地表述了这些思想，他的表述比较正确，而且避免了所有这些毛病。而托洛茨基在他发表于1月11日《真理报》上的《生产民主》一文中，不但没有对存在着这些错误和毛病这一点提出反驳（他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自己的提纲拿来同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反而用“军事民主”同“生产民主”并列起来，这样就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个术语的错误和毛病。幸而，就我记得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为这类术语掀起过派别争论。

托洛茨基提出的“生产气氛”这样的术语，就更不妥当了。季诺维也夫很正确地讥笑了这个术语。托洛茨基气愤地反驳道：“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真正深入到工人群众的基层，而不仅是在表面上——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象过去对前线那样……”问题就在于对“工人群众”说话时，对“工人群众的基层”说话时，要象鲁祖塔克的提纲那样去说，而不要使用“生产气氛”之类

的字眼，这种字眼只会引起误解或者传为笑谈。实际上，托洛茨基同志使用“生产气氛”这个说法所表明思想，正是生产宣传这个概念所表明思想。但正是对工人群众，对工人群众的基层进行生产宣传时，应当避免这一类的说法。如果要说明不应当怎样在群众中进行生产宣传，这个说法倒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衷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的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在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正在把双方统一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我的政治估计也可能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

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灭亡）。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考虑，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你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你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你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更具具体些说吧。季诺维也夫说：“你们在工会中造成分裂，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我早在1920年1月就已经说过和写过提高生产的问题，那时我曾经举修建澡堂作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说：“写了一本小册子，举了个澡堂的例子，真是了不起（第29页），可是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你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第22页）。”

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澡堂的例子，正好是对群众、对“基层”简单明了地说明了工会应该做什么，可是“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却是迷住工人群众的眼睛的沙子，使他们对问题难以理解。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

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 66 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结论**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裁判会的价值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大过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衷主义的规定。

（2）为贯串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所表现的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实事求是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切实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裁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到抽象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读到托洛茨基同志 12 月 30 日对我的反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

我国形势的报告的结论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第 65 页）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是“正中要害的”。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实事求是的、实际的“经济的”争论，即看看谁更好地更成功地分配了实物奖，组织了纪律裁判会，谁更好地更成功地根据 11 月 2 日至 6 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实行了结合：是萨拉托夫面粉业工人呢，还是顿巴斯煤矿工人呢，还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呢，等等。

拿“广泛争论”的好处这个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我曾经反对所谓的“广泛”争论，我过去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工会委员会乃是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本来是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的。我认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集团的政治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缓冲的任务（在这里他们也是用折衷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从“缓冲”的观点上来看，他们正应当全力反对广泛的争论，争取把争论转到工会委员会里去进行。请看一看当时的情形吧。

12月30日，布哈林竟说：“我们宣布了一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工人民主，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领导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广大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45页）这个人还责备过季诺维也夫废话连篇和夸大民主呢！这才是十足的废话连篇和“胡言乱语”，他根本就不懂得形式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丝毫也不高明一些。他谴责道：“列宁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的实质性的争论。”（第65页）他说：“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象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有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第69页）

结果如何呢？从12月25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争论”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但是在一百个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中，对这个争论不感到头痛，不认为这个争论毫无益处（甚至更坏些）的，恐怕连一个也找不到。因为，托洛茨基把党的时间浪费在关于字眼、关于糟糕的提纲的争论上面，并且他还骂委员会里那种正好是**实事求是**的切实的研究是“小圈子的”研究。而这个委员会本来是要研究和检查实际的经验的，以便从这种经验中学习怎样在真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后退**，不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样的“生产气氛”的僵死的经院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结合”来说吧。在12月30日我曾劝告大家对这个问题采取沉默态度。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好**我们本身的实际经

验，而不具备这个条件，关于结合的争论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废话，就会白白地消耗党的力量，使它离开经济工作。托洛茨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或占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我把这个提纲叫做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向我大发脾气。我从记录第四十九页上看到，布哈林很周密详尽地向我证明：“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哑巴的。”（这一页上印的就是这样的话，一字不差！）托洛茨基也发火了，他喊道：

“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做官僚主义；而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就会见诸通告，被大家奉为准则，那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五金部等组织里，都会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兼职工作人员……”（第 68 页）

读过这段话之后，我曾经请米柳亭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把现有的关于结合问题的印好的报告给我送来。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吧，因为光是说空话，既没有材料又没有事实根据，只是凭空捏造意见分歧，制造各种定义和“生产民主”，这样来从事“全党讨论”（布哈林在第四十七页上用的词，这大概也会成为惯用语，不亚于有名的“整刷”），实在是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忍受。

米柳亭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20 年莫斯科版；序言的日期是 1920 年 12 月 19 日）。该报告第十四页上，载有一个表明工人参加管理机关的情况的表格。我现在把这个表格照抄在下面（只包括一部分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

管 理 机 关	总人数	工 名 额	人 百 分 比	专 名 额	家 百 分 比	职 员 及 其 他 名 额	百 分 比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87	107	57.2	22	11.8	58	31.0
总管理处、总局、中央管理局和管理总局的委员会	140	72	51.4	31	22.2	37	26.4
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的工厂管理处	1 143	726	63.5	398	34.8	19	1.7
总 计	1 470	905	61.6	451	30.7	114	7.7

由此可见，就在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一·六，就是说，已经超过半数，而接近三分之二了！这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关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管你是说也好，争论也好，写成纲领也好，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全党讨论”，都是把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间从生产工作方面转移开来，都不过是没有重要内容的政客的空谈。而如果是在委员会里——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在这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写提纲——那我们就可以有成效地从事检查经验的工作，例如，找一二十个人（从一千个“兼职工作人员”中）问一问，把他们的印象和结论同客观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设法得出对于未来的工作的实事求是的、实际的指示：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法和态度，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更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让我也来作些“生产宣传”

吧!)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从头做起,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许多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象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在他12月30日的演说中喊道:“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生产教育呢?有呢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第29页)这样来对待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这就象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师里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有呢还是没有?

甚至就是在十年之后,我们大概还要说:所有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足够的生产教育。这正象在十年之后,所有党、工会和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有足够的军事训练一样。但是生产教育的基础,我们已经奠定了,因为现在已有近千名的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参加了管理机关,管理着企业、管理总局以及更高的机关。“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自己这些老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规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实事求是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实事求是地纠正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

“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规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的整个看法，都正好违反了 this 规则。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和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正好是用自己的错误把党的注意力和力量从实际的“生产”工作方面引到了空洞的、毫无内容的争论上。

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学校”和“机关”

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

由于布哈林同志好在理论上钻研问题，所以他从12月30日的讨论开始(可能还更早些)，就把争论转移到这方面来了。

布哈林同志在12月30日说道：“我认为绝对必要的——在这里被称做‘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东西，其理论实质就在这里——并且在我看来完全无可争辩的，就是无论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第47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在政治和经济的例子上我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在“缓冲”的例子上，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

有倾覆的趋势，那末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衷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的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抽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抽了一点。作为一个“缓冲者”，布哈林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派别性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夸张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了解他自己的这种“缓冲”任务。下面就是明显的例证之一：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乃是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他们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所做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经说，必须撤换工会的领导人员，必须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以前，他甚至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抛弃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据，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第5页）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这句话，是托洛茨基在他11月8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五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12月25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串着我在前面指出

过的那种思想，那种精神。他的“抛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来谈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衷主义的，那末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末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双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要从整刷政策的观点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他干脆就不提它。缓冲者这样起缓冲的作用，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

其次，在同一演说即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演说的第七页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共产主义学校这个方面辩护。”

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布哈林说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同志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不正确或第二个不正确，因为这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第48页）

在布哈林及其“集团”或“派别”的提纲第六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衷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开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他说：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这样，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这样，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46页）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衷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来压纸，可以用来装捉到的蝴蝶。玻璃杯可以作为带有雕刻或图画的艺术品。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末，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末，就是杯子底上

有洞，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学校里只讲形式逻辑，在学校低年级里也只应当讲形式逻辑(但要加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①。)

① 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一切已经是离开“宣传”而转到“行政手段”上面去了。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就目前的问题来说这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个方面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个“方面”。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辩证逻辑是绝对地要求这样做的），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之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对问题的整个提法的方向。布哈林一点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抽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抽一点。这就是折衷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论文）。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末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包括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某乙则说起义是一种艺术。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我就能写出象布哈林的提纲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个“方面”，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个方面”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第二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

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①等等，等等。布哈林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并没有作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集团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错误的，是折衷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12月25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象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做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改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① 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一定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必然的现象（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整的统计，约有九百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十倍、甚至一百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的根本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的将来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六百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象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的会员（六百万减九万等于五百九十一万，等于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五）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30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责备他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实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他说：“……季诺维也夫过分从宣传的观点去处理每个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而忘记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第27页）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人员的身分去处理（确切些说，是很粗糙地处理）的，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者的身分去处理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演说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笨拙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

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分在工会委员会里进行实事求是的“经济的”工作，发表口头上和文字上的言论，那他一定已经给工作带来（并且一定会继续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种趋势”，对待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这象是一根红线，贯串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中所有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握有的材料，要对这些问题作正确的处理，就只能是以宣传者的身分。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影响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在这一领域内，特殊而主要的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五条是这样说的）¹²⁹。

对这个问题提法不正确，对这种相互关系不了解，就象是一根红线，贯串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看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解决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九百件“结合”中的九十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

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九十件事，跟重点进行的统计调查材料，跟工农检察院及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检察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末这样的行政人员的态度就会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谁应当被撤职、谁应当被调职、谁应当被任命的问题上，集中在对“领导层”现时应当提出些什么要求的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印的布哈林1月3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演说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正是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折衷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来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掌握着行政管理，就是说，管理着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拒绝而且也不能拒绝实行“整刷”，即拒绝采用撤职、调职、任命、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里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争论着的，全党现在争论着的，并不是“实际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4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讲来，要象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衷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

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争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个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引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末他们的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当前情况下是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衷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尽管玻璃杯没有底，但玻璃杯还是一种饮具。

结 论

现在我还要再简单地谈几点，要是不谈，可能会引起一些

误解。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第六条里，重述了俄共党纲经济部分的第五条，即关于工会问题的一条。再往下两页，在提纲的第八条里，托洛茨基同志宣称：

……“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工会〈这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轻率的夸大，因为工会虽然失去了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但是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来说，从采取这一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以及从其他等方面来说，工会却远远没有失去——而且，很遗憾，在很多年之内都不会失去——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提纲第9页第8条）

这又是一种可能发展成重大错误的轻率的夸大。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按照我们党纲原来的次序，逐步地来探究其中所包含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论点：

（1）“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不是一切机构〉应当首先〈而不是仅仅〉依靠工会”。（2）“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如何摆脱呢？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进行教育及其他各种影响的过程中〉，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生产联合”。

这是党纲讲到工会的那一条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一下子就提出了很“严格的”和需要将来进行长期的工作才能实现的“条件”。往下又说：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看，这里用词是很慎重的：只是参加者），同时，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请注意：应当做到切实集中的，不是各个工业部门的管理，也不是工业的管理，而是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并且是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这是一个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在全人口中和国民经济中已经少于半数的时候，才算是实现了）。……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即逐步实现上述的各种条件）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广泛地吸引后者（即群众，即人口的大多数）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同时，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也是同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的官僚化作斗争的主要办法，并且提供了对生产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最后一句里的“参加经济管理”，这又是很慎重的词句；这里又指出了吸收广大群众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办法；末了也是一个十分慎重的指示：“提供了”实行“人民的”，即工农的而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监督”的“可能性”。

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持这种错误，把它放到纲领性的提纲中去，那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

附带说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还这样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提纲第7页第6条）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能象托洛茨基在争论中那样，用指出工会“自己”承认这个

事实的办法来证明这一点。对党来说，这并不是最后的决定。一般说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大量事实进行极其严肃的客观的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就假定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也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离得更远了？是象托洛茨基所想的那样，由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不执行新的任务和方法”呢，还是由于“我们”“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阻止和纠正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呢？

说到这里，应当提一下布哈林同志12月30日对我们提出的责备（昨天，1月24日，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争论中，托洛茨基也重述了这一点）。他责备我们“离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12月30日争论记录第46页）。据说，列宁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主张劳动军事化，而讥笑别人拿民主当借口，可是现在，他却“变卦”了。托洛茨基同志在他12月30日的结束语中，更给这种责备可以说是撒上了一把胡椒面。他说：“列宁是估计到了工会里具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正在形成为……一个派别这一事实的”（第65页）；列宁是“从权术的观点”（第69页）来处理问题的；是“在党内派别中间耍手腕”（第70页），等等。托洛茨基同志这样来叙述事情，就他来说，自然是很舒服的，而在我听来，则比不舒服还要坏些。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就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和克利斯廷斯基都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早在7月间（1920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第25页）。8月间，中央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扩大民主的。9月间，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12月间，

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到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这就是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党和整个工农共和国，都认为有必要把官僚主义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离开”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呢？不能。这里根本就不存在离开的问题。关于劳动军事化等问题的决定，是无可争辩的。我毫无必要收回我对那些拿民主当借口来反对这些决定的人的讥笑。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将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是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我们将极其注意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对于任何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无论谁把它指出来，我们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纠正。

最后，对重点制和平均制这个小问题，再谈一点意见。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我曾经说过，托洛茨基同志提纲第四十一条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照他说来，应当是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而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我曾经答复说，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托洛茨基同志责备我这一点，说我“过分健忘”，说我用“恐吓手段”（第67页和第68页），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有说我要手腕、弄权术等等。托洛茨基对我的平均路线作了让步，而我还在向托洛茨基进攻。

实际上，关心党的问题的读者，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有确切的党的文件可查的，那就是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第四点，以及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提纲第四十一条。无论我怎样“健忘”，无论托洛茨基同志的记忆力多么好，事实总是事实：提纲第四十一条包含有理论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在中央11月9日的决议中是没有的。这个决议说：“中央认为，在经济计划的执行上，有保留重点制原则的必要，同时也完全赞同最近一次（九月）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种工人和相应的工会的地位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过

渡到平均制，并且不断加强一般工会的组织。”显然，这是针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而言的，这个决议的确切涵义是曲解不了的。重点制并没有废除。对于重点的（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企业、工会、托拉斯和机关部门，仍然要优先照顾；但同时，“平均路线”（不是“列宁同志”所坚持的，而是党代表会议和中央，也就是说，全党所批准的）又明白地要求：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过渡到平均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中央十一月全会的这一决议，这从中央十二月的（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通过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决议再次提到了“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提纲第四十一条的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它说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这从经济上来说是无稽可笑的，因为这样就使消费和生产割裂开了。我决没有说过而且也不能说出这一类的话。一个工厂不需要，那就把它关闭；所有不是绝对需要的工厂都要关闭。在绝对需要的工厂当中，优先照顾重点。例如，优先照顾运输业。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了使这种照顾不至于过分，并且鉴于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顾已经过分，党（而不是列宁）才指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过渡到平均制。如果托洛茨基在十一月全会已经做了确切的、理论上正确的决议之后，还要发表关于“两种趋势”的派别性小册子，还要在提纲第四十一条中提出他自己的、从经济上来说是错误的提法，那就只好怨他自己了。

今天是1月25日，自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他的派别言论以来，刚好过了一个月。党因为这种形式不恰当和实质不正确的言论，转移了自己对具体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的注意，党为了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而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古语说得好：“弊中有利，祸中有福。”

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们真正的价值。

我们被迫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诉诸全党。争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本质和范围。这样，谣言和诬蔑就破产了。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然而现在是能够而且应当更快地更容易地把它治好的。

党在学习不夸大意见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对托姆斯基同志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我常常说，我很清楚，只有象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季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影响。”（12月30日争论记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

在争论期间，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即所谓“工人反对派”¹³⁰，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了工团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离开党、离开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这种倾向必须特别注

意，必须特别加以讨论，必须特别注意向大家宣传和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以及这种错误有什么危害。布哈林同志曾经讲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即工会参加管理机关的人选）这种工团主义的话，今天又在《真理报》上为自己的话作了很笨拙的并且显然是错误的辩解。你们看见了吧，他在其他几点上又说到了党的作用！当然罗！否则的话，这就等于退党了。否则的话，这就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纠正和易于纠正的错误了。如果说到“必须接受的人选”，而不立即补充说，这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末这就是工团主义的倾向，这就同共产主义不相容了，就同俄共党纲不相容了。而如果补充说：“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结果就会是用扩大工人权利的幻想去欺骗非党工人，这样在实际上丝毫不会改变现状。布哈林同志越是为他那在理论上显然错误、在政治上是一种欺骗的离开共产主义的倾向辩护，这种固执的结果也就越是可悲。要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辩护，总是不会成功的。党并不反对任何扩大非党工人权利的措施，但是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什么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什么办法是不能采取的。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争论中，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虽然得到了在这一工会里特别有威望的基谢廖夫同志的支持，还是遭到了失败：一百三十七票赞成我们的纲领，六十二票赞成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八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应当治好而且也一定能够治好的。

一个月来，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许多省城已经表明，党响应了争论，并且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在“上层”、“地方领导”、委员会和机关里显然有过动摇的话，那末普通党员群众、工人党员群众的多数而且是绝对多数，却是坚决反对这条错误路线的。

加米涅夫同志告诉我说，1月23日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的争论会上，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声明收回他本人的纲领，而在新的纲领上同布哈林集团联合起来。可惜，无论1月23日或24日，当托洛茨基同志在矿工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我时，我都没有听到他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又改变了他的主张和纲领，或者这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1月23日的声明表明，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仅仅反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少数省城的意见，就已经坚决、果断、迅速而毫不动摇地一下子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纠正过来了。

党的敌人只落了一场空喜欢。他们想利用党内有时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来危害党、危害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得逞。

1921年1月25日

1921年1月莫斯科工、农和红军
代表苏维埃报刊部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56—98页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

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议论令人产生一种难堪的印象。请看看列·克里茨曼在《经济生活报》¹³¹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吧(第一篇发表于1920年12月14日,第二篇——12月23日,第三篇——2月9日,第四篇——2月16日,第五篇——2月20日)。十足的空谈。文人的清谈。根本不愿意估计这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就,也不愿意研究这种成就。一味议论——在五篇冗长的文章里!——应该怎样着手研究,却不去研究具体材料和事实。

再请看看米柳亭的提纲(2月19日《经济生活报》)和拉林的提纲(2月20日《经济生活报》),仔细听听“负责”同志的言论吧。根本缺点也同克里茨曼一样。枯燥到极点的烦琐哲学,直到空谈什么链式联系的规律等等;这种烦琐哲学有时象文人的,有时象官僚的,这里面一点不触及实际工作。

更坏的是,人们竟用傲慢的官僚主义冷淡态度对待那种已经完成的和必须继续做下去的实际工作。三番两次毫无意思地“编造提纲”或凭空想出一些口号和草案来,却不仔细用心地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

关于统一经济计划问题所写的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¹¹³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¹⁰⁹提出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在1920年12月出版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分发给代表

们的。在这部著作里叙述了我们共和国的优秀学者受国家最高机关委托所拟定的——当然只是大致拟定——统一的经济计划。而同大官们的不学无术的自负和同共产党员著作家们的知识分子的自负作斗争，就得从极平常的事情做起，即从简略地叙述这部著作的写作经过及其内容和意义做起。

1920年2月2—7日，即在一年多以前，召开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电气化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有如下一段话：

……“除必须解决整顿运输业、消除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消灭传染病以及建立有纪律的劳动军⁴²等方面最迫切最紧急最不容拖延的头等重要任务以外，现今苏维埃俄国初次有可能着手进行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用科学方法制定并彻底实行国家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电气化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估计到电气化对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重大意义，特决定：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

看来很明白了吧？“用科学方法制定国家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难道这些话的意思，我们最高政权机关的这项决议的意思，还有什么不能了解的地方吗？如果那些在“专家”面前以自己的共产主义自夸的著作家和大官们不知道这项决议，那末我们只好提醒他们说：对我们自己的法律无知，并不是论据。

为了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1920年2月21日批准在电力工业部下设电气化委员会，后来国防委员会¹¹²又批准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组织条例，关于该委员会的人选，则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协商确定和批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在1920年4月24日就已出版了它所创办的《公报》第一期，上面登载有极

详细的工作计划,开列有负责人员、学者、工程师、农艺师和统计学家的名单,这些人员参加各种分委员会,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担负各种明确规定的任务。单单这种工作的项目及其负责人员的名单,就在第一期《公报》上占十页篇幅。凡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所知道的优秀人材,都被吸收来参加这项工作。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就是上述那部浩繁的——并且是卓越的——科学著作。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有一百八十多位专家。他们送交“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作品计有二百多篇。首先,那里载有这些作品的总览(该书的第一部分,计占二百多页篇幅):(一)电气化和国家经济计划;(二)燃料供应(附有详细制定的最近十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燃料预算”,并且估计到这方面所需的工人人数);(三)水力;(四)农业;(五)运输业;(六)工业。

这个计划预定大约在十年内完成,计划上载有工人人数和动力数量(单位千匹马力)。诚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初步的、粗糙的甚至含有错误的计划,只是一个“大略的”计划,但它是一个真正科学的计划。那里有专家们关于一切基本问题所作的确切计算。那里有他们关于各个工业部门的计算。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那里有关于皮革生产额的计算,有每人平均需要两双皮鞋(三亿双)的计算,等等。总之,那里既有电气化的物质资料平衡表,又有电气化的财政收支(按金卢布计算)平衡表(约需三亿七千万个工作日,多少桶水泥,多少块砖,多少普特铁、铜等等,透平发电机总功率多大等等)。这个平衡表预定,在十年内加工工业的产量增加(“根据很粗糙的估计”)百分之八十,采掘工业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八十至一百。黄金平衡表中的赤字(正数一百一十亿,负数一百七十亿,

总结起来约六十亿赤字)“可以通过租让和信贷业务来弥补”。

计划上指明了第一批区域电站(二十处用蒸汽发电,十处用水力发电)的所在地点,并且详细说明了每处电站的经济意义。

在总览之后,该书还载有(分别标明页码)下列各个地区的工程大纲:北部地区,中部工业区(这两个区的工程大纲规定得特别明白、详尽而确切,所根据的是极丰富的科学材料),南部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区,高加索区(把高加索当做整体,因为预计各共和国将订立经济协定),西伯利亚西部以及土尔克斯坦。对于每一个地区,不仅计算到第一批电站,而且有所谓“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甲号计划”,即最合理最节约地使用现有电站的计划。还可以举一个不大的例子:计划上规定在北部地区(即彼得格勒区)把彼得格勒所有电站联合起来,可以节省电力,约近半数的电力可以(北部地区工程大纲第69页)输送到北部浮运木材的地点,即穆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去用。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木材的采伐和向国外浮运,就有可能“在最近时期每年提供五亿卢布的外汇收入”。

“每年从出卖北部木材所赚得的钱,可能在最近几年内就达到我国黄金储备额那样大的数目”(同上,第70页),这里当然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空谈计划转到研究并且实际施行由学者们制定的这个计划!

还必须讲到一点,就是那里关于许多问题(当然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开始制定年度规划,即不仅是一般计划,而且还计算到,从1921年起至1930年止,每年有多少电站可以开始发电,以及现有的电站可以扩大到何种程度(这里也要有上面所说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在我国知识分子文人习气和大官的官僚主义习气盛行的环境中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为了估计“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所完成的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全部价值，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情形。德国有一位学者巴洛德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编制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德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计划。这个计划在资本主义德国不免要悬在空中，始终是一种文人清谈和单独一个人的工作。而我们则提出了全国性的任务，动员了数百个专家，在十个月内（当然不是象最初预定的那样在两个月内）制定了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我们理应以这部著作自豪；只是必须懂得应该怎样去利用这部著作，而现在我们正是必须对不懂得这一点的现象进行斗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赞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特别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为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所进行的工作……认为这个计划是伟大经济创举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因而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等完成这个计划的制定工作，并批准这个计划，而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完成……责成……采取各种措施来广泛宣传这个计划……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¹³²等等。

最明显地表明我们机关中特别是上层机关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毛病和知识分子毛病的，就是莫斯科某些人对这个决议所持的态度，他们企图胡乱“解释”这个决议，甚至把它推开不理。作家们不宣传这个已经制定的计划，却一味起草提纲，空洞地谈论怎样着手制定计划！大官们纯粹官僚式地强调必须“批准”计划，他们不把“批准”了解为提出某些具体任务（例如必须建设什么什么东西，在什么什么时候建设，向国外购买什么什么东西等等），而是十分混乱地以为这是要制定一个新的计划！结果弄得糊涂透顶，说什么在建设新东西以前至少先得把旧东西恢复一部分呀；说什么电

气化很象电气幻想呀；说什么为什么不实行瓦斯化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中都是资产阶级专家而很少有共产党员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应当提供的是鉴定人员而不是总计划委员会呀，如此等等。

危险的正是这种意见纷纭，因为这表明人们不善于工作，表明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凌驾于真正事业之上。嘲笑计划含有幻想性质，提出实行瓦斯化的问题等等，正是暴露了不学无术的自负。随随便便地纠正数百个优秀专家的工作，用一些庸俗的笑话来回避问题，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自傲，——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吗？

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该学会系统地从事工作，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

当然，关于“计划”这个东西本来可以无止境地谈论和争论下去。然而我们决不当容许对“原则”（即编制计划的“原则”）作空泛的议论和争论，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着手研究现有的这个唯一科学的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当然，“批准”和“不予批准”之权始终操在某个或某些大官手里。如果正确地了解这种权限，并且正确地解释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批准它赞同的以及它认为应当竭力广泛宣传的这个计划的决议，那就应当把“批准”一词了解为提出一些定货单和发布一些命令：什么东西要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东西应该开始建设，什么材料应该收集和运到某地等等。如果官僚主义地解释问题，那末“批准”就是意味着大官们的刚愎自用，官场拖拉习气，玩弄检查委员会之类的把戏，一句话，就是用纯粹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

我们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吧。必须特别设法把科学

的电气化计划与日常的实践计划及其具体实现办法联系起来。这当然是完全不容争辩的。究竟怎样联系呢？为要知道这一点，经济学家、著作家和统计学家就不应当空谈一般计划，而应当详细研究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我们在这种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以及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若不进行这种研究，我们就会盲目行动。只要进行这种研究，同时研究实际经验，剩下的行政事务问题就完全是小问题了。我们的计划委员会多极了。要进行合并，应当从甲某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两个委员会来，再从乙某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一个委员会来，或是相反。再把这几个委员会和总计划委员会下面的某个分委员会合并起来。显然，这正是一种行政事务，如此而已。周密地加以检验，把优秀的挑选出来，——这件事情是容易得不便多说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的空想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这里有过并且现在还有日常的粮食计划和燃料计划。我们在这两种计划中都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是不容有两种意见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决不会去编制毫无意义的提纲，而会去细心研究事实、数字和材料，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且说明：我们在某某地方犯了错误，要用某种方法来改正。实事求是的行政人员一定会根据这种研究，提出建议或自行采取措施，来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汇报制度，改组机构等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看到过用这种或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统一的经济计划的事实。

毛病就在于，人们不正确地处理共产党员对待专家的态度问题和行政人员对待学者及著作家的态度问题。在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上，也象其他任何问题一样，有某些事情并且始终会有某些新的事情只需要共产党员来解决，或只需要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这是不容争辩的。但这完全是抽象的说法。目前在我们这里对这个问题持错误态度的正是共产党员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人员，他们不能了解，这里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学习，少玩弄些行政手段。除了已经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计划以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应该根据仔细研究过的实际经验来补充、发展、修改和实行这个计划。相反的意见就象党纲所说的那样，只是“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那种认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除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以外还可能有另外一个总计划委员会的意见，也是一种不学无术的自负的表现，虽然这并不是说对于该委员会的成员作局部的切实的调整不会带来益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只有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工作，才能在改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总计划方面做出某种重大的事情，否则就是玩弄行政手段，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刚愎自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内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少发号施令，确切些说完全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正如俄共党纲所说的那样，“他们多半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①）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当的科学成果和材料为根据，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如此等等。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向以指导，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末这样的共产党员往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767—768页。——编者注

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

至于那些没有参加“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他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帮助制定和实现统一的经济计划。如果他们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或著作家，那末他们首先就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才在详细研究相当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改正错误、改进工作的意见。研究是学者的事情。既然我们这里早已不是谈一般原则，而是谈实际经验，那末，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多知道些事实，少来些假冒共产主义原则性的争论吧。

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共产党员是行政人员，那末他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热中于发号施令，首先要考虑到科学界已经做出来的东西，首先要问一问事实可不可靠，首先要研究（通过报告、报刊、会议等等）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来纠正已经在进行的工作。少用些齐特·齐梯奇式的¹³³手段（“我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多研究些我们的实际错误吧。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是印证了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我们已经把俄国说服了，我们已经把俄国从剥削者手中夺取过来交给劳动者了，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了，现在我们

应该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和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和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摆些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架子，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1921年2月21日

载于1921年2月22日

《真理报》第39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根据
列宁修订过的校样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127—136页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¹³⁴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1. 代表大会提醒全体党员注意：在目前许多情况正在使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加强起来的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互相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2. 但是，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别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派别和规定自己的集团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征兆，例如在莫斯科（1920年11月）和哈尔科夫这两次党代表会议上，已经在所谓“工人反对派”¹³⁰方面，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¹³⁵方面表现出来。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是个别派别的代表人物极力想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离开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¹³⁶的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

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³和所有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运用了仿佛是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起义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成最左的共产主义者。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孟什维克利用了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某些派别活动的萌芽来实际上鼓舞和支持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同时在口头上却表示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不过是耍苏维埃政权作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3. 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害处和危险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象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在宣传中还应当阐明过去革命的经验，当时反革命势力也总是支持那些同极端革命的政党最接近的这种政党的反对派，以求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从而为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势力以后取得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4. 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有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延迟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

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的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总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在某种“纲领”等等的基础上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¹³⁷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

5. 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已有专门的决议加以分析),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由于碰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实现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一方面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各种新的办法,大力为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主动精神,揭发、暴露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等等而斗争。

6. 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7.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

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末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¹³⁸

第一次载于1921年莫斯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229—232页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¹³⁴关于 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1. 最近几个月来，在党内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清洗和健全党的队伍。

2. 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然而主要地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在目前，灾荒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大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资料来源，这种自发势力就显得特别厉害，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3. 所谓的“工人反对派”¹³⁰的提纲和其他文件，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最完整和形式上最完备的表现（或者说：是这种倾向的最完整等等的表现之一）。例如，他们的下述这条提纲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他们的这种主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主张，其基本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

同一切半无产阶级革命和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

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反了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

第二、上述提纲中所表现出来的专门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中正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不正确地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工人反对派”的全部观点正是浸透着这种倾向的。

4.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上述这个派别以及其他个人想援引俄共党纲经济部分有关工会作用的第五条来维护自己的错误观点的一切企图，同样也是根本不正确的。这一条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吸引”这些群众来“直

接参加经济管理”。

俄共党纲的同一条指出，使“工会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包括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这个过程是工会“应当做到”的情况的先决条件。

最后，俄共党纲的同一条还着重指出，“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¹²⁹。

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考虑参加管理的这种实际经验，不严格地根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纠正的错误的教训去继续发展这一经验，却直接提出召集“选举”经济管理机关的“各级生产者代表大会或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口号。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和纯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便完全被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继续进行并且改进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建设新型经济的实际工作，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来破坏这种工作，而这样做只能促使资产阶级反革命获得胜利。

5. 除了理论上的错误和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所采取的根本错误的态度之外，俄共代表大会认为，上述的派别及其他类似的派别和个人的观点是很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着的直接的政治危险。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争、破坏、流行病、灾荒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中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情绪。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

力量 and 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只能是促成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是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6.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上述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表现，并认为：

第一、必须同这种思想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

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种思想是同俄共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书刊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们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第一次载于1921年莫斯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232—235页

在全俄运输工人 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21年3月27日)

同志们，首先让我感谢你们对我表示的敬意，同样也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致敬。(热烈鼓掌)在没有讲到直接有关你们代表大会的任务、你们的工作和整个苏维埃政权对你们代表大会的期望这个题目之前，让我先从略微离开本题的地方讲起吧。

刚才我从你们会场上走过时，看见这样一个标语：“工农统治永远存在”。不错，这个标语不是挂在通常的地方，而是放在会场角上，——也许，是谁看出这个标语有毛病，把它移到一边去了，——我读了这个奇怪的标语，便想到在我们这里，怎么对这种最起码最基本的东西也存在着误解和不正确的认识。老实说，如果工农统治真的永远存在，那末也就永远不会有社会主义了，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所以当我想到，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三年半以后，怎么我们这里还会有(虽然向旁边移开了一些)这样奇怪的标语的时候，同时我也就想到，对于在我国最流行最常用的那些口号，大概也还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举例来说，我们大家都唱着：现在我们在进行最后的斗争，——这也就是我们到处重复的一个最流行的口号。可是如果要问问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你们现在进行的斗争——不是最后的斗争(说是最后的

当然多少有点过火),而是我们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究竟是反对谁,我担心,恐怕只有很少数人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很少数人能明确了解,我们现在进行的我们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究竟是反对什么或者反对谁。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春季里,由于发生了引起广大工农群众注意的政治事件¹³⁶,就必须重新研究一下,或者至少要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现在这个春季里,也就是说在目前,我们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究竟是反对谁。我现在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为了解这个问题,我以为首先要再次尽量精确尽量清醒地观察一下各种互相对立的力量,这些力量的斗争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命运,而且一般说来,也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即推翻俄国资本和其他各国资本的这一革命的进程和发展。这些力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们是怎样互相对立地集结起来的呢?它们目前是怎样部署的呢?每一次比较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每一次新的、哪怕是不很大的政治事态的转折,都势必使每一个有头脑的工人和农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究竟有哪些力量,它们正在怎样集结起来。只有善于正确地、完全清醒地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来估计这些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我们的一般政策以及我们最近的任务做出正确的结论。所以,现在我就来扼要地讲讲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总的说来有三种。先从我们最亲近的一种力量即从无产阶级讲起。这是第一种力量。这是第一个特别的阶级。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们本身就生活在这个阶级中间。目前这个阶级的情形怎样呢?在苏维埃共和国中,它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三年半以前夺取了政权,在这个期间内实现了统治,实行了专政,并且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比其他一切阶级都遭到了更

多的苦痛、灾难和贫困。这三年半的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政权所进行的抵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殊死的国内战争中度过的——对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意味着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困苦和牺牲。结果发生了奇怪的事情。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在意识到它是独自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你们都清楚地知道，爱说这种空话的人很多，甚至多得不得了，可是无论如何，这总不是无产阶级里面的人，因为无产者都了解，并且在宪法即共和国的基本法中写道，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阶级懂得它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独自夺取政权的。它实现这一政权时，也同其他任何专政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即以最大的坚定性，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同时，在三年半来的政治统治期间，它所遭到的灾难、困苦、饥饿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是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从来没有遭到过的。因此，我们看到，在经历了这种超乎寻常的紧张之后，这个阶级自然也就显得特别疲惫，特别困乏了。

试问，在一个无产阶级和其他居民比起来只占极少的国家里，在一个被人用武力同无产阶级人数更多、更有觉悟、更有纪律、更有组织的国家人为地隔离开来的落后国家里，并且是处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反对和进攻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是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权的呢？怎么能够维持三年半之久呢？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支持的呢？我们知道，这种支持在国内来自农民群众。我一会儿就要讲到这第二种力量，但先要把第一种力量分析完。我已经讲过，而且你们中间凡是在工厂、机务段和修配厂里观察过自己最

亲近的同志们的生活的都知道，这个阶级的贫困从来没有象在它的专政时代这样严重，这样厉害。我们国家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疲乏，这样困惫。究竟是什么给了这个阶级以精神力量来熬过这种困苦的呢？显然，毫无疑问，它一定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克服这种物质困苦的精神力量。大家知道，关于精神力量，关于精神援助的问题，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一切都可以了解为精神力量，一切都可以算做精神力量。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避免把一种不确定的或虚构的东西硬算做精神力量，我就这样问自己：能不能精确地确定，究竟是什么东西给了无产阶级以精神力量来熬过那种因自己的政治统治而遭到的空前的物质困苦呢？我想，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是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确切回答的。请大家自己想想看：假如站在苏维埃共和国旁边的是些落后国家，而不是先进国家，那末苏维埃共和国能不能经受住它在这三年半内所经受的一切，并且如此有成效地捍卫住自己，击退世界各国资本家所支持的白卫分子的进攻呢？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回答了。

你们知道，在这三年半中，同我们作战的是全世界的所有最富强的国家。你们都参加过战争，你们都清楚地知道，反对我们而援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那种军事力量，无疑要比我们的军事力量大许多倍，大很多很多。你们也都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国家的实力，现在也比我们的实力大得多。它们本来是打定主意要征服苏维埃政权的，结果却没有能够征服，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可以很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会这样，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支持我们。即使是在这些无产阶级显然处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欧洲各国，他们有另外的名称）影响下的时候，他

们也不支持对我国的进攻。结果，在领导者被迫向群众让步的情形下，工人们破坏了这次战争。并不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很小，我们所以获得胜利，是由于列强不能调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反对我们。先进国家的工人竟对战争的进程起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违反他们的愿望，战争就无法进行下去，他们终于用消极和半消极的抵抗，破坏了这次反对我们的战争。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确切说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精神力量，坚持了三年半之久，并且取得了胜利。俄国工人的精神力量就在于，他们知道、感觉到和体会到，在这次斗争中，欧洲所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帮助和支援他们的。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战胜国和战败国，在这些文化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里，社会党发生了分裂，这是最近时期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它向我们表明欧洲工人运动是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在一切国家中，这一年来的重大事件，就是从被击溃了的、遭到覆灭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用俄语说，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另外组成了依靠工人阶级中一切先进力量支持的共产党。当然，毫无疑问，如果进攻我们的不是先进国家，而是没有这样强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落后国家，那末我们就不仅不能支持三年半，甚至连三个半月也支持不了。尽管帝国主义者用千百万份书刊散布反苏维埃政权的谎言，尽管这些“工人领袖”，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破坏工人拥护我们的斗争，先进国家的工人还是支援了我们。如果我国无产阶级不是依靠他们的同情，能不能具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呢？因人数少而力量薄弱，因灾难和贫困而疲惫不堪的我国无产阶级在这种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它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它获得了精神力量因而变得强大有力。

这就是第一种力量。

第二种力量，就是处在发达的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小业主，也就是在俄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主要是小业主和小农户。农民中十分之九是这样的农民，也只能是这样的农民。他们并不经常参加劳资间的尖锐斗争，他们没有受过锻炼，经济和政治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但不能彼此接近，反而彼此分开，彼此隔离，使他们变成千百万单个的小业主。这些事实你们大家都是熟悉的。不经过很多很多年，任何集体制、集体农庄、公社都是不能改变这种现象的。这种力量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毅力和奋发精神，空前迅速地打倒了它右面的敌人地主阶级，连根铲除了这个阶级，用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消灭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可是，这个力量愈快地消灭地主统治，愈快地在全民公有的土地上经营自己的经济，愈坚决地惩治少数的富农，它本身也就愈快地变为小业主。大家知道，俄国农村在这个时期平均化了。拥有大量耕地的人和没有耕地的人的数量减少了，中农增多了。在这期间，我国农村变得更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了。这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推翻和驱逐之后，这个阶级便成为唯一能够和无产阶级相对峙的阶级。因此，在标语上写着“工农统治永远存在”是很荒谬的。

你们知道，从政治情绪来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在革命中，我们在国内每一个地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乌克兰都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到处的结论却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³和孟什维克长期地控制这种力量，——在克伦斯基的帮助下，以及在高尔察克时期，在萨马라의立宪会议时期，在孟什维克马依斯基在高尔察克或其前任那里当部长的时候以及其他时候，都是这样。这种力量动摇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之间。究竟为什

么这个占大多数的力量不能自己领导自己呢？因为这些群众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他们本身不能进行联合，不能实行团结。凡是不听信“全民投票”、立宪会议及诸如此类“民主”的空话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是很清楚的；在世界各国，这种“民主”愚弄人民已经有几百年，而在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玩弄这种“民主”也有几百个星期，但是他们“每一回都在这儿”遭到了破产。（鼓掌）我们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说一百五十年来的一切革命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政治、经济和历史都在驳斥他们。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指明，既然小业主是生产资料和土地的私有者，从他们的交换中就必然会产生出资本，同时跟资本一起，也就会产生出劳资间的矛盾。资本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全世界到处都表明了规律，谁要是不愿意欺骗自己，谁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

这些基本经济事实也就说明，为什么这种力量不能独立地表现自己，为什么在一切革命的历史中，要做到这一点的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在无产阶级还不能领导革命之前，这种力量总是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过去一切革命中的情形都是如此，俄国人当然也不是圣人，假如他们硬想超凡成仙，那除了引人发笑以外，决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言而喻，历史对我们也同对别人一样。在我们大家看来，这一切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当时，拥护政府的、有智慧的、有学识的、在政治和管理国家方面经验丰富的、指导政治路线的人物，比布尔什维克所有的要多

一百倍。如果再加上一切向我们怠工、但是对依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克伦斯基政府却不怠工的官吏，那末这些人就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毕竟还是遭到了破产。可见这里有些原因，这些原因胜过了知识分子力量的巨大优势，尽管他们早在自己取得政权以前几十年就已经习惯于管理国家、已经精通这种艺术了。在乌克兰、顿河区域和库班也有过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经验，结果也都是一样。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第二种力量的经济和政治规律就是这样：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固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走这条道路可以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或者受资本家领导，就象在各先进民主共和国、甚至象在美国那样。美国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止无代价分给土地的做法（凡是移来的人，每人无代价地分给六十俄亩土地；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条件了！），而在那里，这种做法仍旧是导致资本的完全统治。

这就是第二种力量。

在我国，这第二种力量不断地动摇着，它是特别疲乏的。它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而最近几年来它的境况更加困难了：年成不好，在牲畜病死、饲料不足的条件下还要执行余粮收集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这第二种力量，即农民群众，就感到绝望。虽然消灭地主已经有三年半之久，而且改善自己的生活是很必要的，但是他们却不可能考虑这一点。遣散的军队得不到妥善地运用自己劳动的机会。于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力量就转化为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用愤激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要求。

第三种力量，大家都知道，就是地主和资本家。现在在我国表面上看不见这一力量。可是，最近几个星期内的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即喀琅施塔得事件，象闪电一样比任何东西都更清楚地照见了事物的真相。

现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内没有白卫分子。在欧洲，俄国的亡命者共达七十万人。这就是逃跑了的资本家和大批适应不了苏维埃政权的职员。我们现在看不见这第三种力量，它跑到外国去了，但是它还活着，并且同全世界资本家勾结起来进行活动，这些资本家支持它，就象支持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弗兰格尔一样，既在财政上援助，也用其他方法援助，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国际联系。每个人都记得这些人。近来，你们当然注意到了报纸上从白卫分子刊物中摘录来的许多说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材料。最近，在巴黎出版报纸的布尔采夫描述过这次事件，米留可夫也对这次事件作了评论，——当然，你们大家都读过这些材料。为什么我们的报纸很注意这一点呢？这样做对不对呢？是对的。因为应当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敌人。当敌人已经到了外国的时候，自然就不能很清楚地看见他了。但是，看吧，——他走得并不远，最多不过几千俄里，他走了这么一段路，然后就隐藏起来。这个敌人并没有受伤，他还活着，等待着。所以要密切注视他，而且这些人并不仅仅是难民。不，他们是全世界资本的直接助手，是由这资本豢养着、同这资本一起活动的人。

当然，你们大家都注意到了，同国外出版的白卫分子报纸的摘录一起，我们还发表了法英报纸上的一些材料。因为它们是一个合唱团，一个乐队。不错，在这个乐队里并没有一个按乐谱来指挥演出的指挥。在那里指挥的是国际资本，它用来指挥的东西不象指挥棒那样明显。但他们总归是一个乐队，这是你们从任何摘录的材料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认为，如果口号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那他们是同意的。而米留可夫特别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仔细地研究了历史，通过切身体验学习俄国历史，因而温故知新。他用二十个月的自修心得充实了自己

二十年来的博学研究。他声明说：如果口号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那我也赞成这个口号。这种变动是否会稍微右倾，或者稍微左倾，即倾向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外，在巴黎，这是看不出来的。那里看不见喀琅施塔得的实际情形，可是他说，“君主派先生们，不要着急，不要用你们关于这一点的喧嚷来妨碍事情吧”。而他声明说，如果这种变动是左倾的，那他就决心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布尔什维克。

这便是米留可夫所写的东西，而这是绝对正确的。他从俄国历史和地主资本家那里学会了一点东西，他断定喀琅施塔得事件反正是力求建立一种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稍微右倾一些，也就是稍微有些自由贸易，稍微带点立宪会议。试听听任何一个孟什维克的话吧，也许，甚至不出这会场的门，你们就可以听见这一切。假如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口号是稍微左倾的——有那些因贫困、战争、军队复员而产生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苏维埃政权，——那末为什么米留可夫拥护这样的政权呢？因为他知道，事情只能是或者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或者倾向资本家方面。

政权是不会以别的方式存在的。虽然我们进行的不是最后的斗争，而是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但要是问究竟我们今天是同谁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那末唯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同我们自己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斗争。（鼓掌）至于说到地主和资本家，那我们在第一次战役中已经把他们打败了，但这仅仅是第一次战役，而第二次战役将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现代资本主义，即令它再强一百倍，也不能发动战争来反对我们，因为在那里，在各先进国家里，工人在昨天已经破坏了它所掀起的战争，今天还会更顺利地更有把握地来破坏它想掀起的战争；因为在那里，战争的恶果正在日益严重地扩展开来。至于我们家里的小资产阶

级自发势力，虽然我们已战胜了他们，可是他们还会表现自己，地主和资本家们，特别是那些象米留可夫这样比较聪明的人，也是估计到这一点的，他向君主派说：你们坐在那里不要动，不要作声，不然你们就只会巩固苏维埃政权。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后退了。所以后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倒退回去。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一切其他革命中（不过范围比较小），都有过这样的情形。显然，大家都学会了这一课。我国的白卫分子潜逃到了外国，他们走了两三昼夜的路，就坐下来，在那里窥伺时机，他们得到了西欧资本的支持和援助。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和职责，也就很明白了。

在疲倦困惫的基础上，产生着一定的情绪，有时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在革命分子中，这种情绪和绝望总是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遭到危机，因为最近几年来，它的处境很困难，纵然没有象1919年的无产阶级那样困难，总还是困难的。农民曾经不得不去挽救国家，无报酬地缴纳余粮，但是它现在已经经受不住这样的重担，所以在农民中就产生了颓丧和动摇不定的情绪，而我们的敌人——资本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说：一有动摇，接着就会倒下去的。由此可见，从估计全俄和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观点看来，喀琅施塔得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可见，我们现在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还没有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而当前我国革命的命运就以能不能战胜这种势力为转移。假如我

们战胜不了这个势力，我们便会象法国革命一样倒退回去。一定是这样。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点，不要闭着眼睛，不要光讲空话。应当尽力改善这些群众的生活，并且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欧洲正在发展着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就能够得到新的援助。那里，今天没有发生的事情，明天可能发生，明天没有发生的事情，后天可能发生，但明天和后天，这在世界历史中就等于若干年。

究竟我们现在为了什么而斗争，为了什么而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最近的事件有什么意义，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有什么意义，——我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现在也就可以懂得，为什么这种斗争这样尖锐，为什么我们这样难于理解主要敌人并不是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而是我们周围的情况，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

我的话已经讲得太长了，现在，在最后，我来讲讲铁路和水运的情形，讲讲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的任务。我想，我刚才讲的这些话，是同这个任务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无产阶级中，大概只有铁路和水运员工的日常经济活动同工农业的联系最明显了。你们要把粮食运往城市，要输送工业品去活跃乡村。这一点任何人都很清楚，而铁路和水运员工就更加清楚，因为这就是他们日常劳动的对象。我认为，从这里也就自然可以看到目前铁路和水运部门的劳动者担负着何等重要的任务，何等重大的责任了。

大家知道，在你们举行这次大会的时候，在工会的上层和下层人员之间是有磨擦的。这个问题曾经提到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而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上层服从下层，改正上层所犯的那些在我看来虽是个别的、但终归是应当改正的错误，用这种办法使上层和下层协调起来。大家知道，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作了这样的

纠正，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在共产党的队伍中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其领导部分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运动的一种合理的、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回答。如果我们这些觉悟的工人，能认清这种运动的危险性，能团结起来，十倍齐心、百倍团结地工作，这就会使我们的力量增大十倍，这就能使我们在战胜了军事进攻之后，也能战胜这种自发势力的动摇；这种自发势力扰乱我们的全部日常生活，所以——我再重复一句——它也就非常危险。党代表大会纠正了它所注意到的错误，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在团结和统一无产阶级大军方面的巨大进步。现在你们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也需要做到这一点，并且要实现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

我再说一遍：无产阶级中这一部分人的工作，比其他各部分人的工作都更加直接地决定着革命的命运。我们必须恢复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而为了恢复这种流转，就必须有物质基础。联系工农业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就是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所以你们中间不仅共产党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觉悟的传播者，必须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那些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是把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运输业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工会的工作者，也必须这样。你们大家既然已经学习了我国革命和已往的历次革命的教训，就应当懂得我们处境的全部困难，而只有不被“自由”、立宪会议、“自由苏维埃”等等口号所迷惑（用这类口号来装饰门面是不难的，连米留可夫也表示自己是喀琅施塔得共和国苏维埃的拥护者），只有看清阶级力量的对比，你们才能有一个坚固的基础来冷静地做出自己的各种政治结论。你们会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处在危机时期，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象不久以前那样一往直前地走向胜利，还是会发生动摇而使白卫分子获得胜利，以致不但不能改变困局，

反而会使俄国革命倒退好几十年，——这就全看我们了。对于你们这些铁路和水运员工的代表们说来，结论只能有一个，而且只应当有一个，这就是百倍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纪律。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要争取获得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3月29日和30日
《真理报》第67和68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258—271页

给阿捷尔拜疆、格鲁吉亚、 阿尔明尼亚、达格斯坦、哥里 共和国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

我热烈地向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致贺，我深信它们的紧密的联盟，一定会成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从来没有见过的、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决不可能有的民族和睦的模范。

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民族和睦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保持和发展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的苏维埃政权。任务是很困难的，但是完全可以完成。为了顺利地解决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要使南高加索的共产党员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恰恰相反，过去这几年内，它一直在进行斗争来反对协约国的军事侵犯和封锁。

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却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那里得到了政治上的援助和不大的军事援助。这是根本不同的地方。

第二，现在无须害怕协约国方面的侵犯以及它在军事上对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达格斯坦、哥里的白卫分子的支持。

援。因为协约国在俄罗斯境内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这迫使它暂时大概要放谨慎一些。

第三，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

第四，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离的，现在在颇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区别还不止这些。但是就从上述种种区别看来，已经足以了解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通过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石油、锰、煤（特克瓦尔切利煤矿）、铜，——还有不胜枚举的其他各种丰富的矿产。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

应当广泛地、坚持地、巧妙地、谨慎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极力利用这方面的工作来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要利用同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商品交换，来尽力发展物产丰富的边疆的生产力，发展水力和灌溉。为了尽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灌溉是特别重要的。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点。这就是必须了解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

我们打开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缺口。缺口已经打开了。我们在反对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³和孟什维克（他们得到全体协约国的支援，协约国用封锁和武力帮助他们）的极端残酷、极

端艰苦、极端剧烈的战争中，捍卫住了自己的生存。

高加索共产党员同志们，你们已经用不着去打缺口了，你们应当善于利用 1921 年的有利于你们的国际形势，十分谨慎地、有步骤地建立新的事业。1921 年，无论欧洲或全世界，都已经不是 1917 年和 1918 年那样的了。

不要抄袭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从而在自己那里不是照抄 1917—1921 年的经验，而是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应当立刻在经济上依靠同资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价值几千万的贵重的矿产吧。

应当立刻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开始电气化和灌溉的巨大工程。灌溉是最需要的，它最能够改造边疆，复兴边疆，它将埋葬一切旧的东西，而使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业巩固起来。

这封信写得很草率，请你们原谅，我必须赶快把它写出来，好交给米雅斯尼柯夫同志带去。让我再一次向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们致最诚挚的敬礼。

尼·列宁

1921 年 4 月 14 日于莫斯科

载于 1921 年 5 月 8 日
《格鲁吉亚真理报》第 55 号

按《格鲁吉亚真理报》原文
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32 卷
第 305—307 页

论 粮 食 税

(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

代 序

粮食税问题在现时引起了特别多的注意、讨论和争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确实是当前情况下我们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

讨论稍微有些混乱。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我们都犯有这种毛病。所以我们打算不从这个问题的“眼前的”方面，而从它的一般原则方面来考察，这会更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就是要看一看我们现时正在描绘当前政策中某些实际措施的那幅图画的全部基本背景。

为了作这样的尝试，我想从我那本《当前的主要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①的小册子中，摘引一长段话。这本小册子在1918年曾由彼得格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出版过，其内容：第一，是1918年3月11日登在报上的论布列斯特和约一文，第二，是1918年5月5日登载的与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⁵²集团论战的文章。论战部分现在已用不着，所以我把它删掉，只留下了有关“国家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我国现时经济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530—559页。——编者注

的基本成分的言论。

当时我这样写道：

关于俄国现时经济

(摘自1918年出版的小册子)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我暗自揣度，有人会怎样义愤填膺地来驳斥这些话…… 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

第一，应当分析一下，这个使我们有权利、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竟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敌人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苏维埃国家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种情况。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末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 (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 (2) 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 (3) 私人资本主义；
- (4) 国家资本主义；
- (5) 社会主义。

俄国如此辽阔广大，如此五光十色，以致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这些不同类型都错综在它里面。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究竟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我国的投机商时此时彼地在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办合作社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外壳，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便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开展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经济范畴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是(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任何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

济问题上的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才发生的。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这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措施方面的敌人。如果说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最突出、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绞杀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当时尚可原谅的话，那末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³对这个问题还要采取纯法国式的态度，就只能引起每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俄国境内特别广泛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在每一个小资产者那里都有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多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使投机活动得以钻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毛孔中，从而排除国家垄断制。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小资产者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累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这种典型的经济类型也就是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货币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若把贫民，即把多数居民或半无产者组织在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那我们便能做到这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制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之流和卡芬雅克¹³⁹之流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

存有几千小款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无疑

希望把这几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对贫民，反对任何全国性的监督，而这几千小款却给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造成数十亿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一千的价值。又假定说，在我国，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一千中拿出三百来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打破，那末以后减少这种‘贡款’，比如说减到一百或五十，就会是十分容易的任务。

这个简单的数字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例子弄得再简单不过了，——说明了现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一千统统‘拿走’，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用很多办法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比现在还大，为了‘领教’是值得破费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混乱状态、经济破坏和松弛现象是无比重要的，因为继续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的危险，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安排全国性的大生

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并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已经得到保障的国家……

* * *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而同样用国家，但已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关于这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谈起，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足足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值不得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笨蛋之外，没有人期待历史会平稳、宁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演进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离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

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若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仍然迟不‘诞生’，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更快地仿效西方主义，我们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这两个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能象卡列林那样断言——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末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所谓‘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在经济上犯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或者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事实，看不见现存事物，不会辨别真理，或者是因为他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未注意研究我国目前这一过渡的一些具体形式和阶段。

顺便说一下：这也就是使《新生活报》和《前进报》¹⁴⁰营垒中的优等人物神智不清的理论错误。该营垒中的劣等人物和中等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

巴；而优等人物则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¹⁴¹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仍然是一种抽象东西，只有经过一些想建立某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这种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一步，正因为如此，所以用‘演进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的话来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这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正意味着他们不懂得‘演进’的真正道路，在思想上离开这条正路走到‘一边’去了；而在实践上这便等于向小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开倒车。

为了使读者相信，我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做过‘高度’的评价，让我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录几段：

‘……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破坏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将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①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162、163、164页。——编者注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梯级往上登得越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越充分,我们就应该越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 *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他曾顺便提出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¹⁴²(即从资本家匪帮,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

……请深入考虑一下马克思的想法。

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就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而言,是当时‘和平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最有可能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但在苏维埃俄国,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自从剥削者的

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某些条件已经按照半世纪前本可在英国——假如英国当时已开始和平地转到社会主义——形成的那些条件的样式而形成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那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使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由于没有农民（在七十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了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就），工人即无产者在全国人口中完全占优势；（2）无产阶级在工会里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政治自由长期发展中受到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第一位已经转给德国了）——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去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目前我国已有某些具体前提（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从10月到次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有了保障。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虽然在居民中没有占绝对优势，虽然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但最贫穷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却是我们胜利的因素。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能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末就会知道，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做到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以他记得马克思曾极其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极大的生产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例外）环境会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没有考虑到目前之所以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是由于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所以工人们目前才有必要对那些最有文化、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相当认真地帮助组织大的和最大规模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犯两种实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套中人’¹⁴³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适应’是永远不会有，在社会发展中，正象在自然界发展中一样，这样的适应是不可能产生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个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但要从事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

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

幸而各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类典型的清晰面貌，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疯狂地叫嚣，叫得喉咙哽塞地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不会深思一下，‘妥协’的坏处是什么，它为什么理应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裁判。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曾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妥协，这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我们的敌人即切尔诺夫之流和孟什维克来分掌政权，殊不知这些人在基本问题上，即在解散立宪会议、无情地击溃鲍加也夫斯基¹⁴⁴之流、充分施行苏维埃机关的措施和进行每一次的没收工作等方面，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夺到手了，保持住了和巩固下来了，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所以现在，当根本谈不上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时，再来谈论妥协，就无异象鹦鹉学舌一样，只是简单背诵那些念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字句罢了。现在，当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当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文化程度极高的人吸引过来，任用他们以便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竟说这是‘妥协’，那就等于根本不善于思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①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540—552页。——编者注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上面所引的1918年的言论，在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久一些。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我国经济的基本成分仍然和从前一样。农民中的“贫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中农。因此，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强了。而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破坏，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厉害的就是无产阶级。加之，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厉害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例如农民用马匹运输我们的主要燃料木柴的事实就反映出了这一点。

结果，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呢？

因为要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去认真思考问题而陷于空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的统治的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策，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

“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些想不经过这种办法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代表，实际上只会是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帮凶。因为不经过这种办法，就无异是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看得高于阶级利益，就无异是为了工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专政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为反对地主资本家而与农民联盟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在为解放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利益。

总之，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缴完粮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关于这点，现在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其所以不正确，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不深入研究过渡的实质，不自问一下，究竟这一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照他们看来，过渡似乎是从一般共产主义过渡到一般资产阶级制度。为了反对这种错误，不得不引用我在1918年5月说过的话。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

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

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供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因为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给我国的剥削者撑腰）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合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粮食税是走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我国经济至今还破坏得这样严重，战争（昨天已经爆发过，由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恶毒，明天还可能爆发）仍把我们压抑得这样厉害，以致我们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我们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才实行粮食税，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

同时还应该忘记下面这一点，贫困和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竟使我们不能立刻恢复起巨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要这样做，就必须在各大工业中心有大量粮食和燃料的储备，必须以新机器代替废旧机器等等。根据经验，我们深信不能马上做到

这一点，并且我们知道，经过这次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甚至连最富庶和最先进的国家，也要在一定的、相当长的年限内才能解决这个任务。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但却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

这样，结果又会怎样呢？

结果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

试问，这是必要的吗？这能说是对的吗？这不危险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这些问题多半只能暴露出提这种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说得轻一点）。

请看我在1918年5月是怎样确定我国经济现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组成部分）的。我国存在着从宗法式的、即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所有五种结构的全部五层阶梯（组成部分），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一部分是宗法式的“结构”，另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既然有交换，那末，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论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上最初步的真理，而且是日常经验甚至庸人的观察所证实了的真理。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至少在全国

电气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来的。那末怎么办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其所以是愚蠢，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其所以是自杀，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错误是用不着隐瞒的，有些共产党员正陷入了这样的政策，而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者(这是最后一种行得通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在经济上是行得通的，因为在有自由贸易成分和一般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

当然能够。我在1918年5月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并且我相信1918年5月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当时我还证明说，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人们大错特错的地方就是，他们只以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比较，而在现时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以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生产相比较。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

社会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可能清楚地设想一下，在我们苏维埃制度内，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将是怎样的，而且可能是怎样的。

可以说明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以及可以说明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普遍的现象和实例，就是租让制。现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同意租让制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考虑到租让制的意义是怎样的。就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看来，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制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普通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一百个某种企业、矿山和森林区。我们不能全部开采，因为我们的机器、粮食和运输工具不够。由于同样原因，我们在其他产区也开采得不好。正由于大企业开采得不好和不充分，因此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在各方面都加强起来；附近的（以后便是整个的）农民经济被削弱，它的生产力被破坏，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降低，盗窃公物的现象发生，小规模（但是最危险的）投机活动大量出现，等等。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即份额扣除）大工业产品数量，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

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一定的不大的程度内）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要确定在怎样的范围和条件下租让制对我们有利而无害，那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实践是会告诉我们的。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下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几乎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利益和损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规定有先期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先期赎回的条件。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在租让制方面，任务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这里困难无疑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困难，与社会革命的其他任务比较，例如，与发展、容许、培植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较，还是极其微小的。

由于施行粮食税，所以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善于把“租让”（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策的原则、原理和基础，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

拿合作社来说吧。粮食税法令立即引起了对合作社条例的修改和合作社“自由”与权利的适当扩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

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而比较复杂，因此它使我国政权在实践上遇到更多的困难。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末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愚蠢或犯罪。

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末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出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引上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使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便于和资本家订立合同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人商业更有益，更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并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尔后把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又是一大优点。

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租让制和合作制比较一下。租让制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制的基础则是小规模、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经济。租让制在每个单独的租让合同中，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辛迪加，一个卡特尔，一个托拉斯。合作制则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

租让制容许有、甚至预先要求有确切的合同和确切的期限。合作制则既不能有十分确切的合同，也不能有十分确切的期限。取消关于合作制的法令，要比解除租让合同容易得多，但中断租让合同就意味着一下子干脆地立即与资本家断绝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而任何取消关于合作制法令的措施以及一般的任何法令，不仅不能一下子就中断苏维埃政权与小资本家的实际“共居”关系，而且一般也不能断绝实际的经济关系。“监视”承租人容易，“监视”合作社人员困难。由租让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在成功时，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的更为深固的根拔掉。租让制政策施行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的比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合作制政策施行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易于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再拿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来说。国家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产区、森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赁合同与租让合同极相类似。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后两种形式，人们根本不去谈论，根本不去关心，根本不去注意。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强大和聪明，而是由于我们软弱和愚蠢。我们害怕正视“低微的真理”，往往受“抬高我们身价的谎话”¹⁴⁵所摆布。我们经常谈论“我们”是从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却忘记明确地想一想这“我们”究竟是指谁。我在1918年5月5日的文章中列举的我国经济中社会经济的一切——必定要一切，绝无例外——组成部分，一切不同的结构，必须予以重视，以使这一明确概念不致被遗忘。“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解决我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看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些空旷地带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末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隔离了开来，即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¹⁴⁶和半野蛮性所统治吗？

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情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由于一项巨大的科学工作已告完成，现在我们对这个条件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个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能够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乡村，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

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末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了。我们深深知道，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也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最近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由宗法制度、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成分来看。

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拿官僚主义问题来说，并从经济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党纲，在这党纲中，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斗争的思想、意志、毅力和行动，我们说，“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¹⁴⁷。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¹⁰⁹讨论了(1920年12月)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¹³⁴(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呢？这种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局部地也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首先是军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机构。这种现象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们的法庭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庭，我们的军队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军队。官僚主义并不在军队里面，而是在为军队服务的机关里面。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作。这在极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那时我们四面被封锁，被包围，与全世界隔绝，以后又与南方产粮区、与西伯利亚、与产煤区隔绝，我们无法恢复工业。那时我们必须敢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怕采取非常措施，我们可以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有闻所未闻的经济破坏和缺乏流转，我们也要捍卫住工农政权。我们并没有被那些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实际上大都因为恐惧，因为胆怯，才去追随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事物所吓倒。然而，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中，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曾是致胜条件的事物，正是到1921年春，在最后一批白卫军彻底被驱逐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以后，却暴露出它的坏的一面。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可以而且必须“堵塞”一切流转；由于群众具有非凡的英勇精神，这种情况可以忍受三年之久。此后，小生产者的破产更厉害了。大工业的恢复更拖延、更推迟了。于是“包围

状态”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即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应当大胆承认这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将来我国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道路。既然大工业的恢复要推迟，既然工农业间的流转“被堵塞得”不堪忍受，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致力于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即恢复小工业。从这方面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把被战争和封锁弄得一半倒塌的建筑物的一边先支撑起来。要用一切办法来发展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

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培养和唤起各地方在经济建设事业中的较大主动性——省里的要大；县里的更大；乡和村里的还要大；——其目的就是要迅速地即使是用“小”资金和在小范围内来振兴农民经济，靠发展附近的小工业来帮助农民经济。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把这件事作为注意和关怀的中心，作为“突击”工作的中心。在这里即在最接近极广泛极深厚的“基础”的地方所取得的某种改善，能使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更积极更顺利地把大工业恢复起来。

粮食工作人员过去只知道一个基本指令：收集百分之一百的余粮。现在则是另一个指令了，这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内征收百分之一百的粮税，尔后再用大工业和小工业的产品换取百分之一百的余粮。一个征收了百分之七十五的粮税、又用大小工业的产品换取了百分之七十五（从第二个百分数内）的余粮的人，同另一个

征收了百分之一百的粮税和换取了百分之五十五（从第二个百分数内）的余粮的人相比，前者做的事情对国家更有利。粮食工作人员的任务是复杂了。一方面，这是有关国库收入的任务。征收粮税要尽量快和尽量合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般经济的任务。要努力循着使工农业间的流转能够扩大和巩固的这一方向来指导合作社，来帮助小工业，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还很不善于做这件事；官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我们要按省、县、乡、村来比较实际经验的总结；在某个地方，私人资本家和小资本家取得了什么成绩。他们得到的利润大概有多少。这就是我们“为了领教”而付出的贡献或酬金。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而在邻近地方，经过办合作社而取得了什么成绩。合作社的利润有多少。至于第三个地方，则用纯粹国家的、纯粹共产主义的方式取得了什么成绩（这第三种情况在目前是罕见的例外）。

任务就在于每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每个省执行委员会下的经济会议，应把缴纳粮税后余粮“流转”的各种经验或制度立即加以总结，把这一工作提到首位。几个月之后，就应当有一些实际结果，以便加以比较和研究。本地盐或外来盐；从中心区运来的煤油；手工木材加工业；靠当地原料生产一些虽不很重要、但对农民却有利的必需品的手工业；“绿煤”（利用当地小规模的水力来发电），等等，——这一切都应当动用起来，无论如何都要活跃工农业间的流转。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写规

章、条文、训令，但在实践上却不能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

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

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末，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尽量少争论名词。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还非常大。尽量使实际经验多种多样，尽量多研究这些不同经验。有这样的情况，甚至范围很小的模范的地方工作，也比中央许多部门的国家工作有更重要的全国性意义。目前在一般农民经济方面，特别在用工业品交换剩余农产品方面，我国的情况恰恰是这样。在上述方面，模范工作即使只是属于一个乡的，但也比“模范地”改善某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有更大的全国性意义。因为我们中央机关在三年半来竟已染上了某些有害的因循习惯；我们不能大大地迅速地改善这种机关，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要帮助中央机关来做比较彻底的改善，帮助它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帮助它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帮助它克服有害的因循习惯，这种帮助应当来自地方，来自下层，来自一个不大的“整体的”模范工作，这里需要的正是“整体”，即不是一种经济，不是一种经济部门，不是一个企业，而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是全部经济流转——哪怕是在不大的地方范围内——的总和。

我们中间一切必须留在中央工作的人，将要——即使是在有限的直接能够做到的范围内——继续改善机关和清除其中的官僚

主义。但在这方面，主要的帮助是来自地方，并且一定是来自地方。据我看来，我们在地方上的情形比中央一般要好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在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个坏城市，而且一般说来是共和国内最坏的“地方”。在地方上有两种不同于中间状况的倾向，而坏倾向比好倾向要少一些。坏倾向就是：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的从中舞弊，他们有时做出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等恶劣行为。这就需要用恐怖的清洗办法：就地审判，无条件地枪决。让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非党市侩去捶胸大叫：“感谢上帝，好在我和‘他们’不同，好在我向来不赞成恐怖手段。”这些傻瓜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在愚弄工农这一点上甘心充当白卫分子的驯服帮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起的作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把群众引到白卫分子的恐怖中来。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科尔尼洛夫叛乱，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芬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¹⁰⁰英雄们也证明了这一点。让那些白卫分子恐怖手段的驯服帮凶们去自夸他们否认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是要说出一个沉痛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空前危机、旧联系中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国家里，——世界一切国家都是如此——正和伪君子及空谈家的主张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种手段”。

好倾向就是：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非常注意工人和农民的需要，非常关心国内经济的振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方上工农业间流转的发展。这种好倾向虽然表现得比坏倾向多一些，但毕竟还嫌太少。可是这些好倾向总算是有了。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内战和贫困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这一点是可以而且必须更广泛更坚持地做下去的。能够而且应当解除某些工作人员的中央工作而调他们到地方去工作：他们以县和乡的领导者身分，在那里模范地做好整个经济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贡献，就能比有的中央机构做出更重要的有全国意义的事业。因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这种榜样，仿效终究是比较容易的事，何况我们又能从中央给以帮助，使这种榜样在各地能够而且必须得到广泛的“仿效”。

靠缴过粮税后的剩余农产品和靠小工业、主要是手工工业来发展工农业间“流转”的问题，本身就要求地方上发挥独立的、内行的、有智慧的主动性，所以，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军事上，例如在最后一次抗波战争期间，我们未曾害怕违背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我们未曾害怕“降低官衔”，未曾害怕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仍保留他们在中央的高级职务）调到下层去工作。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部务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甚至是县里，甚至是乡里去工作呢？的确，我们并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调到下面去就“感到难堪”。而且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几十个乐意担负这种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这样做了，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会得到非常大的

成绩，因此，模范乡或模范县所起的作用不仅会是巨大的，而且简直会是有决定意义的，有历史意义的。

顺便说说，在与投机活动作斗争这一问题的原则提法上应当作必要的改变，这虽是小问题，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凡是不逃避国家监督的“正当”贸易，我们都应当加以支持，发展这种贸易对我们是有利的。对于投机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就不能把它和“正当”贸易区分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活动，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

怎么办呢？难道宣布投机活动可以不受制裁吗？

不。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物行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事实上要比从前更严厉三倍地加以惩办）。正是要这样来提出问题（人民委员会已经开始这样做，就是说，人民委员会已下令开始重新审查关于投机活动的法令），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政治总结和结论

我还要谈谈，哪怕是简略地谈谈政治局势，究竟目前的政治局势怎样，由于上述经济情况，它起了什么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1921年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与1918年时相同。1921年春天，主要是由于歉收和牲畜死亡，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本来就万分困苦的农民生活状况，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结果就产生了政治动摇，而这种动摇一般说来是小生产者的“本性”。这

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乱¹³⁶。

喀琅施塔得事件最显著的特征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那里很少有完全定形、明确肯定的东西，有的仅仅是“自由”、“贸易自由”、“解放”、“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或改选苏维埃、摆脱“一党专政”以及诸如此类的模糊口号。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宣称喀琅施塔得运动是“自己的”运动。维克多·切尔诺夫派了一位特使到喀琅施塔得去，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领袖之一孟什维克瓦尔克，依照这位特使的建议，在喀琅施塔得表示赞成召集“立宪会议”。全部白卫分子简直可以说象无线电波那样迅速地动员起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的白卫分子军事专家（是许多专家而不是柯兹洛夫斯基一人）制定了在奥拉尼恩包姆登陆的计划，这个计划把拥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班动摇不定的非党群众都吓倒了。五十多种国外出版的白卫分子俄文报纸展开了疯狂的宣传来“支持喀琅施塔得”。大银行以及金融资本的全部力量都来发起募捐，援助喀琅施塔得。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聪明领袖立宪民主党人²米留可夫，直接向傻瓜维克多·切尔诺夫（间接向同喀琅施塔得事件有牵连而被囚禁在彼得格勒监狱里的孟什维克唐恩和罗日柯夫）耐心地解释说，不必急于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可以而且应该拥护只要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政权。

当然，要比妄自尊大的笨伯，如切尔诺夫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空谈英雄或马尔托夫这种以市侩改良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骑士聪明一些，并不是难事。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米留可夫个人比较聪明，而在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对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比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因为资产阶

级真正是一个阶级力量，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君主国内或最民主的共和国内，都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必然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小资产阶级，亦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按其经济实质来说，无非是阶级软弱无力的表现，由此也就产生出动摇、空谈和一筹莫展。在1789年，小资产者还能成为伟大的革命者；到了1848年，他们已是可笑而又可怜；而在1917年至1921年，按其实际作用来看，不管他们叫作切尔诺夫之流或马尔托夫之流也罢，叫作考茨基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等等也罢，总之他们都已成为反动势力的可恶帮凶，都已成为反动势力的亲信奴仆。

马尔托夫在其柏林的杂志上发表声明，说喀琅施塔得不仅贯彻了孟什维克的口号，而且证明了一个并非完全为白卫分子，为资本家地主服务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是可能发生的。这正是纳尔苏修斯¹⁴⁸的市侩式的妄自尊大的典型；好吧，让我们干脆闭眼不看所有真正的白卫分子向喀琅施塔得叛乱者表示欢迎并通过银行募款援助喀琅施塔得叛乱的事实吧！同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比较起来，米留可夫的话是对的，因为他泄露了真正白卫势力，即资本家地主势力的真正策略：好吧，那我们就拥护随便什么人，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就拥护随便什么样的苏维埃政权，只要能打倒布尔什维克，只要能使政权转移！往右移也罢，往左移也罢，往孟什维克方面移也罢，往无政府主义者方面移也罢，只要能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走；至于其余的事，那就由“我们”米留可夫这些人，由“我们”资本家和地主“自己”来做好了，我们几巴掌就能赶走无政府主义者、切尔诺夫之流、马尔托夫之流，象在西伯利亚赶走切尔诺夫和马依斯基一样，象在匈牙利赶走匈牙利的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一样，象在德国赶走考茨基一样，

象在维也纳赶走弗·阿德勒之流一样。这些纳尔苏修斯式的市侩——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非党分子——曾被真正讲实际的资产阶级成百成千地愚弄过，被他们在各个国家的历次革命中百十次地赶走过。这已被历史所证明，这已被事实所验证。纳尔苏修斯之流还将继续空谈。米留可夫之流和白卫分子却将继续实干。

“稍微向右移些或稍微向左移些都是一样，只要能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开，其余的问题，到时候自会迎刃而解”，这一点米留可夫说得完全正确。这是一切国家自中世纪以后长达数百年的近代的全部革命史所证实了的阶级真理。零星散漫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中，在近代的各次革命中，历来就是这样，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来还会永远这样），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在近代某些最伟大的革命高潮中有过这种时间极短的萌芽形态的联合；在1917年至1921年间的俄国，就有了这种形态更为发展的联合）。只有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之流才能空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

布尔什维克历尽千辛万苦，在决死斗争中锻炼出了能够实行管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建立并保卫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四年来经验和实践的检验，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再明显不过的了：唯一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千锤百炼，坚强如钢，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动摇不定，米留可夫之流即资本家地主隐匿在国外并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问题再明显不过了：只有他们才来利用和才能利用各种所谓“转移政权”的勾当。

在上述1918年的小册子里，关于这点公开说道：“主要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或者是我们使它服从我们的监督和

计算,或者是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必然推翻工人政权,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制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之流和卡芬雅克之流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是如此。”(摘自1918年5月5日的小册子,见上面本文①)

我们的力量在于能对俄国和国际一切现存阶级力量作十分清晰和冷静的估计,其次就在于由此产生的进行斗争的钢铁毅力,坚定意志,果断气魄和忘我精神。我们的敌人虽多,但他们是分裂的,或者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所有的小资产者,所有的马尔托夫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所有的非党分子,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们是联合的——内部是直接联合,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是间接联合;我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因此,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可战胜的,虽然这丝毫也不排除个别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一时期遭到失败的可能性。

无怪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被称为自发势力,因为它的确是一种最无定形、最不固定、最不自觉的东西。小资产阶级的纳尔苏修斯之流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普选”就能消除小生产者的本性,其实这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利用教堂、报刊、学校、警察、军队和种类繁多的经济压迫,去征服散漫的小生产者。破产、贫困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他们的动摇:今天跟着资产阶级走,明天跟着无产阶级走。只有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巍然屹立而不为动摇所影响。

1921年春天的事变再次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与布尔什维克疏远,帮助“转移政权”以利资本家和地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已学**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541—542页。——编者注

会如何装扮为“非党分子”。这一点已经完全证实了。现在也只有傻瓜才看不见这一点，才不了解我们是不能受人愚弄的。非党代表会议并不是偶像。如果我们能用这种会议来接近尚未接触过政治的群众，接近不问政治的各阶层千百万劳动者，那它们就是有益的，但如果这种会议变成装扮为“非党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讲坛，那它们就有害了。因为这班人是帮助叛乱者、帮助白卫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是公开的或装扮为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或者是国外杂志社，而与白卫分子为伍；我们曾乐意地把马尔托夫放出国外），决不是非党代表会议。为了检验群众情绪和接近群众，可以而且应该找出其他的方法。让那些希望玩弄议会制、立宪会议和非党代表会议的人到国外去好了，请你们到那里去，到马尔托夫那里去，请尝尝“民主制”的滋味，请问问弗兰格尔手下的士兵究竟这滋味是什么样的。可是我们没有功夫到“代表会议”上来扮演“反对派”。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包围着我们，窥伺着机会，看见有片刻的动摇就要把“自己人”送回，就要扶起地主和资产阶级。我们却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在监狱里，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为“非党分子”的。

我们将用一切方法来和尚未接触过政治的劳动群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只有那些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活动机会、使对米留可夫有利的动摇得以发展的方法除外。我们将特别热心地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分子，即来自群众，来自普通工农的真正非党分子，来担任苏维埃工作，首先是担任经济工作，而不是提拔那些“装扮”为非党分子的人，他们暗中推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出的对米留可夫十分有利的训令。我们这里有成百成千的非党分子在工作着，其中有几十个担负着最重要的和负责的职务。要多多

检查他们的工作。要多多提拔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来受新的检验，要考验他们，根据经验检查的结果，经常地、坚定不移地、大批地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

我们的共产党员直到现在还不很善于领会自己在管理方面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亲手”包办“一切”，这样就会忙忙碌碌，一事无成，而是要去检查几十个几百个助手的工作，对他们的工作组织自下而上的检查，即真正群众的检查；要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军事专家学习，虽然十分之九的军事专家随时都有叛变的可能。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家，还是代购代销商人，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等），虽然资本家并不比军事专家好。在红军中，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抓出叛变的军事专家，如何识别正直诚实的军事专家，整个说来是学会利用了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对于工程师、教师，我们也在学习这样做（采取特殊的方式），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比在红军中差得多（在那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逼我们逼得很好，使我们不得不更迅速、更用心、更仔细地学习）。对于为国家代购代购的商人、办合作社的资本家、企业承租人等等，我们也一定能学会这样做（也是采取特殊的方式）。

工农群众需要立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我们把新生力量，包括非党分子在内，放到有益的工作上去，就能做到这点。粮食税以及和它有关的种种措施，定能有助于这点。做到了这点，我们也就挖掉了使小生产者必然动摇的经济根子。至于仅对米留可夫有利的政治动摇，那我们会对它进行无情的斗争。动摇分子的人数多。我们的人数少。动摇分子是分离涣散的。我们是团结一致。动摇分子在经济上是依赖别人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动摇分子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又想干，又怕疼，米留可夫又不允许他们干。而我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会胜利。

结 论

现在来总结一下。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

经济的极端破坏因 1920 年的歉收而更加严重，同时大工业又不可能迅速恢复，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实行这一过渡。

结论：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

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在一定限度内能帮助我们同小生产者的散漫性作斗争，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所以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实践和经验会来规定。既然无产阶级紧紧掌握着政权，紧紧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这里也就没有什么使无产阶级政权可怕的地方。

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应转变成反对盗窃公物，反对逃避国家监察、计算和监督的斗争。我们实行这样的监督，就能把在一定限度内不可避免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在活跃工农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首倡精神和独立性。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

支援为农业服务并帮助农业发展的小工业，支援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供给它以国家的原料。把原料留着，而不加工，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成绩，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

竭力帮助劳动群众，接近他们，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而对于那些实际上不外乎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非党分子”，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遣送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去自由地享受纯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换意见吧。

1921年4月21日

1921年5月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319—357页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 代表会议¹⁴⁹ 闭幕词

(1921年5月28日)

同志们,我只想很简短地讲几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临时召开这次代表会议,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者和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对经济政策有一个彻底的了解。我认为,代表会议无疑是完成了这项任务。同志们在这里不止一次地指出,奥新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表达了地方上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党的工作者的情绪。他说,应当消除一切怀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¹³⁴所制定的、后来又用一些指令和决议加以肯定下来的政策,无疑是党认为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代表会议也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这一点,并且增加了许多条。同志们回到各地去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误解了。自然,在我们制定一个必须长期实行的政策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国际革命及其发展的速度和条件可能改变一切。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这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这种均势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愈来愈分崩离析,愈来愈不一致,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压力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强大。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无法加以推测的。现在,我们是通过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发

生我们的主要影响。所有的人，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都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注视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我们的成就。资本家要想隐瞒和掩盖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们就拚命寻找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和我们的弱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我认为，不管怎样，通过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我们无疑是达到了这个目的。（鼓掌）

载于1921年6月2日
《真理报》第119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427—428页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¹⁵⁰上 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

(草案初稿)

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的国际环境

目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际环境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终于造成了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局势。

这种特殊局势表现在：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时刻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了几万万法郎进行武装干涉的一切行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苏维埃政权比现在还弱，而俄国地主和资本家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还有大批军队。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战活动大大加强，助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并且席卷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的群众。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尖锐化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尖锐。东方亿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一切情况，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要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贸易条约。

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

2. 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根据以上的局势，国际范围内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

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他们正在等待机会，窥伺时机，以便恢复这一战争。

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到处涌现出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些党在成长壮大，在坚定地争取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摧毁旧工联的官僚的影响和被帝国主义特权腐化了的欧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影响。

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¹⁰⁰为急先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目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的或颇大部分的工人和职员，仍然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些人害怕一旦爆发革命会丧失帝国主义特权所造成的比较优裕的小市民生活条件。可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到处使广大群众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这种情况，加上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就使上述支柱更加动摇起来。

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二十世纪初叶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爆发革命后，已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使这些群众完全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

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中站在最前列的是英属印度，在那里，工业和铁路的无产阶级愈壮大，英国人所加紧实行的大批屠杀（在阿姆里察）¹⁵¹与公开拷打等恐怖行为愈凶残，革命也就愈迅速地发展。

3. 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政治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这里在好多年内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在几十年内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

俄国的大地主与大资本家并没有完全绝迹，但是他们已彻底遭到剥夺，作为阶级来说他们在政治上已完全被粉碎，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他们把阶级组织保存在国外，侨外的人数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他们拥有的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日报达五十种以上，有一些残存的军队，并且与国际资产阶级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亡命者目前正在大肆活动，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

4. 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

在俄国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当前主

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和实施种种必要办法，以保证对农民的领导，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且通过许多逐步的过渡，转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公有农业。这个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落后，再加上七年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一特点不谈，这个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这样的任务，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在事实上奴役着英“属”殖民地几万万人口，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的观点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

5.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正确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建立的，当时，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个政党（社会革命党³与孟什维克）支持下，资本家和地主大举进攻，因而建立、巩固和形成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联盟。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这个斗争愈尖锐，则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成见在斗争的火焰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甚至对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也就会愈加清楚地表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

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的巩固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甚至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农民从工人阶级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得到了免遭地主和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在大工业恢复以前，则从农民那里借取粮食。

6. 过渡到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及改进其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一点是决不能一下子达到的。对一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要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是最适当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原来就已贫困不堪的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过渡到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当的粮食税立刻使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引起农民对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农业的兴趣。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全部余粮转到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办法。

7. 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 及租让制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是意味着农民在纳税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自由买卖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但只要运输业与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对于社会主义是丝毫不可怕的。恰恰相反，在一个遭到极度破坏和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与调节的资本主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程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促进农业的高涨。这对于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废除国有制，只是把一些矿山、森林区、油田等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能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的补充装备与机器。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无产阶级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缴纳的一种贡税；我们丝毫不隐瞒这一点，但应当明确地了解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地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缴纳这种贡税对我们是有利的。

8. 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期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是很粗糙的，极不完善的，并且还产生了许多弊端。在实行这一政策时，也

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并且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遭到破坏的和落后的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一亿一千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二亿二千万普特;第三年收集了二亿八千五百万普特以上。

现在,既然有了实际经验,我们就规定了收集粮食的任务,预计为四亿普特(其中粮食税为二亿四千万普特)。工人阶级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

9.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来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个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一工作业已完成,而且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基本上已被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¹⁰⁹批准。现在准备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工技师代表大会,会上将详细审查这一工作,然后由政府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批工程预计在十年内完成,共需三亿七千万个

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八个电站（平均功率为四千七百五十七瓩），1919年增加到三十六个（平均功率为一千六百四十八瓩），而1920年则增加到一百个（平均功率为八千六百九十九瓩）。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毕竟是开始了，工作已在进行，而且进行得一天比一天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认识，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小农群众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

10. 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 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存在，只要在一个国家内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小农阶级在过渡时期不可能没有许多次动摇。过渡时期的困难、资产阶级的影响，必然使这些群众的情绪时常产生动摇。由于自己的生活基础即大机器工业遭到破坏而被削弱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失去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肩负着一个极艰巨但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不管这种动摇怎样剧烈，必须坚持从资本桎梏下解放劳动的事业，并把它进行到底。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上表现在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

党，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政党的政策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就是这样的政党。现在这两个政党在国外都设有自己的总部，并办有各种报纸，它们实际上已与一切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勾结在一起，并忠实地为他们效劳。

俄国大资产阶级的聪明领袖及其首脑“立宪民主”党² 首领米留可夫，十分清楚、十分确切、十分直率地评价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的作用。在谈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共同纠集力量举行的喀琅施塔得叛乱¹³⁶ 时，米留可夫表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他在发挥这一思想时写道：“荣誉和地位”应该属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921年《真理报》¹ 第64号，引自巴黎《最近新闻报》¹⁵²），因为他们肩负着最先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移政权的任务。大资产阶级的首领米留可夫，正确地估量了一切革命的教训，而一切革命都表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掌握政权，他们始终只能充当资产阶级专政的掩护物，或走向资产阶级独裁的阶梯。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再地证实了1789—1794年的革命和1848—1849年的革命的这个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84年12月11日给倍倍尔信中所说的话，当时他写道：

……“纯粹民主派……在革命关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不能忽视的。”¹⁵³（俄译文载于弗·阿多拉茨基同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一文，见1921年6月9日《共产主义劳动报》¹⁵⁴ 第360号；德文原文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遗教》1920

年柏林版;《国际青年丛书》第12辑第19页)

尼·列宁

1921年6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全文
1921年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2卷
第441—449页

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

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善良词句和不能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来势汹汹,夸夸其谈,妄自尊大,实际上则是分离涣散、毫无头脑、空洞无物。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股“潮流”。在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挖掉以前,这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现在,由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了某种改变,动摇的形式也改变了。

孟什维主义者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已经向后转,转向资本主义了,那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的,连十月革命也不例外!民主万岁!改良主义万岁!”这种论调不管是纯粹孟什维克式的还是社会革命党人³式的,不管是符合第二国际精神还是符合第二半国际¹⁰⁰精神,实质都是一样的。

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⁵⁴或我们党内一部分已经脱离或正在脱离党的前工人反对派¹³⁰之类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论调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了!”由此而产生了多少有点象 1921 年春天“喀琅施塔得的”口号¹³⁶。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冷静地确切地用对实际

阶级力量的估计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来对照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庸人们的抱怨和慌乱。

请回忆一下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纯粹政治活动的阶段，从10月25日起到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止。在这短短十个星期内，我们为真正彻底消灭俄国封建残余而做的工作，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中（1917年2月到10月）所做的要多百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国外的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当时都是反动势力的可耻的帮凶。无政府主义者有的茫然若失，袖手旁观，有的帮助我们。当时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的呢？当然是的，因为当时我们要完成的事业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但是，同时我们又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1）我们空前地发挥了工人阶级自己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2）我们对市侩民主的偶像，即立宪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如专供富人享受的出版自由，给了具有全世界意义的严重打击；（3）我们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是1793年和1871年之后向前迈进的巨大的一步。

第二个阶段。布列斯特和约。反对和约的革命词句，也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半爱国主义的叫嚣，以及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左倾”空谈，喧闹一时。市侩们惊慌失措或幸灾乐祸地反复说：“既然同帝国主义讲和，那就完蛋了。”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作为资产阶级掠夺工人的帮凶去同帝国主义讲和的。我们“讲和”，把一部分财物交给强盗，却是为了挽救工人政权，为了更沉重地打击这些强盗。我们当时听够了那些说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受那些话欺骗。

第三个阶段。1918—1920年，从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立

宪会议派”到反击弗兰格尔的国内战争。战争开始时,我们红军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物质力量来说,这支军队就是在现在同协约国中任何一支军队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战胜了称霸世界的协约国。作为整个世界历史成果的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被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充当了君主派的帮凶,有的是公开的帮凶(部长、组织者、宣传家),有的是暗藏的帮凶(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采取的是最“巧妙”和最卑劣的立场,他们好象是置身事外,事实上却在写文章反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也一筹莫展,左右彷徨,一部分人帮助我们,一部分人叫喊反对军事纪律或散布怀疑情绪,破坏我们的工作。

第四个阶段。协约国被迫停止(能长久吗?)武装干涉和封锁。遭受了空前破坏的国家刚刚开始恢复元气,现在才充分看到经济破坏的深重,才感到极其严重的苦难:工业停顿、歉收、饥荒和流行病等。

在我们这次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当前的和这一时期的敌人,已经不是昨天的敌人。当前的敌人,已经不是得到全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支持的由地主们指挥的白卫匪帮。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受了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它象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且非常严重地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无产阶级则失掉了阶级性,也就是说,它越出了自己的阶级常轨。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是称霸世界的)的支持。

这怎么不令人胆怯呢?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

二半国际的骑士、一筹莫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倾”空谈家这样的英雄们。“布尔什维克正转向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他们的革命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这样的号叫,我们已经听够了。

可是,我们已经听惯了这种号叫。

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我们对工人和农民说:危险很大,要更加团结、坚定、冷静,要轻蔑地唾弃孟什维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惊慌失措和空喊的人。

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象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我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所在。无论在肃清俄国封建势力、发挥工人和农民全部力量方面,无论在推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摆脱了卑鄙庸俗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我们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以致惊慌失措的叫喊已不能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了。关于我们的革命活动,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以及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怯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在伟大斗争开始以前就害怕失败的人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这只能是为了侮辱工人。

正因为 we 不怕正视危险,我们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所以我们能清醒地、谨慎地、周密地权衡时机,采取各种让步来加强我们的地位,分散敌人的力量(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孟什维克叫喊说,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容许租让和国家资

本主义,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外国有一个过去的共产党员列维,也随声附和这些孟什维克。当这位列维所犯的错误,还可以试图解释为这是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在1921年3月所犯的错误¹⁵⁵的一种反应时,是应该为他辩护的;可是当这位列维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完全滚到孟什维主义立场时,那就不能为他辩护了。

还在1918年春,共产党人就主张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并为这个主张辩护,我们只要向号叫的孟什维克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是三年前的事情!是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头几个月!那时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有了这样清醒的头脑。从那时起,就没有人能驳倒我们对现实力量的清醒估计。

滚到了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列维,劝布尔什维克(列维“预言”资本主义会战胜布尔什维克,正象一切市侩、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预言布尔什维克如果解散立宪会议就一定灭亡一样!)向整个工人阶级求救!因为,请看,直到现在,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列维同半无政府主义者、空谈家一模一样,同过去的“工人反对派”里的某些人有几分相似,因为这些都爱高谈阔论,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了。无论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都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个概念变成偶像,不善于考虑它实际的具体的内容。不是研究和分析这些内容,而是一味唱高调。

第二国际的先生们很想自称为革命家,但实际上一到紧要关头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怕用暴力来破坏旧的国家机构,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同伙,并不是随便乱说的。任何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实际上推出

了新的力量、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现在管理着俄国，建立了军队，领导着这支军队，建立了地方管理机关等等，管理着工业及其他等等。如果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那末我们决不隐瞒这种祸害，而是要揭发它，同它作斗争。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中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信口胡说。

但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还不多，有时非常少，尽管有各种指令、号召和鼓动，尽管有各种“提拔非党群众”的命令，但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还是不多，如果因此而大谈什么“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那就是乱发议论。

没有一定的“喘息时机”，就不会有这种新生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慢慢地成长起来；只能在恢复起来的大工业的基础上（更正确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电气化的基础上）产生出来。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工人阶级因失去阶级性而受到极大影响，他们经过世所罕见的极度紧张的生活之后，必须有一段时间，让新生力量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赶上来，让原来疲劳的力量能够得到“修复”。建立一个经得住1917年到1921年考验的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把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存在于空喊家的高谈阔论中的）“工人阶级力量”都占用了抽完了。必须了解这一点，并估计到工人阶级新生力量成长得缓慢是必然的，更确切些说，是不可避免的。

孟什维克叫喊布尔什维克实行了“波拿巴主义”（说布尔什维克依靠军队和机关来反对“民主”的意志），这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策略，而米留可夫也正确地拥护这一策略，拥护1921年

春“喀琅施塔得的”口号。资产阶级正确地估计到，实际的“工人阶级力量”，现在是由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俄国共产党不是一下子而是用二十五年的实际行动争得了唯一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称号和力量的）加上因失去阶级性而大大削弱了的、最容易受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动摇影响的分子组成的。

“多多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口号，现在实际上是在加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1921年春天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非常明显地证明了和表明了这一点。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来揭发和驱逐这批叫喊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家伙，因为这些空喊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他们扩大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利于资产阶级和地主。

如果冷静地研究“工人阶级力量”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就会懂得“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

敬爱的先生，为了真正把非党群众提拔到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战线”上去，到经济建设事业中去，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这就是觉悟工人应当向空喊家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永远能够而且应当用来揭露空喊家的办法，证明他们事实上不是在帮助经济建设，而是在妨碍经济建设，不是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妨碍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所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意图，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意图，是在替异己阶级服务。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打倒这班不自觉的白卫分子的帮凶，打倒这班重犯1921年春天倒霉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者的错误的人！要切实进行善于了解目前时局特点和任务的实际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行动。

冷静地估计目前时局的特点以及实际的并非幻想出来的阶级

力量,会使我们知道:

无产阶级在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的创造性活动方面取得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成绩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生力量缓慢成长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象,这不是由于个别人物和党派的过错,而是由于客观原因。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定是更困难、更缓慢、更要循序渐进;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因此,在这一个新的更高的斗争阶段,我们力求格外慎重地来确定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把任务定得切实一些;我们要多作一些让步,当然是要在无产阶级处于统治阶级地位所能作的让步的范围之内;尽快征收适当的粮食税;尽量使农民经济有较多的自由来发展、巩固和恢复;把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企业租给租借人,其中包括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人。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要巧妙地、按“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原则来实现这一联盟。直接留给自己的工作领域不妨小一些,只留下绝对必需的。我们要把被削弱了的工人阶级的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巩固些。我们要用实际经验来检查自己,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许多次。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否则象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条困难的道路上,在这样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现在是不能前进的。谁对这一工作“感觉乏味”,“没有兴趣”,“不能理解”,嗤之以鼻,或惊慌失措,或沉溺于大谈什么缺乏“过去的兴奋”和“过去的热情”等等,那最好是“解除他的工作”,送他到档案馆去,使他不致妨碍工作,因为他不愿或者不善于考虑当前斗争阶段的特点。

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紧张情况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要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的正常商品交换(更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敌人还比我们强大得多;无政府状态的、投机商贩的、个人的商品交换,到处都在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将逐步地顽强地克服这些困难。让地方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要分派更多的力量到地方上去,要更加重视地方的实际经验。只有随着恢复工业的实际成就,随着建立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工人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已的创伤、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会加强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信赖。随着这些成就,我们会得到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也许不会象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快,但我们一定能够得到。

把这种更缓慢、更谨慎、更坚定和更顽强的工作担负起来吧!

1921年8月20日

载于1921年8月28日

《真理报》第190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根据
列宁修改过的清样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1—10页

关于清党

清党工作¹⁵⁶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严肃的工作了。

有些地方的清党工作，主要是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建议为指导，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来进行的。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能这样自上而下、“不顾情面”地实行清党，那末革命的成就确实是会很大的。

因为，现在的革命成就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转到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条件是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那种不辉煌、不显眼、一时很难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劳动组织和劳动成果的改善；所谓改善，就是要进行斗争，反对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的影响。要得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面前玷污党的分子了）。当然，不是群众的所有意见，我们都要服从，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负担和痛苦过重、令人疲惫不堪的年代，也有根本不是先进的情绪。但是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在否定“混进党里来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了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都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

的共产党员，谁是为谋生而辛勤劳动、没有任何特权也不会“讨好上级”的人们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重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密切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

我还要指出，把过去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是清党的一部分任务。我看，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应当留在党内的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都要三番五次地加以审查。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这个派别在1918—1921年期间证明，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能巧妙地适应环境，“混到”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派里来；第二、能更巧妙地死心塌地为白卫分子服务，口头上和它决裂，实际上为它效劳。这两个特点都是从孟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回顾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¹⁵⁷和孟什维克在言行上对立宪民主党²（以及对君主制度）的态度等等，就知道了。孟什维克“混到”俄国共产党里来，不仅是由于他们的马基雅弗利主义¹⁵⁸，甚至与其说是如此（虽然从1903年以来，孟什维克已表明他们是要资产阶级外交手腕的头等能手），不如说是由于他们“适应环境”的本领。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善于适应环境（但并非凡是适应环境都是机会主义），而孟什维克这班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派的，他们涂着保护色，正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在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起初可能尔后无疑会获得胜利时混入俄国共产党的全部孟什维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九要清除出党。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1921年9月20日

载于1921年9月21日
《真理报》第210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20—22页

十月革命四周年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的四周年快到了。

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

现在极简要地(当然是极不全面极不精确地)将这种意义和这种经验说明如下。

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极端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我们有权自豪，因为从对广大群众的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种清除工作，比一百二十五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

不论无政府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类型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终于）能够前进多远，

能够完成无限崇高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哪一部分。这过一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对一个经济上破坏不堪和灾难深重的落后国家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可是，我不准备多谈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懂得这一点。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来谈谈。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要消灭国内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秩序、机构)。

到1917年，俄国究竟还有哪些农奴制的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一切先进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和二百五十年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进行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留下了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⁸¹，可是，在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里，无论拿哪一间来说，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短短的十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立宪民主党²)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¹⁴⁸和哈姆雷特¹⁵⁹之流，挥舞着他们的纸剑，甚至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整个君主制的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

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是可以争论的”（国外有相当多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进行这种争论）。但是，我们现在不愿花费时间来进行这些争论，因为我们要用斗争来解决这个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决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却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卑鄙之徒在这些问题上空谈了八个月。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同宗教认真地展开了斗争。我们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在我们俄国，妇女无权或少权这种下流、丑恶和卑鄙的现象，这种可恶的农奴制和中世纪的残余已经没有了，而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却无一例外地被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愚蠢畏缩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

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在一百五十年和二百五十年以前，这种革命（如果就同一类型的每一民族形式来说，可以说是这些革命）的先进领袖们曾向人民许过愿，说要使人类摆脱中世纪的特权，摆脱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摆脱某种宗教（或“宗教思想”、一般“宗教信仰”）在国家中所占的优越地位，摆脱民族不平等现象。许了愿，没有兑现。所以不能兑现，因为有……对“神圣的私有制”的“尊重”在从中作梗。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就没有这种对万恶的中世纪制度和“神圣的私有制”的该死的“尊重”。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

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¹⁰⁰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

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显著的证明或表现之一。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苏维埃制度是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的产生，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进我们把苏维埃原则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有权自豪，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新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

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目前左右全世界的、金融资本的国际政策的问题（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关系到在我们亲眼看着资产阶级正在准备的、由资本主义产生的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会有两千万人死亡（在1914—1918年的大战和至今还没有结束的“小”战中，已有一千万人死亡），这关系到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如果有资本主义存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有六千万人残废（1914—1918年已有三千万人残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奴仆及其应声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全世界所有冒充“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嘲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是唯一的真理，虽然这是令人不愉快的、粗暴的、赤裸裸的、无情的，但在无数沙文主义与和平主义最巧妙的谎言中，究竟是一个真理。这些谎言被戳穿了。布列斯特和约被揭露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坏的凡尔赛和约的作用和后果，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情地被揭露出来。千百万人正在研究昨天战争的起因和行将到来的明天战争的问题，他们愈来愈清楚地、明确地、必然地认识到这个无情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还用老的正字法，我就会在这里写上两个含意不同的«мир»^①），就

① 即«миръ»和«миръ»，前者是“和平”、“和约”，后者是“世界”。——编者注

不能摆脱这个地狱。

让资产阶级和和平主义者、将军和市侩、资本家和庸人、一切基督教徒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所有骑士们痛骂这个革命吧。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恶毒语言诽谤和欺骗，都不能抹杀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千百年来，奴隶们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

这个口号千百年来第一次由一种模糊无力的期望变成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实际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消灭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全世界工人联盟对各国资产阶级联盟的第一次胜利，而资产阶级无论和平或战争，无非都是牺牲资本奴隶的利益，牺牲雇佣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是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和困苦，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学会改正这些错误。事实总是事实：用奴隶反对一切奴隶主的革命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诺言，千百年来第一次彻底地实现了一一一并且正在不顾一切困难地继续实现着。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保卫祖国”日本反对美国侵略、或“保卫祖国”美国反对日本侵略、“保卫祖国”法国反对英国侵略等等的各国资本家先生们，请

继续玩弄你们伪善的把戏吧！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骑士先生们以及全世界和平主义的庸夫俗子们，请继续用新的“巴塞尔宣言”（仿照1912年巴塞尔宣言¹⁰³的式样）来“敷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手段的问题吧！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种世界。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进行这样一个在全世界是新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石头”和“坚定不屈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另一种必要的革命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显得不适当或行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

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三四年来学会了一些实行急剧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的方法，我们现在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新的转变，学习“新经济政策”了。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批发商似乎是经济方面的一种典型人物，他离共产主义之远，有如天壤之别。但这正是在实际生活中从小农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向社会主义的矛盾之一。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论如何首先要增加生产。批发商业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在生产中用各种形式联系和联合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了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这是不大的、局部的，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在这新“科学”的领域里，就要读完预备班了。我们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习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查我们每一个步骤，不怕多次地改进初步着手的工作，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也一定会升到更高的年级。我们一定要学完全部“课程”，虽然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使

这一课程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得多，困难得多。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破坏多么严重，但是我们决不垂头丧气，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的胜利。

1921年10月14日

载于1921年10月18日

《真理报》第234号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32—40页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现在，有一些根本任务，革命还没有解决，要解决这些任务需要领会某种新事物（同至今革命已经做到的相比），在这个时候用这种办法来庆祝革命是特别适当而必要的。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这种“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在整个革命的全部胜利的进程中，在某一领域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我们的敌人，从半封建式的反动分子到孟什维克或第二国际¹⁰⁰的其他骑士们，当然会说有。正因为他们敌人，所以不管有没有根据，总是这样大叫大嚷。一切政党，从封建主义者到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惊人的一致，不过再一次证明所有这些政党确实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的一帮”而已（顺便说一句，这正象 1875 年和 1884 年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中所预见的一样）¹⁶⁰。

但是，在朋友中间也有某种……“疑虑”。

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

帮助小农业走向公有化。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借来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原料。这就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以前三年多的时间内所采取的计划（或方法、制度）。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社会经济制度的意义上来说，这是解决任务的一种革命办法。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办法即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运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

这是解决任务的完全不同的办法。

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有人问，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既然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末这是不是证明你们宣布革命根本就是错误的呢？这是不是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只限于改良呢？

孟什维克和类似他们的人所作的结论就是这样。但这种结论，不是政治上“饱经风霜”的人的诡辩和彻头彻尾的骗人的鬼话，就是“没有经受”真正考验的人的幼稚无知的言语。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

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

谁要是这样“设想”，谁就一定会毁灭，因为他在根本问题上设想一些愚蠢的事情，而在残酷战争（革命是最残酷的战争）的时候，愚蠢往往会遭到失败的惩罚。

根据什么能得出结论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只能而且只应采用革命的方法？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结论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恩格斯说：从理论上说，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¹⁶¹ 这是一句真理。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到，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解决，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解决。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布列斯特和约完全不是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一个例证，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在已经证实，这是大家已经清楚并一致公认的，关于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讲了。

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工作。我们完全

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1）用革命手段摆脱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揭露并阻止资本主义强盗两大世界集团的屠杀；在我们方面，这一点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才能在各方面都做到这一点。（2）建立苏维埃制度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还要由许多国家来改善和完成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完，改做和从头做起。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有待于改造的东西还很多，如果因此而“惶惑”起来，那就荒谬绝顶了（甚至比荒谬更坏）。（3）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这是我们最确定不移的工作，无论从原则和实践来看，或者从现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国际方面来看，都是最确定不移的工作。

既然在自己的基础上还没有完成最主要的工作，那就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里的困难就在于过渡形式。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

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①

在我们所谈的当前工作中，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看来这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竟同商业有关？！这二者之间似乎完全没有关系，毫不相干，距离很远。但是，如果从经济上来考虑，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更远。

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金子，对于好几代人说来，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不会忘记，怎样为了金子的缘故，在1914—1918年的“伟大解放”战争中，即在为了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些还是凡尔赛和约坏些这个大问题的战争中，使一千万人遭到了屠杀，三千万人变成了残废；怎样又为了金子的缘故，或者大约在1925年前后，或者在1928年前后，在日美之间或者英美之间的战争中，或者在诸如此类的战争中，一定还会使两千万人遭到屠杀，六千万人变成残废。

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金子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但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象1917—1921年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规模要大得多。目前

① 见本选集第3卷第526页。——编者注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仍然应当爱惜金子，卖金子时要卖得贵些，用金子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象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所应有的那样，我们就要照着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线密布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随之产生的现象来说，是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地用更大量的优良产品供给小农的，——那末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假定”已经实现，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马上直接实现并实际安排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联系，它用“冲击”方法没有能解决这个任务，现在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包围”行动来解决这个任务。

掌握商业，指导商业，把商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现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顿巴斯，一方面由于国营大矿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小矿井的出租，经济已经开始有些活跃，虽然还很不够，但毕竟有了一些。因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国贫困的情况下却是很可观的），我们所得到的煤，假使按成本说是百分之一百，而卖给国家机关是按百分之一百二十，卖给私人是按百分之一百四十（附带声明一下，这些数字完全是我随便举的，因为第一、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第二、即使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公布）。看来，为数虽然很小，但我们已开始掌握工农业间的**流转**，掌握批发商业，掌握这样的任务；抓住现有的落后的小工业，或者是被削弱被破坏了的大工业，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使商业活跃起来，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多数，是农民群众的代表人物，是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利用这一点来更有步骤、更顽强、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我们决不受莫名其妙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的社会主义”或旧俄国式、半贵族式、半农民式、宗法式的情绪的支配。既然有采取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必要，那就可以利用而且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在一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里立刻活跃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以便今后采取更广泛更深入的各种措施，如电气化等。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以及第二半国际的半迂腐、半狡猾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采取布列斯特和约的退却办法呢？因为我们前进得很远，所以我们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星期之内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这个大倒退（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我们

还是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能够利用“喘息时机”来胜利地前进，去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末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力量上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要使自己精神涣散，组织瓦解，要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和坚毅的精神，虽然退得很远，但是退到一定限度，我们就能及时停止退却，并重新转入进攻。

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我们正退向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我们停止退却的时间已不太远了。这次必要的退却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末，停止退却就会愈快，而我们胜利的前进运动就将愈稳固、愈迅速、愈壮阔。

1921年11月5日

载于1921年11月6—7日
《真理报》第251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86—93页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 作用和任务

(俄共(布)中央 1922 年 1 月 12 日决议)¹⁶²

1. 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工业和运输方面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还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加上土地国有化，表明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

社会主义建设形式的改变，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政策上，正在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比如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在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在改用所谓经济核算，即商业原则，这在我国文化普遍落后和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在群众的意识中造成企业行政和该企业工人的对立。

2. 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 资本主义和工会

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在一定限度内，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调节能否有效，不仅决定于国家政权，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这种调节即使十分有效，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要从各方面尽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一任务应当公开地提到首要地位，工会的机构必须相应地加以改组、改变或充实（应当设立，或确切些说，应当着手设立调解委员会，筹集罢工基金和互助基金等等）。

3. 实行所谓经济核算的 国营企业和工会

国营企业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在最近的将来，这种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也必定会是主要的。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够赢利，由于必然会发生照顾

本位利益和过于热心本位利益的现象，上述情况就难免不在各企业劳动条件的问题上，造成工人群众利益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理人员或其主管机关利益的某些对立。因此，在社会化的企业中，工会就一定要负责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根据可能促进他们物质生活的提高，经常纠正由于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而造成的经济机关的错误和过于热心本位利益的现象。

4. 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私有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经济斗争之间的根本区别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俄国共产党的纲领十分肯定地指出：我们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共产党也好，苏维埃政权也好，工会也好，都应当公开承认：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或基本上没有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全部根基还没有为电气化所割断，经济斗争就会存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显然是破坏国家机构，推翻现有的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在我们这种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任何斗争，比如，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

级野心作斗争等等，其最终目的只能是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此，无论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决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当向工人和劳动群众隐瞒这一点：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它的机关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群众在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落后。

所以当工人阶级的个别部分同工人国家的个别机关发生摩擦和冲突时，工会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圆满地解决冲突，使工会所代表的工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但要无损于其他部分工人和无害于工人国家及其整个经济发展，因为只有这种发展，才能为工人阶级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打下基础。调解工人阶级个别部分同工人国家个别机关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唯一正确、合理和适当的方法，就是工会通过它的相应机关直接参与，或者根据双方明确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同有关经济机关进行谈判，或者向上级国家机关申诉。

如果经济机关的不正确做法、某些工人的落后、反革命分子的从中挑拨或者工会组织本身的缺乏预见，在国营企业中造成了罢工等公开的冲突，工会的任务就是采取工会工作性质所规定的措施，尽快地促成冲突的解决，例如设法消除确实不正确、不合规定的做法，满足群众合理的可以办到的要求，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等等。

工会能在何种程度上采取富有远见的政策，真正从各方面保障工人群众的利益，及时消除可能造成冲突的因素，以有效地防止国营企业发生群众性的冲突，这是衡量工会工作是否正确有效的一种极重要极精确的尺度。

5. 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工会把所有雇佣劳动者都列为会员这种形式主义做法，已经造成工会中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弊病，使工会脱离了广大的会员群众。因此，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入会都必须坚决实行自愿入会制，对于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也在对宗教态度的问题上一样，工会应当是非党的。在无产阶级国家中，对于工会会员，只能要求他们了解同志式的纪律，懂得工人团结起来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和帮助劳动者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从权利和物质方面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但是工会如果不尽义务，就不应当有任何权利。

6. 工会和企业管理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个任务在俄共党纲上已经明确地提出，在战后的今天，由于经济破产、饥荒和破坏，这一任务格外重要。因此，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和尽可能地取得巩固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整个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无从谈起，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俄国目前的环境下，还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这些照例按一长制原则组成的管理机构，在同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的基础上和范围内，在保留最大的机动自由、极其严格地

检查提高生产和生产赢利的实际成绩、十分认真地选拔最优秀能干的行政人员等等条件下,应当独立处理规定工资以及分配纸币、口粮、工作服和其他种种供应品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

但是把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了解成拒绝工会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业组织和国营工业的管理,那就完全错了。在准确规定的形式下,即在下列形式下,工会参加这种工作是必要的。

7. 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 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作用

无产阶级是正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阶级基础。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在非常巧妙而谨慎地逐渐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在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一般说来,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对全体工人群众以及全体劳动者说来,工会也应当是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逐渐地也管理农业)的学校。

根据这一原理,应当规定工会在最近期间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下列几种基本形式:

1. 工会参加一切经济机关以及同经济有关的国家机关的人事安排工作,推荐自己的候选人,说明他们的工龄和经验等等。但决定权完全属于对该机关工作负全责的经济机关。同时经济机关应

当重视同级工会对各候选人所作的估价。

2. 工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人员。如果说，目前我们管理工业的行政人员完全称职的只有几十个，比较称职的也不过几百个，但是不久我们就需要几百个完全称职和几千个比较称职的行政人员。工会应当比现在更细致、更经常得多地系统调查一切适合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和农民，从各方面切实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管理工作的成绩。

3. 工会必须更加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参加经济计划、生产计划和工人物质供应分配计划的制定工作，参加选择企业的工作，哪些留作国家经营，哪些可以出租或租让，如此等等。工会不担负直接监督私人企业或租赁企业生产事宜的任何职能，而是完全通过参加有关国家机关来参与对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的调节。工会要参加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通过这些活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吸引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国家各项经济建设，使他们熟悉经济生活的整个情况，熟悉从采办原料一直到销售产品为止的工业工作的全部情况，使他们无论对于国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或实现这一计划同工农的实际利害关系，都有更具体的了解。

4. 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参加工业管理方面，一个必要的工作组成部分就是规定工资和供给的标准。这里包括，纪律裁判会应当不断地加强劳动纪律，提高文明的斗争方式，来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而决不是干预人民法院和管理机构的职权。

以上列举的只是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项最重要的职能，当然，这还应当由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机关加以详细规定。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关键是，从工会组织经济

和管理经济的巨大工作中吸取经验，同时也要从工会由于没有准备、不内行或不负责任而直接干预管理事宜而造成的为害不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自觉地、坚决地进行顽强的实际的长期工作，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来管理全国国民经济。

8. 联系群众是工会任何工作的基本条件

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这是工会无论做什么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工会组织及其机关从下级到最上级，都应当在实际当中，根据多年的经验培养和考察一批负责同志，这些负责同志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应当同工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非常熟悉工人生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地判断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真正愿望、要求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伪的臆测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群众受了某些旧偏见和旧残余多少影响，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领导一个大国（现在还没有得到更先进的国家的直接援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极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正象一家拥有优良发动机和头等机器的最好工厂，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同样，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建立得不好或工作犯错误，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到大灾难。我们仅仅解释、提示、证实这个真理是不够的，还应当工会的整个机构中，在它

的日常工作中，从组织上把它固定下来。

9.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工会内部情况的矛盾

工会各项任务之间的许多矛盾是从上述全部问题中产生的。一方面，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绝采取强制手段。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采取强迫方法。一方面，工会应当按照军事方式来工作，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顽强、最激烈的阶级战争；另一方面，正是工会应该最少采用军事的特殊工作方法。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它们又决不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不断地把他们提到愈来愈高的水平上，如此等等。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在今后几十年内所能克服的。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和社会主义萌芽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实际结论：第一、工会要有效地进行工作，仅仅正确地了解工会的任务、仅仅有正确的工会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特别的机智，善于在各种具体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群众，尽量减少摩擦，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更提高一步。

第二个结论：上述矛盾必然会引起冲突、不协调和摩擦等现象。因此必须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机关及时地解决这些冲突。这种机关就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10. 工会和专家

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已经在俄共党纲中说明。但是，如果不经常注意表明这些原理实行程度的事实，那这些原理还是一纸空文。最近就有这样的事实：第一、不仅在乌拉尔，而且在顿巴斯的社会化的矿井中，都发生工人打死工程师的事件；第二、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尔甸博尔格尔由于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自杀，而这些条件是由于党支部委员以及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不内行和不可容许的行为造成的，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把这一案件全部交给法院去审理。

对这些现象，共产党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过错，要比工会大得多。但是，现在问题不在于确定政治过错的大小，而是要作出一定的政治结论。如果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要使这个特殊阶层的专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或权利方面如此，而且在同工农同志合作方面，在思想方面也如此，也就是说，我们要使他们满意自己的工作，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有益于社会而不是为资本家阶级的私利服务的。这一切我们还不能很快办到，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办到。如果一个机关在给专家各方面保障、鼓励优秀专家、维护他们利益等等方面，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并得到实际

效果，那末，谁也不会承认它是工作得不坏的机关。

工会应当进行这方面的各种工作（或者经常参加各机关这方面的有关工作），应当不从一个机关的利益出发，而从整个劳动和国民经济的利益出发。关于专家问题，工会担负着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就是要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使他们能同专家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收到真正重大的实际效果。

11. 工会和小资产阶级 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工会只有把极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才算是真正的工会。因此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着。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³、孟什维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¹⁰⁰各政党在俄国的变种）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有这些流派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是从自私的阶级动机出发，而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他们继续信仰他们所鼓吹的一般“民主”、“平等”、“自由”的超阶级意义。

正应当用上述社会经济原因，而不是用个别集团的作用，更不是用个别人物的作用，来说明我们工会中还存在着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还会复苏）。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在工会中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流派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

对抗这种现象，加强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写于 1921 年 12 月 30 日
至 1922 年 1 月 4 日

载于 1922 年 1 月 17 日
《真理报》第 12 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 33 卷
第 155—166 页

政论家的短评

(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
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①

一 打个比方

假定有一个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空前的困难和危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他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原定的道路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仍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现在已经登到世界上没有人登过的高处,要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因为容易失足,很难观察迈脚的地方,同时没有勇往直前、走向目的地时那种兴奋的情绪等等。现在必须用绳子捆在身上,花好几个钟头,用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把绳子紧紧拴住的地方;必须象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开目的地更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条极端危险和极端痛苦的下山道路是否就要结束,是否就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截地向前走,向上爬,登上山顶。

^① 本文没有写完。——编者注

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境地，尽管他已经爬得非常高，也会有霎时的灰心，这几乎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遥远的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看着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那末灰心的时候会更多、更沉重。而这种下山甚至不能叫作（象“路标转换派”¹⁶³说的）“有制动器控制的下山”，因为使用制动器，要有周密设计的试验过的车辆、事先修好的道路和早已试用过的器械。可是，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

来自下面的声音是幸灾乐祸的。有些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高声嘲笑说：看，他就要摔下来了，他活该如此，别再发疯了！有些人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完全仿照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的方式¹⁶⁴行事。他们神情忧伤，目光悲戚。不幸，我们的忧虑竟证实了！我们耗费毕生精力来拟订一个攀登这座高山的合理计划，我们不是要求过在计划没有订好以前，先不要攀登这座高山吗？我们曾激烈地反对走现在连这个疯子本人也放弃了的道路（看，看，他后退了，下来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挪动一两俄尺！可是，当我们不断要求稳重和谨慎的时候，我们曾遭到最难听的辱骂！）。我们严厉地斥责过这个疯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帮助他。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攀登这座高山的伟大计划的热爱，千万不要糟蹋了这个伟大计划！

幸亏，我们打的比方中所假想的这位旅行家，听不到这些设想登山的“真实朋友”的声音，否则也许要使他反感了。而反感，据说是不能使人头脑清醒、脚步稳健的，尤其是在那极高的地方。

二 不用比喻

打比方不是证明。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妨再把这些道理提一下，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比方的有效界限。

不仅同 1789 年和 1793 年相比，而且同 1871 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必须尽可能冷静、明确和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经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这样就会使人头脑清爽，既没有反感和错觉，也不会灰心失望。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

我们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尤其宝贵的是，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在，那末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爆发反动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在 1912 年和 1914—1918 年，工人的叛徒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¹⁰⁰的英雄们，曾用《巴塞爾宣言》¹⁰³愚弄了自己和工人，但是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很难再次满足于这种宣言了。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更替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使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日益完善”。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

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向来确认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可是，我们暂时还是单独地并且是在一个落后的、比别国破坏得更厉害的国家里做了很多事情。此外，我们还保存了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的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重新着手进行那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做那还没有完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一定要失败的。有些共产党员既不沉溺于错觉，也不悲观失望，一直保存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失败的，而且是一定不会失败的。

我们尤其不容许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究竟在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而世界上与我们并存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我们富庶千百倍、在军事上强大千百倍的国家，却在“它们的”即为它们所称颂、所熟悉的、经历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继续倒退着。

三 论捉狐狸；论列维；论塞拉蒂

据说，捉狐狸最可靠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一定距离内把侦察到的狐狸用带有许多小红旗的绳子在离雪地稍高的地方围起来。狐狸害怕这种显然是人为的即“人造的”设置，只有当用小红旗筑成的“围墙”微微启开的时候，它才跑出来，而猎人就在那里等着它。对于这种人人都要追捕的野兽来说，谨慎似乎是一种最好的品质。可是在这里“优点的继续”却变成了缺点。狐狸的被捉，正是由于它的过分谨慎。

应当承认，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¹⁵⁰上也因过分谨慎而犯了一次错误。在这次大会上，我站在最右翼。我相信，当时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因为当时有大批“有威信的”代表，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很多同志为首，采取了一种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左的立场，对于不宜立刻直接采取革命行动的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他们没有作冷静的估计，而是加紧挥舞小红旗。由于谨慎，由于想不让这种无疑是不正确的左倾带给共产国际的全部策略以错误的方向，我当时曾竭力替列维辩护，说列维的失去头脑（我当时并没有否认列维失去头脑），也许是因为对左派错误的过分害怕，并且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失去了头脑的共产党员，以后又重新“找到了”头脑。在“左派”攻击的时候，我甚至说，就假定列维是孟什维克，仍旧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十五年的全部历史（1903—1917年）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

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例如，1907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显然，我们当时同“左派”的争论已经过时了，已经由现实生活解决了。在对于列维的问题上，我当时是不对的，因为列维已经有效地证明，他走上孟什维克的歧途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不仅仅是因反对“左派”极危险的错误而产生的“矫枉过正”，而是出于他的本性，是长时期的，持久的。列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诚恳地承认必须重新申请入党，象一个因愤恨左派的若干错误而暂时失去头脑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而开始卑鄙地诬蔑党，暗地里陷害党，这就是说，实际上是在替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效劳。德国共产党人为了回答这一点，最近又从自己党内开除了几位暗中帮助保尔·列维干这种高尚勾当的老爷，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证明，它们已经认识到左派在这次大会上所犯的错误，并正在渐渐地、慢慢地、但却在不断地加以纠正。它们正忠诚地执行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欧洲议会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轻轻涂上一层革命色彩的改良主义的旧型的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真正共产主义的新型的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法国的例子证明了这一困难。这个例子恐怕是最明显的了。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一切平凡细小的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要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的、但也是最重要的事情。1921年和1922年初，欧美许多资本主义

国家都处在革命斗争极度尖锐化时期的间隙，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利用这种间隙(大概是非常短促的)来对本党的全部机构和工作进行这种根本的、内部的、深刻的改造，那他们就将犯下极严重的罪行。幸而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在欧洲和美洲，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先锋队的工作，已经不声不响地、暗暗地、悄悄地、慢慢地但是深入地开始了，并且这种工作正在继续进行。

甚至从观察捉狐狸这样一件平凡的事情中得出的政治教训，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一方面，过分谨慎会犯错误；另一方面，又不忘记，如果只凭“热情”或挥舞小红旗而不冷静地估计客观情况，那就会犯无法纠正的错误，就会在困难虽然很大但灭亡决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遭到灭亡。

保尔·列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想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过错误的著作。我们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这一点：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¹⁶⁵。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犯过错误(1918年底1919年初出狱后，她已经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德国共产党人很不应该地迟迟不出版她的传记和全集，由于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只能部分地原谅他们)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

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臭尸了。”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保尔·列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让他们去高兴吧。

谈到塞拉蒂，那只能把他比作一个臭蛋，打开来时，拍的一声，冲出一股特别……刺鼻的气味。他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提议通过一个准备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定的决议，然后把一位老头子拉查理派到这个大会上，最后用马贩子的卑鄙手段来欺骗工人，这真是太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正在意大利培养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党，现在就会把这一政客骗局和孟什维主义的明显例子揭露在工人群众眼前。这种例子有益的、使人厌弃的作用，虽然不能立刻就表现出来，但经过反复多次的明显的教训，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不要脱离群众；在向普通工人实际揭露塞拉蒂的一切骗局的艰苦工作中，不要失掉耐心；不要作出太轻率的和最危险的决定；在塞拉蒂说“a”的地方，就说“负a”；要始终不渝地教育群众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采取革命的行动；在实践中巧妙地利用法西斯主义所给予的确实很出色的（虽然代价很高）经验教训。这样，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胜利就有把握了。

列维和塞拉蒂之所以有典型意义，并不是由于他们本身，而是由于他们是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标本，是“他们的”阵营的，即反对我们阵营的国际资本家阵营的标本。“他们的”整个阵营，从龚帕斯到塞拉蒂，对我们的退却、我们的“下山”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都在幸灾乐祸，欣喜若狂，或者洒下几滴鳄鱼眼泪。让他们去幸灾乐祸吧。让他们去排练他们的丑角戏吧。让他们去高兴吧。但我们决不被错觉和灰心所支配。不怕承认自己的错

误，不怕一次又一次地改正这些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
从龚帕斯到塞拉蒂这个国际联盟的事业，是日暮途穷的事业。

写于1922年2月底

第一次载于1924年4月
16日《真理报》第87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174—182页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¹⁶⁶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已由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一、二两期合刊上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一、二两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纲领规定得更确切些。

这篇发刊词说: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的虽不全是共产党员,然而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结成这样一个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并且这样的联盟可以正确地规定杂志的任务。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也是如此。可喜的是俄国先进社会思想中的主要思潮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且不谈格·瓦·普列汉诺夫,只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够了。现代的民粹派(人民社会党人²²和社会革命党人³等)由于一味追随时髦的反动哲学学说,往往离开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向后倒退，他们被欧洲科学中所谓“最新成就”的假象所迷惑，不会在这种假象下面辨认替资产阶级及其偏见和反动性效劳的各种伎俩。

无论如何，我们俄国还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定还会有——一些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而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派，反对所谓“有教养社会”的种种哲学偏见，是我们绝对的义务。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的儿子即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成就的著作家混为一谈——对现今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实际上大多数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的话所作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敢正视真理。只要稍微想一想现代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锋利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占绝大多数的时髦哲学流派，从那些和镭的发现有关的哲学流派起，到那些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由此可见，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机关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机关刊物，这就是说，不管一切现代“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是官方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志愿兵，都应坚决地加以揭

露和追击。

其次，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机关刊物。我们有些主管部门，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是专门抓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这大概是由我们道地的俄罗斯式的（虽然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的一般条件所造成的。因此，为了协助有关国家机关进行这一工作，为了纠正和加强这一工作，这个以担当战斗唯物主义机关刊物为己任的杂志，就要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密切注意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一切有关文献，把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或者至少应该摘要介绍。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¹⁶⁷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有时人们用各种“动听的”理由来为我们这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进行辩护，例如说十八世纪无神论的老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等等。这种不是掩盖学究习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是再坏也没有了。当然，在十八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对宗教作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

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

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因为这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了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却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另一方面，你们看一看用现代科学态度批判宗教的那些代表人物吧。这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驳斥宗教偏见时差不多总要“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这就马上暴露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奴隶，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举两个例子。罗·尤·维彼尔教授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题名《基督教的起源》的小册子（莫斯科“法罗斯”出版社印行）。作者叙述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但他不仅没有反对教会这种政治组织的武器，即种种偏见和骗局，不仅回避了这些问题，而且表示了一种简直可笑而反动透顶的奢望：他要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上。这无异是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而资产阶级则从他们在世界各国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利润中拿出几亿卢布来维持宗教。

德国的著名学者阿尔都尔·德列福斯在他的《基督神话》一书

中驳斥了宗教偏见和神话，他证明根本就没有基督这样一个人，但在该书末尾，他却主张要有一种宗教，要有一种刷新的、去芜存精的、巧妙的、能够抵抗“日益汹涌的自然主义潮流”的宗教（1910年德文第4版第238页）。德列福斯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和自觉的反动分子，他公开帮助剥削者用更为卑鄙龌龊的新的宗教偏见来代替陈旧腐朽的宗教偏见。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翻译德列福斯的东西。这只是说共产党员和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结成联盟，但是当这些进步分子变成反动的时候，就要坚决地揭露他们。这只是说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因为通过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同德列福斯一流人物结成“联盟”，是我们为了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所必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机关刊物，就必须用许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评介有关的著作，纠正我们国家机关在这方面工作中的大量缺点。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那些有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比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组织同宗教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子。

凡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材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宗教同资本的正式的、官方的、国家的关系在美国表现得比较少。然而我们已经更清楚地看出，所谓“现代民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等对这种民主崇拜得五体投地），无非是有自由宣传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东西，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宣传最反动的思想、宗教、蒙昧主义以及为剥削者辩护

等等。

我希望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机关刊物的杂志，能为我国读者登载一些评介无神论书籍的文章，说明哪些作品在哪一方面适合哪些读者，并指出我国出版了一些什么书（译本较好的才能算数，但这样的译本还不怎么多），还应出版些什么书。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是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一、二两期合刊上登了阿·季米里亚捷夫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由此可以期待，这个杂志也能实现后一个联盟。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问题。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季米里亚捷夫在杂志第一期上不得不声明，爱因斯坦（用季米里亚捷夫的原话来说，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积极的攻击）的学说已被各国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利用，其实不仅爱因斯坦一人的遭遇如此，就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自然科学的许多大革新家，甚至大多数的革新家的遭遇都是如此。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这种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

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在历史上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至今仍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处于停滞和腐败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他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阐明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引用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引用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来加以评注。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而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却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

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有步骤地去执行这

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用谢德林的话来说,它就不能打人,而只有挨打。¹⁶⁸不这样做,大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自然科学进步得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以致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虽然与哲学问题无关,但终究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也要注意的社会问题有关。

这个例子表明,现代伪科学实际上是最粗暴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

不久以前我收到了“俄罗斯技术协会”第十部出版的第一期《经济学家》杂志(1922年)。寄这个杂志给我的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大概还没有时间了解一下这本杂志的内容)轻率地对这个杂志大表赞同。其实,这个杂志是现代农奴主的机关刊物,其自觉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这些农奴主当然是披着科学、民主主义等等外衣的。

有一位叫皮·亚·索罗金的先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战争的影响》的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大作。这篇深奥的文章堆满了作者从他自己的著作和他的许多外国师友的“社会学”著作中引来的种种深奥的论据。请看他的妙论吧。

他在第八十三页上说道:

“现在彼得格勒每一万起婚事中,有九十二点二起离婚事件,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每一百起离婚事件中,又有五十一.1是结婚不满一年的,其中有百分之十一不满一个月,百分之二十二不满两个月,百分之四十一不满三个月至六个月,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超过六个月的。这些数字表明,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过是掩盖私通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依法’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了。”(《经济学家》第1期第83页)

无疑地，这位先生以及出版这个杂志并刊登这种议论的俄罗斯技术协会，都是以民主拥护者自居的；当他们听见人家叫他们的真实名字，即叫他们农奴主、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关于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以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即使是在所有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以农奴主的态度对待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方一切类似他们的党派继续高呼民主，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民主。事实上，在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地位这些问题上，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是唯一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最直接涉及每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人口利益的问题。虽然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自称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第一次在这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既反对反动思想和农奴制度，又反对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通常所表现的假仁假义。

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一万次结婚中有九十二次离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只好认为，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同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那就是这位作者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故意歪曲事实。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资产阶级各国社会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里实际的离婚事件（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要多得多。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法律不把假仁假义、妇女和儿童的无权地位奉为神圣，而是公开用国家政权的名义对一切假仁假义和一切无权现象作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必须对这一类现代的“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其中也许有不少人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年的职务，虽然他们不配做这种工作，正如臭名远扬的堕落分子不配在儿童学校做训育工作一样。

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了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老早就把这一类的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一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

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

1922年3月12日

载于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

署名：尼·列宁

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8—207页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¹⁶⁹上)

(鼓掌)同志们!请允许我这次做中央的政治报告,不从年初开始,而从年终谈起。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热那亚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报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我在3月6日的演说(这个演说已经发表)中也谈过这个问题的要点^①,所以,如果你们不特别要求我来作详细的说明,那就请你们允许我不再谈这个问题的细节了。

热那亚会议¹⁷⁰的一般情形,你们都已知晓,因为我们的报刊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用了很多篇幅,依我看,甚至是太多了,多得有损我国整个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的真正的、实际的和迫切的需要了。在欧洲,在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很喜欢在热那亚会议问题上大做文章,喧嚣一时,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这次(而且不仅这次)竟模仿他们的样子,而且模仿得太过分了。

应当指出,我们中央已经采取最缜密的办法,由我国优秀外交人员组织一个代表团(现在我们已有相当数量的苏维埃外交人员,和苏维埃共和国初成立时不同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给我国去热那亚的外交人员拟定了十分详细的指令,这些指令草拟了很久,而且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3—190页。——编者注

作了多次反复的讨论。不言而喻,这里的问题,我虽然不能说是个军事问题,因为军事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解,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比赛问题。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有一个非常强大、比其他派别都强大得多的派别,正在想破坏热那亚会议,但也有无论如何要坚持召开并竭力设法使它开成的一些派别,现在后一种派别占了上风。最后,在资产阶级国家阵营里,还有一种可以叫作和平主义的派别,应该把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¹⁰⁰也包括在内。这一资产阶级阵营企图坚持几项和平主义的建议,并确定类似和平主义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这种和平主义是有一定看法的,不过这里完全没有说明这些看法的必要。显然,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我们要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就要看我们外交人员的艺术了,虽然这之间的关系并不大。

我们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醉心于和平主义(虽然它是最坏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东西)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所区别的。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只能算是一个蹩脚的商人。

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但是,我们不能担保热那亚会议一定成功。作这样的担保是可笑的、荒谬的。应当指出,在最冷静最谨慎地估计热那亚会议现在所具有的种种可能以后,我始终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可以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

如果在那里,我们的对方很识时务,不过分固执,那就通过热

那亚会议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硬要固执，那就在会外达到这一点。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几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暴露得最突出的利益，就是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对俄国的贸易。既然有这种利益，即使有辩论、有争执、有各种意见分歧——甚至很可能弄到决裂的程度，但最后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还是会给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放心。我不能担保哪天成功，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关系，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于这方面的关系可能怎样中断，这一点我到下面有关部分再谈，我想，关于热那亚问题可以讲到这里为止。

当然，那些还希望更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的、看了报上公布的代表团名单还不满足的同志，可以选出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小组来了解中央所有的材料、信件和指令。当然，我们所拟定的细节是带假设性的，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都是谁出席这次热那亚会议，他们会提出哪些条件，是先决条件还是附带条件。我想，在这里研究这一切问题是极不适当的，甚至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再说一遍，代表大会完全可以通过小组或委员会收集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公布的和中央现有的各种文件。

我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我相信，我们最大的困难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不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欧洲资产阶级报纸故意吹嘘和存心夸大这次会议的意义，欺骗劳动群众（在所有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和共和国里，十分之九的资产阶级报纸总是这样做的）。我们多少受了这种报纸的影响。我们的报纸仍旧受着资产阶级的老习惯的影响，不愿转上新的社会主义的轨道，

因此我们小题大作，掀起了不必要的喧嚷。其实，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经历过1917年以来的艰苦岁月、见过自那以后各种严重的政治局面的共产党人说来，热那亚会议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问题。我不记得，我们中央和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意见分歧或争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共产党人（尽管他们也有各种差异）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我再重说一遍，我们是以商人身分去热那亚的，是为了寻求发展贸易的最有利的形式，这种贸易已经开始，已经在进行了，即使有人能用强力使它中断一个时期，但过后它仍然会发展起来的。

因此，关于热那亚问题就简短地说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我认为过去一年和今后一年中的政策上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或者说，至少我的习惯是如此），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总结年度内做了哪些工作，而且应当指出这一年得到了哪些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从这一年中学到一点东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度的政策。

主要的问题当然是新经济政策。整个总结年度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标志下度过的。如果说，我们这一年做出什么重大的和不可抹杀的成绩（对这一点我还不那么相信），那也不过是从这个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一年来我们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确学到了很多。至于我们是否真正学会以及学会了多少，这大概就要由今后发生的很少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件来检查了，例如，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就是如此。我觉得，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主要应当注意如下三点，这是一切议论的基础，是记取上年度经验和取得下年度实际教训的基础。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查我们是否真正达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前一时

期，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主要放在或者说几乎都放在抵抗侵略的任务上，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考虑这个结合问题，那时我们还顾不到这一点。那时我们刻不容缓的万分紧急的任务，是如何防止立刻被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扼杀的危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放松这种结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次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解决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应当承认，一般说来我们党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用各种不同观点来估计情况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由于军事事态和政治事态的发展，由于旧的文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各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在我国还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至少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的时候，首先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一个缺口。我国极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细小的个体经济。我们把我们拟定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纲领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常规。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大体说来，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犯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总的说来，农民群众看到并且懂得，为了保卫工农政权不被地主扑灭，不被资本主义的侵犯所扼杀，为了使全部革命果实没有被夺去的危险，他们肩负起这些重担是必要的。但当时国有化和社会化的工厂、国营农场所建立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这一点我们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

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发生任何犹豫。

看看国外俄国各党派大量出版的报刊对我们这个决定所作的各种估计,那真好笑极了。这些估计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现在还说左派共产主义者⁵²至今仍然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在1921年回忆着1918年的事情,回忆连我国左派共产主义者自己都忘记了的事情,他们至今还在反复地回昧着这一点,硬说这些布尔什维克是狡猾撒谎的人,向欧洲隐瞒着内部的意见分歧。当你读到这里,你就会想:让他们去摸不着头脑吧!既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有这样的看法,那就可以根据这点来断定这些现在逃往国外的似乎极有教养的旧人物的认识程度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我们试图建立的那种新经济并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我们只是刚刚接近这种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人们还常常在我们的报刊上到处去寻找这个意义,但是找得不对头)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

我们不顾一切旧的东西,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硬要坚持:我们既然十分勇敢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根据没有呢?这没有一点根据。

我们一开头就说过,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

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一定会犯一些错误。主要的是应该善于清醒地看出什么地方犯了错误，把一切都从头加以改造。既然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地把一切都从头加以改造，那正说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现在主要是如何正确地吸取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应该这样做，我们也愿意这样做。既然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愿意做到这一点，而且一定会做到这一点！），那就应该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是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的生产、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同千百万农民借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要首先建立这种结合。我们做一切事情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能把这种结合建立到何种程度，同时又不破坏我们已经不熟练地开始建设着的東西。

我们建设自己的经济是同农民有联系的。我们应该多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且应该把它安排得能使我们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所进行的工作结合起来。农民尽力干活，是为了挣脱贫困，并不异想天开（因为他们为了摆脱极痛苦的饿死的直接威胁，怎么会异想天开呢？）。

应当把这种结合表现出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让全国人民看到它，让全体农民群众都看到；他们现在空前破产、空前贫穷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同人们为了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工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要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了解到，他的境况得到了哪些改善，而且是与地主当政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

那时只有少数农民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改善无疑是有的，甚至很大），但是那种改善往往同对农夫的讥笑、侮辱和嘲弄是分不开的，同对群众的暴行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俄国哪个农民也没有忘记，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目的是要恢复这种结合，是要用事实向农民证明：我们是用农民所了解、所熟悉、而且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可以行得通的办法，而不是用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办法开始的；要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员此刻在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关头，正在实际上帮助他们。我们必须证明这一点，不然农民就会把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我国全部政策的根据。这是我们过去一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教训，也是本年度我们主要的所谓政治准则。农民给我们信贷，当然，他们有了过去的经历，不会不给我们信贷。广大的农民群众都同意这样做：“好，既然你们不会，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也许你们以后会学会。”但是这种信贷不可能是取之不尽的。

应该明白这一点：负债的人总是要着急的。要知道，全国农民不再给我们信贷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最敬爱的执政者，虽然好几个月、好几年地一再延期，但是，你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帮助我们摆脱贫困、饥饿和破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办法。你们有本领，你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受到的一次考试，归根到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命运。

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直接要做的事业呢？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否有点用处呢？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末，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

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使他们永远看到我们毕竟是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我们。可是第一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无可隐讳的。但我深信（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十分明确地肯定地作出这个结论），只要我们领会到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全部巨大的危险，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是能够解决这个任务的。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我认为，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第二个是比较局部的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合营公司——关于合营公司我下面还要略微谈一谈，——这些公司也象我们的全部国营商业和全部新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我们共产党人采用商业方法和资本主义方法的表现。这些公司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进行实际竞赛。实际地较量一下吧！我们过去只是制定纲领，许下诺言。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没有纲领和诺言就不能发动世界性的革命。如果白卫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内，为这一点骂我们，那只说明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社会党人根本不懂得革命是怎样发展的。不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无从着手。

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而不是仍旧让那些共产党员组成的监察机关来检查，虽然这些监察

机关组织得非常好，虽然它们无论在苏维埃机关或党机关的系统中几乎可说是尽善尽美的监察机关。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种检查，而是从群众的经济着眼来进行的一种检查。

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但他们做起来很恶劣，就和强盗一样，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共产主义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都知道。

“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去年春天就听到这种话了（并不总是听得很清楚的），这些话竟成了去年春天整个危机的根源。“你们倒是一些好人，可是经济工作，你们虽然担当了起来，却不会做。”这就是去年农民以及一些工人阶层通过农民对共产党提出的最普通最致命的批评。新经济政策中原有的这一条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就在这里。

检查必须是真正的检查。资本家在一旁活动，在抢劫，在榨取利润，他们有这种本领。可是你们用新方法试试看：你们没有利润，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的，你们这些圣人简直要活着升天堂，但是，事情会不会做呢？这需要检查，需要真正的检查，而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和提出责难、再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处罚办法的那种检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从国民经济着眼来进行的真正检查。

农民借给共产党的信贷比借给任何其他政府都多，而且农民同意一再延期归还。当然，共产党曾帮助农民摆脱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农民很珍视这一点，正因为这样，农民才答应延期还债，但总得有一定期限。他们以后就要来检查：你们是不是会经营得不亚于别人？旧日的资本家会经营，你们却不会。

这是第一个教训，这是中央政治报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一年来已经证明了的。我倒很想举几个“国营托

拉斯”（用屠格涅夫如此赞颂过的这种优美的俄罗斯语言来说）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怎样经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生病的关系，我不能很好地准备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能根据自己对现状的观察谈谈一些看法。这一年来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主要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继续存在。现在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全体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既然不会，就要从头学起，这样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依我看，这是主要的根本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以为谁这样想，谁就不开通，没有学过共产主义，——也许学一下就会懂得的。不，对不起，问题不在于农民和非党工人没有学习共产主义，而在于发挥纲领、号召人民实现伟大纲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证明，你们在目前困难的情况下有本事实际帮助工人和农民的经济，让他们看到你们经得起这场竞赛。

我们开始设立的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外国私人资本家参加，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确地展开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表明并且学会：我们能够比资本家更好地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能够在农民的目前落后状态下帮助他们前进，因为要在短时期内改造农民是不可能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纯政治的问题和困难，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一点你们都知道，既有热那亚会议，又有武装干涉危险。困难很大，但这些困难同上述困难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在那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怎么办，在

那方面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也领教过资产阶级的外交。这套玩意孟什维克已经教了我们十五年，也教会了我们一些有益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同普通的店员、资本家和商人竞赛并且胜过他们，他们到农民那里去，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不会争论共产主义），而是去争论：如果你们需要弄点什么东西，要交易得好，建筑得好，那可以由我来办，价钱虽然贵，可是让共产党员来办，也许更贵一些，甚至贵上十倍。这种宣传就是现在问题的本质，经济根源之所在。

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获得了人民的信贷，并且可以延期偿还，如果用新经济政策的用语来说，这叫作期票，但这些期票并没有注明期限，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兑现，从票面上是看不出的。危险就在这里，这些政治期票和普通商业期票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并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还是用那个伟大的俄罗斯语言来说，这里存在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优秀的，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买卖，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也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虽然不是四十座金字塔¹⁷¹，也是四十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凝视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他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

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

同志们,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种起初不懂的状况,那就是一个极大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应该抱定这种信念:我们既然不懂,我们就要从头学起。我们到底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甚至不是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说什么你是共产党员,他是非党的店员,也许还是一个白卫分子,的确,他很可能是白卫分子,但是,他会做经济上非做不可的工作,而你却不会做。你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有上百个官衔和称号,又是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功臣”,只要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是可以学会的。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主要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没有普遍地使全体共产党员都相信,现在我们俄国负责的和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必须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次严重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我们打垮。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这场竞赛很重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曾经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来克服我国的政治困难和经济困难。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各种途径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但是现在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请让我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的确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这里最近将有战斗，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什么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绕。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把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考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考好这次考试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我们缺乏本领而外，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既有政权，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我们就是缺乏本领。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吸取这个简单的教训，把它当做我们在整个1922年的行动指南，那时我们就连这个困难也能战胜，虽然这个困难要比以前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本身。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敌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识我们非认识不可的不愉快的真理，也不愿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我看，这是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补充的教训，就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可惜，这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同志没有参加，我本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还是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说吧。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的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去看旧书本。可是旧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如果象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把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字全面考察一下，

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打中目标。

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一切政治优势,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你们一定记得,我们是从建立贫农委员会¹⁷²起开始这项工作的)。所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基本的一点: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任何理论、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探讨过,原因很简单,通常一切同这一名词有关的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国的社会制度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领导这个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有些人不愿了解,我们说的“国家”指的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应当给以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会这样做。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握有充分的、极其充分的政治权力,也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但是我们却缺少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领,工人阶级先锋队已被提升出来,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清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使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这种本领,但是我们恰恰缺少这种本领。

要知道,革命先锋队——无产阶级掌握了极其充分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情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

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为广大农民所需要，为必须做买卖来满足农民需求的私人资本所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人民就不能生活。其余一切东西对于他们这个阵营，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一切东西，他们是完全可以迁就的。你们是共产党员，是工人，是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你们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你们的意志来行动。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主要之点。应该在这个主要方面从头学起；只有当我们完全领会到和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担保说，我们能够学会这点。

现在我来谈谈停止退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已经谈过了。^①从那时起，无论在党的报刊上，无论在同志们的私人信件中，无论在中央委员会里，我还没有听到过反对的意见。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报告大纲，这个大纲的内容就是要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所做的报告中竭力强调停止退却的问题，并请求代表大会代表全党作出相应的必须执行的指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0—197页。——编者注

令。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地方，总的说来，我们的退却总算进行得比较有秩序。不错，曾经从不同的方面发出过不少言论，想使这次退却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有些人说，你们在某些部分退却得不对，例如，那个取名“工人反对派”¹³⁰——我认为他们这个名称取错了——的集团中某些代表就是这样的。他们过分热心地往一个门里跑，结果却跑进了另一个门¹²⁵，这一点现在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活动不是在纠正我们的运动，而实际上不过是在散布惊慌情绪，妨害有纪律地进行退却。

退却本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已经惯于进攻的革命家，尤其是在他们几年来惯于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在他们被一味幻想进攻的各国革命家包围着的时候，那更是一件难事了。有些外国革命家看见我们在退却，竟不可容许地象小孩子似地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的感情和热望，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在退却而嚎啕大哭起来。我虽然在西欧这些很好的民主国家里侨居多年，但是现在也许我已经很难领会西欧人的这种心理了。也许在他们看来，退却实在难于理解，因此嚎啕大哭起来。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我们明白，正因为我们许多年来这样顺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而且是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失去了物质前提的国家里！），为了巩固获得这么多的战果的进攻，我们实行退却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不能保持住一举夺来的全部阵地；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依靠工农蓬勃的热情一举获得了无数的胜利，我们才有这么宽

广的地盘,使我们可以退得很远,甚至现在还可以退得很远,而丝毫不丧失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虽然惊慌失措的言论,其中包括“工人反对派”的言论(他们最大的害处也就在这里!),在我们中间造成了部分的损失,发生了违反纪律、不能正确退却的事情,但是总的说来,退却是相当有秩序的。退却时最危险的东西就是惊慌失措。在这里,我打个比方,假定全军都在撤退,那全军就不会有前进时的那种情绪。那时处处都会看到相当沮丧的情绪。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诗人,他们写道:看!在莫斯科,饥寒交迫,“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这样的诗作在我们这里是很多的。

显然,这是退却所造成的。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用不着维持纪律,大家自己就会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更加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明白、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所看到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稍微有一点惊慌的言论,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确的退却发生混乱时,就要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

当我们实行空前困难的退却的时候,当全部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秩序的时候,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不仅对于我们党内的某些事件应该如此,而且对于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所有先生们更应该如此。

前几天我在《共产国际》杂志⁶¹第二十期上读到了拉科西同志的一篇文章,是评论奥托·鲍威尔的新著的。我们大家过去都向鲍威尔请教过,但是,他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了可怜的市侩。他

现在写道：“看，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向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³，都在宣传这些东西，他们听到我们说要枪毙进行这种宣传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确实感到很诧异，然而问题很清楚：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一百倍，因为在进攻时大家都会向前冲。可是在退却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开始向后逃窜，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

正是在这种关头，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许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孟什维克说：“你们现在才退却，我一向都是主张退却的，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我是你们的人，让我们一块退却吧！”那我们就要这样回答他们：“凡是公开宣扬孟什维主义的人，我们革命法庭一律要处以死刑，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天晓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说：“这些人的独裁癖多么厉害呵！”他们直到现在还以为，我们所以要惩办孟什维克，是因为他们在日内瓦同我们吵过架。如果我们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政权大概连两个月也保持不住。其实，无论是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者们的说教，还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教，都表现了他们的本意：“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向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复这一点吧。”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一点，让我们枪毙你们吧。或者是你们竭力不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我们处于比白卫分子直接侵犯时更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如果你想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罪的白卫分子。”我们决不当忘记这一点。

我说停止退却，这决不是说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意见

恰恰相反,如果我的讲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手忙脚乱的现象,那种要把一切都按新的样子来创建和改造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是的,这种公司还很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了九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领导的委员会批准了六个,北海白海地区森林工业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一来,现在得到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十七个了(当然,由于我们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很可能有错过机会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已经有了,不过还不多。这个小小的但是实际的开端表明,人们已在评价共产党员,根据他们的实践来作出评价,而且作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但毕竟这些机关在审查共产党员时……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威信的。(笑声)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已经同共产党员一起办合营公司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总算能办一些事情了,尽管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我们毕竟在开始时取得了一点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是很充沛的)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还只办了十七个合营公司。

这一点证明,我们是多么不灵活、多么蠢笨,证明我们还有多少奥勃洛摩夫习气¹⁴⁶,因此我们一定还要挨打。但我再说一遍,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侦察工作已经完成。资本家如果没有起码的活动条件,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一小部分,

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胜利。

当然，他们还会在合营公司内部打我们，而且会把我们打得几年以后才能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说这就是胜利，这只是一种侦察，它表明我们已经有了活动场所，有了一块地方，我们可以停止退却了。

通过侦察工作判明，已经同资本家订立的合同并不多，但究竟是签订了。这方面还应该继续学习，继续活动。就这点说来，是中止神经过敏、叫喊和忙乱的时候了。人们纷纷写条子和打电话来问：“既然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这里能否也改组一下？”大家都乱忙一阵，漫无秩序；谁都不做实际工作，都在谈论怎样适应新经济政策，结果一无所成。

可是，商人们却在嘲笑共产党员，大概还会说：“过去有过劝说司令¹⁷³，现在又出了空谈司令。”资本家在嘲笑我们，说我们坐失时机，错过机会，——这是无可怀疑的，因此我提议，要用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这个指令。

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典型已经有了，虽然为数很少。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不要再卖弄聪明、高谈阔论了！诗，让诗人去写好了，这是他们的本分。但是，经济工作者，请你们再不要侈谈新经济政策了，请你们更多地建立这种合营公司，检查一下善于同资本家竞赛的共产党员有多少！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配置力量。这就是代表大会应当作出的指示，这个指示应当结束混乱忙碌的情况。安静点吧，不要自作聪明，这是有害的。要在实际上证明，你工作得并不比资本家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同农民建立经济结合；你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应该同农民经济建立结合。

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政权在你手里，许多经济资料在你手里，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你应当清醒一些来观察事物，抛弃浮夸心理，脱掉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一定会战胜私人资本家。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大批经济资料；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那时，普通的农民就会看到，我们是在帮助他；那时，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虽然这种步伐慢一百倍，但却稳当可靠一百万倍。

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我们应该用某种形式把这个口号正确地变成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想结合这一点，谈谈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究竟是蜕化，还是策略这个问题。路标转换派分子¹⁶³就是这样提问的，你们知道，他们是在俄国流亡者中形成的一种派别，一种社会政治派别，领导这一派别的是立宪民主党²的一些大头子，前高尔察克政府的一些部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正在建设俄罗斯国家，因此要跟这个政权走。路标转换派发表议论说：“但是这个苏维埃政权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员说，在建设共产主义国家，并且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哄骗私人资本家，然后，据说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实际上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蜕化，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他们有些人冒充共产党员，但是也有比较坦率的，乌斯特里雅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好象在高尔察克手下当过部长。他不同意他的伙伴们的意见，他说：“关于共产主义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行，

但我断定，这一切并不是他们的策略，而是蜕化。”我认为，乌斯特里雅洛夫这种直言不讳的声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话”，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我每天都听到“共产主义谎话”，有时听得简直要恶心，难受死了。最近到了一期《路标转换》杂志，它不是说这种“共产主义谎话”，而是直率地说：“你们那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不过是你们的想象而已，其实，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不过有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子罢了。”这话很有益处，因为我们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的，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我们从周围经常听到的谎话，而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阶级真话了。看看这种东西是很有益的，因为它这样写并不是由于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只能这样写或不许那样写，而是由于这的确是阶级敌人粗暴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乌斯特里雅洛夫虽然是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分子，支持过武装干涉，但现在他却说：“我拥护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是因为它踏上了滚向通常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这是很有益的话，我认为必须加以重视；路标转换派这样写，对我们说来，比他们某些冒充共产党员几乎冒充得很象的人要好得多，因为远远看去真假难分，——他们也许相信上帝，也许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应该老实说，这种坦率的敌人倒是有益的，乌斯特里雅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应当欢迎路标转换派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敌

人力图使这种危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问题。现在没有人直接进攻我们，也没有人扼住我们的喉咙。至于明天会怎样，我们还要看看再说，不过今天还没有人拿着武器来进攻我们，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敌人在什么地方攻击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谈共产主义竞赛，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出发，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的发展出发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拚命的疯狂的斗争，如果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生死斗争。

这里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的政治权力是非常充分的。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在处理某个实际问题时，在某个事务机关中，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权力不够。主要的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和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不管租借在某些地方有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很小的，它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过渡到共产主义。究竟还缺少什么呢？缺什么，很明显：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的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是很怀疑的。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真象我们小时候听人讲的历史故事。据说：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为征服者，而被征服的则成为失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得。至于这两个民

族的文化怎样呢？那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形呢？四千七百合个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被迫接受别人的文化呢？不错，这里可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可是总比我们那些做负责工作的党员高得多，因为这些做负责工作的党员没有足够的做管理工作的本领。共产党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故意拿他们当招牌。承认这一点是很不愉快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很愉快的，但我觉得，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看，这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教训，而且1922年的斗争也将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国共产党的做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做管理工作呢？是否了解他们以为自己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如果他们能够了解，那他们当然能学会做管理工作，因为什么都是可以学会的，为此就应该学习，可是我们有些人就不学习。他们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

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种竞赛似乎在所有国家机关中都有，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在莫斯科各中央机关，从文化上来说，也还没有解决。因为资产阶级的活动家往往比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内行，虽然我们党员掌握了全部政权

和一切资源,但是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政权。

我想从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中引证一段话。这本小册子是在维谢冈斯克城(特维尔省有这样一个县城)于俄国苏维埃革命一周年纪念日——1918年11月7日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位维谢冈斯克的同志大概是个党员。这本书我是很久以前读的,因此不敢担保现在不会引错。他谈到自己怎样开始装备两个苏维埃工厂,怎样吸收两个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工作,并且是按照当时的办法做的,即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威胁强迫他们参加工作的。这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吸收来恢复工厂的。我们知道在1918年是怎样吸收资产阶级的,(笑声)所以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讲;现在我们采用了另一种办法。但是,请听听他的结论:“仅仅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我们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看,这是多么精彩的话呵。这句精彩的话说明,甚至在维谢冈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1918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非作歹,甚至致他于死命,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一百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九十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致剥削者于死命,使他不能为非作歹,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我关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所讲的话,往往被人只理解成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痛打他们的双手(也许不光是打他们的手,还打别的地方),致他们于死命。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1918年,当那位维谢冈斯克的同志说到这一点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只居于领导地位,

带了不少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企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正确地——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向来看是正确地——规定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从世界历史趋向来看，我们规定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每个国家都在证实我们规定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我们在自己的祖国也应当正确地来规定这条道路。决定这条道路的不仅是这一点，还要看有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能不能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农民会这样说：“你是个好人，你保卫了我们的祖国；为了这一点我们才听你的话，可是你不会经营，那就请滚开吧。”是的，农民会这样说的。

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自己向资产阶级学习，并且使资产阶级走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管理这种经济。可是有些共产党员自以为我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我什么都懂，我战胜过的不是什么店员之类的人，我们在前线打过仗，难道打的是这种人吗，——正是这种主导的情绪在害我们。

我们使剥削者不能为害，痛打他们的双手，斩断他们的双手，这不过是事情的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件事我们应该做。无论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或我们的法院都要做这个工作，而且不应当象至今所做的那样疲蹶，要记住，它们是受全世界敌人包围的无产阶级的法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我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这方面应该抓紧一点，但这是容易做的。

至于胜利的第二部分：用非共产党员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善于实际地做必要的经济工作，——这就是寻求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说：“不管饥饿怎样难受，怎样痛苦，怎样

严重,但我看到,这个我不习惯的异乎寻常的政权,带来了实际的、确实可观的好处。”我们必须设法让那些为数众多的、超过我们许多倍的、同我们合作的分子工作,要善于观察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手做出一些有益于共产主义的事情。目前情况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还只有个别共产党员懂得和看到这一点,而广大党员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已写了多少命令,说过多少话,可是一年来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在我们一百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五个也没有。看,我们是多么严重地落后于当前迫切的需要,是多么厉害地保持着1918年和1919年的传统。那是完成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的伟大年代。如果只回顾这些年代,而看不到当前的迫切任务,这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一定是自取灭亡,整个症结就在于我们不愿意了解这一点。

现在我想举两个有关我们管理工作的实际例子。我已经说过,比较正确的是拿一个国营托拉斯来做例子。但是,请原谅我不能用这种正确的方法,因为这样至少需要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个国营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我只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控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官僚主义;另一个是顿巴斯地区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不很恰当,但是,我又举不出更好的例子。不过用这个例子也能说明我的主要意思。你们从报上都知道,最近几个月来我不能直接处理事务,我没有到人民委员会去工作,也没有到中央委员会去办公。在我偶尔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常常听到许多人愤慨地激烈地埋怨对外贸易部的工作。对外贸易部工作得不好,办事拖拉,这点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这些怨言特别激烈,我想了解一下,抓一件具体的事情,追究到底,看看那里怎么会发

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架机器开动不起来。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买罐头食品。为这件事来了一个法国人。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为了国际政策的利益,是否得到协约国领导者的准许或彭加勒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同意(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热那亚会议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做了这笔生意,这是事实,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莫斯科卖了罐头。莫斯科正在挨饿,到夏天一定会饿得更厉害,肉类没有运来,并且从尽人皆知的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效率来看,大概也不会运来。

他们卖罐头肉(当然是指不完全发霉的罐头,这以后会检查出来),换取苏维埃纸币。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可是,如果按苏维埃方式认真地考虑一下,那就完全不简单了。我不能直接调查这件事情,但组织了别人去调查,现在我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这一著名事件的发展经过。事情开始是这样的:2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是可取的。当然,没有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这些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请想一想:不经过中央政治局,这四千七百个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根据登记统计的)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加米涅夫同志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所以对大批负责工作人员并不过分信赖,而用了擒牛先擒角的办法,当然擒的不是牛,而是政治局,他一下子就得到政治局的决议(我没听说,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什么辩论):“请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从国外购入食品是可取的,并注意关税”等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了这一点。事情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是2月11日的事。我记得,我到莫斯科是在2月底或在这时间前后,我一来就听到莫斯科同志们

的号叫，简直是绝望的号叫。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本买不到食品。为什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办事拖拉。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时也不知道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决议，所以只对办公室说，调查一下，弄份文件来给我看看。克拉辛来了之后，加米涅夫和他谈了谈，这件事情才有了结果。事情交涉好，我们把罐头买来了。结果好的事情，总算是好事情。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于协商，能够正确决定俄共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线，这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商业问题方面的政治路线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决定，那我们在世界上就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不能每次交易都拉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做，——克拉辛此刻正忙于热那亚会议前夕的外交事务，要进行极度紧张的工作，不能把这些同志拉来买法国人的罐头。工作不能这样做。这不是新政策，也不是经济政策，甚至不是政策，简直是开玩笑。现在我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调查材料。我甚至有两份：一份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哥尔布诺夫和他的助理米罗什尼科夫的调查材料，另一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调查材料。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为什么注意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不大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这点我不准备多讲，因为我怕又要来一次调查。重要的只是材料已经收集到，现在就在我的手里。

我在2月底一到莫斯科，就听到一片号叫声，说“买不到罐头”，而轮船就停在里巴瓦，罐头就堆在那里，人家甚至同意用真正的罐头来换取苏维埃纸币！（笑声）如果这些罐头没有完全发霉（这里我要特别着重“如果”这两个字，因为我不十分有把握，到那时是否会再派人作第二次调查，关于这件事情的结果，只好留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说了），而且已经买到手了，那我要问：这样的事情没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推不动，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我现在掌握

的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是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把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大骂一顿。从同一份调查材料中，我又看到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对另一个负责的党员说：“以后没有公证人在场，我决不同你谈话。”看了这段故事，我想起二十五年前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我当律师的事情。那时我是个黑律师，因为我是被放逐的国事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案情。最困难的是弄清楚案情。有一次来了一个村妇，她开头当然讲她的亲戚如何如何，可是怎么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她说：“去把状纸的底稿拿来！”但她还是讲她的白母牛。又告诉她：“去把底稿拿来”，她一面走，一面说：“没有底稿，关于白母牛的事，就不爱听啦。”此后我们常常在流放者中间取笑这次要底稿的事。但是，我仍旧使情况有了一些改进，人们都把底稿带来了，这样就可以弄清案情，他们为什么控告，苦处在哪里。这是二十五年前在西伯利亚（从那里到最近的火车站要走几百俄里）的事情。

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买点罐头，为什么还要经过两次调查，还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示呢？究竟缺少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是有的。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缺少文化（我丝毫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能文明地来处理业务。

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我认为，除了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以外（你们知道，这些委员是不可侵犯的），把莫斯科各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禁闭六小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禁闭三十六小时。哪知现在在一个有罪的人也没有找到。（笑声）其实从我所讲的事情

中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罪的人是找不到的。俄国知识分子通常总是不善于做实际工作，杂乱无章，一事无成。他们先是忙作一团，后来再动脑筋，事情办不成时，就跑去向加米涅夫诉苦，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当然，国家的一切困难问题是需要提交政治局解决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但是，做事应该先动脑筋，后动手。如果你要办什么事，那就请带了文件去办。最初你可以拍一份电报，在莫斯科还有电话，可以给有关机关打一个电话，把抄件交给瞿鲁巴，要说清楚：我认为这笔交易很紧急，如果拖延，我是要追究的。应当想到这一起码的文明作风，处理事情要考虑周密；如果问题不能靠打一个电话，在一两分钟内一下子解决，那你就拿着文件有根有据地说：“你要拖拉的话，我就把你关到监牢里去。”可是现在我们一点也不考虑，毫无准备，乱忙一阵，委员会成立了好几个，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吃苦生病，而事情直到加米涅夫同克拉辛接头后才能有所进展。这是很典型的事情。这种事情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而且在所有独立共和国的首都，在各区域首府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城市里更是屡见不鲜、更要严重百倍。

应当记住，在我们的斗争中，共产党员需要深思熟虑。关于革命斗争，关于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情况，他们可以对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摆脱极端的贫困，必须深思熟虑，必须有文化，必须言行得当。这些他们却不会。如果我们责备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他们做事不老老实实，这是不对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不仅老老实实，而且证明他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沙皇制度崩溃前或在革命胜利后，对革命都是无限忠诚，不惜牺牲生命的。如果从这方面来找原因，那就根本错了。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有文化，必须了解这是国家的事务、商业的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办事拖拉的罪人送交法院。在莫斯

科我们有无产阶级法庭,这法庭应当审讯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摆着几万普特的罐头不买。我想,无产阶级法庭是知道应该怎样处罚的,但是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说,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并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谁都不会办事情,谁都不了解究竟怎样处理国家事务。一切白卫分子和怠工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同怠工者作过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摆在日程上;只要有怠工者,就必须同他们斗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象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难道可以同他们进行斗争吗?这种情况比任何怠工更有害,怠工者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看到两个共产党员彼此争吵应该什么时候到政治局去接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示,他就有空子好钻了。要是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怠工者站在一边支持其中一个共产党员,或者对双方轮流加以支持,那就完蛋了。事情就永远搞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因为两个负责的共产党员,两个忠诚的革命家,在争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得到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示。

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做这种事情,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做,并且不愿意了解他们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我想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顿巴斯。你们知道,这是我国全部经济的中心,是它的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恢复顿巴斯,不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恢复俄国大工业,也谈不上什么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个地区并没有把琐碎问题毫无道理地荒谬可笑地搬到政治局来,那里提出的是真正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应当监督我国全部经济真正的中心和真正的基础,使那里能真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在“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都是些不仅绝对忠诚而且确实博学多能的人,甚至说他们有才华也不过分,因此中央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乌克兰是个独立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它在党的关系上有时总想——该怎么说得客气一点呢?——绕道而行,我们不得不设法去了解他们,因为那里的人很狡猾,我并不是说,乌克兰中央存心欺骗,但总是同我们有些疏远。为了弄清全部情况,我们在这里的中央委员会里研究过,发现有摩擦和意见分歧。那里有个小矿井管理委员会。当然,这个委员会同“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是有激烈摩擦的。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还算有些经验,一致决定不撤换领导人员,如果有摩擦,甚至连全部详细情形都可以报告给我们,因为我们在那边的人又忠诚、又能干,应当尽力支持他们,假定说,他们还没有学会工作,那就应当让他们学好。结果,乌克兰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我不知道会上的情况,只知道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问过乌克兰的同志,并且特地问过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中央委员会并责成他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显然,那里有过阴谋,情况一塌糊涂,如果党史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费十年工夫也搞不清楚。结果实际上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把这批人撤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批人中间有些人虽然具有各种高贵的品质,可是在基本问题上却犯了某种错误。他们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那里我们是在同工人打交道。人们讲到“工人”,往往以为就是工厂无产阶级。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自从战争爆发以后,进工厂的已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

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都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是不对的。照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指的不是俄国,而是十五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六百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就不正确了。在俄国进工厂的往往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到机会的分子。

要善于正确地安排工作,使工作不落后,要能及时解决所发生的摩擦,而且不要把行政手段同政策割裂开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基础,是要使整个先锋队联系全体无产阶级群众,联系全体农民群众。如果有人忘了这些小轮子,而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顿巴斯工作人员所犯的错误,同我们其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委员会一致要求:“留下这批人,把那些小冲突也提到我们中央来解决,因为顿巴斯是重点区,没有它,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成为空洞善良的愿望”,——可是我们的全部政权和中央的整个威信还很不够。

这次当然是犯了滥用行政手段的错误,同时也犯了一大堆别的错误。

这个例子说明,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是否会管理,是否会正确地安排人员,是否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间断。我们不善于这样做,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我认为,谈到我国革命和估计我国革命的命运时,我们应当把那些已经完全解决的革命任务严格地区别开来,这些任务已经作为一种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战果载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推翻资本主义的史册。我国革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业。让孟什维克和第二半国际代表奥托·鲍威尔去叫喊“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革命”吧,可是我们说,我们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正如有

一个白卫分子的刊物说,我国国家机关中四百年来的积粪,我们用四年功夫就清除干净了,——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功绩。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他们无论在我国,或者甚至在先进的文明的德国,都不能把中世纪的积粪清除干净,可是他们反而来诋毁我们最伟大的功绩。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不可剥夺的功绩。

现在闻到战争的气息。一些工会,例如改良主义的工会已通过反对战争的决议,并威胁说,要用罢工来反对战争。不久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看见报上有一则电讯说,在法国议院中,有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发表了反战演说,他说,工人宁愿起义,不愿战争。可是现在不应当象我们在1912年公布巴塞尔宣言¹⁰³时那样来提问题。只有俄国革命表明:怎样才能摆脱战争,这要费多大的气力,用革命手段摆脱反动战争意味着什么。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解决这类性质的问题时,不可能忘记,也决不会忘记,过去有几千万人被屠杀了,现在还会有几千万人遭到屠杀。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只有俄国人民用革命手段,用不是为哪一个政府效劳而是使它们遭到失败的手段摆脱了反动战争,而俄国革命也挽救了俄国人民。俄国革命的果实是不可剥夺的。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去这一成果,正象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夺去苏维埃国家所创造的东西一样。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

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苦吃,就让它们宣传去吧,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还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共产党的代表来说,这还只是打开了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点做到了没有呢?没有,还没有做到。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些共产党员以为已经有了这种基础,这是极其错误的。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还做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

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1917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而也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革命的俄国终于摆脱了战争。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总算照顾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从而保证了我们多年的胜利。人民感觉到,农民也看得见,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士兵也清楚地知道,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尽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照顾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

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抗战。当时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进攻我们,企图扼杀我们;因此用不着进行宣传,任何一个非党的农民都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主要来了,共产党能同地主作斗争。因此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于是我们获得了胜利。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须有十分严格的

纪律。“工人反对派”说：“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然而，主动性应当表现在有秩序地退却和严格地遵守纪律上面。只要有人稍微有点惊慌失措或破坏纪律，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让那些已经惯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认为一切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们实行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秩序，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

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目前的关键，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结论和总结的关键，并不在于政策，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人们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太多了。可是谈的都是废话，是最有害的空谈。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我们有人开始忙乱起来，改造旧机关，建立新机关。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我们得出结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挑选人材。一个惯于反对琐碎事情、反对拘泥文化，惯于强调个人作用而不改造机关的革命家，是难于领会这一点的。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应当在政治上冷静地估计一下，我们跑得太远，以致不能而且也不应保持全部阵地了。

在国际方面，我们的情况近几年来有极大的改善。我们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共产国际每天从各国得到的消息都给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在实际工作方面，情况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如果不能给农民群众实际的帮助，农民群众就不会拥护他们。注意力不应该集中在搞立法工作、颁布完善的法令等等上面。我们有一个阶段把法令当作宣传的形式。人们嘲笑我们，说布尔什维克不知道人们并不执行他们的法令；所有白卫分子的报纸也充满了这种嘲笑，但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只能向普通的农民和工人说：我们想这样来管理国家，这是法令，请试试看吧！我们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想法是立刻用法令的形式告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的。结果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了高度的信任。这是革命初期必然经过的阶段，不然我们就不会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只能跟着它的尾巴跑。不然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现在再有人靠下命令来设立和改组什么机关，工人农民就要嘲笑了。现在普通的工人农民对这点已不感兴趣，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你是共产党员，现在不应当向人民宣传这一点。我们这些坐在国家机关里的人总是埋头于这种琐事，但是要抓的正好不是这一环节，因为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人员安排得不妥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实际检查。这是一种枯燥的小任务，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一个时期，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狭义的政策（报上所说的全是些政治高调，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内容），不在于决议，不在于机关，也不在于改组。这些只要对我们有必要，我们会这样做的，但决不要用这些东西去纠缠人民，应该挑选必需的人材，检查实际执行情况，这才是人民所重视的。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现在全体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自己主要的是如何能够切实地减轻赤贫和饥饿的状况，并表明生活确实象农民所需要、所习惯的那样在改善着。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我们不能直接按共产主义方式进行分配。因为工厂和装备还不够。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商

业来供给,但要供给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不发生什么突然事变,这就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虽然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它,但是每天仍有发生的可能。我们确实应当时刻警戒,为了加强红军,我们应当作某些重大牺牲,当然也要严格规定牺牲的范围。我们面前的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要扼杀我们,现在只是在寻找扼杀的方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过是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罢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如此。

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这个危机正在逼近。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听有关财政政策问题的报告。如果危机太厉害、太严重,我们有许多事情就要重新调整,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一点上。如果危机不太严重,那甚至是有益的,因为它会把一切国营托拉斯中的共产党员清洗一下。不过不要忘记做这件事情。财政危机会震动各个机关和企业,其中无用的会首先垮台。不过不要忘记,不能把这一切都推在专家身上,说是他们的过错,而说负责的共产党员都很好,说什么在前线打过仗,工作一向很好。所以财政危机要是不过分严重,也许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益处,它不会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或中央审查委员会¹⁷⁴那样进行清洗,而是对经济机关中的全体负责的共产党员来一次认真的清洗。

第三个条件是要在这段期间不犯政治错误。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到挫折,那就要来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如果不犯这种可悲的错误,那最近的关键就不在于法令,也不在于政策(狭义地说),不在于机关,也不在于机关的组织(因为这些事情是由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机关根据需要程度来进行的),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只

要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学到东西,收到实际成效,那我们就能重新克服一切困难。

最后,我应当谈谈我们苏维埃高级机关以及党同它们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际方面。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的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从形式上避免这种现象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是由唯一的执政党在管理国家,因此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所以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来了。这里我的过错也很大,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很多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都转不动了,加米涅夫为了保持这种联系,就不得不加倍地工作。

现在来谈一些主要的指令,在这方面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代表大会能大大重视这个问题,根据应该解除政治局和中央的琐碎事务并加强负责人员的工作的精神来批准一些指令。要使各人民委员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能先把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我们在形式上不能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对于一切琐碎的请求,应当不予受理,但是要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各部的正人民委员——而不是副人民委员——应当多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把我最近一年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做到,即改变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性质,更多地注意检查执行情况。

因此要注意使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¹¹²裁减所属的各种委员会,使它们熟悉和解决自己份内的事情,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无数的委员会上。近几天来把各委员会整顿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总共有二百二十个。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十六个。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整顿。人们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

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反而躲藏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乱七八糟,一蹩糊涂,谁都弄不清楚是谁负责;结果,作出决定由大家共同负责。

因此应当指出,必须扩大和发挥区域经济委员会的自治权和积极性。现在我们俄国的区域划分是有科学根据的,是估计到经济、气候、生活、燃料来源、地方工业等等条件的,根据这种划分,建立了区和区域的经济委员会。当然,局部的调整还会有,但还是应该提高这些经济委员会的威信。

其次,应该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使例会能够正常地举行,会议的时间应当长一些。例会应当讨论法律草案,因为有时法律草案没有必要匆忙地提交人民委员会审议。最好把这些草案搁在一边,让地方工作人员去仔细考虑,并且对法律的起草人要求得更严格些,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做。

如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的会期较长,分设各种小组和专门委员会,就能更严格地检查工作,就能抓住那种在我看来是目前政治局势的整个关键和本质的东西,就是说把重心移到挑选人材、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去。

应该承认,也不怕承认: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都没有被派去做他们现在适于做的工作,他们都不善于搞自己的业务,因此应当立刻加紧学习。如果承认了这一点,而我们又有做到这一点的充分可能,——根据总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还有时间来得及学会,——那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热烈鼓掌)

载于1922年莫斯科俄共中央
出版局出版的《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按该书原文刊印并根据
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230—273页

俄共(布)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¹⁶⁹闭幕词

(1922年4月2日)

同志们！我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这次代表大会同上次相比，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这次代表大会更加团结，更加一致，在组织上更加统一。

上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现在只有极少一部分人仍然自绝于党。

关于工会问题和新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党内已经没有意见分歧，或者说，已经没有什么显著的意见分歧。

根本的和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新的东西”，它生动地证明我们的敌人是不正确的，他们始终喋喋不休地硬说我们党正在衰退，说我们的头脑和整个机体正在丧失灵活性。

不！我们并没有丧失这种灵活性。

当根据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客观形势，需要前进、需要用无比英勇的精神迅速而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进攻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进攻一次，并且不止一次地进攻。

我们正是这样把我国革命提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高度。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不管它还能给千百万人带来多少不幸、灾祸和

苦难，都不能夺走我国革命的基本成果，因为现在这已不是“我国”的成果，而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了。

1921年春天，我们革命的先头部队有脱离它应当善加领导的人民群众、农民群众的危险，因此我们一致坚决地决定退却。过去一年来，我们的退却一般说是有革命秩序的。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熟，如果它不能把奋勇斗争和进攻的本领同实行有革命秩序的退却的本领结合起来，它就无法解决自己的任务。我们斗争的第二个阶段的经验，即退却的经验，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正象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即奋不顾身地英勇进攻的经验，无疑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工人一样。

现在我们作了决议，指出退却已经结束。

这就是说，现在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

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用事实、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正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如何来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前进。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只有大大放慢进度，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只有对自己的每一步骤进行千百次的实际检查，才能解决这项任务。

如果说，我们党内还有反对这种极缓慢极谨慎的行动的论调，那也只是极个别的。

我们全党都懂得，并且现在要用事实证明：它懂得目前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工作，也只能这样安排工作。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宣布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载于 1922 年莫斯科俄共中央
出版局出版的《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33 卷
第 288—290 页

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
第四次代表大会¹⁷⁵上的报告)

(列宁同志出现,全场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我的讲题范围很有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泛太庞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演说里把它讲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为了使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样,我要讲的是:我们怎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实行这政策后得到了什么结果。如果只讲这个问题,也许我能作一个总的概述,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总的了解。

如果从我们怎样实行新经济政策谈起,那我就应当提到我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①。1918年初,我在一次短短的论战中恰巧谈到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当时写道:

^① 指《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本选集第3卷第530—559页。——编者注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即当时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

可见，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我们共和国那时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非社会主义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非社会主义的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末，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国家资本主义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进而又问自己：这几种成分哪一种占优势呢？显然，在小资

产阶级环境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我那时就意识到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不可能有别的想法。我当时在一次与现在的问题无关的专题论战中，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国家资本主义呢？我回答自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社会革命，但我们无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或基础都没有估计过高；相反地，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也许更好一些。

我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部分，是因为我认为只有从这一点出发，第一、才能说明现在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第二、才能由此作出对于共产国际也很重要的实际结论。我不想说我们事先就有一个准备好了的退却计划。这是没有的。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关于对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但这总算提出了一个一般的、还不明确的退却思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制度至今还很落后的国家来看，或是从共产国际和西欧先进国家来看，我们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比方，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纲领。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对所有的纲领只作一般的讨论，即所谓一读讨论，然后送去付印，但是不是在现在而是在今年最后作出决定。为什么呢？我想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纲领不见得都很好地考虑过。其次是因为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过可能退却和保障这一退却的问题。而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艰难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这是我们绝对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必须知道当我们直接转入进攻而且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应该怎样行动。在革命时期这并不怎么困难，也不怎

么重要，至少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进行革命时，常常发生敌人手足无措的情形，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時候进攻他们，就能够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事先聚集力量等等。敌人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在那时去进攻，然后使我们后退好多年。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好有可能退却的准备，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他一切教训外，如果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个教训，那末，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

我已经着重谈了我们还在1918年就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一条可能的退却路线，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思想，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情绪上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反对我们的，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保证足够的根据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有意识地加以说明，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

的。就在这年春天，我们便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挽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是不肯定的呢？这就是我所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主要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现在我想来证明这一点。为此我应当简略地谈谈我国经济中的各个组成部分。

首先谈我们的财政制度和著名的俄国卢布问题。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一千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著名的了。（笑声）这可真不少。这简直是天文数字！（笑声）我相信，在这里甚至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数字的意义。但是，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我们也不认为这些数字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笑声）在这种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完全不重要的艺术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点成就，我相信今后还会在这种艺术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优秀干部都在研究，我们认为这一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而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并在坚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可以向你们列举一些相当重要而又有决定意义的事实。1921年，纸卢布比价的稳定

时期不到三个月。1922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时期在今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你们要我们拿出科学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将来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当然是不够的。可是要完全充分证明这一点，我看根本不可能。上述材料说明从去年我们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末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我们所必需的商品流转。如果说，两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崴几个星期以前才收复），虽然现在才能完全有步骤地开始进行我们的经济工作，但我们还是使商业有了开展。如果说，我们毕竟使纸卢布的稳定期从三个月增加到五个月，那末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这可以使我们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国家。我们一向借不到任何外债。那些把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得如此“出色”、以致现在还不知道走向何处的资本主义强国，哪一个都没有帮助过我们。他们通过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金融制度。既然这些资本主义大国都这样经营，那我认为，我们这些落后无知的人居然懂得了如何稳定卢布这种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就可以使我们满意了。这一点并不是用什么理论分析，而是用实践来证明的，我以为实践比世界上任何理论上的争论更重要。而实践证明，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是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开始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自由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的小生产者有极重大的意义。

现在来谈我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很大一部分农民对我们无疑有不满的情绪，接着我们又发生了饥荒。这对农民说来，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当时外国都大叫大嚷

地说：“看呀，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饥荒是内战的恶果，当然，他们对这一点默不作声，也是很自然的。1918年开始向我们进攻的一切地主和资本家，都把事情看成这样，仿佛饥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当时的饥荒的确是一场极大的严重的灾难，它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

这样，我现在就要问一声：现在，在这场空前的意外的灾难之后，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允许农民贸易自由之后，情况是怎样的呢？答复是很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迫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满意他们目前的境况，这一点我们是有把握肯定的。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农民是我国的决定因素，这是谁也不怀疑的。农民今天的情况，已经使我们不必再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举动了。我们这样说是心中完全有数的，一点也不过甚其词。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农民也许还不满意我们政权的某些方面的工作，他们可能有怨言。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国营经济还很糟糕，还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但无论如何，全体农民对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严重的不满了。这是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我认为这已经算很多了。

其次谈一谈轻工业。我们正应当在工业方面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区分开，因为两者的情况不同。至于轻工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方面有了普遍的高涨。我不想来谈一些细节。我的任务不是列举统计资料。但这个总的印象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可以担

保，这个印象的基础丝毫没有有什么不可靠的或不确切的东西。我们可以指出，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比较差，因为那些地区主要是重工业，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再说一遍，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的情绪，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天天都在注意工人的生活 and 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会犯错误的。

第三是关于重工业问题。我应当说，这方面的整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在1921年和1922年中，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转变。因此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情况会得到改善。我们已经为此筹集了一部分必要的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要改善重工业的状况，就需要有若干亿的借款，否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能作为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借款，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借到什么款。现在所谈的租让等等，只是纸上空谈，差不多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近来关于这个问题，特别是关于乌尔卡尔特的租让问题谈得很多。我们的租让政策，在我看来是很好的。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没有实现什么有利可获的租让，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忘记。可见，对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来说，重工业的情况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富有国家的贷款。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显著的改善，并且我们看到，我国的商业已经使我们取得了一些资金。诚然，这还是很少的，才两千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的商业使我们取得了资金，我们可以用来提高我们的重工业。目前我国的重工业无论如何仍然处于很困难的状况。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积蓄一点资金了。我们今后还要

这样做。这些资金往往是取之于民的，我们现在还是应该厉行节约。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样缩减国家预算，精简国家机关。我在下面还要谈谈有关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厉行节约，能够节约多少就节约多少。我们在各方面实行节约，甚至在学校里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良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努力。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我们已经搞到了为恢复重工业所必需的资金。固然，我们至今搞到的数目才两千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是有了，而且是专门用来提高我国重工业的。

我认为，我已经照我所答应的，概括地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了我国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成分；我认为，根据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现在已经收到成效。我们现在已经有证据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经商，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能够向前行进。实际工作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这对于我们，目前也就足够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也懂得我们还必须学习。我们已经执政五年了，而这五年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民拥护我们。很难有比农民更拥护

我们的人了。农民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最痛恨的地主是拥护白匪的。所以农民十分热烈地、十分忠诚地拥护我们。使农民捍卫我们、反对白匪，本来是不难办到的。过去痛恨战争的农民，尽一切可能支援了对白匪的战争、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实质上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政权留在地主手里还是留在农民手里的问题。对我们说来，这是不够的。农民了解，我们是为工人夺取政权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个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做好经济准备。我们不能用直接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我们不得不用迂回的方法来做这一点。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的敌人认为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不对的。土地国有这一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所以我应当说，今后我们的一切活动应当仅仅在这些范围内展开。我们已经使我国农民满意了，使工业和商业都活跃起来了。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照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我们首先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其余的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至于商业，我还想着重指出，我们正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我们已经建立了这种公司，这些公司的资本，一部分是私人资本家的，而且是外国资本家的，一部分是我们的。第一、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习做生意，这对我们是必要的，第二、必要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所以说，我们一点也不冒险。我们要向私人资本家学习，要注意我们怎样才能提高，要注意我们会犯什么样的错误。我觉得，我能够谈的就是

这些。

另外，我还想谈几个不很重要的问题。无疑地，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笑声）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我国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地，它们都在反对我们，第四、是我们国家机关的过错。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往往反对我们。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后，国家机关曾经对我们怠过工。当时我们很惊慌，便请求他们说：“请你们回来吧。”于是他们都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大批职员，但是缺乏相当有学识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往往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还能发挥一点作用，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的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几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反对我们，一部分是自觉的，一部分是不自觉的。在这方面，短时期内无疑是毫无办法的。在这方面我们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机关，改变它的面貌和吸收新的力量。这个工作我们做得相当快，也许太快了一些。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有几十万青年在学习，也许学得太快了，但是，工作总算是开始了，我想，这个工作一定会收到成效。只要我们做得不要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青年来根本改变我们机关的面貌。

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

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到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有步骤地学习，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我们的敌人，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强调我们干的蠢事，那让我在这里引一位俄国著名作家的话来打个比方，我把这句话稍微改动了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资本家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¹⁷⁶。这是不难证明的。就拿美、英、法、日同高尔察克签订的条约来说吧。请问你们：世界上还有没有更文明更强盛的国家呢？结果怎么样了呢？它们不先盘算一下，不思索一下，也不观察一下，就答应帮助高尔察克。依我看，这种失算即使从一般常识来看，也是难于理解的。

再拿凡尔赛和约这个更近更重要的例子来说吧。请问你们：“伟大”而“荣耀的”列强究竟在这里干了一些什么呢？它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呢？我再说一遍，我们干的蠢事比起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合伙干的蠢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我看这样说一点也不过甚其词。所以我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这是我应当简略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美好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我认为还会更好一些。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条件。

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¹⁵⁰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它的好的一面在于此，它的坏的一面也在于此。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把它读完。我在发言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五十多节。这

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道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译成各种文字，并且译得都很好，——而是因为它充满了俄国气息。第三、即使偶尔有个把外国人能够读懂，他也无法执行。这是决议的第三个缺点。我同几个到这里来开会的代表谈过话，我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大会——可惜，我不能参加，——但是，我希望在代表大会今后的进程中，能够同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代表详细谈谈。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五十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没有了解，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同志。决议中所讲的一切都成了死条文。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或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但是，只要不打仗，没有战争，我们就应当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

我们全党和俄国各阶层人民都有求知的渴望，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种学习的愿望，说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外国同志们也应当学习，但并不是象我们那样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读、学习写和了解读过的东西，这对我们还是需要的。有人在争论是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呢，还是资产阶级文化？我不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读、学习写和了解读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外国同志们不需要这样做。他们需要学更高深一点的东西：首先要使他们也了解我们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所写的、他们没有读过也不了解就签了字的东西。这应当

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执行这个决议。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决议的俄国味道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象神像一样地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得不到什么的。他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也许,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会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们会向意大利人说明:意大利人还不够文明,他们的国家还不能保证不产生黑帮。也许,这是很有益处的。我们俄国人也应当设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决议的原理。不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能执行这个决议的。我坚信我们在这方面不但要向俄国同志说,而且也要向外国同志说: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学的是一般的東西,而他們要學的是專門的東西,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組織、結構、方法和內容。如果這一點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熱烈鼓掌,經久不息。高喊“我們的列寧同志萬歲!”再次熱烈歡呼。)

載於1922年11月15日
《真理報》第258號

按1922年11月16日
《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
公報》第8號原文刊印并
根據列寧修改過的德文
速記記錄作過校訂

選自《列寧全集》第33卷
第377—390頁

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 任务的一些意见

海牙会议¹⁷⁷就要召开了。我想，在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上，最大的困难是克服那种把这一问题看得简单明了和比较容易的偏见。

所有著名的改良派领袖总是对工人阶级说，“我们要用罢工或革命来回答战争”。这种答复似乎非常激进，往往使工人、合作社工作者和农民很满意，很安心。

也许，最正确的做法是首先最严峻地驳斥这种论调。应当指出，特别是在战争过去不久的今天，只有最愚蠢的人或不可救药的骗子才会叫人相信，对反对战争问题作这样的答复会有什么用处。应当指出，用真正的罢工来“回答”战争是不可能的，同样，用真正的革命来“回答”战争也是不可能的。

应当向人们说明实际情况，说明战争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般工人组织虽然自称革命组织，在战争真正到来时也是毫无办法的。

应当反复地、具体地向人们说明上次战争的情况，说明为什么情况只能是那样。

尤其应当说明这一情况的意义：“保卫祖国”是一个必然产生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

因此，第一、说明“保卫祖国”的问题；第二、与此有关，说明“失败主义”的问题；第三、说明反对战争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是保持和建立一切参战革命者的秘密组织，以进行长期的反战活动，——应该把这一切提到首要地位。

抵制战争，这是一句蠢话。共产党人应当投身到任何反动的战争中去。

最好是举例证明，例如，用战前德国的书刊，特别是用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作例子，来极其具体地证明：理论上承认战争是罪恶的，承认社会党人不容许战争等等，不过是一些空话，因为这样提问题没有丝毫具体的内容。我们没有使群众真正具体地认识到，战争可能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相反地，大量发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报刊，每天都在混淆这个问题，散布有关这一问题的种种谎言，软弱的社会党报刊简直无力加以驳斥，而且社会党报刊在和平时期对这个问题又抱着根本错误的看法。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报刊大概也会丢丑。

我认为，我国出席世界合作社、工会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分一下工，对目前各种维护战争的诡辩作出十分详细的分析。

也许，资产阶级报刊所使用的那些诡辩正是诱使群众作战的最主要的手段；而我们在反战方面软弱无力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能预先分析这些诡辩，甚至还象1912年巴塞尔宣言¹⁰³那样，对这些诡辩，用一些廉价的、夸耀的、空洞的词句来支吾搪塞，说我们不容许战争，我们完全懂得战争的罪恶等等。

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某种外国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些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似乎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突然的时机降临到他们头上，似乎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

的方法，多少有点能力采取明智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

根据不久前的战争经验，我们应当说明，一旦宣战之后，一连串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就会产生出来，而使绝大多数应征者根本不可能以比较清醒的头脑、比较公正的不抱成见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

我想，我们应该非常详细地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叙述并分析上次战争的情况，向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指出，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或者是假装知道，其实却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而不知道问题的真正关键，就谈不到任何反战斗争。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当时俄国社会党人对战争问题的各种看法和各种意见。必须证明，这些看法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现代战争的性质本身产生的。必须证明，不分析这些意见，不说明它们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对反战问题的决定意义，就谈不上如何准备应付战争，甚至也谈不上如何自觉地对待战争。

第二、拿目前的冲突（即使是极小的冲突）作例子来说明：由于英法两国在对土和约的某些细节上的争执，由于美日对任何太平洋问题的细小分歧，由于列强在殖民地问题、关税政策或一般贸易政策等问题上的争吵，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想，如果在海牙会议上能不能畅所欲言地把反战演说讲完，令人有点怀疑，那就要想些巧妙的办法，至少把主要内容讲完，而把来不及说的话印成小册子。应当估计到主席会打断我们的演说。

我想，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除了应该邀请有能力、有责任发表总的反战演说，即发挥反战斗争的一切主要理由和一切条件的发言人参加代表团之外，还应该邀请掌握三种主要外国语言的人，专门同代表们进行交谈，看看这些人对基本理由懂得多少，是否需要

提出某些论据或举出某些例子。

在有些问题上,也许只有举出上次战争的实际例子,才能发生重大作用;在另一些问题上,也许只有说明当前的国际争端及其导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才能发生重大作用。

我记得,关于反战问题,我们一些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内和议会外曾作过许多极端错误、极端轻率的声明。我认为,对于这种声明,特别是战后发表的这种声明,应当坚决表示反对,毫不留情地点出说这种话的每个人的名字。对他们的批评可以委婉一些(特别在必要的时候),但是决不能缄默不言,因为轻率地对待反战问题是极坏的、绝对不能宽容的事情。

有些工人代表大会作出了不少十分愚蠢、十分轻率的决定。

应当立即收集各种材料,详细地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细节,研究大会上的全部“战略”。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固然不能容忍,就是对问题的实质说得不充分,也是不能容忍的。

1922年12月4日

第一次载于1924年4月26日

《真理报》第96号

署名:列宁

按列宁修改过和有列宁
签字的打字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405—408页

日 记 摘 录

根据 1920 年的人口登记资料编成的俄国居民识字状况一书（《俄国识字状况》1922 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版）日前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我从这本书里抄录 1897 年和 1920 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于下：

	每一千男子中 识字人数		每一千妇女中 识字人数		每一千人口中 识字人数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 欧俄·····	326	422	136	255	229	330
2. 北高加索·····	241	357	56	215	150	281
3. 西伯利亚(西部)·····	170	307	46	134	108	218
共 计	318	409	131	244	223	319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实际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就是我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情形也是很糟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想入非非的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巨大的工作，才能在

我国无产阶级已经赢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真正达到某种文化水平。

我们不应光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真正动手干起来。当然，首先应当缩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而是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把缩减出来的款项，转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在今年这个粮食已经勉强够吃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员的面包配给额了。

目前在国民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一般说来，范围并不算太窄。为了推动旧的教师们前进，吸引他们来执行新的任务，使他们关心教育法上的新问题，关心宗教之类的问题，我们做了很不少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或很少注意到提高人民教师地位的问题，而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因为没有哪一国的人民群众象我国人民群众这样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哪一国象我国这样把文化问题提得这样深刻，这样彻底；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象我国的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识字方面——的缺点；没有哪一国的工人阶级象我国工人阶级这样，为了改进自己在这方面的状况，决心忍受并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使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少得简直不象话。甚至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里，也经常可以看到某某国家出版局人员过多的现象，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国家要关心的首先不是出版局，而是使书有人读，使能够阅

读的人更多，使将来俄国出版局的政治影响更大。我们还是按照旧的坏习惯，用在出版局这类技术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国民识字这个一般的政治问题上的要多。

拿职业教育总局来说，我们深信，这儿也能找到许多多余的、为了本位利益而弄得庞大起来的不合广大国民教育需要的东西。在职业教育总局里，远非所有的东西都能满足首先提高我国青工教育并给这种教育以实际领导的这一合理愿望。如果从这一点来仔细考察职业教育总局的编制，其中有许多东西是虚浮臃肿、应当取消的。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中，还有许许多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具性的机构，那些在上述统计材料所表明的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关一律撤销，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

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应当有步骤地加强组织人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摆脱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简略地说来，经常巡视农村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我们既然常常在几乎完全是旧时代的国家机构上白费钱，那就不要在巡视农村这种办法上舍不得花钱。

我曾收集过一些材料，准备在1922年12月的苏维埃代表大

会上做关于城市工人帮助农村居民的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做成。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些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给我的，既然我自己没有来得及把这个问题研究好并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发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请同志们研究。

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现在资产阶级国家正不断努力设法麻痹城市工人，驱使国家、沙皇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出钱办的种种报刊来为这一目的效劳，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把城市工人真正培养成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我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忙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了解。决不能把这一句话了解为似乎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的联系开始，决不能过早地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可是，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中间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就必须在工厂的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

能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当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够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时机，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要求呢？或许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引起同志们的

注意，把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告诉我的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转告诉大家，并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完全提出来。

我们对于农村，除了正式预算和正式联系之外，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诚然，我国今天城乡的文化联系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带有另一种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农村的，是那些使农村在政治、经济、道德、体质等等方面腐化起来的東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可是这一切正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而且以后更会百倍地加强起来。

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它并实行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前进（那时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1923年1月2日

载于1923年1月4日

《真理报》第2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根据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417—421页

论 合 作 制¹⁷⁸

一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制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含有很多幻想。他们的幻想常常是可笑的。究竟他们的幻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有居民的合作化了。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在使居民尽量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使俄国居民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限量的意义。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做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

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在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操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要知道这一点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组织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使所有小农都能参加这项建设，又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段阶梯。毫无疑问，我们虽然达到了这段阶梯，却绝少利用它。

我们转入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火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而在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合作制，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制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制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

我现在想跟读者谈一谈，从这“合作制”原则出发，此刻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为使每个人都明白“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此刻可以而且应当用些什么手段来着手

推广这一原则。

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使它不仅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钱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拨给重工业等等的一样。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奖励参加合作社流转的农民，这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形，检查他们参加的自觉性和诚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合作社工作者到村里开设了合作商店，严格地说，居民是并没有参加的，但同时，他们从个人得益出发，又会急于参加合作社尝试一下。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为了使全体居民个个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是很少的一些工作。实在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样。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

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获得了圆满结果的革命胆略和革命热忱与（这里我几乎敢于说）做一个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是指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作买卖，就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做买卖距离有文明商人的本领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为了善于做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

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采取这样的支持。但这里提出的还只是一般性的任务，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没有确定，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和奖励条件），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1923年1月4日

二

每当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①。这曾不止一次地引起某些青年同志的怀疑。但他们的怀疑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第一、是为了指明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⁵²论战时的立场之间有历史的联系，而且那时我就屡次证明，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制度；我很重视确定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第二、我一向很重视实际目的。而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要采用租让制；在我国条件下，租让制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还有事情的另一方面，在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国家资本主义或至少能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拟的东西。这就是合作制问题。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具体经济情况下，当我们把私人

^① 指《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本选集第3卷第530—559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社会主义式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产生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既是私人企业,又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

我们有人谈论合作社时,对于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们常常忘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殊,我国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制(顺便说一句,租让制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末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现在来说明我的看法。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这种“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当作彻头彻尾的幻想,把以为只要实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阶级敌人转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转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幻想,当作浪漫主义的,甚至庸俗的东西。

从当前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但是你们看，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现在情况就大变了。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们看来，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

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

1923年1月6日

第一次载于1923年5月26日和
27日《真理报》第115和116号

署名:尼·列宁

按照报纸原文刊印并根据
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422—430页

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¹⁷⁹论革命的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的学究气。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胆小，甚至其中比较好一些的人，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抱保留态度，这种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整个革命时期充分表现出来的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¹⁸⁰，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¹⁸¹。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要回避，绕道而行，就象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

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如果不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也就是说，如果不作某些改正(从世界历史总的进程来看，这种改正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当作模范的。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免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我们看见，最富强的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战后起一直到现在还不能把“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调整好，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俨然以革命家自居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条界限(不能再越过了)，而且他们对于这种“常态”的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

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做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1923年1月16日

二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 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之流,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本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1923年1月17日

第一次载于1923年5月30日
《真理报》第117号

署名: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并根据列宁对
速记记录的指示作过补充修正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431—435页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¹⁸²

工农检查院对我们说来,无疑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这个困难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那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志否认工农检查院的好处和必要,我认为是不对的。但同时我并不否认,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所以,为了寻找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

在国内战争比较危急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是把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我们动员了我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

我确信,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个方针来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办法。我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

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组织部、书记处等等以中央的名义处理。我认为,

我们应当彻底采取已经开始实行的这个办法，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同时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根据下述条件同改组过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

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个至一百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审查，因为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另一方面，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减到三四百个，这些职员都要经过特别的审查，看他们是否忠实，是否了解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同时还要经过特别考试，看他们是否知道科学地组织一般劳动的原理，特别是科学地组织管理工作和行政工作等等的原理。

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就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实行这个办法，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任务，更应该彻底采取这个办法。这两个方面是：第一、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第二、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的广大群众联系起来。

我预见到，那些把我们机关变成旧机关的人，也就是那些主张把我们机关照现在这样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的人，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反对意见（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历史上相当稀有的机会，来确定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期限，我们现在也清楚地看到，什么可以在五年内做到，什么需要更长的时期）。

这种反对意见认为我提出的改革办法只会造成混乱。他们说

中央监察委员们将徘徊于各机关之间，不知道该到那儿去，去干什么，去找谁，弄得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耽误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如此等等。

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出自险恶的用心是很明显的，甚至用不着回答。自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及其部务委员（在适当的情况下，还有中央书记处），还需要顽强地努力若干年，才能正确地组织自己的人民委员部，组织它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进行的工作。我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可以（而且应当）仍旧是人民委员，象全体部务委员一样，仍旧领导整个工农检查院和所有“派来”听他指挥的中央监察委员。按照我的计划，工农检查院留下来的三四百个职员，一方面要在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增补委员的领导下作纯粹秘书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应该是非常熟练、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的人，同时要给他们很高的薪金，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们的真正不幸的（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处境。

我相信，把职员减少到我所说的那个数目，会使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整个工作的质量改进许多倍，同时也会使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有可能集中全力来安排工作，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而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我国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还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该研究一下，把我们共和国现有的十二个以上的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中央劳动研究所、劳动科学组织研究所等等）一部分合并，一部分互相配合工作。过于互相重复和因此而力求合并，都是有害的。恰恰相反，应该在把所有这些机关合并成一个和正确划分各机关的界限并保持每个机关一定独立性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明智的、适当的折衷

办法。

无疑地，经过这种改革以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本身所得到的好处并不少于工农检查院，中央委员会得到的好处是能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又能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踏实。那时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订出更严格更负责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出席这种会议，其人数或以某一时期、或以某一组织计划来规定。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该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来给工农检查院的委员分一下工，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出席政治局会议和审查送交政治局审阅的各种文件，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分出工作时间来学习理论和研究劳动的科学组织，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实际参加监督和改善从最高国家机关到最低地方机关的我国国家机构的工作等等。

经过这种改革以后，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凡与政治局的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二十四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个委员，除了丝毫不能延迟、需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个委员通过特别程序加以研究解决的事情，绝无例外）。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好处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出于纯粹个人情况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就会减少，因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还没有取得符合它威信的条件。我提出的改革办法必将有助于这种情况的改变。那些必须有一定人数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应该“不顾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

查各种文件，并且总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末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国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预防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足以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

1923年1月23日

载于1923年1月25日
《真理报》第16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与
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436—440页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察院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特别认真地整顿国家机关,把具有真正现代水平的人材、即不亚于西欧优秀模范的人材集中到工农检察院里来,这一工作是应当关心的。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当然是非常不够的。但是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我们对那些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

因此,关于国家机关问题,我们现在根据过去的经验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业中,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我国社会制度中好的东西,可

以说还丝毫没有经过考虑,没有被理解和体会,只是被匆忙抓起,没有经过检查和考验,没有为实践所证实,没有被巩固下来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的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之下,本来也只能是这样。

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对任何冒进和吹嘘等采取有益的怀疑态度,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的前进步骤,这种步骤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没有被理解。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建立真正新机关、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机关、苏维埃机关的人材,如此等等。

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人材,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许多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哪些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的人材呢?只有两种。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很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建立,建立不起来。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而做这个工作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靠蛮干和突击,靠机智和毅力,或者任何优良的个人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这种人在我国,比在其他一切国家简直是少得可笑。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性急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这种知识的缺陷。

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

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老实说,这种现象在我国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决心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察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想使工农检察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原则。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周到地、深谙情况地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真正好的东西来建立新的人民委员会部。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第一要求先进工人,第二要求真正受过教育的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庄严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空忙使我们徒具工作的外表,实际上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终于应该改变这种情形了。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材,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

我知道,这个规则很难坚持,很难适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我知道,相反的原则会从我们的无数孔隙中钻出来。我知道,需要给

以大力的反抗,需要表现出无比坚韧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且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成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

许多读者也许认为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举出来作例子的数字太小了。我相信,可以举出很多统计数来证明这些数字是很不够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真正合乎标准的质量看得比一切统计数字更重要。

我认为,我们国家机关正是现在终于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来研究一下国家机关问题,对于这种研究工作,急躁几乎是最有害的。所以我竭力主张防止扩大这些数字。相反地,我认为对于数字要特别吝啬。说句老实话,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如果我们真正抱定目的要在几年后建成这样的机关:第一、它是模范的;第二、它是大家绝对信任的;第三、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立即永远废除一般的编制标准。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试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说话毫无威信,那又何必组织它呢?我想,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谈的改造工作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非难的共产

^① 见本卷第693—697页。——编者注

党员,我想,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掌握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其次,在这项工作中,应有一定数目的秘书作助手,在任用他们以前,必须再三审查。最后,凡是我們决定要破例立刻录用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必须由几个共产党员介绍;

第二、必须通过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

第三、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基本理论、行政管理和公文处理等等基本知识的考试;

第四、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要达到这些要求还要有许许多多先决条件,所以我很担心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实践家”会说这些要求是无法执行的,或者轻蔑地加以嘲笑。但我要问一问工农检查院现在的任何一个领导人或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诉我,象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实际上有什么用处?我想,这个问题会帮助他们找到权衡的尺度。或者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查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样的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或者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职衔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如果不准备忍受一切,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情,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我认为,应该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等等方面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关中挑出一两个来,检查它们是否认真工作,如果它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并给我们提供一切保证,才能继续工作。这样就可以并非空想地希望在几年之内建成一个能胜任自己工作的机关,就是说它就能取得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以及我国

全体人民的信任，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为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而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如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同意这个改造计划，现在就可以开始采取准备措施，以便有系统地工作到彻底完成，既不要急躁，也不要拒绝重做已经做过的事情。

在这里，不彻底的决定是再有害不过了。凡是根据其他任何理由定出来的工农检查院的编制标准，实际上都是根据旧官僚式的理由，根据旧的偏见，根据已经受到批判、引起大家讥笑等等的东西定出来的。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

或者现在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五年内也应该学到一些东西了）；或者表明，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那就不值得动手去做。

如果说我们已经学到足以有系统地重新建立一个人民委员部，我想，就我们现有的人材来看，这种假设并不算夸张。不错，这样一个人民委员部一定会确定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面目。

现在就宣布悬赏征求两本或两本以上关于组织一般劳动和组织行政管理的特别劳动的教科书。我们现有的叶尔曼斯基的那本书可以作为基础，附带说一句，虽然他很明显地同情孟什维主义，不适于编写适合苏维埃政权的教科书。其次，不久以前出版的凯尔任策夫的那本书也可以作为基础；最后，在现有的一部分参考材料里，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有用。

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书籍和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出英国，是恐怕不可能派人到美国或加拿大去。

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查院录用工作人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挑选预备委员的考试大纲。

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不会使人民委员为难，也不会使工农检查院部务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难。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选拔能够充当中央监察委员的人。我相信，现在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在我们苏维埃大学生中，能担任这项职务的人是绰绰有余的。事先排除某一种人未必是正确的。最好是使这个机关有各种各样的人员，使我们看到这个机关是多种品质和各样优点的结合，因此，我们需要在拟定候选人名单时下一番工夫。举例来说，假定组成这个新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模子的人，譬如都是官吏型的人，或者没有鼓动员一类的人，或者没有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那就糟糕透了。

* * *

我想，如果把我的计划和学院式的机关比较一下，那我的意思就表达得更清楚了。中央监察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有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进行各个工作，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公文处理进行检查。最后，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还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并包括实习，即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习。

但是我认为，他们决不能只限于做这类学院式的工作。除了这些工作以外，他们还要训练自己做别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捉拿骗子，但也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还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行进、接近等等。

在西欧国家机关中,这样的建议是会引起空前的不悦和愤怒等等的,但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会采取这种态度的程度。在我们这里,新经济政策还并没有被人崇敬到如此地步,以致一想到可能捉人就恼怒起来。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很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确信,我们都会大笑这种人的。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察院会摆脱法国人称之为 *pruderie* 的品质。这种品质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摆空架子,它最合我国苏维埃和党的官僚的胃口。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我在上面说,我们必须学习,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所去学习等等,这决不是说,我把这种“学习”了解成有点象学校式的学习,或者我的想法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我希望,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怀疑我,说我不承认这儿所说的“学习”包含着某种半玩笑式的手法、巧计、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官气十足庄严堂皇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吃一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吏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会同意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引起人们的愉快。

真的,为什么不把快意的东西跟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揭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等等的东西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工农检察院把这些理由审阅一下,会获益不少;在奇案录中(我们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它在工农检察院工作的同事曾依靠这种奇案录取得了几次极辉煌的胜利),将给冠冕堂

皇的教科书添进原来里面不大论述的我们未来的“工农检查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不少惊险事迹。

* * *

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没有什么不可容许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以我的名义提出的，而是以另一些人的名义，也就是我在上面说到官僚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的时候所暗示的那些人的名义提出的。

真的，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外交人民委员部从建立时起就实行了这样的结合，而且收到了很大的效果，难道还有谁没有注意到吗？难道在政治局里没有从党的观点讨论过我们用什么“手腕”来对付外国的“手腕”，来防止它们的——好吧，说得客气一些——巧计等等大大小小的问题吗？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国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吗？我认为在我们对外政策方面已经证实和巩固了的东西，已经成了惯例的不会有人怀疑的东西，对于我们一切国家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我认为是更为适用的）。工农检察院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一切国家机关：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行政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一无例外。

对于活动范围这样广，又需要非常灵活的活动形式的机关，为什么不能容许它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我看不出合并有什么阻碍。而且我认为，这种合并是使工作顺利的唯一保证。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那些布满灰尘的角落里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对这种怀疑也只有付之一笑

而已。

* * *

还有些人怀疑：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是否合适？我觉得不但合适，而且应该。一般说来，虽然我们对西欧的国家制度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但还是受到它许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见的传染，部分地是由于我国那些亲爱的官僚故意使我们受到这类偏见的传染，他们妄想乘机在这类偏见的浑水中一再地摸到鱼；他们浑水摸鱼的勾当已经猖狂到如此地步，我们中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

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公文处理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也和在社会生活中一样，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最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在非常迅速地跃进，而同时在实行微乎其微的变革时却又过分地缩手缩脚。

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最勇敢的前进步骤是出现在早就组成一个理论部分的那个领域里，是出现在主要从甚至完全从理论上论证过的那个领域里。俄国人由于讨厌可恶的官僚生活而在家里从事非常勇敢的理论建设，因此这个非常勇敢的理论建设工作就具有一种非常片面的性质。我国同时存在着一般理论建设上的大胆和办公手续的微小改革上的缩手缩脚。以盖世的勇敢精神进行了极其伟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土地革命，但在极次要的办公手续的改革上却又缺乏想象力，缺乏把在一般问题上收到“灿烂”效果的一般原理运用到这种改革上的想象力或耐性。

因此，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既有英勇非凡的特征，也有害怕极小改变的心理。

我想，在任何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中，也不会不这样，因为

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东西以及改进旧东西的意图和追求新东西（新得连一丝一毫旧东西也没有）的抽象愿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

这种革命来得越突然，这类矛盾存在的时间就会越长久。

* * *

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我们破坏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彻底摧毁中世纪制度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最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就而跟着它走。但是我们光靠这种信任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较为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最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现在也把俄国抛到后面去了，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整个说来，现在比战前低得多。西欧资本主义列强，时而有意，时而无意地竭力把我们抛到后面去，利用俄国内战中的各种因素来尽量破坏我国。它们认为正是这样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才是极有利的；我们即使推翻不了俄国的革命制度，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它们大致上是这样设想的，而且根据它们的观点也不能不这样设想。结果，它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它们并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是它们也不让新制度能够立刻大步前进，以证实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一切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潜力，并昭然若揭地向所有的人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的发展阶段。

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其次，西欧的一些国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

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涡。

因此,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这些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会是象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一种发展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必须极其慎重地维护我国的工人政权,保持住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最小农中间的威信和对他们的领导。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营垒,同时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因此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所谓西方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它,不让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整个东方及其亿万被剥削的、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

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们的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国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

跟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避免将要发生的冲突呢?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曾使过去西欧反革命派发动的援助俄国反革命势力的进攻遭到失败,现在西方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冲突会不会象过去那样,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

我觉得,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来回答:这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许许多多的情况;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不让西欧反革命国家扑灭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的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就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变得文明起来。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为了自救,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

这不会是农民的狭隘观点吗？

不是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

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人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等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

这个理由是说，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在这种各方面都很有有限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了工

农检查院而打算把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和“普通的”人民委员会合并起来的原因。

1923年3月2日

载于1923年3月4日

《真理报》第49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
根据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441—455页

注 释

- 1 《真理报》(«Исти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是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发起创办的,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

《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它是依靠工人的捐款出版的。它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家。《真理报》仅仅在一年之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篇工人通讯。《真理报》的发行量平均每日四万份,个别月份平均每日达六万份。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派。斯大林说:“1912年的《真理报》为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给报纸写文章,给编辑部指示。斯大林在1912年9月逃出纳雷姆流放地以后参加了《真理报》的领导工作。1913年1—2月,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该报编辑。1913年2月,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按照列宁的指示改组了《真理报》编辑部。

《真理报》在创刊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内,被沙皇政府查封过八次,但是每次被查封后又改用别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

在1914年7月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真理报》被封闭。二月革命以后,从1917年3月18日起《真理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扩大会议决定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在1917年4月回到俄国后直接领导了《真理报》。七月事变后,由于列宁转入秘密状态,斯大林担任了报纸的责任编辑。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四次更换名称继续出版,用过的名称有:《〈真理〉小报》、《无产者报》、

《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自11月9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第1,411,426,551页。

- 2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1905年10月成立，首领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公敌。——第9、23、116、195、533、551、563、566、634页。

- 3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丁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

1917年12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9、23、43、66、76、96、115、142、158、186、326、366、382、465、479、491、501、506、546、553、565、592、603、631页。

- 4 指反革命间谍破坏组织——“民族中心”策划的出卖彼得格勒的阴谋活动，参加这个间谍组织的有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中心”是按照外国间谍机关的指令进行活动的。1919年6月13

- 日，阴谋分子在红丘炮台举行叛乱。当时斯大林受党中央委托正在彼得格勒前线，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苏维埃军队很快就把叛乱镇压下去了。——第 9、23 页。
- 5 伯尔尼国际是原来参加第二国际的一些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为了恢复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于 1919 年 2 月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建立的联盟。列宁称伯尔尼国际“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459 页）。——第 10 页。
- 6 萨多瓦会战是 1866 年 7 月 3 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同普鲁士的军队之间在捷克进行的会战。这是 1866 年普奥战争（结果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凯尼格列茨（赫腊德茨-克腊洛佛）会战。——第 13 页。
- 7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8 章第 7 节。——第 17 页。
- 8 1919 年 3 月 16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改组消费合作社，并把消费合作社的名称改为“消费公社”。但是这个名称引起了农村居民对法令的某种误解。考虑到这一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1919 年 6 月 30 日的决议中，除同意上述法令外，决定将“消费公社”名称改为人民用惯了的名词“消费合作社”。——第 20 页。
- 9 俄罗斯复兴会是 1918 年由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组成的反革命组织，它同外国使馆和间谍机关有直接联系。复兴会妄图武装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第 33 页。
- 10 积极派是一个孟什维克的极右派集团，他们的纲领就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不应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通过社会改良的道路去争取改善自己的地位。该集团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就反对用“民主”的方法，而积极主张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消灭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因此，他们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乌克兰拉达，积极参加捷克白军的叛乱，并同外国干涉者的军队勾结。积极派的代表人物是李伯尔、波特列索夫等人。——第 37 页。

- 11 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做了两次论国家的讲演。1919年8月29日第二次讲演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前身是1918年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后来这个训练班改为苏维埃工作学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成立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央高等学校的决定后,该校改为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工作学校。1919年下半年,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定,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工作学校改名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第41页。

-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5页。——第43页。

- 13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大部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国际派。从1916年起,国际派开始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它加入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1918年11月,在德国革命过程中斯巴达克派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十一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12月建立德国共产党。

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即直到实行分离,成立独立国家),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运动的自发性。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选集第2卷第846—860页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8—72页)等著作,以及斯大林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都对德国左派的错误做了批评。——第50、190页。

- 14 **征收党员周** 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扩大党组织、吸收工人和工农青年入党的决议举行的。1919年8月10—17日,彼得格勒党组织首先举行了征收党员周,随后莫斯科省党组织在9月20—28日,莫斯科市党组织在10月8—15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1919年9月2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在其他各城市、农村和军队里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决议。当时被接受入党的有二十多万人。——第76、79页。
- 15 **重新登记党员** 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1919年5月至9月底进行的。决议规定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普遍登记,以便对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党员采取特殊的检查办法。为了进行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拟定了专门指示,其中说:“重新登记的目的是把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把那些看到党取得统治地位而混入党的人和为了个人目的而利用党员称号的人清除出党。”——第76页。
- 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147页。——第93页。
- 17 **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1919年11月22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前夕(11月21日),列宁召集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和一部分代表举行了预备会议。出席大会的有土尔克斯坦、阿捷尔拜疆、希瓦、布哈拉、吉尔吉斯、鞑靼、楚瓦什、巴什基里亚、高加索等地的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约八十人。斯大林致开幕词(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48—249页),列宁在大会第一天做了目前形势的报告。
- 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的工作报告,选出了新的常务局,并确定了东部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的工作任务。——第95页。
- 18 **立宪会议委员会** 是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政府,1918年6月在国外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在萨马拉成立。1918年9月,反革命的“乌发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即改名为“立宪会议委员代表大会”。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傀儡高尔察克当了最高执政者之后,于1918年12月初解散了立宪会议委员代表大会。——第97页。

- 19 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由农业人民委员部于1919年12月3—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一百四十名,其中九十三名是共产党员。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二天发表了演说。代表大会通过了全俄农业劳动生产组织(公社和劳动组合)联合会章程,这个章程后来得得到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批准。——第106页。
- 20 十亿基金是根据1918年11月2日人民委员会《改进和发展农业并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迅速改造农业》的指示设立的。从这笔基金中曾拨出一笔补助金和贷款分发给农业公社、合作社和正在向集体耕作制过渡的农村团体和小组。——第106页。
- 21 《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条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9年2月通过的。列宁直接参加了该条例的制定和审订工作。条例规定了一系列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扩大播种面积的实际措施。——第106页。
- 22 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该党提出了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人民社会党人拒绝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性的原则,主张以赎买的办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列宁称人民社会党人是“市侩机会主义者”、“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的首领是阿·瓦·彼舍霍诺夫、维·亚·米雅柯金、尼·费·安年斯基等人。
- 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社会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入反革命阵营。——第116、603页。
- 23 统一派是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1917年3月成立,首领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过去的取消派阿·弗·布利杨诺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统一派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伙同黑帮分子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疯狂攻击,敌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1918年夏,统一派在组织上瓦解。

统一派于1917年3月至11月出版了《统一报》,该报从1917年12

月至1918年1月又用别的名称出版。——第116页。

- 24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成立于1917年4月，首领是考茨基。考茨基主义的组织“劳动友谊社”是该党的主要部分。“独立党人”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替他们辩解，庇护他们，主张放弃阶级斗争。

1920年10月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党内很大一部分人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存在到1922年。——第121、166、187、290、303、326页。

- 25 法国社会党是饶勒斯派于1902年建立的改良主义政党。1905年，法国社会党和盖得派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组成统一的社会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成员（盖得分子、布朗基分子、饶勒斯分子等）。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领导权为党内占多数的以饶勒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所掌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它的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它的代表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在1920年12月25—30日的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多数派组成法国共产党，以莱昂·勃鲁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少数派退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个旧名称。——第121、303、326页。

- 26 参看马克思1870年12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第123页。

- 27 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0—692页，第2卷第334—336页）。——第127页。

- 28 1918年1月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1918年1月28日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福斯。1月29日在赫尔辛福斯组织了革命政府——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或芬兰人民委员会）。资产阶级政府将富农和富裕农民的芬兰北部变成了反革命基地，建立了白军，挑起了内战，在全国各地对赤卫队展开了进攻。芬兰工人及其所建立

的赤卫队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但是芬兰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性策略削弱了他们的反击力量，而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在芬兰还没有建立。1918年5月，无产阶级革命在芬兰白卫军和德国军队联合进攻下被残酷镇压了。白色恐怖笼罩着芬兰，成万革命工人惨遭枪杀。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的覆灭，促进了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18年10月30—31日匈牙利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8年11月成立了共产党。1919年3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革命势力进行武装干涉，1919年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第137、161、255页。

- 29 龙格派 是1915年成立的法国社会党少数派，是社会改良主义者龙格的拥护者。他们坚持中派观点，实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的政策。法国社会党内以龙格为代表的这种机会主义思潮，被称为龙格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龙格派采取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龙格派口头上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它的敌人。龙格派继续执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左翼取得胜利，于是龙格派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一同脱党并归附所谓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又回到第二国际。——第138、166、186、286页。

- 30 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于1919年12月20—21日举行。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1)关于全俄党代表会议；(2)关于燃料问题；(3)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4)关于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5)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6)关于普遍军训和特别任务部队。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强调指出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巨大意义，认为它是实际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第140页。

- 31 斗争派 是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5月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因该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而得名。1919年3月取名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8月改称乌克兰共产党(斗争派)。1920年3月，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农民群众中影响的增长，斗争派解散了他们的党并提出同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合并。乌

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决定接受斗争派入党,并且对所有被接受入党的斗争派分子进行了重新登记。后来查明,有不少斗争派分子是暗藏的敌人。——第 149 页。

- 32 这些问题是由美国自由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晚报》驻柏林代表通过无线电转给列宁的。列宁回答的全文用无线电报拍至柏林,于 1920 年 2 月 21 日由柏林转到纽约。《纽约晚报》当晚就刊载了列宁的答复。德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报刊也转载了列宁的答复。——第 153 页。

- 33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5 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五百五十四人,有发言权的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共代表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名党员。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议程如下:1.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 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3. 工会运动;4. 组织问题;5. 共产国际的任务;6. 对合作社的态度;7. 改行民兵制;8. 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致开幕词,做了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总结报告和关于报告的结论,并就经济建设问题和合作社问题发表了讲话。在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列宁致闭幕词,并提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运输、粮食、燃料和工业等方面的当前任务,指出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大会特别重视统一的经济计划的问题。在统一的经济计划中居于首位的是全部国民经济电气化问题。大会对反党集团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鉴于列宁五十寿辰即将到来,代表大会在结束工作之后,举行了庆祝会。当时通过了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第 156、201、429 页。

- 34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 1919—1920 年的巴黎和会上成立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国联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列宁称国际联盟“只是纸上的联盟,而事实上这是一群互相厮杀、彼此毫不信任的野兽”(见《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50 页)。国联对日、德、意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纵容包庇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联也随之瓦解。1946 年 4 月正式宣告解散。——第 160、224、272、310、324 页。

- 35 指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十一月革命是德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在1918—1919年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面临军事、经济的总崩溃。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国内革命运动空前高涨。1918年11月3日，基尔军港的水兵举行起义，这次起义成了十一月革命爆发的信号。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11月9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在斯巴达克联盟的号召下举行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谢德曼等所篡夺，他们执行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斯巴达克派揭穿了艾伯特—谢德曼政府的反动政策，为了更好地领导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斯巴达克联盟于1918年12月决定成立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经受了严重的考验。为了使共产党失去领导和破坏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德国资产阶级挑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起义。1919年1月，柏林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遭到社会民主党艾伯特—谢德曼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以及数以万计的德国工人和共产党人惨遭杀害。1919年4月成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又遭到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十一月革命遂告失败。——第162、255页。
- 36 见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故事说：一个老渔夫捕到一条金鱼，金鱼哀求放了它，答应要什么给什么。渔夫没有要什么就把金鱼放回大海。渔夫的老伴知道此事后，大骂渔夫是傻瓜，让他向金鱼要个新木盆，因为家里的木盆已经破了。渔夫只好向金鱼去要，家里果然有了新木盆。老太婆贪得无厌，有了木盆又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又要做贵妇人，做了贵妇人又要做女皇，最后甚至提出要当海上的女霸王。于是大海发怒了，金鱼不再答应渔夫的呼唤，结果老太婆失去了已经得到的一切，仍旧守着她那只破木盆。——第163页。
- 37 指以卡普和吕特维茨为首的德国反动将领于1920年3月发动的军事政变，即所谓“卡普叛乱”。这次政变是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公开纵容下准备的。1920年3月13日，叛乱分子占领了柏林并组织了以卡普为首的新政府。柏林的工人用总罢工回击了这次政变。在工人的猛烈打

击下，卡普政府于3月17日垮台。社会民主党人重新执掌政权，以后又开始实行镇压工人的政策。列宁把“卡普叛乱”叫做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

科尔尼洛夫是沙俄的将军，君主派，反革命头子之一。1917年七月事变后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为总司令。同年8、9月间，科尔尼洛夫举行反革命叛乱，企图把军队开到彼得格勒来消灭苏维埃，成立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动员群众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第164、260页。

- 38 指以弗·阿德勒和奥·鲍威尔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该派采取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立场相接近的中派立场。——第166页。
- 39 斯莫尔尼是苏联列宁格勒市重要古迹之一，建于1806—1808年，原为贵族女子学院。斯莫尔尼学院是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于1917年10月25—27日（公历11月7—9日）在斯莫尔尼学院举行。1918年3月迁都莫斯科以前，这里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第171、405页。
- 40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Извест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是俄共（布）中央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的阐述党内生活问题的刊物，刊登中央的决议、指示和工作报告以及有关党的建设问题的报道和文章。1919年5月起在莫斯科出版。1929年10月《中央通报》改为《党的建设》杂志，出版到1946年6月，以后又改为《党的生活》杂志。——第173、411页。
- 41 指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专刊，这期专刊是莫斯科各报社和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部和工作人员为1920年4月10日举行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筹办的。——第175页。
- 42 1920年初，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红军的某些部队改编成劳动军。但不久以后，同波兰和弗兰格尔进行的战争迫使这些劳动军重新处于

战斗状态。——第176,469页。

- 43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阐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列宁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国际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他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的叛卖行为，详尽地批判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于1920年4月写成，增补部分于5月12日写成。该书俄文本于同年6月8—10日出版，德文本、法文本和英文本相继在7月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出版，列宁曾亲自校阅该书清样和机样。该书曾分发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1920年7—11月，该书在莱比锡、巴黎和伦敦分别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再版。

在这本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之尝试)》。列宁在世时出版的这本书的一切版本中都没有印上这个副标题。——第178页。

- 44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由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警察的迫害，在俄国无法出版革命的报纸，列宁早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就周密地考虑了在国外出版报纸的计划。列宁在1900年1月流放结束后立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火星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24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在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天起在日内瓦出版。

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春天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有关

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的文章，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评论。

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等）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

火星派组织是在列宁培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尼·艾·巴乌曼、伊·瓦·巴布什金、谢·伊·古谢夫、米·伊·加里宁等）的直接领导下产生和进行工作的。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倡议和在他的直接的参与下，制定了党纲草案，准备了在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俄国的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拥护《火星报》，赞同它的策略、纲领和组织计划，承认它是自己的领导机关。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中指出《火星报》在建党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编辑部。马尔托夫不顾代表大会的决定而拒绝参加编辑部，因而《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立场上去，他要求让已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原来的全体孟什维克编辑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加强党中央委员会里的阵地，并从这个阵地上打击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出版的。1903年11月26日，普列汉诺夫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补选为《火星报》编辑。从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从此时起，党内就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第179页。

- 45 1912年4月4日，西伯利亚连纳金矿工人为反抗矿主的剥削举行罢工，沙皇军队对这次罢工进行了血腥镇压，枪杀了数百名罢工工人，造成连纳惨案。列宁说：“连纳惨案是群众的革命情绪转为群众革命运动高

- 涨的导火线。”(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89页)连纳惨案在俄国各地激起了强大的群众罢工浪潮,由此便开始了俄国革命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第185页。
- 46 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1914年7月26日(公历8月8日)的杜马会议上,强烈抗议沙皇俄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代表被逮捕,1915年2月被交付法庭并以“叛国”罪名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第186页。
- 47 英国独立工党于1893年成立。该党的首领是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等人。列宁指出,独立工党“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工党于1914年8月13日发表宣言反对战争。之后,在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党人同意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议。从那时起,独立党首领以和平主义词句作掩护,推行社会沙文主义。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员群众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领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1921年独立党人参加了所谓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们重新加入了第二国际。——第186、303、326页。
- 48 费边社分子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维伯和比·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第 186 页。

- 49 内阁派 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反动内阁而得名。米勒兰于 1899 年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第 186 页。
- 5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于 1917 年 4 月 24—29 日(公历 5 月 7—12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一百三十三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八万党员。这是布尔什维克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代表会议，它起着党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就代表会议日程的各项主要问题做了报告和重要讲话。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下列决议草案：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草案，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草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团结一切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草案，关于苏维埃的决议草案，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柏格别尔格的建议的决议草案。

在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发表讲话捍卫列宁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并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列宁和斯大林揭露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的投降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立场，无情地批判了皮达可夫，因为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反对民族自决权，并在战争时期就和布哈林一起采取了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季诺维也夫主张布尔什维克和齐美尔瓦尔德派合作并反对建立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列宁坚决地斥责了他的发言。

四月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于革命的所有重要问题的路线，引导布尔什维克党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关于四月代表会议的意义，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第 248—252 页。——第 188 页。

- 51 指 1905 年 10 月的全俄政治罢工。这次罢工是 1905—1907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强大力量。罢工先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很快就发展成为全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二百万以上。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

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政治罢工的风暴扫除了布里根杜马，把无产阶级引向十二月武装起义。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列宁全集》第9卷第377—380页）。——第191页。

- 52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1918年初由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反党集团。“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左”的辞句掩饰下，坚持要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同德国作战的罪恶政策。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这些“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头目都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当时托洛茨基在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口号下，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执行叛变性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以便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强迫布尔什维克党接受显然会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受灭亡的政策。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称做“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进行了公开的反党斗争，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派别活动。他们对党乱加诽谤，造谣中伤，竭力分裂党，瓦解党的队伍，以辞去苏维埃和党的职务等等来破坏党，要挟党。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为了争取通过签订和约的决定，以便拯救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在中央内部坚持顽强的斗争，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回击了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罪恶活动，痛斥了他们的叛卖和投降的立场。“左派共产主义者”终于被孤立、被击溃了。——第193、503、618、685页。

- 53 “拉布分子”是列宁对英国工党党员的称呼。工党是英国的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于1900年由工联、费边社等联合而成，最初叫“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为工党。工党公开执行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的首领们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第193、305页。
- 54 指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这一集团于1919年10月脱离德国共产党，1920年4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即所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曾要求德国

“左派”共产党人放弃宗派主义的策略，加入德国共产党，但他们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后来，“左派”共产党人的上层分子滚到反革命那边去了。——第 195、305、553 页。

- 55 沃拉皮尤克 (*Volapük*) 是德国人约·马·施莱艾尔于 1879 年提出的一种世界语方案，后来没有流行于世。——第 198 页。

- 56 论坛派 是集聚在《论坛报》周围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集团。1909 年，论坛派被开除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组成独立的政党(荷兰社会民主党)。论坛派是荷兰工人运动的左派集团，但不是彻底革命的政党。1918 年，论坛派参加了建立荷兰共产党的工作。

《论坛报》(*«De Tribune»*) 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该报从 1909 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 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第 198 页。

- 57 《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 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的机关报，1919 年至 1927 年在汉堡出版。——第 199 页。

- 58 指列宁在 1895 年秋天组成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该协会统一了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领导斗争协会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中心小组。

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把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变为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斗争协会领导了工人运动，把工人为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给工人印发传单和小册子，领导了罢工运动。斗争协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彼得堡。在斗争协会的推动下，俄国其他城市和区域中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

1895 年 12 月 20 日夜，以列宁为首的斗争协会的 leadership 核心被捕。列宁在狱中从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提出种种意见和指示帮助斗争协会，送出他自己所写的传单和小册子。党纲草案也是列宁在狱中写的。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最初重大萌芽。”（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第201页。

- 59 劳动派 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劳动派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第202页。

- 60 俄共（布）党员人数从1917年二月革命后到1919年变化如下：到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时，共有党员八万人；到1917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约二十四万人；到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至少有二十七万人；到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为三十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六人。——第203页。

- 61 《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曾用俄、德、英、法、中、西班牙等国文字出版。1919年5月1日创刊，1943年6月停刊。——第208、630页。

- 62 参看恩格斯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第208页。

- 63 《人民政治日报》（《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4月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1921年起成为瑞典共产党机关报。1929年10月瑞典共产党分裂后，该报转到右翼手

里。——第 209 页。

- 64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是美国的工会组织，成立于 1905 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拉丁美洲也曾建立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曾多次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一些领导人热烈欢迎俄国十月革命。但是它的活动带有显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特点：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拒绝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工会中进行工作。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后来变成一个对工人不起任何作用的宗派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第 210、302 页。
- 65 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 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天主教派党团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联合而成。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即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第 213 页。
- 66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这篇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有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游玩，途中隐士困倦酣睡，熊为了赶走隐士鼻子上的—只苍蝇，用—块大石头把朋友的脑袋砸成两半。——第 218 页。
- 67 《苏维埃报》（《Il Soviet》）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报纸，1918 年至 1922 年在那不勒斯出版。1920 年起成为意大利社会党共产主义者抵制派（弃权派）的机关报。——第 220 页。
- 68 《共产主义》（《Comunismo》）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杂志（双周刊），1919 年至 1922 年在米兰出版。——第 221 页。
- 69 意大利社会党 成立于 1892 年，当时叫意大利工人党，1893 年改称意大利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期，意大利社会党采取了不彻底的

国际主义立场。它参加了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得和1916年4月在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倒向占多数的中派。1916年底，它在改良派影响下走上社会和平主义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左翼加强了。1919年10月在波伦亚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赞成把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条文列入党纲，并赞成加入共产国际，但仍然把机会主义分子留在党内。1921年1月，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发生分裂，左翼代表退出代表大会，建立意大利共产党。——第221、305、343页。

- 70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222页。
- 71 见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3—594页)。——第222页。
- 72 参看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第226页。
- 73 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书信》一书的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第226页。
- 74 “革命共产党人”是革命共产党的成员。革命共产党是在1918年7月6—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挑衅地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并举行叛乱之后，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一个新党。革命共产党主张同俄共(布)合作，声明支持苏维埃政权。革命共产党是一个成员不多的政党，存在到

1920年。1920年9月,该党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准许各党组织吸收前革命共产党的成员加入俄共(布)。——第227页。

- 75 美国社会党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于1911年同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而成立的。英国社会党曾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宣传和鼓动,但是该党人数不多,并且脱离群众,因而具有某种宗派主义的性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内出现两派:一个是以海德门为首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一个是以阿·英克平和费·罗特施坦等人为首的国际主义派。1916年4月该党发生分裂。海德门及其拥护者占少数,他们退出该党。从此国际主义分子成为英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他们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第232、337页。

- 76 社会主义工党是由脱离社会民主联盟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于1903年组成的。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主要是由英国威尔士煤矿工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是由英国妇女选举权保障协会产生的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主要由妇女组成。

英国共产党成立时(成立大会于1920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举行),把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列入自己的纲领,当时上述组织都没有加入共产党。在1921年1月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当时称做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共产党)同英国共产党合并,称为英国统一共产党。社会主义工党的领导者拒绝合并。——第232、305页。

- 77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235页。

- 78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的君主派军阀集团于1894年对总参谋部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组织的挑拨性的审判,诬告他进行间谍和叛国活动。军事法庭把德雷福斯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法国展开了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共和派同君主派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1906年被宣告无罪。——第251页。

- 79 1917年7月3日(公历16日),彼得格勒维波尔格区开始出现反对临时

政府的自发的游行示威。最先出来的是第一机枪团,接着,别的部队和工人也同他们汇合在一起了。游行示威很可能变成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在这个时候采取武装行动,它认为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军队和外地群众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支持首都的起义。7月3日下午四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事局的联席会议上,做出了劝阻发动的决定。当时正在开会的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前往各工厂和各区去劝阻工人。但是,发动仍旧开始了,要阻止已经不可能了。

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局考虑了群众的情绪以后,于7月3日深夜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定,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运动。列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他得到消息后,于7月4日(公历17日)早晨来到彼得格勒。参加7月4日游行示威的有五十多万人。游行示威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主要的口号下进行的。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知道并且同意派士官生和军官来镇压举行和平示威的工人和士兵。士官生和军官向群众开了枪。反革命部队也从前线调回来镇压革命运动。

7月4日夜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决定。列宁在深夜来到《真理报》编辑部,审阅当天的报纸。列宁离开半小时后,编辑部就被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捣毁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是这次反革命屠杀的参加者和帮凶。在游行示威被镇压后,他们又同资产阶级一起攻击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都被临时政府封闭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屠杀开始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革命部队被调离首都,开往前线。

七月事变以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告终。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第255页。

- 80 《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于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创办的日报,最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机关报,同年12月德国共产党成立,该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第260页。
- 81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第261、566页。
- 82 《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奥地利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在维也纳创刊。最初称为《呐喊报》,1919年1月起称为《社会革命报》,1919年7月起称为《红旗报》。——第262页。
- 83 《自由报》(《Die Freiheit》)是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年11月至1922年10月在柏林每日出版。——第262页。
- 84 最高纲领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形成的中派,领导人是拉查理和塞拉蒂等人。最高纲领派反对改良主义者勾结资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背叛行为,但却主张同改良主义者保持统一。1921年1月在里窝那党代表大会上,最高纲领派拒绝同改良主义者决裂,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左派共产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另行建立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和共产党成立后,最高纲领派同改良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人,于是丧失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63页。
- 85 “苏维埃”“法律辩护人”,即法律辩护人委员会,1918年2月设立,直属工兵农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1920年春提出了撤销法律辩护人委员会的问题,因为在许多委员会中资产阶级律师的影响很大,他们歪曲苏维埃诉讼程序的原则,滥用职权。1920年10月,法律辩护人委员会被撤销。——第266页。
- 86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寄给当时在西南战线的斯大林的。斯大林在1920年6月12日给列宁的信中提出自己对提纲的意见。提纲于1920年6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发表。——第270页。

- 87 见注 24 和注 47。——第 286 页。
- 88 参看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 页）。——第 297 页。
- 89 美国社会党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政党，成立于 1901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的右翼多数派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并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左翼少数派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 年社会党发生分裂，左翼退出社会党，发起建立美国共产党。——第 303 页。
- 90 瑞士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于 1888 年。机会主义者的势力在党内很大，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6 年秋，右派从党内分裂出去，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大多数党员采取了中派主义的、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左派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列宁在 1914—1917 年住在瑞士期间，曾同瑞士社会党的左派有过联系；列宁指出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采取正确的立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党左派的力量增强。1920 年 12 月左派脱离社会党，1921 年左派同瑞士共产党合并。——第 303 页。
- 91 都灵支部是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左派支部。它对以调和派为首的意大利社会党领导的错误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在意大利革命高潮（1919—1920 年）和无产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的条件下没有对事件做出正确的分析，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可以为革命群众接受的口号，没有从内部清除改良主义者。都灵支部提出许多实际建议：清除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各工厂、工会、合作社和兵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工厂委员会，对工农业生产进行监督。都灵支部要求立即开始发动人民群众来建立苏维埃。——第 305 页。
- 92 《新秩序》（*«L'Ordine Nuovo»*）是 1919 年起在都灵出版的周刊，从 1921 年起改为日报。最初是意大利社会党左派的机关报，1921 年起是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1922 年 10 月被法西斯政府查封。——第 305、343 页。
- 93 厂工会委员会是工人选出的组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在英国很多生

产部门中就已存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外国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厂工会委员会曾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第306页。

- 94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五十二个代表，其中三十四人有表决权，十八人有发言权。大会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在1919年3月4日会议上，列宁就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即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做了报告（见本选集第3卷第717—732页）。代表大会没有经过讨论就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并将该提纲转交共产国际执行局，委托执行局设法将其广为传播，同时还批准了列宁对提纲提出的补充决议（见本选集第3卷第733页）。

根据列宁的提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解散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决议。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共产国际纲领和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号召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和由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五人组成的执行局。——第308、331页。

- 95 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工会国际联合会）是191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国际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改良主义工会国际联合组织。阿姆斯特丹国际奉行改良主义政策，公开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姆斯特丹国际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1945年12月14日，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阿姆斯特丹国际才正式解散。——第311页。

- 96 红色工会国际（工会国际）是革命的工会国际联合组织，1921年成立，1937年底解散。工会国际团结了革命的工会，坚持了共产国际的立场。——第311页。

- 97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二十条》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25日的委员会会议讨论他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时提出来的。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是在代表大会会前发表的，其中包括十九条。代表大会通过了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是：“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第314页。

- 98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举行。大会开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各次会议都在莫斯科举行。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二百多名，代表三十七个国家的工人组织。除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三十一个国家的）的代表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和法国的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劳动民族联盟等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在各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增长、革命路线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克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危险，确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大会前，列宁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为大会做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在大会上对企图钻进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对一些共产主义组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和“左”倾宗派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列宁参加了下述委员会的工作：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列宁提出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土地问题提纲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都被批准为代表大会的决议。

列宁被俄共（布）代表团推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制定共产国际的纲领、组织原则、战略和策略奠定了基础。——第315页。

- 99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20页。
- 100 第二国际是1921年2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各中派政党和集团的代表会议上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称维也纳国际）。这些政党和集团在革命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暂时退出了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

- 级运动一切最主要的问题上都执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被称为第二半国际。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广大劳动群众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削弱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列宁说：“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很想自称为革命家，但实际上——一到紧要关头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见本卷第 557 页）。1923 年，第二半国际又和第二国际合并了。——第 322、530、544、553、568、574、592、596、614 页。
- 101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中改良主义派别之一，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当中散布有可能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主张“和平地”用基尔特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鼓吹在现有工联的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门的生产者联合会，即所谓“基尔特”，由这种“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基尔特社会主义鼓吹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引诱工人阶级脱离革命斗争。——第 331 页。
- 102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参加委员会的有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委员会在列宁的领导下于 1920 年 7 月 25 日开始工作，讨论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纲于 7 月 26 日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经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议讨论后，于 7 月 28 日通过。——第 332 页。
- 103 巴塞尔宣言**是第二国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 年 11 月 24—25 日）通过的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宣言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准备战争的掠夺目的，号召各国社会党人进行坚决的反战斗争。巴塞尔宣言重申 1907 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论点（这是列宁和卢森堡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巴塞尔宣言坚决谴责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二国际的首领在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巴塞尔宣言，但是在第一

- 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就背弃了宣言，站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去了。关于巴塞尔宣言，见本选集第2卷第615—624、675—676页。——第337、571、596、648、673页。
- 104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事先经过代表大会选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讨论。参加委员会的有俄国、德国、保加利亚、美国、匈牙利、奥地利、荷兰等国共产党的代表。此外，还有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瑞士社会党左派、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委员会是以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为基础进行工作的。列宁直接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7月29日，委员会把提纲提交大会讨论。7月29日和30日，代表大会共开会三次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8月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这些条件。——第337页。
- 105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用来代替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因为它摒弃了拉萨尔主义的教条。但是，爱尔福特纲领还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1891年6月恩格斯对这个纲领的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第338页。
- 106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7页。——第338页。
- 107 指《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ВЦИК Советов Рабочих,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Казачьих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该报从1917年10月起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出版，同年11月9日起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第361、392页。
- 108 1920年10月上半月，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要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

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它应该是后者的一个附属机构等等。卢那察尔斯基在讲话中却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完全自治。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指示，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拟定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第 361 页。

- 109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12 月 22—29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千五百三十七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一千七百二十八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八百零九名。

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问题有：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一致通过同意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决议。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国家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482 页）。在大会期间，列宁不止一次地在俄共（布）党团的会议上发言。在 12 月 21 日党团的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做了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在 12 月 22 日党团会议上，列宁又就对内对外政策问题发了言。

代表大会讨论了人民委员会 1920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法案。在 1920 年 12 月 22 日农民代表的会议上以及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 12 月 24 日和 27 日的会议上，对这个法案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讨论，列宁也参加了讨论。1920 年 12 月 28 日大会一致通过这个法案。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还批准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盟条约。——第 373、426、468、526、549 页。

- 110 1920 年 8 月 10 日法国政府正式声明承认弗兰格尔为俄国南部的执政者。——第 374 页。

- 111 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参加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于

1920年8月初在伦敦建立的组织。到8月底，这样的组织就达到一百五十多个；一个月以后，又增加了一倍。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工联和工党的机会主义首领所领导的中央行动委员会被迫反对英国政府的反苏维埃政策，但不久以后就放弃斗争，并限制地方组织的活动。1921年初，行动委员会就瓦解了。——第377页。

- 112 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1918年11月30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领导前后方的全部国防工作；组织和补充军队，供应前线粮食、服装和武器，并为此动员国家的一切资源。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

各主要战线的战争结束后，国防委员会在1920年4月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国内战争结束后，按照1920年12月29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劳动国防委员会成为人民委员会下的一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6年底。——第381、412、437、469、653页。

- 113 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和指示成立的。1920年2月7日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1920年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协议，批准成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委员会于1920年3月20日开始工作，并且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拟定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的总规划。——第397、468页。

- 114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现名集体农庄广场）上的市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中心。从那时起，苏哈列夫卡成了投机倒把的同义语。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苏哈列夫卡市场根据1920年12月13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被封闭。——第398页。

- 115 1920年11月14日列宁应农民的邀请，参加了沃洛柯拉姆斯克县雅罗波列茨乡卡希诺村电站的落成典礼。在落成典礼大会上，列宁先同农民进行了谈话，然后发表了电气化对国民经济的意义的演说。——第399页。

- 116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是在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发生后列宁向党的积极分子发表的第一次演说。挑起争论和发动反对列宁、反对党的斗争的是托洛茨基。跟着托洛茨基走的还有其他反党集团。

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反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主要火力打击了反党集团的主力托洛茨基分子。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支持者。

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一切反对派分子都遭到了失败。各个党组织都团结在列宁的周围，拥护列宁的纲领。

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见本卷第 426—467 页、斯大林《我们的意见分歧》（《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5—13 页）以及《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32—342 页。——第 402 页。

- 117 指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和《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2—17、18—23 页）。——第 405 页。

- 118 指 1920 年 9 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37—45 页）。——第 411 页。

- 119 缓冲集团是在 1920—1921 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出现的反党集团之一，由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等人组成。缓冲集团掩护最凶恶的托洛茨基派别活动分子，帮助他们反对党。不久以后，布哈林分子就公开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列宁。

列宁在《党内危机》一文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的小册子中说明了缓冲集团的特征，批判了它的反党观点和反党活动（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6—37 页和本卷第 426—467 页）。——第 411、427 页。

- 120 指根据列宁的倡议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下设立的全俄生产宣传局。——第 414 页。

- 121 交通总政治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1919年2月建立的直属俄共(布)中央的临时政治工作机关,1920年1月改组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处。建立交通总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交通运输因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受到彻底破坏;在运输工人当中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铁路员工工会并把它变成进一步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工具。交通总政治部在铁路上实行了军事纪律,使铁路完全服从战时任务。交通总政治部的特殊工作方法使交通运输业免于彻底崩溃,但同时却助长了官僚主义,产生了脱离群众、放弃工会工作的民主方法的倾向。1920年,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2月7日的决议,交通总政治部被撤销。——第418、430页。
- 122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9月。托洛茨基分子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篡夺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在工会工作中采取赤裸裸的强迫命令的方法,唆使非党工人反对党,并且进行分裂工人阶级的活动。党中央揭露并斥责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1921年3月举行的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分子赶出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关。——第418、427页。
- 123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14页。——第418页。
- 124 水运政治处(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运总政治处)成立于1920年4月,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下属机构,1920年12月被撤销。——第418、436页。
- 125 见亚·谢·格利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误》第一幕第四场。——第420、629页。
- 126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托洛茨基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共产党员的会议上,提出了“把螺丝钉扭紧”和“整刷工会”的可疑的口号。他要求立刻把“工会国家化”和把军事工作方法搬到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唆使非党工人反对党,分裂

工人阶级。

托洛茨基的发言遭到了出席代表会议的共产党员的反击。列宁写的《〈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9—340页)被作为共产党党团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基础。

在后来党内开展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以及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敌视党和工人阶级的托洛茨基政策被揭穿了,作为反党集团主力的托洛茨基分子也被击溃了。——第421、432页。

- 127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列宁就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而写的。小册子于1921年1月25日写成,当天就付排。1月26日夜,一部分印好的小册子就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的党中央委员。——第426页。
- 128 《彼得格勒真理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于1918年4月2日创刊。最初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同年6月成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北方区域委员会和市委员会的机关报,后来成了党的省委员会和市委员会的机关报。1924年1月改名为《列宁格勒真理报》。——第426页。
- 129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41—542页。——第457、484页。
- 130 工人反对派是1920年下半年在俄共(布)党内形成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首领是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人。工人反对派提出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他们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把工会同党和苏维埃国家对立起来,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工人反对派,并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后来,被打垮的工人反对派的余孽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结在一起。——第465、478、482、553、629页。
- 131 《经济生活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1918年11月创刊,1937年11月停刊。

该报在最后一段时期是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苏联国家银行及其他财政机关和银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第468页。

- 132 引自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电气化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82页）。——第472页。

- 133 齐特·齐梯奇是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代人受过》中的主角。他是一个富商，是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第476页。

- 134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六百九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共代表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二十一名党员，此外还有二百九十六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代表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等等。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并且主持大会的全部工作。列宁就议程的各个主要问题——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做了报告，并且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结论。列宁还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工会问题和关于燃料问题的演说。列宁拟定了关于合作社、关于改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关于党的统一、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等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

代表大会做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的总结，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分子、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并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列宁的纲领。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和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代表大会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是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和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斯大林代表民族问题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党在

- 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第十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是列宁主义者。——第 478、482、526、541 页。
- 135 民主集中派 是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人领导的反党集团。这个集团产生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组织问题上的列宁路线，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俄共(布)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民主集中派，认为它是反党集团。1923 年民主集中派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结在一起，1927 年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第 478 页。
- 136 1921 年 2 月 28 日在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领导这次叛乱的是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叛乱者极力用“苏维埃”招牌把他们妄想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和私有制的意图掩饰起来。他们提出“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企图以此来排除共产党人对苏维埃的领导，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叛乱很快就被红军镇压下去。——第 478、487、533、551、553 页。
- 137 《争论专页》(«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Листок») 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的出版物，它是根据 1920 年 9 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开始出版的。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共出过两期；第一期在 1921 年 1 月出版，第二期在 1921 年 2 月出版。——第 480 页。
- 138 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第七条当时没有公布。在 1924 年 1 月 17 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宣读了这一条(见《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22 页)。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代表会议通过了公布这一条的决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371 页)。——第 481 页。
- 139 路·欧·卡芬雅克 是法国的一个将军，反动政客。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 年 5 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马克思指出：“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

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5页）——第506页。

- 140 《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报纸，1917年4月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7月被克伦斯基政府封闭，同年9月起又以《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封闭。

《前进报》（《Вперед》）是孟什维克的日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发行于1917—1918年，1918年4月2日起成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8年4月底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查封。——第509页。

- 141 参看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第510页。

- 142 参看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第511页。

- 143 套中人 是契诃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因循守旧的典型。——第513页。

- 144 米·彼·鲍加也夫斯基在1917年6月至1918年1月担任沙俄将军卡列金的反革命顿河哥萨克军队的副统领，并从1918年1月初起参加反革命的“顿河政府”，不久被捕，4月被枪决。——第514页。

- 145 引自普希金的诗《英雄》（见《普希金选集》1949年俄文版第1卷第431页）。——第523页。

- 146 奥勃洛摩夫 是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角，他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这个词一般用来比喻因循守旧和宗法式的落后性。——第524、632页。

- 147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35页。——第525页。

- 148 纳尔苏修斯 是古希腊神名。据传说，纳尔苏修斯自恃美貌，妄自尊大，拒绝了所有向他求爱的女神。因此，爱神阿芙罗狄蒂为了惩罚他，使他

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水中，结果憔悴而死。后来纳尔苏修斯这个词被用来比喻高傲自大的人。

马尔托夫有一个笔名是：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第 534、566 页。

- 149**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于 1921 年 5 月 26—28 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一次非常代表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为代表会议准备了关于粮食税问题的报告的书面提纲以及关于该报告的结论提纲，并对俄共(布)中央的工作计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列宁在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做了关于粮食税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该报告的结论，草拟了关于粮食税问题的决议草案，做了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工作的报告，还致了闭幕词。在三天的会议上列宁共发言十二次。

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所制定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草案。——第 541 页。

- 150**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12 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四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左派社会党的代表，还有国际妇女联盟和国际青年联盟的代表。靠近共产国际的团体也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大会。

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无产阶级最初几次革命斗争的经验，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并且指出，必须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进行坚决的斗争，清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影响，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列宁拟定了《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列宁就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和意大利问题在大会上发了言，并做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在大会上阐明共产国际的策略时指出，不把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听取了列宁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

告后，一致批准了这个策略，批准了俄共(布)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大会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支持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沿着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道路前进。——第543、598、669页。

- 151 指1919年4月13日英国军队在印度阿姆里察城枪杀手无寸铁的印度群众的事件。这次屠杀结果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二百人受伤。这种枪杀在印度其他城市也发生过。——第545页。
- 152 《最近新闻报》(«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是白俄的一种日报，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1920年4月至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立宪民主党首领巴·尼·米留可夫。——第551页。
- 15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51页。
- 154 《共产主义劳动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Труд»)是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1920年3月18日出版。1922年2月7日改称《工人莫斯科报》，1939年3月1日改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1950年2月19日改称《莫斯科真理报》。——第551页。
- 155 德国共产党“左派”的错误在于它推动工人阶级过早地走上发动的道路。德国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煽动工人在不利的时机举行武装发动。1921年3月，德国中部地区的工人举行了起义。虽然工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是这次起义由于得不到其他工业区工人的支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以及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对这次起义做了评价，并且批评了“左派”的错误(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5—465、500—511页)。——第557页。
- 156 指1921年的清党。这次清党是根据1921年下半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的。清党结果，约有十七万人被开除出党，占当时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第562页。
- 157 阿克雪里罗得提出的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得到其他孟什

- 维克的支持,其目的是要利用这样的大会成立一个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广泛的工人党”,来代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坚决谴责孟什维克的这种主张,并指出,宣传这种主张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是有害的。——第563页。
- 158 马基雅弗利主义是一种尊崇权术的政治主张,因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意大利政治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马基雅弗利而得名。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主张意大利的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践踏一切道德原则,背信弃义、欺骗、背叛、暗杀等等。——第563页。
- 159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内心矛盾、犹豫不决、耽于幻想而不能坚决行动的人的典型。——第566页。
- 160 参看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和1884年12月11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4页。
- 161 参看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4页)。——第576页。
- 162 1921年1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研究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会后,列宁起草了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这一提纲。1922年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批准了这个提纲。提纲经过修改后由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第2分册第154—164页)。——第582页。
- 163 路标转换派是由一伙反对苏维埃的白俄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集团。1921年,这个集团在布拉格出版《路标转换》文集,以后于1921—1922年又在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杂志,路标转换派的名字即由此而来。路标转换派确信不能用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以后,就指望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第595、634页。

- 164 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是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小说《果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一个极端自私、虚伪、残酷、贪婪、愚蠢的地主。——第595页。
- 165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鹰和鸡》。——第600页。
- 166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是苏联哲学和社会经济月刊,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第603页。
- 167 参看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1页)。——第605页。
- 168 见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萨尔梯柯夫-谢德林全集》1934年俄文版第9卷第363页)。——第610页。
- 169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二十二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六十五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入大会议事日程的问题有:(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3)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4)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5)关于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6)工会;(7)关于红军;(8)财政政策;(9)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补充报告;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10)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 列宁为大会致开幕词,做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这个报告的结论,并致闭幕词。
- 代表大会对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的工作做了总结。
- 1922年4月3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第613、655页。
- 170 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维埃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德国和其他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美国代表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了会议。

1922年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任命列宁为苏

维埃代表团团长。列宁虽然不能去热那亚，但是实际上领导了苏维埃代表团的全部工作，给代表团团员各种指示，规定了问题的提法和在开会期间代表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备忘录的内容。

在会议上，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利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困难，强迫它接受条件苛刻的协定。它们要求偿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借的外债，要求把收归国有的企业等等归还给外国企业主。

苏维埃代表团拒绝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理要求。由于法英两国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敌对立场，会议中断。这些问题被移交到1922年6—7月在海牙召开的专家会议上讨论。海牙会议也和热那亚会议一样，毫无结果。——第613页。

- 171 这个典故源于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说的一句话。1798年7月20日，拿破仑率部到达金字塔附近，和当地近卫骑兵主力相遇。战斗开始前，拿破仑向全军士兵说：“士兵们！四十个世纪从这些高耸的金字塔俯视着你们！”——第624页。

- 172 贫农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关于组织贫农并供给他们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成立的。根据法令规定，贫农委员会的工作如下：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的粮食机构没收富农和富人手里的余粮。法令还规定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贫苦农民以各种优待。

贫农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在同富农的斗争中，在重新分配被没收的土地和对工业区和红军的粮食供应上，贫农委员会起了巨大的作用。组织贫农委员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段。贫农委员会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巩固，对于把中农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1月）的决议，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贫农委员会同农村苏维埃实行合并。——第627页。

- 173 “劝说司令”是1917年士兵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司令克伦斯基起的绰号，因为他遵照英法帝国主义者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旨意在1917年夏巡视前线时劝说士兵举行进攻。——第633页。

- 174 中央审查委员会，即中央党员审查委员会，是1921年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根据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了领导清党工作而设立的。——第652页。
- 175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举行。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1922年11月9日起改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各国的五十八个共产党组织的四百零八个代表，其中三百四十三名代表有表决权。此外，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工人援助会和美国黑人组织等都派了代表出席。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做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批准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通过了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等等的决议。大会强调共产党必须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群众中从事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工作。——第658页。
- 176 这里借用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的一个人物毕加索夫的话。毕加索夫极端蔑视妇女，认为妇女愚昧无知，说话毫无逻辑联系。他说：“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他也许会说二二不得四，而得五或者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二得蜡烛。”——第669页。
- 177 海牙会议，即海牙世界和平大会，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在工人群众压力下召开的，大会于1922年12月10—15日举行，讨论如何防止新的世界大战问题。由于工会和合作社的革命工人的要求，苏联被邀请参加了大会。苏联代表团在会上虽然遭到机会主义多数的阻挠，但仍根据列宁指示的精神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战争问题上的任务。大会没有通过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行动纲领。——第672页。
- 178 《论合作制》是列宁于1923年1月口授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用合作社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和国家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

参加的合作社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第 681 页。

- 179 尼·苏汉诺夫是俄国政论家，农业经济学家。早期为民粹派，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 年因领导孟什维克地下组织而被判刑。——第 689 页。
- 180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 1871 年 4 月 12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8 页，第 4 卷第 392 页）。——第 689 页。
- 181 参看马克思 1856 年 4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4 页）。——第 689 页。
- 182 《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和它的续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都是列宁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写的。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 1923 年 4 月 17—25 日举行）在决议中接受了列宁在他最后几篇文章和一些书信中的全部指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专门决议和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292—297、299—300 页）。——第 693 页。

人名索引

A

- 阿·日·(А. Ж.)——第1—4页。
-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 (Adler, Friedrich 1879—1960)——第85, 179, 187, 193, 535页。
- 阿多拉茨基, 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 (Адорат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1878—1945)——第551页。
- 阿尔乔姆 (Артем 1883—1921) (真名谢尔盖也夫, 费多尔·安得列也维奇 Сергеев, Фе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第436页。
- 阿夫克森齐也夫, 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维奇 (Авксенть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78—1943)——第37页。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第226页。
- 阿斯奎斯, 赫伯特·亨利 (Asquith, Herbert Henry 1852—1928)——第235, 240页。
- 艾列尔, 卡尔——见劳芬堡。
-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 (Einstein, Albert 1879—1955)——第604, 608页。
- 奥尔匈博尔格尔,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也维奇 (Ольденборгер, 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3—1921)——第591页。
- 奥尔忠尼启泽, 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

- 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6—1937)——第646页。
- 奥兰多, 维多里奥·艾曼努埃勒 (Orlando, Vittorio Emanuele 1860—1952)——第324页。
- 奥斯特利茨, 弗里德里希 (Austerlitz, Friedrich 1862—1931)——第187页。
- 奥新斯基, 恩·(Осинский, Н. 1887—1938) (真名奥波连斯基, 瓦列利昂·瓦列利昂诺维奇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第419, 541页。

B

- 巴布什金, 伊万·瓦西里也维奇 (Бабушкин,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06)——第210页。
- 巴洛德, 卡尔 (Ballod, Karl 1864—1931)——第472页。
- 鲍加也夫斯基, 米特罗范·彼得罗维奇 (Богаевский, Митрофан Петрович 1881—1918)——第514页。
- 鲍威尔, 奥托 (Bauer, Otto 1882—1938)——第179, 187, 193, 226, 231, 255, 327—328, 630—631, 647页。
- 贝·库·——见库恩, 贝拉。
-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第191, 551, 574页。

彼得罗夫斯基, 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 (Петров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8—1958)——第 436 页。

波尔迪加, 亚马多 (Bordiga, Amadeo 生于 1889 年)——第 220—221、263—264 页。

波特列索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Потре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34)——第 226 页。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第 190、338 页。

勃拉温——见勃朗斯基。

勃朗斯基, 美契斯拉夫 (Broński, Mieczysław 1882—1941) (勃拉温 Braun)——第 319—320 页。

布尔采夫, 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Бурцев, Владимир Львович 1862—1936)——第 494 页。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第 193、397、407、409—411、415—416、418—420、424—425、426—467、511、513、626 页。

C

查苏利奇, 维拉·伊万诺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49—1919)——第 226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第 226、603—604 页。

D

德莱昂, 丹尼尔 (De Leon, Daniel 1852—1914)——第 208 页。

德雷福斯, 阿尔弗勒德 (Dreyfus, Alfred

1859—1935)——第 251 页。

德列福斯·阿尔都尔 (Dreux, Arthur 1865—1935)——第 606—607 页。

邓尼金, 安东·伊万诺维奇 (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第 23—31、33、36—38、39—40、63—68、71、76、79、96、98、102、131—132、134、146、149—151、159、165、173、195、202—203、217、356、382、489、497、538、581 页。

狄慈根, 欧根 (Dietzgen, Eugen 1862—1930)——第 604 页。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f 1828—1888)——第 217、604 页。

迪特曼, 威廉 (Dittmann, Wilhelm 1874—1954)——第 338、342 页。

杜果尼, 恩利科 (Dugoni, Enrico 1874—1945)——第 263 页。

E

恩·尔·(H. P.)——第 4—5 页。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 41、54、93、191、198、208、221—222、226、551、574、576、605—606 页。

尔·尔·——见赫尔曼。

F

弗兰格尔, 彼得·尼古拉也维奇 (Врангель,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8—1928)——第 370—371、374—375、416、489、494、555、581 页。

福煦, 斐迪南 (Foch, Ferdinand 1851—1929)——第 13 页。

G

盖得, 茹尔 (Guesde, Jules 1845—1922)

(真名巴集尔, 马蒂约 Basile, Mathieu)——第 222、255 页。

高尔察克,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20)——第 2、4、23、25—29、31—32、37—40、62—69、71、96、98、100、131—132、146、150、159、165、195、217、356、366、382、489、491、494、497、538、581、634、669 页。

高尔基, 马克西姆 (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 1868—1936) (真名彼什科夫,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Пешков,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第 58—61 页。

哥尔布诺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Горбуно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1892—1938)——第 642 页。

格·(Г.)——第 7—8 页。

格·鲁·——见鲁卡奇。

格耶, 亚历山大 (Ге, Александр 1879—1919)——第 509 页。

龚帕斯, 赛米尔 (Gompers, Samuel 1850—1924)——第 207、210、601—602 页。

古谢夫,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Гусев,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1874—1933) (真名德拉勃金, 雅柯夫·达威多维奇 Драбкин, 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第 173—174、395 页。

Н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 (Hyndman, Генри Mayers 1842—1921)——第 255 页。

韩德逊, 阿瑟 (Henderson, Arthur 1863—1935)——第 207、210、233、235、238—242、248、261 页。

赫尔曼, 拉迪斯劳斯 (Hermann, Ladislaus 死于 1962 年) (笔名尔·尔·L. L.)

——第 262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第 453、609 页。

华莱斯, 约翰 (Wallace, John 生于 1868 年)——第 236 页。

怀恩科普, 戴维 (Wijnkoop, David 1877—1941)——第 269、341—342 页。

霍多罗夫斯基, 约瑟夫·伊萨也维奇 (Ходоровский, Иосиф Исаевич 1885—1940)——第 679—680 页。

霍格伦, 泽特 (Höglund, Zeth 1884—1956)——第 220 页。

霍纳, 克·——见潘涅库克。

J

基谢廖夫, 阿列克塞·谢明诺维奇 (Киселев, Алексей Семенович 1879—1938)——第 466 页。

季米里亚捷夫, 阿尔卡季·克里门齐也维奇 (Тимирязев, Аркадий Климентьевич 1880—1955)——第 608 页。

季诺维也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 (Зиновьев,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1883—1936)——第 433—437、440、442—443、445、450—451、454、456、458、462 页。

加拉赫, 威廉 (Gallacher, William 1881—1965)——第 233—235、242 页。

加里宁,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Калинин,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75—1946)——第 58、436 页。

加米涅夫, 列甫·波利索维奇 (Каме́нев,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1883—1936)——第 173、436、467、641—644、653 页。

嘉靖科, 阿·普·(Дьяченко, А. П. 1875—1952)——第 6—8 页。

К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 ——第 506、536 页。
- 卡列林,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Карелин,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1—1938) ——第 509 页。
- 卡普, 沃尔弗干格 (Кapp, Wolfgang 1858—1922) ——第 247、260、262 页。
- 凯尔任策夫 (Кержоцев 1881—1940) (真名列别捷夫, 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 Лебедев, Платон Михайлович) ——第 703 页。
- 凯因斯, 约翰·梅纳德 (Keynes, John Maynard 1883—1946) ——第 318—320、322—323 页。
-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 ——第 11、17、85、89—91、120、123、128、130、179—180、187、190、226、228、231、255、261—262、287、301、338—341、517、534、568、600—601、630、692 页。
- 柯兹洛夫斯基, 阿·(Козловский, А.) ——第 533 页。
- 科尔尼洛夫, 拉甫尔·格奥尔基也维奇 (Корнилов, 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0—1918) ——第 247 页。
- 克拉辛, 列奥尼德·波利索维奇 (Красин, 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1870—1926) ——第 319、642—644 页。
- 克莱尼斯, 约翰·罗伯特 (Clynes, John Robert 1869—1949) ——第 233、235 页。
- 克里茨曼, 列甫·纳塔诺维奇 (Крицман, Лев Натанович 1890—1938) ——第 468 页。

- 克里斯平, 阿尔都尔 (Crispien, Artur 1875—1946) ——第 190、228、261—262、338—342 页。
-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扎曼 (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 ——第 322、324 页。
- 克列斯廷斯基,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Крести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3—1938) ——第 424、462 页。
- 克虏伯·冯·博伦·翁特·哈耳巴赫, 古斯塔夫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 Gustav 1870—1950) ——第 340 页。
- 克伦斯基,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 ——第 165、195、202、227、238、253—254、290、326—327、329、491、493、511、514 页。
- 库恩, 贝拉 (Kun, Béla 1886—1939) (贝·库·В. К.) ——第 289—291 页。
- 库拉也夫,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Кураев,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92—1938) ——第 388 页。
- 奎尔奇, 汤姆 (Quelch, Tom 1886—1954) ——第 337 页。

L

- 拉查理, 康斯坦丁诺 (Lazzari, Costantino 1857—1927) ——第 601 页。
- 拉狄克, 卡尔·别隆加尔道维奇 (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85—1939) ——第 193 页。
- 拉科西, 马提阿斯 (Rákosi, Mátyás 1892—1971) ——第 630 页。
- 拉林, 尤里 (Ларин, Юрий 1882—1932) (真名卢利叶,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Лурье,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ич)——第468页。
 拉品斯基, 普·勒·(Lapinski, P. L. 1879—1937)(真名列文桑, 雅·Lewinson, J.)——第321页。
 兰斯柏利, 乔治(Lansbury, George 1859—1940)——第193, 222页。
 劳芬堡, 亨利希(Laufenberg, Heinrich 1872—1932)(艾列尔, 卡尔 Erler, Karl)——第199, 230页。
 劳合-乔治, 戴维(Lloyd George, David 1863—1945)——第235—242, 248—249, 319, 322, 324页。
 累德堡, 格奥尔格(Ledebour, Georg 1850—1947)——第190, 228, 340页。
 李卜克内西, 卡尔(Liebknecht, Karl 1871—1919)——第162, 212, 220, 340页。
 李可夫,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Р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1—1938)——第392, 395, 436页。
 李沃夫, 格奥尔基·叶甫盖尼也维奇(Львов, 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1861—1925)——第290页。
 里季斯(Lysis)(真名累太叶尔, 欧仁 Letailleur, Eugène)——第316页。
 梁赞诺夫, 达维德·波利索维奇(Рязанов, 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1870—1938)——第407, 409页。
 列金, 卡尔(Legien, Carl 1861—1920)——第190, 207, 210页。
 列诺得尔, 比埃尔(Renaudel, Pierre 1871—1935)——第122, 193页。
 列维, 保尔(Levi, Paul 1883—1930)——第318, 321, 557, 598—601页。
 龙格, 让·罗朗·弗雷德里克(Longuet, Jean-Laurent-Frederick 1876—1938)——第85, 120, 130, 187, 193, 568

页。
 卢那察尔斯基,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5—1933)——第361—362页。
 卢森堡, 罗莎(Luxemburg, Rosa 1871—1919)——第212, 340, 600—601页。
 卢托维诺夫, 尤里·赫里桑佛维奇(Лутовинов, Юрий Хрисанфович 1887—1924)——第419页。
 鲁卡奇, 格奥尔基(Lukács, György 生于1885年)(格·鲁·G. L.)——第289页。
 鲁祖塔克, 扬·艾尔涅斯托维奇(Рудзутака, 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1887—1938)——第421—424, 432, 435—436, 438—440, 443—444页。
 吕特维茨, 瓦尔特(Lüttwitz, Walter 1859—1942)——第260, 262页。
 伦纳, 卡尔(Renner, Karl 1870—1950)——第187, 193页。
 罗将柯,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Родзянко,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59—1924)——第202页。
 罗日柯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Рож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1927)——第533页。
 罗易, 马纳卜德腊·纳特(Roy, Manabendra Nath 1892—1948)——第332—333, 336页。
 洛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 1878—1952)(真名德里德佐, 索洛蒙·阿布拉莫维奇)——第405, 408—409, 429, 436页。

M

马尔赫列夫斯基, 尤利安(Marchlewski,

Julian 1866—1925)——第 277 页。

马尔托夫, 尔·(Мартов, Л. 1873—1923) (真名策杰尔包姆, 尤利·奥西波维奇 Цедербаум, 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第 11, 37—38, 90—91, 120, 128, 226—227, 530, 533—534, 536—537, 540, 555, 568 页。

马赫诺,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Махно, Нестор Иванович 1884—1934)——第 366 页。

马克思, 卡尔(Марх, Karl 1818—1883)——第 17, 41, 123, 126—127, 198, 208, 221, 226, 347—348, 511, 513, 580, 606, 609, 626, 647, 689, 691 页。

马林, 亨利克(Maring, Henryk 1883—1942)——第 332 页。

马林诺夫斯基, 罗曼, 瓦茨拉沃维奇(Малиновский, Роман Вацлавович 1876—1918)——第 201—202 页。

马依斯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Майский,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生于 1884 年)——第 32, 491, 534 页。

麦克唐纳, 詹姆士·拉姆赛(MacDonald, James Ramsay 1866—1937)——第 85, 120, 130, 233, 235, 326, 328, 338, 534, 568 页。

梅尔黑姆, 阿尔方斯(Merrheim, Alphonse 1881—1925)——第 207, 265 页。

米留可夫, 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Мило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43)——第 290, 494—496, 498, 533—535, 537—540, 551, 558 页。

米柳亭,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Милютин,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84—1938)——第 446, 468 页。

米罗什尼科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Ми-

рошник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94—1939)——第 642 页。

米雅斯尼柯夫(Мясников 1886—1925) (真名米雅斯尼柯扬,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Мясникян,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第 502 页。

明岑堡, 威廉(Münzenberg, Wilhelm 1889—1940)——第 341—342 页。

莫迪利扬尼, 朱泽培·艾曼努埃勒(Mo-digliani, Giuseppe Emanuele 1872—1947)——第 263, 310 页。

穆拉维约夫, 米哈伊尔·阿尔帖米耶维奇(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1880—1918)——第 38 页。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第 692 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第 506, 536 页。

纳坦松, 马尔克·安得列也维奇(Натансон, Марк Андреевич 1850—1919)——第 227 页。

诺斯克, 古斯塔夫(Noske, Gustav 1868—1946)——第 186—187, 233, 235, 255 页。

O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第 686 页。

P

潘克赫斯特, 西尔维娅·埃斯特尔(Pankhurst, Sylvia Estelle 1882—1960)——第 232—233, 235, 237—238, 242

- 页。
潘涅库克, 安东尼 (Pannekoek, Antoine 1873—1960) (笔名霍纳, 克·Horner, K.)——第 199、202、230、342 页。
佩特留拉, 西蒙·瓦西里也维奇 (Петлюра, Сим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7—1926)——第 366 页。
彭加勒, 雷蒙 (Poincaré, Raymond 1860—1934)——第 641 页。
皮达可夫, 格奥尔基·列奥尼多维奇 (Пятаков, 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1890—1937)——第 392 页。
皮尔苏茨基, 约瑟夫 (Pilsudski, Józef 1867—1935)——第 581 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86—1937)——第 397、418—420、429、436、462 页。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第 190、226、251、255、338、453、600、603 页。

Q

- 切尔年柯夫, 波利斯·尼古拉也维奇 (Черенков,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生于 1883 年)——第 22 页。
切尔诺夫,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 (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6—1952)——第 32、37、90—91、120、128、227、343、530、533—534、536、540、555、568 页。
邱吉尔, 温斯顿 (Churchill, Winston 1874—1965)——第 101、238—240、242、248—249 页。
瞿鲁巴, 亚历山大·德米特利也维奇

(Цюрупа, 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70—1928)——第 644 页。

R

茹奥, 莱昂 (Jouhaux, Léon 1879—1954)——第 207、210、265 页。

S

- 塞拉蒂, 札钦托·梅诺蒂 (Serrati, Giacinto Menotti 1872—1926)——第 221、337、339、342、598、601—602 页。
舍尔,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Шер,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4—1940)——第 22 页。
施勒德尔, 卡尔 (Schröder, Karl 1884—1950)——第 199 页。
施略普尼柯夫, 亚历山大·加甫利洛维奇 (Шляп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1885—1937)——第 419、465—466 页。
司徒卢威, 彼得·别隆加尔道维奇 (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第 226 页。
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Сталин,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1879—1953)——第 436 页。
斯诺顿, 菲利浦 (Snowden, Philip 1864—1937)——第 233、235、238—242、261 页。
斯汀尼斯, 胡果 (Stinnes, Hugo 1870—1924)——第 340 页。
斯维尔德洛夫, 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 (Свердлов, 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5—1919)——第 156 页。
斯维捷尔斯基,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Свидер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78—1933)——第 70、391 页。

斯维亚齐茨基,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Святыц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 1887 年)——第 115、117—118、123—124、133 页。

苏汉诺夫, 尼·(Суханов, Н. 生于 1882 年)(真名吉姆美尔,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Гиммер,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第 689—692 页。

孙中山(1866—1925)——第 454 页。

索柯里尼柯夫(Сокольников 1888—1939)(真名勃里利安特, 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 Бриллиант,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第 632 页。

索罗金, 皮梯利姆·亚历山大罗维奇(Сорокин, Питир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9—1968)——第 610—611 页。

索斯诺夫斯基, 列甫·谢明诺维奇(Сосновский, 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1886—1937)——第 434—435、437 页。

T

唐恩(Дан 1871—1947)(真名古尔维奇, 费多尔·伊里奇 Гурвич, Федор Ильич)——第 533 页。

特雷维斯, 克罗狄奥(Treves, Claudio 1868—1933)——第 263 页。

屠格涅夫, 伊万·谢尔盖也维奇(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8—1883)——第 623 页。

屠拉梯, 菲力浦(Turati, Filippo 1857—1932)——第 186—187、221、262—264、301、310、342、568 页。

托多尔斯基,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Тодор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94—1965)——第 638 页。

托洛茨基, 列甫·达威多维奇(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第

70、392、394—395、402—425、426—467、603 页。

托马, 阿尔伯(Thomas, Albert 1878—1932)——第 329 页。

托姆斯基,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1880—1936)——第 405、408—409、429、432—433、436、465 页。

W

瓦尔加, 叶甫盖尼·萨莫伊洛维奇(Варга, Евгений Самойлович 1879—1964)——第 341 页。

瓦尔克(Вальх)——第 533 页。

瓦扬, 爱德华(Vaillant, Edouard 1840—1915)——第 222 页。

王德威尔得, 艾米尔(Vandervelde, Emile 1866—1938)——第 600 页。

威尔逊, 托马斯·伍德罗(Wilson, Thomas Woodrow 1856—1924)——第 322、324 页。

维彼尔, 罗伯特·尤里也维奇(Виппер, Роберт Юрьевич 1859—1954)——第 606 页。

文德尔, 弗里德里希(Wendel, Friedrich 1886—1960)——第 199 页。

沃尔弗海姆, 弗里茨(Wolffheim, Fritz)——第 199 页。

沃尔斯基, 弗拉基米尔·卡季米罗维奇(Воль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生于 1877 年)——第 37—38 页。

乌·(У.)——第 6 页。

乌尔卡尔特, 约翰·莱斯利(Urquhart, John Leslie 1874—1933)——第 665 页。

乌斯特里雅洛夫,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Устряло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1890年)——第634—635页。

X

希尔奎特, 莫利斯 (Hillquit, Morris 1869—1933)——第568页。

希法亭, 鲁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第187, 190, 228, 231, 568页。

谢德曼, 菲利浦 (Scheidemann, Philipp 1865—1939)——第122—123, 154, 186, 227—228, 230, 233, 235, 238, 249, 255, 261, 327, 339, 601页。

谢尔盖也夫——见阿尔乔姆。

谢烈布利雅柯夫, 列奥尼德·彼得罗维奇 (Серебряков, 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1888—1937)——第418, 420, 429, 436页。

谢烈达, 谢明·帕弗努齐也维奇 (Середа, Семен Пафнутьевич 1871—1933)——第110页。

兴登堡, 保尔 (Hindenburg, Paul 1847—1934)——第13页。

Y

雅柯夫列娃, 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 (Яковлева, 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1885—1944)——第70页。

雅可比, 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第13页。

叶尔曼斯基, 阿·(Ерманский, А. 1866—1941)(真名科甘, 奥西普·阿尔卡季也维奇 Коган, Осип Аркадьевич)——第703页。

叶姆沙诺夫, 阿·伊·(Емшанов, А. И. 1891—1941)——第394页。

伊慎科, 阿·格·(Ищенко, А. Г. 生于1895年)——第419页。

英克平, 阿尔伯特 (Инкрин, Albert 1884—1944)——第237页。

尤登尼奇,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Юдени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2—1933)——第63, 67, 79, 96, 98, 100—101, 159, 203, 366, 489, 494, 497, 581页。

Z

祖巴托夫, 谢尔盖·瓦西里也维奇 (Зубатов,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4—1917)——第210页。

佐夫,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 (Зоф, 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1889—1940)——第437页。